

Nº 0000536

043-7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1947·8—1948·11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 文件汇集

(广东区党委等文件)

1947.8—1948¹¹

编 辑：陈树源、许振泳、唐启军

审 稿：林忠佳

校 对：黄秀华、邝素珊、孟青、林忠佳

编出时间：1989年10月

印刷时间：1989年12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2000份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第256号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藏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甲种本第57册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区党委在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区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广东区党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两广纵队在鲁成立	
——前东纵司令曾生荣任司令员，宣言一直打回两广解放华南	
(1947年8月).....	(1)
庆祝两广纵队成立	
(1947年8月23日《正报》社论).....	(2)
答问(党内参考材料)	
——△△同志在△△干部会议上的答复	
(1947年8月).....	(3)
闻叟：杂写广州	
(1947年9月).....	(19)
某首长为迎接大反攻加强农村斗争的指示信	
(1947年9月26日).....	(21)
加紧工作，赶快立功	
(1947年9月27日《正报》社论).....	(28)
评宋子文主粤	
(1947年9月27日《正报》社论).....	(29)
碧星：张发奎为什么苦闷？(广州通讯)	
(1947年9月27日).....	(30)
准备后事——再论宋子文主粤	
(1947年10月11日《正报》社论).....	(37)
辛之：罗卓英逃不了罪	
(1947年10月).....	(39)

广东人民应走在宋子文的前头 (1947年10月25日《正报》社论)	(41)
文沉：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经济灾难 (1947年11月1日)	(42)
黎展：起来遏制宋子文的乱崩 ——广东时局述评 (1947年11月)	(44)
崔是田：准备好，和宋子文竞赛！ (1947年11月)	(46)
两年来的《正报》工作总结 ——一般概况、编辑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检讨 (1947年11月)	(51)
《正报》编辑工作的检讨和改进 ——十一月二十七日干部会议的决议 (1947年11月27日)	(67)
拾月份保警处布置情形 (1947年11月30日)	(72)
关于税收问题指示信 (1947年11月)	(74)
用焮盛火力教训宋子文 ——各地战讯综合报道 (1947年12月)	(78)
黎展：评“省参会”三次大会 ——广东时局述评 (1947年12月)	(80)

桐庐：“国选”百丑图	
——广东时事报道	
(1947年12月)·····	(83)
两年来我们统战工作总结	
(1947年12月)·····	(86)
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	
(1947年)·····	(102)
关于军事的几个问题	
(1947年)·····	(104)
广东区党委给琼崖特委的指示	
——关于提高党的水平、改进领导作风和选举执委问题	
(1947年)·····	(112)
广东区党委关于解决农民斗争和民主联军问题的指示	
(1947年)·····	(114)
广东区党委关于游击战略战术的指示	
(1947年)·····	(117)
迎接人民的新年	
(1948年1月1日《正报》社论)·····	(118)
星子：艺术工作者到农村去	
——广州纪念于子三烈士发出的号召	
(1948年1月)·····	(120)
俞同：走向胜利，一定胜利	
——1947年的广东形势	
(1948年1月)·····	(122)
胡其亮：青年的魂灵挺立起来了	
——一年来的青年学生运动	
(1948年1月)·····	(132)

方敏：面向着祖国

——一年来的香港青年学生运动

(1948年1月) (137)

黎展：困难紧跟着敌人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1月) (140)

黎展：前所罕见的粮潮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1月26日) (142)

绿波：从广州看宋子文(广州通讯)

(1948年1月) (144)

恨填：替农民撑腰，斗争才发动得起

(1948年2月) (146)

新春论粤局

(1948年2月17日《正报》社论) (151)

桐庐：蒋宋刘卖整个华南

(1948年2月) (155)

再论粤局

(1948年3月6日《正报》社论) (158)

为加强广东人民战斗的一翼发起万元办报基金筹募运动

(1948年3月13日) (162)

放手发展，大胆进攻！

(1948年3月20日《正报》社论) (165)

黄安思：农村第一，面向农村

——“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孰轻孰重”讨论总结

(1948年3月) (169)

△△在三查三整中的自我反省

(1948年3月)..... (178)

辛之：蒋宋出卖华南的新阶段（广州通讯）

(1948年4月1日)..... (195)

桐庐：论宋子文“经建”骗局之败露

(1948年4月)..... (199)

广东财政经济概况

——财经收支及物价与金融状况

(1948年4月20日)..... (203)

张其光：《华商报》改进刍议

——检讨《华商报》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

(1948年4月23日)..... (206)

广东之窗

(1948年4月—10月)..... (215)

坚决执行正确方针

(1948年5月1日《正报》社论)..... (240)

蓝川：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5月)..... (244)

闻挺：TV宋“整理”沙田

(1948年5月)..... (249)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社论）

(1948年5月25日)..... (255)

玉尧：广东水灾可虑（综合报道）

(1948年6月)..... (258)

鲁保：香港工人对“五·一”口号的响应

(1948年6月)..... (261)

半年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 (1948年6月19日)	(264)
蓝川：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6月)	(267)
粤港等地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动态等情报汇集 (1948年6月)	(274)
关于广东的敌情研究 ——对敌人各种武装数量、使用情况、军事计划及军事动态的估计 (1948年6月底)	(301)
鲁保：香港工人的反美帝扶日运动 (1948年7月)	(320)
星星：纪念“七·一”与整党 (1948年7月)	(325)
林锵云致中央转华野两广纵队雷曾电 (1948年7月8日)	(328)
玉尧：宋灾下的水灾(综合报道) (1948年7月)	(329)
谁在制造广东的粮荒? (1948年7月17日《正报》社论)	(334)
千山：宋子文下斜坡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7月)	(337)
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在东江前线发表谈话 (1948年7月25日)	(340)
广东我军伤亡被俘统计表 ——根据匪军所公布“出击及战果”统计 (1948年7月)	(343)

有关武装斗争的参考资料	
(1948年7月).....	(346)
宋子文“军建”的透视	
(1948年8月).....	(368)
正报同人：百期纪念，鸣谢读者	
(1948年8月).....	(372)
敌人呼救无门	
——粤局述评	
(1948年8月).....	(374)
许涤新：论广东经济的特点	
(1948年8月).....	(377)
颜孙：关于宋粤派系斗争	
(1948年8月).....	(382)
新高鹤人民部队发言人指斥蒋宋阴谋出卖 新宁铁路断送华侨权益	
(1948年9月).....	(386)
罗纯：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东江前线通讯）	
(1948年9月20日).....	(388)
蓝川：广东人民武装的发展与现势	
(1948年9月).....	(396)
和宋子文打政治仗	
(1948年10月9日《正报》社论).....	(402)
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10月).....	(405)
欢迎工商业家同人民合作	
(1948年10月30日《正报》社论).....	(411)

广东人民武装分布情形 ——根据K报资料摘录 (1948年10月).....	(414)
颜孙：宋粤内哄新演变 (1948年11月).....	(416)
黄瑛：宋粤限价政策解冻前后（综合报道） (1948年11月9日).....	(419)
千山：敌人在苦撑待死（粤局述评） (1948年11月).....	(423)
正报同人：休刊词 ——告别读者 (1948年11月).....	(427)
（383）.....	（438）
（384）.....	（439）
（385）.....	（440）
（386）.....	（441）
（387）.....	（442）
（388）.....	（443）
（389）.....	（444）
（390）.....	（445）
（391）.....	（446）
（392）.....	（447）
（393）.....	（448）
（394）.....	（449）
（395）.....	（450）
（396）.....	（451）
（397）.....	（452）
（398）.....	（453）
（399）.....	（454）
（400）.....	（455）
（401）.....	（456）
（402）.....	（457）
（403）.....	（458）
（404）.....	（459）
（405）.....	（460）
（406）.....	（461）
（407）.....	（462）
（408）.....	（463）
（409）.....	（464）
（410）.....	（465）
（411）.....	（466）

两广纵队在鲁成立

——前东纵司令曾生荣任司令员，

宣言一直打回两广解放华南

(1947年8月)

(新华社山东九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八月一日在华东前线正式成立。并发表建军宣言。前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荣任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为雷经天将军。这支簇新的人民劲旅，以名扬中外抗战八年有功的东江纵队为骨干扩大而成。宣言中称：愿为彻底粉碎进犯华东的蒋家军并解放两广人民而奋斗。八月二日，该纵队举行干部大会，雷政委号召继承与发扬人民军队勇猛善战、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战（按：东江纵队系于去年六月三十日北撤山东烟台，年来即在华东前线积极整军练武，此次成立两广纵队，系由华东战场所俘获之两广蒋军士兵，自愿参加扩编的）。

(新华社山东九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成立后，特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原电如下：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已于八月一日在华东前线正式成立。我们全体指战员，在你们英明领导下，在伟大的爱国自卫战争中，坚决执行并保证完成你们所给予的一切艰巨任务，彻底粉碎蒋介石对全国解放区的进攻，一直打到两广，解放华南。全军团结一致，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暨全体指战员。八月一日。

(新华社山东九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致电华东军

区，原电如下：陈军长、饶政委、张副军长、谭副政委：我们两广纵队在你们直接领导下，已于八月一日在华东前线正式成立。我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你们的命令和指示，粉碎蒋军对华东的进攻，争取全国大反攻和胜利的早日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暨全体指战员。八月一日。

（原载《群众》第29期，1947年8月14日）

庆祝两广纵队成立

（1947年8月23日《正报》社论）

欣闻两广纵队成立，我们谨向纵队首长曾、雷两将军及全体指战员致崇高敬礼和慰劳，并对他们所负担的“打回两广解放华南”的伟大任务表示切盼和感谢！

这支人民的新劲旅，以名震中外的东江纵队为骨干，结合转变过来自愿参加的蒋军两广俘虏编组而成，他们在中共中央、华东军区和山东人民的领导与抚育之下，一定日见坚强壮大；在解放军的胜利已接近大反攻的今天，他们的“打回老家”的口号也日益具有现实性。

百粤人民的前途更加光明了！认为华南只有长期黑暗的观点已经不会有人相信，奋斗中人民信心更为坚强，没落中的反动派日见徬徨和怯弱！例如反动头子张发奎，他就在最近向京沪记者感慨叹“匪剿不清”，引为生平最“不高兴”的事。回忆去年东纵为了促进和平而北撤，他们是高兴过的，但这种高兴很快便消失了。而且，这种高兴是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东纵北撤之后的实际经验，使人民完全了解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什么和平，更没有民主自由和生活改善，只有拿起枪桿，才能停止反动派对人民的清剿屠杀，停止他

们的征粮抽丁，才能免于饥饿与死亡。因此，人民求生自卫的斗争风起云涌，人民武装队伍日见发展壮大。这是反动派所最不高兴，而人民则最高兴的！两广纵队的成立和他们的打回老家的号召，也是人民所最高兴，而反动派所最不高兴！但是，现实的发展只有依从人民的愿望走，决不会依从反动派的愿望，两广纵队打回老家的口号一定会实现，而日益发展的人民武装也一定继续发展，走着抗战时期的东纵那样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行见不久的将来，一支或几支过去东纵那样强大的人民主力队要出现在华南的土地上，和两广纵队一齐来解放华南，解放广东！

丁叔士感恩（原载《正报》第二年第一期，1947年8月23日）

答问（党内参考材料）

——△△同志在△△干部会议上的答复

（1947年8月）

问题一：自双十协定至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后，党中央提出“和平实现了，武装斗争已成为尾声”，这是对外的宣传，中央一贯知道蒋介石是不顾和平的，但为什么广东区党委却有“和平实现快则半个月，迟则三个月”的估计呢？既说仍要坚持武装斗争，为什么又提出“将农村斗争转变到以城市斗争为主”呢？为什么要提出“转变”的问题？未到决战时期为什么要提出“集中一切力量去冲破法西斯的最大堡垒（城市）”的问题呢？广东党对于当时的局势如何认识呢？

答：对于广东区党委去年二、三月间的时局决议，我的意见归纳起来可拼作一句话，就是“轻重倒置”。因为：1. 对中央指示

片面了解。主要表现在对和平过分强调，对坚持斗争太看重，因此才提出把农村斗争转变到城市斗争，集中一切力量去冲破法西斯的堡垒，这是错误的。中央当时的指示，原文虽然没有在手内，但其要点仍是强调和平不可自得，必须有力量不断斗争才能实现。如果你的力量早就及〔给〕人消灭，还有什么和平之可言？2. 重心摆错。主要表现在区党委决议中所提出的十项方针中，坚持武装斗争被放在不关重要的位置，因为既然必须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才能实现和平，则当前的中心任务就应该是在坚持武装斗争，而不在和人家去谈和平。所以当时区党委的决议在这一点上（主要的一点）说起来，可说是不大妥当。

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究在哪里呢？我以为主要是思想上对下面四个问题弄不清楚。

第一，对中国的革命特点掌握不住，这是主要的。本来毛主席在《共产党人》的发刊词上面早就说过，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是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这即是说，中国革命的力量主要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力量，就没有统一战线。这是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思想中的主要东西，如果对这一点弄不清楚，则所有的思想、方针、政策等都会弄错，首先从武装斗争来说，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统治者特别残酷、凶狠，人民没有丝毫自由，故须以和平斗争方法去达到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就绝对不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至教育文化等，任何一方面都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反动势力的统治在城市及交通要道特别强大，而在乡村则显得薄弱。因此，就便与需要我们首先在广大乡村区域展开武装斗争，以便长期积聚力量，造成乡村包围城市的形势，以最后去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因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式。

其次，就统一战线来说，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基础极为广泛，甚至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也会成为

我们利用矛盾时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因为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是一个，而是好几个，他们之间互相矛盾，当着某一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时，其他的帝国主义就可能起来反对。同样，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也分属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构成几个阵营，所以他们之间也和各个帝国主义一样，互相矛盾，互相斗争。这些矛盾，当我们要集中力量去反对某一个特别疯狂的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时，就可以加以利用，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抗日战争就是如此。现在也仍存在着这种现象（反美独占），但虽然我们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他们的反动性质却没有改变，他们依然要反对我们，而且可能临时和当前的敌人妥协，以便共同联合来反对我们。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同盟者，只能够暂时作策略的利用，应该时时提防他们的暗算和公开叛变。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和镇压他们的叛变，以维护统一战线的进行。

同时中国革命还有一种基本的统一战线，那就是指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可能跟着我们直走上胜利的道路，这是我们战略的同盟军，直接的同盟者，里面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内。但在这些阶级里面，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具有联系，而且害怕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因此，他们常常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当着帝国主义向他进行威迫利诱时，他就可能妥协投降。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定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才能保证统一战线的巩固。当他还坚决与我们一道时，我们要争取团结他；当他表现动摇甚至反动时，我们不怕和他斗争，甚至在不可挽回时也不怕和他分裂（虽然我们对他的整个阶级利益还是照顾）。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的领导权，保证我们的胜利，但在此却非有武装斗争不可。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就是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今天要去实现新民主主义，而且在将来还要去实现社会主义。在新民

主义这一阶段里面，资产阶级还有发展的前途，新民主主义还可以给他以利益，因此在我们强大力量的领导之下，他还可能和我们一道，但一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时，资本主义便将被结束，因此到那时，他就可能叛变引起分裂，这样如无武装斗争，也就不能使统一战线继续以达胜利。

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产生，他的性质和构成又是如此，所以如无力量，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如无力量就不能采取独立自由的政策与立场，结果只配做人家的小老婆。比方今天，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党派为什么敢于拒绝和国民妥协，而依然坚持和我们团结合作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解放区和军队，这支军队不只可以解放我们自己，而且也可以解放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如不依赖我们，他们自己又有什么前途呢？

由上所说，我们就可知道，如果我们当时对这问题真能了解清楚，我们就不会把工作重心放在和平上面，而把它放在坚持农村武装斗争上面。

第二，对广东情况的特点认识不清，这可说多少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说要实现和平，这是有根据的。因为华北、华中我们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强大的解放军，沿海重要城市都在我们包围之下，而当时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峨嵋山上，一时不易调到前方来，他想打也不易做到，我们有力量迫他接受和平条件。同时就我们自己来说，也需要取得和平。因为日本投降后，我们解放区的土地与人口大大增加，军队也有了扩大，我们必须利用和平的时机，练兵生产，扩大群众力量，发展党的组织，才能打下基础准备应付和平不能实现时的自卫战争。因此，中央当时提出的和平口号，是适应客观形势，我们需要和平，而蒋介石也无力量可以打才产生的。

但广东的情形怎样呢？当时蒋介石的新一军、五十三军等一共十八个师的兵力强大地压在我们的头上，敌优我劣。敌人的企图是要完全消灭我们，而不是要什么和平。我们若不能坚持斗争，打破他的企图，和平就是幻想；如果给人家全部消灭，还有什么和平可

谈？所以当时要在广东实现和平，首先是要坚持自卫斗争，保存力量，只有如此，才是实际。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是他如此说我们如此做，我们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当时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把和平放在第一，而把斗争放在第二。

第三，对中央政治攻势认识不清，你们说中央提出和平的口号，是对外宣传，我认为这样说，还不明确，实在说来，这是中央的政治攻势。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和平。国民党一时还无法打也可能被迫假和平。国际间和平空气也很浓厚。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力量可以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和平。在这样的形势下，加上我们在宣传上的进攻，便可发动群众起来斗争，配合解放区的自卫准备，把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完全压息下去。这里主要的条件是依靠我们的斗争准备。你有力量，又有准备，他就无法不接受。所以和平要靠我们有力量去争取，不能赖人给与。因此当时中央提出和平的口号，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拆穿国民党的阴谋，揭露国民党的野心，向国民党发动政治攻势，而不是要把我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的口号上面。这一点我们只要看毛主席返延安后，所说的和平仍要用大力争取，不能自得及其提出的任务中把练兵生产列为第一位就可知道。广东党当时对这一点不了解，把口号当为现实；把政治攻势看成我们的方针；因此就把方向弄错了。假如当时能够强调自卫而配合以和平的政治攻势，指出好战分子的阴谋，则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不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解决城市是革命决战时的任务，在到达决战之前，一切斗争应以农村为主。毛主席一贯来领导中国革命都是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投降之前，中央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那是因为华北华中各地，差不多全部乡村都已为我控制，各大城市都在我们力量的包围之下。到了日本投降，中央又把这一任务再行强调一次，因为这时我们已有了足够力量和可能去夺取平津、济南等各地城市，而且只有夺取了这些城市，我们才能保障更大的胜利。所以中央对这一点的〔强〕调是完全对的，适合实际

的。然而从整个中国来说，由于力量开展的不平衡，大部分地方仍应以农村斗争为主。只有农村有基础，城市才重要。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形来决定，不能千篇一律。

华南在日寇投降之前，只有地区很小的解放区，对于城市远未能造成包围与威胁的形势，农村工作仍须大大加强，才能造成夺取城市并取得胜利，因此它的工作重心仍应着重在农村，而不是着重在城市。当时提出由农村工作“转变”到城市工作，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法西斯的最大堡垒，这是错误的。

但如果当时在这意义下去强调即是说，由于日寇的占领，国民党的破坏，城市工作许多年来已经备受摧残削弱，日寇投降后，有大大增加之必要，如尽可能抽调重要干部派到城市去，对城市的群众斗争应提高它的重视等等，那是对的，因为这样的加强，乃是布置基础准备未来斗争，不是放弃今天的农村工作，集中全部力量到城市里面去。

上面四点，依照我的意见就是当时区党委决议在思想认识上所犯的错误。对于检讨区党委过去的领导工作，特别从思想根源上把这几点提出来，我认为就是对于今天的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拿今天的统一战线来说，如果我们要它扩大，要它巩固，就必须我们有力量，有武装，这是根本的东西。要是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还有谁肯跟着我们走呢？还有谁重视我们和我们建立什么统一战线呢？又如以城市工作来说，我们既然知道，城市工作必须有农村工作的配合应援，才能取得胜利，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该动员一切力量去和敌人作决斗，就应该打下基础，积蓄力量准备为未来的决斗使用，就应该在斗争行动中采纵深配备的方式，避免遭受敌人聚歼。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了解就是如此。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应该提一提的，就是有些同志不明瞭中央当时和平方针的实质，认为在一年的谈判中，使蒋介石得到从容的机会，准备内战，使美国得到充分的时间去帮助蒋介石，因此使到后来全面内战发生

后我们遭受严重损失，这一点他们认为是极大的错误。不久之前，我们的一个地方党就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意见，要求我们向中央质问，同时托派分子也如此大肆宣传，诬蔑我党，说毛主席路线是新机会主义。这种了解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的明确的给予指出，就会上了托匪特务的当。

一年来的和平，虽然给了蒋介石以准备内战的机会，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一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也取得了很大收获，这些收获对于我们后来的斗争给予了最后胜利的保证，在这里我可以举出几点：

1. 日本投降后，我区我党有了二倍左右的发展，这些发展起来的东​​西必须加以巩固和加强，在一年的和平中，我们利用了这个机会都把它完成了。

2. 军队得到了训练与整理，日降后，我军增〔加〕了好几倍，尤其是东北增加得最快，但增加了起来的新军，是不能马上打仗的，特别是重武器增加了不少，可是不懂得使用，仍然没有用处，故必须有一个时间去学习和训练，在这一年中，我们也通通学会了。

3. 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展开，蒋介石陷于更大的完全孤立，如民盟在我党七大开会时，对他的估计还不敢太高，他们还有许多人对我党政策表示怀疑，对蒋介石还有幻想采取敷衍而不敢断然抛弃的态度。对于我党的武装斗争方针，不大同情，但到了今天，他是如何呢？显然的，不仅数量大大发展，而且质量也提高。如对土地改革的问题，他们都同意了，蒋介石的三番四次的拉拢他们都拒绝了，而且越来越坚定地更加紧靠着我们了（当然仍可能有分化动摇出去的人物）。这是不是成绩呢？我以为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4. 延安整风，干部利用了和平安定的环境分散到各地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国并成为每一地区的工作指导，因此使党的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应该重视。除此之外，如我党的国际地位提高，威信提高等也是一种胜利，也应该估计到。

总之，日本投降后的和平，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在客观上当时确有实现和平之可能，在主观上，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个和平时间，才能重整力量，准备更大发展。虽然在和平中，我们作了无数的让步，但那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譬如过去撤退八个地区，许多人觉得让步太大，但毛主席说，不撤也要撤，我们不能张开五个手指去打人，应该捏拳头去打人，只有这样才会使人觉得痛，才会使人失败。我们中国，土地实在太大，足足等于一个欧洲。欧洲革命已经进行了一百年，而且又出现了马恩列斯等伟大人物，可是到今天革命还只是在局部地区胜利。我们中国呢？革命才不过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出现了一个毛泽东，我们想一下子就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必须一块一块地去啃，不能心急，心急起来想把它一口气吞下那也是消化不了的。

问题二：自卫战争发生后，人民解放的前途在广东将如何变化？可能遇到怎样的迂迴曲折？在各种变化下，华南党将取何种政策？我们农村斗争的策略线如何？既要在政治上战略上进攻，又如何准备走迂迴曲折的道路。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分开三点来说：

1. 关于总反攻与总胜利问题。总反攻是指解放军在军事上的反攻。总胜利是指全国性的我们革命的整个胜利。这可以说是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两件事情。所谓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由解放区的军事反攻开始，加上全国各地及各方面的进攻配合，彻底消灭敌人，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是我们今天主观上的一种要求，大家都希望如此做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条件。所谓是两件事情，意思则是说，总反攻及全国的进攻如果不能依照我们的预期的目的，则解放区总反攻虽然胜利了，但蒋管区仍可能未立即解放，仍要斗争。因此我们的要求尽管是由总反攻走到总胜利，但实际工作的布置仍要把它分做两件事情。所以把它看做两件事情，是从我们的工作布置做出发。

今天的解放区的战场主要有三：东北、山东、陕北。先谈东北，我军最近的动向，显然是把主力逐渐移向南满，目的是要把蒋军内的后方交通线切断，占领资源地带，压缩蒋军于一二据点，断绝其一切供应，然后关起门来打，在原地消灭其全部力量。在陕北也是如此，一面向陇东发展，斩断蒋军之左翼，另一方面则攻打榆林，截其北方及吸引其兵力北向。至关中分区的扩大以及晋南的占领黄河一切渡口，也是在使蒋军既无退路，又无法可以增援，目的也是关起门来全部消灭蒋军。刘部的渡河东向对于山东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全部的情势是在加强大歼灭性的布置。

在这里就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解放区在总反攻胜利之后，继续打出解放区以夺取全中国呢？还是就这样停顿下来让蒋介石再获得一个偏安喘息的机会呢？我以为主要关键在看总反攻中是否全歼了蒋军的主力，及蒋管区的斗争如何来决定。今天蒋介石正在守点避打及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在台湾继续训练新军。最近各省市主席的会议又决定征粮八千万担，拼命抓丁抓粮，企图补充他的力量，等待时机继续进攻。假如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这个计划，不能给与打击破坏，那么，蒋介石在前线的消耗不大而又得到源源补充。以蒋后方的人力物力和我长期周旋，那么总反攻的期限固然要延长，就是总反攻到来时也不能马上转入到争取总胜利。相反，假如我们的歼灭战打得好，在蒋后方的工作做得好，不让他征粮，不让他建立新军队，扰乱他的治安，摇撼他的统治。同时在各地的农村斗争，武装队伍又充分展开与建立得好，那么总反攻到来时，我们就可以取得与解放军抽兵南下配合，这样就可能使得我们立即去进行夺取整个中国争取总的最后胜利。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存在着总反攻可能同时就是总胜利。但战争终究是战争，须靠许多条件，更须靠我们主观努力的程度才能决定。今天美国正在积极援助蒋介石，替他灌血，这一点自然会加重我们的总反攻的困难，但相信至多只能拖延一些时间。我们的总反攻总要实现，我们必能把蒋军歼灭或打出来。然而，如果是把

它打出来而不是歼灭，而他又利用他的后方不断生长新力量，我们不能破坏他、阻止他，则总胜利就不可能跟着总反攻出现。因此，能不能够实现总胜利，还要看未来的形势，如果我们准备得不够，配合得不好，很可能只把蒋军驱逐出解放区或甚至长江以北之后，仍有一个大大的迂迴曲折的可能。所以我们主观上虽然要求总反攻与总胜利同时实现，但在实际布置上，我们却不能不把它分开为两件事去准备。但怎样准备呢？下面就回答这个问题。

2. 争取好的，准备坏的。我的意思认为，我们的整个方向应该向着争取总胜利这一道路前进，这就是取好的。但同时我们也要估计到，在总反攻之前或在总反攻之后，蒋介石也可能抽出一部力量集中起来进攻我们，如果我们事先没有这思想准备，一切都朝着争取总胜利的方向去布置，如力量过早暴露，时机未成熟或准备未周就迅速公开等等，就可能遭受损失。中央指示要我们扩大群众性的普遍的游击战争，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打下群众基础，准备建立根据地。不要过早打大仗，不要过早虚张声势，也就是为此。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必须是首先打下基础。如果这一点做得好，就是把蒋介石的下层反动势力消灭清光，而我们在广大地区的群众中间树立强固不拔的基础，则蒋介石的集中力量有扫荡我们时，他所〔将〕摸不着我们的所在，无从下手。我们仍能坚持以待时机，而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集结主力，建立根据地，配合解放区的总反攻而走向最后的总胜利。这就是所谓准备迂迴曲折，也即是作坏的打算去准备和布置。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万无一失，永远胜利。这里归纳起来，就是我们为着争取总反攻与总胜利同时实现，我们必须大胆放手，猛烈去进行和发展。但同时我们为着防止可能的迂迴曲折，我们又不能不小心谨慎的布置。因此在下面我再提出一个标准问题。

3. 策略方针是在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下去放手。上面已经说过，形势的发展不一定是按照着由总反攻到总胜利那么笔直地进行，在这中间可能仍要出现一些迂迴曲折。因此，我们的目标虽然

是朝着总胜利的方向大胆放手发动，然而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这三个原则，才不致冒险。这是我们今天的政策方针，也是我们放手的尺度。

所谓有利，就是利用敌人今天后方的空虚，大胆广泛普遍的展开游击活动。不过早和敌人主力打大仗，着重消灭地方恶势力，组织群众分散建立主力，创造山地根据地。一面使敌人不能再从广东抽兵增援前线，加速他的崩溃，时机一来我们就配合反攻。一面又使敌人抓不着我们的目标，过早集中力量来进攻甚至消灭我们，这就是有利。相反，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机，不放手发动，等到时机到来时我们无力量配合，那就是不利，也就是丧失时机。但我们虽然抓紧了时机，虽然敢于放手发动，可是放手却毫无节制，这就会过大。例如我们今天马上就建立公开的根据地，打起公开的旗帜，到处大打，和敌人主力硬拼，不讲策略，反动势力也打，中立地主也打，造成四面受敌，这样就会使敌人调动大兵，并且联合一切敌对力量同时来攻打我们，于是我们就陷于不利，这就是无节。因此，纵然是有利，但如果我们搞得不好，也会变成不利，自然明确规定一种限制，这是很困难，弄得不好反会束缚手足。然而，我们如无思想准备，打算即在最坏时仍能妥善应付，那也是一错误。

至于所谓有理，就是说针对今天蒋管区人民的普遍不满。如饥荒、水灾、征兵征粮等。提出包括广大人民要求的口号如反三征、破仓分粮等去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我们的口号必须包括最广大人民的要求，然后我们才能站在有理的地位，然后才能动员得起人民，人民才能拥护我们，这样才能达到普及。不然，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高的口号，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口号未深切认识，我们不能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就孤立。所谓有理无理，就是看你的口号是不是能够动员得起最广大的群众，是不是能够得到最广大的群众的拥护来决定。因此，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解决，而不是凭着我们的主观愿望。

上面三点就是我们对广东具体形势的了解及今天所采取的策略

方针。为使大家更具体明瞭起见，下面我再把东纵北撤后这一年来，我们在广东怎样地根据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不断提出新的口号与方针去实行领导这一具体过程。

4. 一年来的口号。一年来全国以至广东的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的口号方针可以分做五个阶段：

(1) 东纵北撤前后，这一时期我们的口号方针是保存农村据点，保存干部。方式是强调荫蔽。但必要时则采取自卫。我们当时做出这样口号的根据，是因为估计到东纵北撤以后，国民党必然疯狂清剿，大肆屠杀，他们想在北调之前，全部彻底扑灭我们，以免后顾之忧。而我们当时，则北撤之前怕其包围歼灭，北撤之后则力量又已薄弱分散，如果和他硬拼，必然损失很大。当时这一口号在我们党内曾发生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应该强调自卫，不宜强调荫蔽，这一点在当时来说，当然也有理由。因为那时太强调长期黑暗的可能性，估计将有十年八年的黑暗时期，因此决定各地方组织不采取联系，留下的队伍可以暂时去当土匪等等，影响到党内，一时充满着悲观消极的空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同志认为应该强调自卫，这是不可非议的。然而从当时整个客观形势来说，我以为上面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蒋介石军队正在集中力量来大举清剿，如果我们一意硬拼，必然使原已荫蔽分散起来的力量全部暴露，便利于敌人的剿灭。而北撤以前东纵主力又在敌人重重包围下更易遭聚歼。而且则在东纵未撤时，主力仍在，已有部分干部表现出失去信心。当东纵北撤之后，形势更加困难，如果太强调了自卫，而不允许荫蔽，更可能招致损失。但我们当时强调荫蔽，精神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反对过去那些张惶恐惧悲观失望，把荫蔽看做永久的长期的黑暗，这样会使整个党陷于瓦解。所以我们一面强调荫蔽，一面又提出必要时采取自卫。这就是说荫蔽是有限度的，荫蔽不得时就该自卫。这样才不会拘束干部的手足。

(2) 八月之间：这是东纵已经完成北撤任务，而蒋军主力也先后北调参加内战，敌人清剿则更加普遍深入，因此我们的方针就

强调自卫。因为东纵主力北撤，敌人包围聚歼之机会已消失，我们必须强调自卫，下面的干部才敢放手去抵抗，而我们的据点和力量才能保存。

(3) 十月十一日张家口失守以后，此时全面内战已正式决定，和谈的一切可能全部消失，今后的局面只有打下去才是出路。因此这时我们就提出反对三征，破仓分粮，用以积极动员群众向蒋政府展开斗争。这一个口号的内容精神上显然是已由过去的自卫转入进攻了。

(4) 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间：经过几个月来反三征破仓分粮的斗争之后，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已经扩大。我们部队的活动又已增加和发展。在人民中的威信又再提高。因此我们提出准备展开广泛游击战，再次遣派干部回到农村去。然而这时一般干部却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再回农村当然不成问题，但将来搞下基础之后，会不会又来撤退？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明确解答，将会影响到干部今后工作的信心与不敢放手。因此，我们又重新检讨与讨论这一问题。结果决定把口号改为“为创造根据地而斗争”，这样问题就得到明确的解决而且更与形势密切配合。这可说是由下面的干部教育了我们的。

(5) 由今年二三月起到现在：这时全国形势已有了大大变化。蒋军大量遭我歼灭，侵略区相继收复过来，蒋军形势日趋不利。而广东呢？则我军亦有了几十倍的发展。联系的群众亦更加广泛，而且由于蒋政府的无止境搜括，人民忍愤痛深，都起来发动斗争。因此，我们就从这时起，把创造根据地的口号预示其发展前途是为建立新解放区而斗争。这是我们今天一切斗争所要走向的最终目标。

从上面这五个时期看起来，我们的领导都是跟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并无停留。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这个口号的内容问题，领导同志之间虽有不同意见发生争论，但基本上说来都是一致的。至于这些口号提出的对不对，希望各位同志多多提出意见讨论。

5. 当前的具体任务：目前我们的口号虽然是要朝向建立新解

放区而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标。但是将采取怎样的具体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呢？这是要回答大家所提出的问题的最后一点。

今天我们的活动方针，仍然是展开群众性的广泛的游击战，着重消灭地方恶势力，求得普遍发展。因此，活动的方式是分散的，多种多样的。我们认为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才能打下坚实基础，使我们能够来去自如。同时又不致引起敌人注意一个目标，过早集中力量来进攻消灭我们。这个方针我们稳定之后，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达到我们建立新解放区的目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之下，我们又同时照顾到重点布置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并已经着手去做。至于重点的选择，大致是根据这样的几个条件：（1）群众基础较好；（2）党在当地有影响有基础；（3）我部队已建立起或可能迅速建立起主力；（4）地形适合（如有广大山脉）；（5）其他条件亦较×，如有上层关系可资掩护，粮食充足，不易封锁之类。

对于这样的方针，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并须彻底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山地与平原，重点与分散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记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平原为着山地，山地支持平原，分散为着重点，重点支持分散。而它们本身也是如此。例如以平原来说，我们提出普遍发展游击战，但其中心也是必须建立发动斗争的主力，以主力做骨干，团结着无数的大大小的游击队，游击队做××，又团结着广大的民兵与群众，形成像所谓宝塔式似的一套系统。故所谓平原与山地，重点与分散，都是互相照顾的，有系统的，不是各自为政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稳固，才能打败敌人。所以我们反对那种无中心无领导的涣散乏力的普遍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实现这一口号方针的具体办法。希望各同志也提出意见来讨论俾得更加充实。

问题三：我们此次下去后，如碰着思想不一致应该如何着手工作？并应着重一些什么问题？

答：关于这个问题根据过去经验应该采取下面这几个原则去进行：

1. 从大处求一致，从小处去下手——譬如在去年东纵北撤前后，各地党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尤其是思想上的不一致，更是一切混乱的根源。例如有的同志强调长期黑暗，有的反对，有的强调荫蔽，有的强调自卫，有的主张上层重要，有的主张下层重要，有的强调城市工作，有的强调农村工作，总之思想上失去了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先从思想上去解决，使大家在总方向上求得一致，其他问题才能着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就集中力量去弄清思想，把上面的问题给以明确的解决。然后就从局部的比较已弄清楚了情况的地方或部门首先着手去逐步进行。如对比较熟悉的小的地区，比较接近而集中的部门，首先从这里开始，这样使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首先获得解决之后，藉以此去逐渐推动其他部门或其他地方。我以为你们将来下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仿照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当地的问题。如不然，看见这样不好，那样又不好，想一下子就把全部问题都一一获得解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当着干部的思想尚未搞通，而你偏要过急地去勉强进行时，稍为弄得不好，就会使事情愈弄愈糟，以致放松了当前对敌斗争的一致。我以为在一切问题上最要紧的是先使大方面不错。因为这是一个最紧迫的与当前敌人拼死活的斗争问题。这个问题弄得不好，使自己力量蒙受损失甚或给人打垮，则一切都谈不上。所以只有大方向一致，齐一步骤以对付敌人，则其他的一切问题从或还有许多缺点，也可以一步一步地去改进以致克服。例如拿东纵北撤的问题来说，当时这个决定是没有错的，应该北撤的，这是当时党工作上的主要方向，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求得一致。但当时有没有缺点呢？无可否认是有的。如对复员同志的照顾不够，对坚持工作的布署不周（如干部与武器）等等都是。然而是否可以因为这缺点的存在，就否认北撤决定的正确，甚或反对北撤呢？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应该在北撤这一点上求得一致后，其他的问题分别出大小轻重缓急去逐步求得其解决，才是正确的态度。

2. 承认成绩要求提高。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种工作，都必

有其成绩和缺点，我们不能凭着主观的要求拿一般的尺度去批评一切。我们应该根据其当时客观的具体条件给以正确恰当的评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避免“事后聪明”的乱发批评，才能使人心服。如果自己事先就怀着一把主观的尺度，把这一尺度去量这里，量那里，自然是没有一处适合的。譬如你拿八路军的标准来量新四军，自然觉得新四军有些不够的地方，新四军有许多地方还应该改进（现在新四军已改进与八路军看齐了）。同样，你拿新四军的标准来量东江纵队，当然也觉得东江纵队更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应想一想，在远离主力军和党中央的南方，靠着当地经验不多的干部，艰苦奋斗创造出这样的一支队伍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总算是同志流血流汗所奋斗得来的结果，我们不能一笔抹煞。如果一笔抹煞就等于推翻了现存的新生起来的基础，而过去同志们的努力和奋斗就变成白费，这样是无论如何也不对的。我们不是否认过去的一切与来从头去创造，而是承认过去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再去改进再去提高。我们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一道来做，把事情做得更好，把原来负责的人的威信更加提高。决不是把别人挤掉，让我自己再来做过。所以你们将来下去之后，首先应该承认同志们原来奋斗的成绩。在承认了这些成绩之后，再提出要求使这发扬光大，更加提高。因此，就检讨做得不够的地方，检讨各种缺点，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同志们一道做〔从〕部分下手去做。这样事情才会顺利解决。同志们也才能心悦诚服。如果不然，那是会把事情弄僵甚至引起干部之间的团结破坏的。这只有方便了敌人，损害了我们自己。但这里同时也要注意，我们承认成绩，只是说承认已有的基础，在这基础再去提高。决不是说，承认成绩，满足现象，固步自封，以致妨碍我们的进步。

3. 影响推动，启发反省。上面说到我们应该首先承认成绩，然后检讨缺点，提出改进。但当检讨缺点时，我们仍要注意尽量避免正面指摘〔责〕批评。因为当同志们的思想尚未搞通，认识上尚

未深刻了解这些缺点时，可能一时不易接受，如果勉强去做，则徒然引起反感，对事情的解决并无实际帮助。所以我们首先应从部分着手，建立起正确的路线与作风，然后慢慢地以它做例子来推动其他以及于全体。当全体或大部分有了新的认识便愿意改进时，然后又按照实际的条件，来推动全面的反省与全面的改进。而当检讨缺点时，也尽可能首先从自己来开始，藉此去启发对方的自我反省，然后帮助他去改进。不可徒事正面批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改造，不是一篇〔遍〕谈话就可以做到的，必须依靠干部的认识了解及其经验才能做到。当他思想上尚未彻底认识时，你应该拿具体的事实或旁的例子来给他看，这样从侧面去影响推动，引起他的自我反省。等到他的反省发生，然后更进一步去推动使他走向成熟，这样我以为所收到的效果一定较大。这就是说，我们要反对不对的应该做出一套好的来比较，推动，而不是空谈。希望你们好好地去研究，运用。

杂 写 广 州

(1947年9月)

闻 叟

“魏去” “孙来”

八月十六〔日〕华盛顿战神魏德迈翩然莅粤了，他是这样来去匆匆的，仅停留一宵。但行辕首脑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但不料魏德迈巡按临别时竟装腔作势地对张发奎板起脸孔说：“我见过的各党派代表，在华南是没有自由的。”市面传说着这是由于《每日论坛》报社长章导，曾单独“晋见”老魏，在十五分钟谈话中，痛陈省市当局的摧残文化，不惜以“栽赃”手段，诬陷自由派的报刊，说得慷

慨激昂，张发奎便因此受了一顿“教训”。其实这说法是并不中肯的，巡按大人早就准备摆出这类骗人的姿态的。

跟着“特使”去后，便来了孙科。二十六日晨在行辕官舍招待报界时，除了大骂一通外，自然而然的谄媚主子美国一番。他说：美国除了“军事顾问团”还驻在中国之外，“正式美军”是一个也没有。接着，他又用颤动得发抖的声调，指责“民盟”。有一个不相识的党报记者向他动问：“魏特使离华声明，是否即为美将退出中国的先声？”孙科愤然答曰：“不，绝对不会的。”他认为我国有的是“自力”，不甚稀罕“外援”。“英国会不会听从故罗斯福总统的主张，在最近交还香港？”又一人问，孙答：“照目前形势看，此说言之过早。”他骂中共时，口沫四射地胡诌了将近一个钟头，弄得他的老婆陈氏也不耐烦起来，当堂大叫：“说了这么久了，还未讲完吗？”他才慢慢停下来，你看这镜头过瘾吗？我当了八年记者从来未看过雌老虎的威猛一至于此！

“藩府”的内哄

在“魏”去“孙”来前后，广州官场喧嚷着粤省政局改变。那些谣传不是说黄镇球、薛岳主粤，就是说马超武会南来，弄得大小官员惴惴不安，但是谣言自谣言，在陈诚总长撑持下的罗卓英，还是匕×不惊，他一声不响的踢走李扬敬，换上一个詹朝阳，压迫谢文龙，授意各界组织马鞍围调查团，搜集防潦工程的舞弊证据，疏远杜梅和，而替罗楚材与蓝逊（实业公司新旧经理——罗的私人帐房）撑腰，在“省市分家”的业务下，又嗾使李东星（社会处长）与欧阳驹捣蛋，在工商界则收买李德轩，这些官僚正在内哄方酣，至今未闹出一个清楚的眉目。

报业如斯

在这热懔的夏季中，报业的演变也颇出奇，从前以广东《大公报》自命的《建国日报》，销数据说已从近万惨跌至不够两千，罗

家公司的《华南日报》最初是大吹大擂，可是后劲不继，他的招牌很快的就要黑起来。与省党部的“岭南”李大超的“西南”成为鼎足的“广州三南”，都是黑面孔的官报，很少人愿意看的，此外 C C 头子高信的《广州日报》，因为没有人重视，日趋下流，以黄色的淫亵的社会新闻号召读者。销数多了几百，那位社长张希哲还自认为得计。《前锋日报》的社长是市党委刘伟森，内容大捧小骂，副刊每日不同，举凡男女饮食，风物志，新闻眼，社会色相无奇不有，最近居然销数大增，大购其捲筒机，乔迁南堤新址，当“魏特”来穗时，趋炎在“谒”的社长就是刘伟森和“岭南”的廖英鸣，前者大登其特刊，向“魏”大告洋状，文章读了使人肉麻。最近由晚刊改日报的有“环球”，社长郭英殊是新被南海县罢免的省参议，他很狡狴，明白广州人心理，要读些“四不像”的新闻，故决定“九三”出版的计划，是包罗万有，如“讲古寮”“大眼仔”之类副刊，比“前锋”还要贱格了。

特别市的广州，确是越来越显出“特别”的样子了。

（原载《正报》总54期，1947年9月13日）

某首长为迎接大反攻 加强农村斗争的指示信

（1947年9月26日）

（一）五月来事变的发展，以及我们农村斗争胜利的展开，证明我们五月接受中央指示的正确性。全国解放军的大反攻，蒋介石在人民反对、兵力薄弱、后方空虚几个条件下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危机，宋子文主粤就是蒋为着挽救

这种危机的最后挣扎。

(二) 长江以北的解放战争在急剧发展，长江以南的游击战争也风起云湧，蒋后方统治已成为战争必败的致命伤。中心在于如何更加无耻出卖获得美援；如何缓和英美矛盾；如何统一广东反动势力；如何更加剥削工商业、金融，抽剥群众，更加离间民主力量，拉拢地方势力，以便剥削广东以及西南各省人民，以增加物力、人力、财力来支持蒋的战争，展开国际中港贸易协定的谈判。宋之主粤后之“粤”客系地方势力的调解，对港方个别人士的拉拢，悉是具体事实的表现。

(三) 宋蒋仍有矛盾，英美矛盾虽或一时可以缓和，但基本上不能解决，粤以及西南地方势力与中央的矛盾的不能解决，特别由于蒋的败仗可能更加离心，但蒋宋的四大家族是不可分割的。西南地方反动势力，企图新的结合也是为着对付革命，我们对此虽然策略上可以利用他们倒蒋，造成英反动派之更加速覆灭，但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幻想。我们只有独立自主大胆放手的依靠群众，猛烈发展群众斗争、游击战争，利用宋子文基础未固以前这个空隙，创造出广大农村据点与武装组织，才能有力打破蒋宋企图。

(四) 五个月南方农村斗争的急剧开展，根据初步总结，证明中央指示所说的：“武装力量散布得愈广，发动群众愈多，先从多歼灭乡村地主联保武装做起，便愈能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根据地奠定基础，就不致引动保安团队过早集中的调来清乡。由分散的武装据点到集中力量建立成块的根据地，还需要经过一些过程”完全正确。东江南岸的武装的十倍发展，地区普及六县，小型主力在不损害分散活动的武装力量下之建立，减租减息之实施，平原税站依靠群众之坚持，敌人找不到目标扫荡之失败，是较着于中央指示与我们决议的模范典型，值得我们发扬与学习。其余各地同样有许多光荣成绩，虽然个别地区对中央上面所指示理解不够，有的过早使用会合，过早打大仗；有的掌握政策不稳，损及富农、中农及小商人利益；有的不敢放手分散活动，限于狭隘地区活动，集中力量于

建立主力，有的仗虽打得胜利，但群众的烧杀骇怕跑动我们隐蔽或暂时离开；有的斗争虽然发动与胜利，但忘记了党与群众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有的造成赤白对立，陷于敌人据点封锁之间，使我们不能更大巩固发展。但几个月各地都打下了基础，都建立了大小不同的主力，显然的在这个新形势底下，我们不只是克服以上的困难、错误与弱点，我们一定更胜利的前进。

（五）大反攻既然已经到来，而大反攻的战略方针，我军又是外线出击的强大攻势，它在敌人后方空虚、兵力削弱，而人民又拥护反蒋的条件下，可能大踏步前进。首先发展农村斗争，以包围大城市最后解决大城市，故加强我们的农村斗争工作是更有力的准备迎接大反攻，目前南方工作应有如下改造：

1. 在已经普遍发展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之游击战争地区，必须抽调部分兵力组织主力，创造较能独立作战而能到处配合游击队、民兵作战的核心，是目前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基本任务。但它必须：①不削弱地方性的武装活动；②不是硬性改编，而是在配合行动中吸收一班一排或在游击队、民兵整训个别吸收；③按照活动地区大小，经济负担能力以便有效打击敌人之分散部队，又能活动自如的原则来决定主力的大小；④未得上级许可不能擅挂军区、军分区名义，按各地情况以支队面目出现。

2. 相反的定以主力出现，去发展游击战争的部队，则应调出精干短小队员配合地方干部的政治干部，组成若干地方性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去钻入敌各空隙地方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民〔兵〕游击队，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帮助地方解决军事干部，一直到它能单独活动，才看需要否撤回所派武工队或挺进到异地发展。

3. 战术的运用，仍以分散发动，开展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为主，对可以歼灭的有生力量及可以攻取的若干中小市镇，则应灵活根据中央最近决定，“以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先取广大农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灭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反复多次，才

能最后保守或夺取之……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力求敌人打运动战；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战、伏击战及一些有缴获的袭击——不要攻坚”加以研究运用。

（六）发展游击据点与根据地问题，应本着中央“以能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根据地奠定基础”的指示为原则，把K顽政权变为我之政权，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不可过早突击暴露，以致遭受封锁、围困、扫荡，增加发展的困难。因此对敌政权形式，可以采用江南所采取的，不能是自己主持乡政，便应是进步分子，不能进步分子，便是中间人士，不能中间人士，便较解放政治头脑人物，连这种人物都不能得到，则利用两面分子，利用其联我之两面性之要求，反对联国方面给予斗争种种形式，由可能全部反对K顽政策到不可能局部反对个别破坏，软拖哀求，以群众性的非法的配合运用，总以求得上层关系及下层群众的结合，保护群众自己利益以至逐渐走上完全属我控制指挥为目的。主力武装行动的保护群众应是配合的，不可能长期住在一个地区保卫群众，等待形势发展，条件成熟，有巩固胜利把握时，我们当指示如何建立公开政权。

对于统一战线上层关系之使用，应该明确决定，不可和××一样的要人去当K的团队，又要即刻收其武装，要准备兵变的，要待收集情报的，要代采购军用品的，要代掩护交通的，要以合法阻碍敌人全面进攻的，要它掩护下层活动的……应该各有目的去布置，不要不看朋友可能与否事事运用，不要不从协商而强人以不愿做的事要他做。过去的闹翻，只有自己孤立不能发展。

对于伪军土匪应采取改造及远交近攻的两面政策，对反共反人民进攻我们的如说服不改，在我地区活动，阻碍我发展，可能时坚决消灭之。其较远地方矛盾较小者则拉拢之，此点也适用于挂名是民主人士领导的武装。

（七）对于群众利益，破仓分粮，减租减息，为的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组织起来发展游击战争以至最后解放。虽然在许多地方做起，但大部是属于“恩赐”的武装行动，甚至一些群众虽然吃下

去了，但给反动派一压，连胆汁都吐出来，得不偿失。特别是某些地区，因部队过大，给养困难，对于征谷缴粮竟侵犯了贫农、中农及同志家属的利益，用光吃光，导致群众“白也走”、“红也走”，这便违背了我们动员群众的目的。

群众利益的口号，必须根据南方党的当前政策（反三征、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目前应广泛的宣传发动群众，一俟力量形势变动后再决定通知实行。由群众磋商提出来，必须在布置斗争以前，在群众中分开来小漫谈、大漫谈，收集材料，决定政策口号，再回复到群众去讨论通过，然后，再决定推行方法，动员方法，有步骤、有计划去进行。对于已经进行而违背群众利益的一种措施，必须立即停止，必要时应向群众认错，以至于尽可能赔偿。

部队的行动打仗，必须照顾群众，避免受顽军摧残，或减少摧残。不可与群众对立，而应倾听群众意见，和研究群众各种应付顽军的各种技术问题。

队中的个别流氓土匪习性未除分子，必须加强教育，严紧注意，不使损害群众利益；不单独派他去征收谷物税收；不轻易听信其报告去征发农户财物，以减少下层执行政策的错误。

日常生活的群众利益，如调整种田种子，修理水利坡圳；如卫生教育娱乐；如日常用品的消费合作，农产品的运出贩卖……不应嫌其微小销屑，仍应时时注意，帮助群众解决。加深D与群众的日常联系，而团结各种人才来工作。

群众组织主要为农民形式，但一定要根据各地大小情形组织各种形式（如抗征团、铁血团、兄弟会、合作社、新民主青年会……）。总之适合于更广大的群众要求为主。

（八）对于经济财政，必须树立经常收支制度，不但平衡收支，而且开始积蓄财富，打下大搞的本钱。打土豪、捐款、没收反动派财产，都是临时收入，不是长久可靠来源，因此，对于减租减息，胜利后的征粮（不胜利最好不收），对于交通孔道的税站，对于有计划的生产（农工商业）三大来源，必须成为我们解决经济

的主要方针。但征粮征税一定要比恶政府征收比例减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而且还必须采用简单累进办法。征收起点，必须保护群众生活所必需的×担以上开征累进提高，或作人民必须消耗品（油或布），奢侈品原定税则（免收、轻收、重收），对于已罚款或已收粮税不论任何人物必须保护之。过去侵犯中农、贫农利益必须赔偿，临时借款必须给予借单，俟财政充裕时分期偿还。

对革命家属于地主者，除照一般地主措〔处〕理外，必须为优待“解属”的同等待遇。

支出必须有制度，暂时采用平等原则。官兵生活共同甘苦，将来事业发展巩固以后，再来研究等级制度（已定等级制度的应尽可能说服干部降低），照顾大众生活适当提高，照顾有功劳老弱干部老战士，照顾伤病员是我们生活的支出原则。临时额外支出一定经会议决定，再由负责人批准（一定数量内负责人批准后再在会议报告）。今天提倡节约刻苦，为着未来胜利的伟大事业，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金钱（金银、美钞、港币）物资的保管，必须有专人负责，必须有负责人经常检查，及向党、军、政负责人作报告，以杜侵蚀贪污。

（九）对反奸清算工作，集中发动群众剷除地方反动势力等主要问题，但必须认清镇压是为着争取，杀人是万不得已的大事，因此必须是广大群众所要求的杀一能够儆百。下级部队及区乡政权的战争情况或与上级失了联系，杀人都须经过一定会议通过及经上级批准，对党员及干部的错误，绝对禁止任何超过党章规定之处分。

清算地主反动派，必须有一定期限（如闽西决定清算至三八年，东纵地区清算至东纵撤退时），老帐不算（因过去已算过些），才不会引起其大纠纷，而带有教育意义（合作后还做坏事，人人会骂他反党）。

逃跑分子如非带枪的，以后允许入队，带枪收回枪权令出境或老老实实参加生产；带敌来进攻或摧残群众的，坚决消灭之。

(十)对宣传工作每个单位必须建立收听新华社广播,编印油印小报,广作宣传;必须设法打通与香港交通,运送进步书报至国内及南洋推销,每个干部必须研究新华社、《群众》、《正报》社论及负责同志重要文件,作为对内掌握政策,对外宣传根据。同时应指定《群众》、《正报》通讯员,将群众斗争伟大事迹及经验教训经常投寄,以广泛宣传。

目前宣传中心口号应以《群众》三十七期中央所颁布的六十七条口号及双十节解总宣言,土地纲领为主要内容;地方斗争报道则以强调群众行动为主,暂时不强调武装斗争——特别是主力的作战,俟各地基础稳固后,再有计划的轰轰烈烈的宣传,发展成风,争取领导权,以免过早暴露,企图促令敌顽警惕注意,增加发展的苦难。

(十一)对于党的工作必须进行:

1. 在普遍的斗争中吸引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基础。要设法将未经恢复的组织审查恢复起来,每个组织单位,必须有一专管发展新党员的干部定出计划,审查历史,经常在常委领导下工作。

2. 县委以上必须有一个专管干部登记的干部,审查干部历史掌握材料,以便干部调动时的介绍登记。

3. 必须经常有计划的训练党内外干部。以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及总结各单位抗战以来的党的历史路线、政策,到个人的反省、整风、弄通思想,面向当前工作应如何着手,如何发展的学习,应特别着重在帮助老干部,培养工农干部,以应土地革命之需要。

4. 必须经常总结工作经验,发扬典型例子,编成小册子,作为干部党员的教育材料。

5. 必须有计划培养派定党员干部到城市、大乡村或敌军团机关队伍中去工作;必须在城市和乡村组织组一人专门管理此部门工作,与一般农村组织完全划开。

6. 利用在业党员对当地军事、政治、经济人物(反动的、进步的、中间的)进行调查研究,尤其应有计划在市镇中布置情报网。

7. 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心已经形成，威信确立时，必须一元化，而又不能具体分工。正书记兼部队政委，副书记或为部队指挥员或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余常委或专管组织宣传，或专管市区秘密系统，整个组织下的各个地区，也应由常委分开负责管理，专门研究，而在常委会提出报告讨论。

8. 大胆发扬党内民主作风，实行任何党内会议可以批评任何负责同志的决定；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决定；实行“弄通思想一致对敌”的决定。

(十二) 为着面前更大胜利的发展，平衡发展，普遍发展，各地对于未有组织或组织较弱的地方，必须站在兄弟党的密切关系上相互帮助财力、人力、枪弹、工作意见，求得我们的工作更有配合的全面展开，才不孤立。

(十三) 总之，迎接大反攻，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必须有具体的实际内容，这个实际内容就是要更好稳固的奠定我们的基础。以上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我们基础的中心工作，望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从恢复游击战争以来，是否在中央的指导方针下工作，抑是有更新的创造，再对上列指示加以讨论，依照地方情况作具体的布置。

——秘密文件，不准翻印——

加紧工作，赶快立功

(1947年9月27日《正报》社论)

大反攻开始了，全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新阶段到来了！全国人民，首先是人民解放军，为着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而奋斗，向着“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而前进！伟大的人

民力量，一定能够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统治者打倒，把最后一个民族侵略者逐退，完成百年来未曾完成的历史使命！

我们在兴奋之余，应该从时局的伟大变化中，深刻认识人民力量的空前强大和反动力量的危机重重，解放军既已处于全面主动和反攻的地位，蒋介石的崩溃必定比较以前更为迅速，任何美国的帮助也挽救不了他。今后时局是急激向着胜利迈步，我们如果稍有犹豫观望、缩手缩脚，就必定落在现实发展的后头！

我们应该认识，在今后的斗争中，困难曲折仍然会有，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胜利中的曲折，而且完全具备着克服的条件。现在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胜利的问题。如果还有人被这种困难吓倒，那就一定不能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光荣的任务！

我们更应认识，现在是加紧工作，赶快替人民立功的时候，人人加紧工作，个个争着立功，革命的胜利就因而加速到来。人民的功臣，在人民当权的新中国就一定得到人民的敬佩，得到应有的光荣，如果存在着等待胜利坐享其成的心理，结果一定相反，人民绝对看不起这种人！

新形势到来了！我们要敢于胜利，要加紧工作，要赶快立功！

（原载《正报》第56期，1947年9月27日）

（用） 评宋子文主粤

（1947年9月27日《正报》社论）

跟着贪鄙凶狠的罗卓英去职，中国第二个吸血魔王宋子文来当广东省主席了。这个“皮肤黄色的美国人”之南来，是带给广东人民更为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蒋介石眼见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反攻的浩荡态势，于是决心把广

东乃至华南诸省赶紧奉送给美国，以换取其军事援助，并以广东为美援的运输基地。在黄埔开港，翁江水电厂及广州修筑港口等几件出卖工作密锣紧鼓进行声中，这个“皮肤黄色的美国人”又是蒋家姻亲，降格主粤，自然是美蒋中间最理想的“联络者”，任何交割，可不必如罗卓英之往返交代了。同时，由于南京财政枯竭与目前经济危机之严重，抬出这个“理财有方”的宋子文，加紧向广东百姓和南洋侨胞进行见骨的剥削，弥补本省一年八百亿元的政费缺额，并取其盈余充实南京“国库”，甚至企图“粤省一省之财力，供十数省军饷之需”。至于，以贪婪垄断著名于世的宋氏本人，可以借此捞回献产一千八百亿元的本利，更不消说了。这，便是众人周知的宋子文主粤的内幕。

官报频频透露宋氏登台后将集力于经济建设、整理税收、吸收侨汇，这都是蒋宋出卖广东，加紧剥削广东百姓与海外侨胞的先行文告，是罗卓英卖省害民政策之变本加厉。三千万广东人民在三征暴政与半省陆沉的大水灾之后，决不能再忍受宋子文带来的亡省擗命的大灾难！全省爱国求生的工商界及人民大众，猛烈开展反对美国及其忠实走狗吮骨吸血的斗争，是决不容缓了！

（原载《正报》第56期，1947年9月27日）

张发奎为什么苦闷？（广州通讯）

（1947年9月27日）

碧 星

张发奎去香港作他就任蒋记行辕主任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报聘，日前曾在一部分侨商的宴会上夸夸其谈，“为状至为

愉快”。其实这种乔装的“愉快”是掩饰不了他内心的恐惧与苦恼的。在香港发表的谈话固然色厉内荏，而一个多月以前对京沪记者访问团的谈话，尤足以表示一个反人民反民主的罪人，今天是如何悲苦的自食其果。

一个多月以前，京沪记者团到广州时，曾向这位“华南最高首长”询问：“一生之中什么事情最高兴什么事情最不高兴？”张发奎说：“一生之中受降接收最高兴，剿‘匪’不清最不高兴！”张发奎扯了不少次数的谎，但这两句话却是蛮老实的，也许这是他一时脱口而出的心底话吧？

当然啰！“受降接收”他怎么会不高兴呢？三十三年湘桂战事中由于张发奎和他统率的蒋介石部队的无能，曾经造成抗战史上空前惨败，弄到一千几百万人倾家荡产，子散妻离，至今枉死在黔桂道上的冤魂都难以瞑目，而张发奎本人也只好带着他的残兵败将缩到桂西去“向隅”一番，那时候他为全国人民所指责，狼狽万状，他自己也颇受一些损失，郁郁于怀。

可是“惨厉”以后，他到广州来主持“受降接收”了，面对着这一个仅次于京沪的肥缺，张发奎之乐不难想见。接收之后的张发奎到底有多少财产，无人知道，也无法统计，但是只在当时及以后在广州市中间传说的事情，就可想见一斑：他接收了沙面珠江路五十四号的一幢三层楼大洋房作为“公馆”，又接收了法政路日本人为汪精卫、陈璧君建筑的全广州最漂亮的花园式的别墅作“官舍”，敌伪手中全部汽车（这是人民的血汗）都为他所接收，陈璧君还把从人民手中刮来的民脂民膏为张铸就一副金十八罗汉，还有金元硬币几十箱，绸缎布疋装满间房子，敌伪在华南最新式最大规模的印刷机（这也是人民的血汗）现在已变成张发奎财产的一部分放在他开的“怀远书店”里，而怀远书店所在的那一条新辟的马路（在惠爱中路原大公司对面）全条街是他的太太出面经营的。另外由他的弟弟张嘉斌，他的旧部李仲生（潘宜——李仲生公司的华方官僚资本的代表人）乃至冯次祺等人出面去投资的商业机关，更为一

般商人所耳熟能详。华南走私据说是全国考第一，而中国的走私又是世界第一，但是谁也知道作为华南走私骨干的“军人走私”是那些权贵们的勾当，现在他又在香港大买地产房产了。

就这样，张发奎从“接收”中发了大洋财，阔起来了。你想，这样的“受降接收”，张发奎怎么不“高兴”呢？

但是，张发奎毕竟不是神仙，他的确也有他的“不高兴”的地方。其实这所谓“不高兴”，不如说是“苦闷”、“苦恼”，来得恰当些。

张发奎为什么苦闷呢？

首先，是他自己承认的“剿匪不清”。

自从他为权势利禄薰昏了心，在华南忠实地为蒋介石执行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以来，他的第一个拿手好戏是“不承认华南有中共武装，只承认有少数零星‘散匪’。”他这一着，据说已经得到他的“最高当局”的奖励，于是这个得到一点儿甜头的丑角，便叫嚣得更凶，直到今天他还得意地说：“广东只有土匪”。但是历史是最无情的，不管张发奎怎样肆意侮蔑，人民武装终于击溃了张发奎两年来的“围剿”、“扫荡”，一天天在壮大起来，今天连张发奎也不能不“坦白承认广东方面有‘土匪’三万余人了”（但是在陈沛上台做警保处长第一次招待记者，说广东有“奸匪”二万三千余人时，就曾被张发奎打过官腔，斥为“夸大匪情”，予以警告，并规定“以后凡关‘匪情’应由本辕统一发布新闻”的，现在看来，倒是冤枉陈沛了）。

张发奎过去说广东的“匪”，自从东纵北撤后，只有几千人，东纵在时也只有一万人，而他先后用来进行内战的兵力却有三个军（新一军、十三军、五十四军），四个整编师（四十六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六十九师），十六个保安总队（广东十个、广西六个），五个师管区，十五个团管区，三十多个新兵大队（师团管区本是蒋记政府拉壮丁的“催命机构”，但在兵力不足的情形下，也被张发奎当作作战机构来使用，粤南师管区司令林英兼任“南路清剿指挥官”就是一例）。共计二十多万人；假如连各县市乡镇的自

卫队，警察队算进去，则有四十多万人，为什么“剿”了两年“剿”而“不清”，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由“一万人”剿成“二万余人”呢？这自然是“完全掩盖良心”的张发奎所不能解答或不敢解答的（注：目前广东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六十九师的两个旅，是在苏北被打垮后，调回来整编补充的）。

不是兵力不足，而是张发奎所统率的部队根本就是一群他拿来侮蔑人民武装的“破坏地方秩序，使人民不得安居乐业”，“绑票勒索，打家劫舍”，“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土匪！空言没用，我们且看事实：

曾在广州长堤潮洲会馆前用皇然布告“执行枪决”的一个向豪贤路某号勒索巨款的士兵，不是别人，正是张发奎自己的卫士排的中士班长。

曾和这次枪决掉的李节文一起到市桥去处置李辅群遗产，而从中贪污中饱。被告发后一直拘押着延未判罪的一个行辕代表，正是跟过他二十几年的少将参议庄清源。

在广州北郊包烟庇赌，在从化、增城一带劫掠行凶，在始兴清化司前（张发奎的家乡）欺诈民众，屠杀人民，甚至连张发奎的外甥女都惨遭毒手的“土匪”部队，不是别人，正是张发奎自己的特务团。

两个月前粤汉铁路火车在英德遥步大桥堕河，发生空前惨剧，而乘机行劫，尽掠行李猪牛，并开枪扫射死里求生的旅客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发奎指挥下的整编六十九师九十九旅。这件事情引起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怒，使得当时只吃饭车大炮的参议员也被迫说了点实话，才使九十九旅旅长杨达要他的部下吐出脏物的一部，计牛五十余头、猪一百多只，美其名曰“协力抢救所得”。

在英德、佛冈、翁源一带，借“清剿”为名，行劫掠其实，肆意屠杀当地民众，勒索军粮，还强迫民众登报恭颂“德政”，以致当地良善士绅们也愤慨到极，组织清愿团到广州控诉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张发奎统率下的“正规军”整编九十九旅。

至于在琼崖、在南路、在九连山区行劫、烧杀、勒索的保安总队，更是“有口皆碑”。张发奎的“正规军”乃至他的卫士排特务团都尚且如此，其他向以鱼肉人民为职志的地方部队自可想见其一斑。

蒋张的军队以人民为敌，人民武装却是人民为自卫求生而成长起来的部队，这就是为什么张发奎无法“消灭”人民武装的原因，张发奎企图反人民到底，想做个内战英雄，然而在日益强大的人民武装面前，束手无策，于是除了悲鸣，除了苦闷之外，便毫无办法。这是张发奎苦闷的第一个由来。

其次，张发奎虽然以华南反人民统帅自任，但是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人物；而陈诚系的罗卓英，CC系的余俊贤，以及所谓“地方系”的林翼中等人，除了在每月一次的中山纪念堂上做“国父纪念周”（后因“还政于民”改为“总理纪念周”时），在他领导之下“行礼如仪”之外，可说没有人认真买他的账，这就使得他更加苦闷。

蒋介石自然还会清清楚楚的记得：二十年前张发奎是如何在汪精卫的阵营里大叫大嚷，要打到南京去，以后宁汉合作了，张发奎便只好成个无兵将军到外国去，抗战期中也一直只是个空头司令长官；抗战结束后，虽然张发奎以努力反人民反民主的“功绩”，得到蒋介石“行辕主任”的赐奖，但是，这个有地位无实权的“主任”，仍然是个“因人设事”的闲职，较之今日煊赫东北的陈诚，乃至武汉行辕的程潜，西北行辕的张治中，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抗战期中，特别是汪精卫公开投敌以后，他开始投靠陈诚，但到抗战末期，他编入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下为“第二方面军”，“受降”之后他又在何应钦的指挥之下，进行华南的“受降接收”工作，于是他又开始投靠何应钦，这样一来，陈诚大为不满，跟着何应钦下台，陈诚红极一时，而张发奎和陈诚的关系却来得疏远了。

于是代表陈诚在华南骄横跋扈的罗卓英，才敢这么目空一切，不买张发奎的账。

两年来张罗的磨擦是很激烈的，今天，罗卓英先行滚蛋了，张发奎不久也将从行辕主任的“宝座”上滚下来，在这个时候来“强调辟谣，否认粤当局政见不协调”，除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掩饰一番之外，也未尝不是想在两个人都滚蛋的时候，和缓和缓彼此间紧张的关系。

罗卓英象陈诚对何应钦一样，在接收发财的时候，却让张发奎先了一着，看见张发奎发了财，自然眼红耳热，但又毫无办法；及后接收过了一个段落，罗卓英便大施其不卖账的本领。首先天天嚷着要把省府被行辕占驻的屋子要回来，这使得张发奎只好用了五六亿元去建他那迄今还未完成的“新址”，张发奎为表示不与省府商量，事事只以“命令行之”起见，下令把行辕与省府之间的大门封锁起来，围上铁丝网还外加卫兵，其情形之严重，一如大敌当前，罗卓英不甘示弱，对行辕的命令视若具文，在军粮筹措上，在兵员补充上（罗卓英是军管区的兼司令），在保安部队的调遣上（罗又是广东全省保安兼司令），凡是能够与张发奎为难的地方，无处不与他为难，这就够使他头痛的了。在CC系的曾三省、杨德隆等人进行倒蔡劲军运动时，张发奎有意无意之中是从旁协助的；在南京，广东同乡会开会请张、罗二人出席参加，以便进一步扩大倒蔡运动时，张发奎就很巧妙地让自己先行退席，而让会议的火力集中打击罗卓英，几乎演成全武行，罗卓英衔恨在心，便把沈秉强囚禁起来，以为报复，而企图把省府进一步的“中央化”，张发奎灵巧，便乘机来个偷袭，把冯次祺安置到省府里去。……

这一切事实都说明了广东的权贵间倾轧，是如何激烈，也就说明这个“政令不出辕门”的广州行辕主任是如何苦闷了。在无可奈何中，张发奎想到海南岛去做小皇帝，于是半年来一直传闻着他长琼的消息。然而他这一个好梦，终是好事多磨，同样成为张发奎苦闷的原因之一。

张发奎之所以要去海南岛，并不象他所说的因为海南岛是什么“国防要地”，“华南屏障”，他要去把海南岛建设成“国防重

镇”，也不是他所说的海南岛物产丰富，他要去“开发实业”。实在说来，张发奎之想去海南岛，第一是想为蒋介石“立功”，“彻底剿灭土匪！”第二是想把海南岛变成他的小天下，用他接收得来的财产，实行对琼崖人民的掠夺；第三在上面两个目标之下巩固自己的地位，更求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要是蒋介石垮台了呢，他也有足够的本钱可以到外国去做寓公。

然而张发奎的算盘并不打得如意，可以说一开始就碰了壁，要去海南岛，首先就要有兵，没有足够的兵他是不敢去的。要多少兵呢？最少也要三个“海南警备旅”，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因为既是“海南警备旅”自然只能警备海南岛，这对现在兵力不足、处处捉襟见肘的蒋介石说来，是不合他的“兵力转用”原则的。每旅每月经费要八十亿，三旅就要二百四十亿，这对蒋介石的钞票印刷机，又是一种重大的负累。在全国战场处处吃紧，部队整师整旅被歼灭，而经济上又面临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对张发奎的请求自然感到吃力，但是又不能不加紧对人民武装的进攻，于是拖延了几个月，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原则上是决定成立两个旅（三团制），不冠以“海南警备”字样，而由国防部统一赋与番号。这两旅人，一旅由行辕特务团扩编，人事由张发奎决定，一旅则调现在山东作战的一三一旅或一五九旅（均属六十四师）回来，人事照旧，这对张发奎自然又是一阵苦闷的事情。

现在宋子文到广东来，张发奎的行辕主任拿稳是没得做了，他到海南岛去，毫无疑问的将加紧反动的措施，向琼崖人民进攻。张发奎对这一新任务将是“最高兴呢？”还是“最不高兴呢？”琼崖人民会以铁拳教训张发奎的。只是那个时候，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罪魁，都将受历史的裁判，自食其恶果，就不由得你张发奎高兴不高兴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广州

（原载《群众》第36期，1947年10月2日）

准备后事——再论宋子文主粤

(1947年10月11日《正报》社论)

北线的解放军敲击着蒋介石的脑袋，南线的解放军剜割着蒋介石的心脏，农民的游击战争拉住蒋介石的手足，城市的工人、贫民、学生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斗争腐蚀着蒋介石的肺腑，蒋介石小朝廷的统治，离总崩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善人之死，因其生也为着服务社会而来，故其死也心安气平，任务完了，瞑目而去；恶人之死，因其生也无恶不做，故其死也烦急暴躁，多方挣扎。

TV宋之主粤，就是为着这个恶政府准备后事，就是混世魔王临死以前的一种最后的挣扎。

我们知道，蒋之总崩溃，一在军事，二在经济，三在政治，而且三者都是互相密切关连着。TV宋在准备后事中必有的挣扎，自然是由这三者着手，不信，让我们把省港“官”方各报对宋主粤的言论要点摘下一看：

“北伐军兴，军需浩大，宋氏展其长才，以广东一地筹措所得供各路军饷，源源接济，应付不匮……”（《大光报》九月二十日）这不是明显的说明了希望宋来对我粤人民侨胞，加紧敲榨，加紧勒索，以便填满蒋介石进攻人民的浩繁军费的无底洞吗？

“宋子文主粤后，黄埔开港厥为刻不容缓之事，该港完成后，影响整个华南商业，今后所有美货有可能自该港课税后直输华南……”（《国民日报》十月三日）这不是明显的说明了，宋之主粤，将为美国帝国主义铺平倾销美货的道路，让美货日货如潮而来，让华南的硕果仅存的民族工商业全部崩溃吗？

“广东……饱经变乱，情况特殊，环境复杂，政治上门户之

见，派系之私，常常阻碍着广东之‘进步’（应说是常常阻碍着广东之蒋化）……宋子文必能洞察广东政治上的积弊，加以革除，一扫早日那种门户派系的复杂情势，……”（《中山日报》九月二十二日）这不是明显的说明：宋子文主粤，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扫除地方势力，软化地方势力，既不是“高朋满座”也不是“客至如云”，而应是蒋王朝的一统天下吗？

“现中枢以粤省政局持有人，海南特区问题，亦亟待解决，故对张（发奎）氏请求拨发开办费二百亿元及编组两个独立旅二事，已允加考虑……”（《华侨日报》九月二十三日）这不是又明显的说明了宋主粤以后，将积极调整广东的一切反人民反共的力量，在分赃式底下统一起来进行对人民的进攻吗？

够了吧，就这些材料，就可以证明宋在粤替蒋准备的后事，所从事的挣扎，就是投降美国帝国主义，造成广东工商业的完全破产；就是剥削广东人民，造成广东人民更走上饥饿死亡；就是扫除地方势力，造成广东成为蒋王朝的一统天下；就是调整统一反动势力，一致进攻人民。还有，则是以金钱利诱，威力强迫，使民主人士中之动摇不可靠分子起分化，以削弱民主阵线的战斗力。

可是，时间已经不同了，蒋介石的罪恶对于广东人民，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的惨痛教训已经使人们够受了。

北伐是革命战争，是人民反封建反帝的战争，广东人民当然要捱苦来支持。今天的战争，是美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奴役人民的反革命战争，人民不但不支持而且要行动起来反对，弥漫全省的农村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已经很好的答复了这一点。

余汉谋之辈，是地方实力派降蒋的榜样。广东现存的实力派都已奄奄一息，助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愿意与蒋偕亡或向广东人民悔过自新，道路由他们自己去选择。

“民主人士”对TV宋若有幻想，贪饵上钩，自绝于广东人民，自绝于民主阵营，其结果也当与蒋宋同其命运而已。

人民，将懂得怎样做，他们将更勇健的大踏步前进，为蒋宋敲

响丧葬的钟声！

（原载《正报》58期，1947年10月11日）

罗卓英逃不了罪

（1947年10月）

辛之

九月三十日当宋子文踏进罗卓英的主席官邸东园时，罗氏指着事先打扫干净的房间，满面笑容对TV宋说：这一切都属于你的了，看你高兴怎样安排好了！不料宋竟转过身来拍着张发奎的肩膀说：我还是先去做你的客人好了。这事情成为当日广州的新闻中心，有经验的市民猜测着：罗卓英的账目交卸将会碰到多少麻烦。

果然，宋氏接任后第一件断然的措置，就是禁止实业公司发卖沙糖、派四联总处人员清查该公司辖下各工厂业务，并谕令该公司限期造报账目。正由于宋子文的对罗毫不客气，广州就有所谓“清算”罗卓英的“舆论”，《岭南日报》登报徵求“民众意见”，CC系省参议员凌维素在《前锋报》发表一篇叫做“相思病与广东政治”的长文，洋洋洒洒，抨击罗卓英。其中揭发罗卓英在实业公司的贪污黑幕说：“作为操纵全省国民经济命脉的两大省营机构——广东实业公司与省银行，不仅独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糖业，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纺织业。省银行的分支行处不仅布满全省，而且遍及省外和海外各重要地区（单位超过一百以上）；但去年的盈利，前者仅四亿余元，后者仅六亿元，还不及普通一间商号，而且这些数字，亦只徒有虚名，事实上解库的少得可怜。构成本省一大富源之顺德糖厂，上年度盈利据估计最少应占一百亿元以上，但

公家入帐的只二十亿元。”这一席话正是TV宋的心稿。以假公济私。劫收垄断的第一流好手的宋子文，如今降“首相级”之尊入主百粤，当然注目所及的首先就是接收罗记公司，变做罗氏家财，而且还要迫使罗记吐出其若干赃物。这就使罗卓英像吮血过饱的臭虫一样，在手指缝里胶着、尴尬而且焦急。自叹“行动未敢自便”了。

凌维素并且暴露罗卓英卖官鬻爵的劣迹，他指出罗记县长缺买卖周转之速度：“最近琼州某县王县长由上台到下台，前后不及三个月，其他在半年被撤差的县长，竟占多数，做一年以上的算为例外。在上月罗主席被撤职半个月內，竟撤了三十个县长。听说在接到免职令的前一天，还派出七个，其后尚有一批急待放出，可惜时间迟了”。凌氏又且指摘罗卓〔英〕在广州市区内外纵放烟赌，坐收黑钱：“单就省会所在地附近五里内乡村来说，在西便有最大规模的罗溪沙村公开烟赌场，每日有五只汽船由广州开往，赌注每日达十亿元之巨。在东便〔有〕宝汉茶楼一带，最近竟变了高等赌场，每日汽车往来停留，多至四五十部以上。……”

罗卓英主粤两年，坏事做尽，此次离职，还假惺惺作态，今日一文告，明日一谈话，自诩“光明而来，光明而去”，“慈母心肠，忠仆态度”，企图以此洗净自己的血手。然而从凌维素这些“狗咬狗骨”的揭发当中，罗氏的丑面具也就给戳破了；这些指摘，决不足罗氏祸省罪恶的万一。并且，罗虽失势下台，但决不能就此抹去他两年的血账，在不久的将来，还得交到广东人民手上来替他清算！

（原载《正报》第59期，1947年10月18日）

广东人民应走在宋子文的前头

(1947年10月25日《正报》社论)

宋子文主粤的阴谋，我们已经不断的指出，近日宋的措施，也完全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宋之拉拢李福林、张瑞贵、莫雄、伍观琪、谭启秀、袁带等，就是为着统一地方反动势力，收编伪军、土匪、流氓、团队，以代其维持兵力不足的地方反动政权；宋之接纳陈沛意见，计划建立两个警卫旅，就是企图继地方反动势力之后的反动主力的建立，以便对正在发动与猛烈发展着的农民游击队的进攻；宋之延纳美国帝国主义大批战争贩子到穗，就是为着更加无耻出卖的更直接的获得美援以便实现其黄埔筑港与练兵计划，扼杀广东及西南人民及民族工商业的生存。

然而，这并不是说，宋子文在实现这一切是没有矛盾与困难的。这种死灭人民的政策，首先当然要遭受广东广大人民的反对，而经济的困难，蒋贼的猜忌，地方反动派失却胜利的信心，下层反动政权之贪污无能，都是他在实现这一计划中不能解决或很难解决的事情。——当然，他是企图用快速的时间及用各种方法来克服这些矛盾与困难的。

因此，广东的人民，广东的民主战士，今天的口号，是应该走在宋子文的前头而不可落在宋子文的后面，走在敌人的前头便能先发制人，落在敌人的后面便要挨打。

广泛发展农村的群众斗争，抗丁、抗粮、抗税，以破坏宋子文的补给计划，使其新生的反动武装不能建立。

广泛发展农村的游击战争，消灭一切地方反动武装，收缴一切地方的反动武器，武装一切参加斗争的人民，到处建立游击战争的大小据点，把反动力量围困于一些较大县城镇之中，使其血腥统

治日见缩小。

团结一切民主人士、开明仕绅，深明大义而了解大势所趋蒋宋必亡的地方反蒋反宋实力派，共同为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地方安宁而奋斗，拯救与避免其与蒋宋共同覆灭的命运。

由强大人民的武装力量到创造人民武装力量的主力，由发展广泛人民斗争建立游击据点到建立大块游击根据地围困宋子文，既可破坏宋子文目前的杀人计划，又可准备结束蒋宋的最后命运，这是广东人民当前奋斗的任务。

争取时间，和宋子文竞赛，走在宋子文的前头，广东人民一定要胜利！

（原载《正报》第60期，1947年10月25日）

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经济灾难

（1947年11月1日）

文 沉

宋子文主粤，曾经使一部分人对她发生一些幻想。这些幻想的出发点，都是由于长期为经济灾难所苦，以为宋子文来了也许可以使人们好过一些。产生这种幻想不外以为宋是“财政专家”“经济长才”，可以把广东的财政经济搞得象样一点；或者以为宋以“首相级”之尊来主省政，新官上任，可能注重一下“国民生计”以收揽人心；或者以为宋已经是著名的“豪门”，“钱扒够了，这回来粤也许洗手不扒，等等。宋本人也许懂得这点心理，拿经济建设”做哄孩子的果饵。

然而事实最不讲情面，事实最不肯替上述这些善良人稍留余

地。伴随宋子文而来的不是什么经济建设，而是一场经济灾难，金融波动，物价扯高，来头十分凶猛。上月二十六日波动得最厉害时，港币涨到三万零七百，美钞一十五万六千，金价更达一千零一万，打破了上海半月来的金融上涨纪录，也一变过去上海事事领先的情况，这在广州来说，应该看做“反常”现象。广州米价，汹涌飞升，着着领先，超越京沪，这也是“反常”。金融物价的波动原系蒋区经济日趋总崩溃的必然现象，已不是美蒋所能挽救的狂澜，但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宋子文来粤之后，马上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呢？据一般观测，原因是广州游资比上海还大，近两个月来，北方大都市汇来广州的游资，超过千亿以上，可能有过半以上都挂着“公款”的名称而得顺利由国家行局转汇的。此固反映前线失利官僚资本南逃避难的狼狈，而这里不又是看到宋子文来粤后为要独占广东经济而大事调动他的官僚资本吗？因此面对着物价狂涨而徬徨无措的广州市民，他们就很直觉、很朴素的指出：这次经济灾难就由于宋子文带来了大批上海人的原故。

人们已再不会有幻想了，已开始完全明白宋子文的真面目了。宋子文带来的不是什么“安定民生的经济建设”，而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绞杀民族工商业，榨干人民血汗的经济灾难。而且，广东人民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情绪也随而高涨。据本港某日报一篇通讯里记载一个汽车司机和售票员的对话，说：“逼虎跳墙非抢不可了”！“抢米是没有罪的，以前杭州就闹过这类的事”。由此可见求生的意志，使市民不再害怕什么宋子文。全市小学教职员爆发了改善生活的怠教、罢教、请愿的斗争，迫使宋子文不得不掏出七十亿元去缓和这一风潮。上月二十五日也发生了印刷工人怠工事件。人民以求生斗争来反抗宋子文带来的经济灾难。这情况势必日趋发展。

（原载《正报》61期，1947年11月1日）

起来遏制宋子文的乱崩

——广东时局述评

(1947年11月)

黎 展

张发奎、罗卓英对抗人民，不出一年，宣告完全失败，现在宋子文、黄镇球之流。拾起张、罗的破手套和人民比武，我们试拿上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举行的“两广绥靖座谈会”的决议案，和张、罗时代的历次有关绥靖的议案比较，差不多完全就是那么一套。由可此见，宋子文戴起的不过是张、罗的破手套。他们进攻人民的办法，弄来弄去，不外三板斧。即调整反动统治机构（所谓“分区绥靖”、“健全基层”、“加强地方行政职权以配合军事”等），企图统一地方反动势力（各县组织“民众自卫队”、组织“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等），以及准备充实反动主力。如此而已。

我们并不想看轻宋子文这个人，但我们看到他这样坦白地说：“治安如有办法，一切均有办法，否则一切均无希望。”那不是人民斗争前面发抖和哀鸣吗？这个号称蒋政权中最有魄力、有才干的大员，原来只能是一个在人民反抗面前哀叫“一切没希望”的纸老虎！当然，我们并不忽视宋子文进攻人民势必更加疯狂和更加坚决，聪明的人民是会提防这只“垂死的狼”的最后的扑噬的。人民的反抗，不但破坏宋子文的搜刮与出卖的计划，而且形成最后结束四大家族的统治。据传蒋曾对宋表示“危机不在北而在南”，因为南方维持得住，蒋统治还有一个最后藏身之所，南方也维持不住，四大家族就死无葬身之地。带着这种垂死挣扎情绪的宋子文，面对

着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的破局，就不免更加“乱来”。

週来的时事就发现这批“垂死之狼”要“乱来”的两件例证。第一件，徐景唐发表施政谈话中，道出今后的广东政治将是如何凶残和丑恶的秘密。在所谓“治安第一，廉洁第一”的前提下，他提出今后行政人员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先能后贤”，拆穿来说，只要有剿杀人民的本事就行，那怕他是个万恶暴君；一个是“贪而不污”，拆穿来说，只要有搜刮人民的才干就行，那怕他把地皮刮尽。一个刚愎贪婪的宋子文君临在上，万千个小宋子文横行其下，极尽其剿民、杀民、抽民、刮民的民死主义之能事，这就是今后的广东反动政治新面貌。

另一个“乱来”的证据是已判死刑的大汉奸李辅群撤销原判，解京更审。珠江三角洲人民提起李辅群这个人，无不咬牙切齿，要食其肉寝其皮。照此次撤销原判的“判决书”所写：他的罪状是：

“在任伪职期内，替敌收购粮食，勒收军谷，及协助敌寇，以清乡为名，焚毁乡村，洗劫杀人，无恶不作，又藉势勒收禾粟与船只保护费，更假借举办农场，霸占民田二十七万余亩，霸耕十一万余亩，霸占民房在广州番禺两处共二十七间”。这样大的罪状，万死不足蔽其辜。可是由于他附敌原因，“实系奉中委李福林，李绮庵、梅光培及中央军统局戴笠之命，藉以掩获从事反间谍工作”，有这种天大理由，所以要发交南京“更为审理，期臻明确，而昭折服”。所谓“折服”就是超生甚至释放的伏笔。

这事的严重意义不是别的，而是反动集团的一个大阴谋的露现。本刊前曾揭发罗卓英的祸首阴谋，就是准备释放及赦免汉奸头目，叫他们出来啸聚伪军土匪，作为进攻人民支持统治危局的一支反动力量，李辅群即为其中的主要一员。据说李福林数月前赴京谒蒋，即为解决其事，传说蒋已面允免死完全可行，释放则待考虑。此则李辅群的“解京更审”，其真相如何，当可想象得之，宋子文处此岌岌垂危之局，其决心把这批汉奸、伪军、土匪收为己用，而把他历年来所做的“霸占民田”、“霸占民房”以及“焚毁乡村，

洗劫杀人”，“无恶不作”的行为，完全予以合法化！

由上所述，广东人民行将在实际体验中更加明白，祸乱广东的完全不是什么“奸匪”而完全是这批“宋匪”，他们的所谓“戡乱”，完全就是“作乱”，拨乱反正的任务就是我们人民自己起来自卫，把这些“宋匪”清除！宋子文的“乱来”，他们的疯狂性，要用来回答他？用大大发展斗争来回答他，从违遏制宋子文的乱萌。

（原载《正报》第61期，1947年11月1日）

准备好，和宋子文竞赛！

（1947年11月）

崔是田

宋子文来广东干什么？替蒋朝廷准备后事，作死前挣扎；这是尽人皆知的了。怎样准备？做怎样的挣扎？现在也让我们看清楚了。两个步骤：第一个现在立即要做的是，把广东、华南干净出卖以换取美援，加强对广东人民及侨胞的搜刮以支应蒋介石的需要，加强对广东人民的军事进攻，妄图在此经营一个“比较安定”的最后巢穴，其目的在于挽救蒋朝廷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都是“单面倒”崩溃下来的危局于万一。这一步，的确需要像宋子文那样最忠心于美国主子的买办，以劫掠人民为专业的“财政专家”，以傲慢专横、刚愎自用著称的人物，既是四大家族的巨头，又是蒋介石的妻舅的这种家伙到来主持其事。宋子文之所谓“行尊降贵”，屈就粤省主席，这事件的本身，就成为蒋朝廷统治危机空前深重的反映！还有第二个步骤，今天在准备着做而等待蒋介石的统治再也不

能维持的时候才搬[扮]演的，即新华社所揭露的政治新阴谋。以华南为中心，酝酿所谓“和平”运动，用表面上牺牲蒋介石的办法，来挽救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势力的特权，局部维持这种反人民的统治，“一俟军事局面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本人已至无法维持的时候，此项计划或其订正本，即将出而问世”。省港各报会曾一度盛传广东将组织特别的经济体系，宋子文会曾对此表示“奇怪”与“滑稽”，我们认为这种经济上自成系统的计划，和他的政治上自成系统的阴谋，完全是一致的，今年还不会立即就走这一步，所以是“奇怪”与“滑稽”，而到了将来要把这出政治把戏搬上台来的时候，那就虽然滑稽，却绝不奇怪了。这一步骤也的确用得着如像宋子文这样的人物，“利用他的历史关系与某些不满蒋介石的军人沟通关系，控制他们的活动”，和笼络一些“迄今仍被遗忘的若干国民党失势人物”，来准备施用其招摇撞骗的最后一计。新华社的揭露中指出，这个阴谋是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华大使馆与蒋介石、宋子文协商的结果。由此可见，蒋统治之不可能维持下去，已为美蒋宋等所公认，所预见！

不管蒋宋在广东华南打算做些什么，以他们处于“单面倒”的垂危境况，如果没有美国的撑持，是一步也不能走的。又不管美蒋宋共同打算做些什么，以现在广东人民的觉醒和斗争的迅速上涨，美蒋宋的破碎的梦，也是必然幻灭的。然而他们是极力的挣扎。因此，要知道宋子文在广东做些什么？主要的不出两件大事：第一件，赶紧出卖；第二件，进攻人民！

先说第一件，赶紧出卖。罗卓英任内，曾经殚精竭智，弄出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又曾经找到了潘宜公司这个美国主子，以为于此可以做个大买办了。然而不幸得很，罗本人并不为美国所满意。至于今天的宋子文，其出卖的范围就更广些，速度就更快些，宣称“三个月要做好，六个月可大有成绩”，的确不愧为一个有胆量，有魄力的老卖手。他既有丰富的为洋大人办事的经验，又有出卖的专擅大权，所以到粤时并不多久，而美国的战争贩子与吸血

魔鬼们都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了。宋子文接收了罗卓英的“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并由蒋廷再加批准，以示郑重。他接见过煤油大王之孙洛克菲尔、潘宜公司的副总裁、美驻华大使馆参赞纪伯狄，谈的都是“投资”、“开发”、“商务”等出卖主权的生意经；黄埔开港工程立即动工，限令明年春间即需完竣；最近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也远道来穗，和宋举行密谈，内容是海南岛的“开发”与榆林筑港。柯克和宋的密谈，是最有力的揭露了美国要在广东攫夺军事基地与大举经济侵略的真相，也最有力的揭露宋子文的“经济建设”都是出卖广东领土主权、绞杀民族工商业与广东人民的真相！传闻的“魏德迈秘密计划”把华南划为“经济建设区”（亦即美国军事占领与经济侵略的特殊势力范围），按照月来美、蒋、宋的所作所为，颇足证明确有此事。宋子文来粤要做和在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如此！

再说第二件，进攻人民。宋子文说过，广东要从事“经济建设”就要揽好“治安”。不错，广东存在着强大的人民反抗，而且天天发展，天天扩大，美蒋宋想做些什么坏事，人民都要粉碎它！宋子文准备怎样进攻人民呢？他首先来一个“军政一元化”，企图加强自己的统治阵容。宋子文本身独揽军政大权，借藉此避免过去张（发奎）罗（卓英）互相倾轧的现象，这是一；在宋手下，有几员中将级军官，均被称为“一流干部”的，这是二；过去说是军政不配合，所以“绥靖”没有成绩，现在由徐景唐长民厅，接任后即表示“今后民政之重心，在配合军事绥靖工作”的决心，并拟增加各县保警实力，各县长人事“严格考核”，“必须具有魄力且具军事才干者为准，使能配合绥靖工作”，这是三。由此看来，贯彻军人主政以便加强对人民进攻，这是宋子文的干部配备和用人政策的特色。然而，这个政策，罗卓英任内也采用，宋子文至多是更彻底一些罢了。过去的张发奎不可谓不勇，罗卓英不可谓不忠，他们也都堪称反人民阵营中的“一流干部”，可是解决不了问题，在其进攻人民的两年来，弄到焦头烂额，破局一盘。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

困，是蒋军北调后的后方空虚、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宋子文为要克服这个弱点，提出了两种办法，一个是“办团”，一个是“扩军”。“办团”就是所谓“起用宿将”筹组“民众自卫团”，即统一地方反动势力，收编伪军、土匪、地痞、流氓来对付人民。“扩军”就是扩编保安总队，或正规部队，即建立反动主力。一些反动论客曾经对“办团”一事鼓掌不已，认为“办团”易收实效，“扩军”缓不济急。但根据最近报章透露，宋由南京返粤之后，“办团”有搁浅之说，曾一度活动最力进行笼络伪军土匪的主要人物的李福林也公开表示没有“出山”之意。其中当有曲折，这种曲折，实质上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表现。宋子文原有软化和笼络地方势力的企图，但由于四大家族的性质，对于地方势力只能利用，不能分与实权。只能让他们沾一点余唾而受他的控制，决不能让他们可以分庭抗礼使独占统治变成分赃统治。“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差使，对于识大势的分子固不愿为，而一些地方反动分子也应该休惕于过去许多鲜血淋漓的教训而不再去上钩的。十多年的时间写下一页广东地方实力衰亡史，余汉谋之殷鉴不远，现在仅存奄奄一息的力量，助蒋就是与蒋皆亡，这趋向不是十分明显吗？关于“扩军”，一说保安总队由十个团增为十五个团，一说把保总缩编为五个，另编税警十团。正规军一说三个师，一说三个旅。计划是一回事，实行又是一回事，兵源与经费的困难要解决，装备训练要时间，我们虽可肯定宋的反动主力必须相当增加，但能够增加到什么程度，且看以后的事实吧。

事实是最不留情面的答案。广东各阶层人民苦于暴政和经济崩溃久矣，一些善良而政治上幼稚的人们，对于宋子文来粤，以为靠他的“经济长才”，可以稍抒自己的困厄。然而事实很快的回答他们，宋子文的“经济建设”这种甘言蜜语，剥开皮看就是出卖，就是美资和四大家族资本的结合，绞杀民族工商业与榨干人民的血汗。宋子文擅长的财政经济，是反人民的财政经济，他的才能愈好，本事愈大，人民就愈加遭殃。也许有一些地方实力派对宋也有

幻想，无疑的将受到事实的答复。也许有一些人对宋所酝酿的“和平”运动、政治阴谋感到兴趣，仅奉劝他们要慎重为妙，因为人民并不会傻到看不出这阴谋的反动本质，如果谁不坚定在民主阵营之中，谁敢于向人民面前玩弄把戏，谁就有做四大家族的陪葬者的危险！

我们广东人民对宋子文已经看得很透彻，我们藐视这样的人，他无耻的把广东以至整个华南干净出卖，他的罪恶就完全和汪精卫、陈耀祖之流没有两样；他是一个最凶残的吸血者，要把我们的血吸干；他是一个极疯狂的暴君，企图啸聚过去的民族败类社会害虫来进攻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卑鄙的阴谋家，准备搬〔扮〕演无聊的政治丑剧！我们广东人民藐视他，完全不怕他的进攻人民出卖乡邦的阴谋措施！我们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的一切恶毒阴谋，因为现在处于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不断胜利，蒋朝廷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没有一样不是单面倒的全国斗争新形势；宋子文本身有许多困难，例如美国虽然援助但不可能无限制的援助，蒋宋与地方势力依然有矛盾，兵源不足和经济支绌等困难；在群众条件上说，大反攻的胜利，土地法的公布，蒋宋的出卖，美资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横行，苛征暴敛与摧残人民的加紧，势必更加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与斗争情绪，城市的人民运动与农村的群众斗争势必更为上涨，反对美、蒋、宋的阵线势必更为扩大与坚强；而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一年来农村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在广东百分之七、八十的县份有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在广西也有着十五个县份的民变起义，截至现在，人民武装力量已经日渐强大，向着创造人民武装力量的主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据点向着创造大块游击根据地发展，这是广东人民有胆量、有气魄准备粉碎美、蒋、宋的阴谋并最后结束蒋、宋统治的主要根据。敌人丝毫不足怕。但我们并不轻敌。老死的必定死灭，新生的必定兴起，邪不胜正，这是定理。但道高一丈，魔高一丈，胜利不能等待，凡事要靠人为。我们足够的估计敌人，我们足够的准备自己。我们承认这是一场竞赛，但我们敢于胜利就一定

能够胜利！
（原载《群众》第44期，1947年11月27日）

两年来的《正报》工作总结（二）

——一般概况、编辑工作与经济工作的检讨

（1947年11月）

一、一般情况概述

（一）艰难草创：为了开展大城市的宣传工作，建立宣传据点，党从东纵抽出干部五人，由杨奇同志负主要责任，出香港来办报。任务是“自己占有阵地”，“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初步交换意见，根据人力物力情况及当时同时筹备《华商报》的复版，故认为可以战前的“天文台”、“探海灯”等作为借鉴，以出版小报为适宜。到港之后，情形是陌生的，以前的朋友和印刷店等关系都找不到了，于是找印刷店和找写字楼两事，已花费一个月时间才能解决。接着是注册问题，此时尚系一片混乱，港府连法令也未有，我们找律师代去华民登记。结果是先行出版，以后如与法令不符时，港府声明可以停止其出版云。得到此一答复，《正报》创刊号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面世，出版八千份，一个上午已全部销完。创刊之后，一方面是群众拥护，反映甚佳，来信、来稿甚多；另方面是港府已加注意，召去问话，查询消息来源，并诫“青年人不要过激”；国民党特务则从事撕报纸及写恐吓信等。干部精神上又是受到鼓励又是受到威胁。而上级对于《正报》的批评，认为不能满意，立场不稳。这里存在着的问题是什

么？是上级的要求和干部的了解不一致，而同时可能的是上级的要求仍有若干是没有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作干部表现了没有信心，尤其是上级只有批评没有指示明确的方针，使干部手足无措，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如是者继续到了第十五期。

（二）努力坚持：第十五期以后，工作本来有若干改进，首先是引用党外开明分子（刘日波等）参加工作，并负编务主责，利用其对新闻事业有比较熟练的经验之长处，改革内容版面。至此原来材料已渐感贫乏的弱点得以补救，而且搞到更加活泼多样，栏目种种色色，多为读者欢迎，亦有至今仍为同业所喜仿用。三十期后，为了加强刊之政治领导，李超同志参加报社工作，是时销路颇好，在八千到一万一千份之间，内地与海外，均受欢迎。但当时曾经出过若干政治上的毛病，如“南天王”、“龙光反照”，如打击祝秀侠、任军明等。上级批评认为没有策略头脑，妨碍统线工作，丧失政治立场等等。这些毛病因为没有能够提到方针、原则上来加以讨论，使干部在思想上弄通，在以后可以改进，而只是冷言冷语地说：“小心呀！再搞出毛病就停你们啰！”干部听了，郁郁不乐，心惊肉跳，而又不知何去何从。尽管谨小慎微，但偏会错误重现，这在编辑方面成为最难处理的事情。经营工作本来颇有开展局面的魄力，但因当时纸价成本高，广告受压制，故上万销路仍无法平衡收支，“华商”又已出版，《正报》要求组织上、经济上支持当然更难，只好日日张罗，东扯西借度日，而至于两日刊结束。

（三）改版前后：《正报》两日刊的困难是逐日增加了，在内容上，两日刊要保有“独有新闻”为其号召，“华商”出世之后，新华电讯已非独有，有的已只是“华商”要完要剩的东西。乃转而找寻内容秘闻一类，其中处理方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特别是广州情况不熟悉，记者来件都流于夸张失实或道听途说，处理困难。五月以后，环境变化，广州干部不能站足，来稿大有问题。转到以香港新闻真相的报道，本来也有读者欢迎，但其政治斗争意义则不

免减弱。“华商”力争上游，我们每有改革，“华商”则步步追迫，我们此时有无路可走之感。经济困难也不能打破，最后一个时期，交由“华商”发行，但经营反而退步，销数降到六千五，于是停版改为期刊，遂成为当时唯一的对案。改版的原因，当时是这样的：①《正报》在政治上易出毛病，弄得不好反会害了斗争，加上廖承志同志已经承认《正报》系党的报纸，因此政治上犯了错误就更加不容许了。②经济困难，组织不能负担亏空，改期刊后可以自己维持。至此，两日刊到了一百一十期停出，期刊于七月二十一日面世。

（四）期刊初期：对期刊的估计开头就有两个错误：①以为期刊出版，可以在政治上避免过去的毛病而仍然可以保持原有读者；②由于第一个估计，产生第二个估计，开支节省了，经济可以维持。其实则相反，期刊出版后，读者对象立即改变，过去是以下层群众为主劳及各阶层人士，现在缩小了，变了内部干部、复员人员、进步知识分子了。因此读者比两日刊减少（去年七月改版到年底止，实销应为二千六百，我们曾发出过四千份以上，实在是虚数）。经济上无法自给，产生了经营方面的失败，拖了成万的印刷费，除了一部份可抵帐外，实际上就是要亏三几千元的。期刊一开始办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首先是办给谁看？群众性？还是干部性？如果是继续两日刊的性质精神，办个广泛宣传群众的刊，就必须总结和吸收两日刊的经验；如果客观上已经形成刊的干部性了，那么就要在如何办一个教育干部的刊物去设想。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干部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摸索了半年，没有结果，天天忙在写作等事务、技术问题，而没有解决战略方针上的问题。应该承认，在这期间（去年七月到年底）无论在编辑上或经营上，全部都是失败的，编辑上依赖电台收到的文章，印了出来仍可销它二、三千份，经营上依赖有利，实际上也就是使组织多点向《华商》作经济支持。

（五）《群众》出版：去年年底，《群众》出版前后，问题迫

着我们要解决了。十二月中，举行一次讨论这个专题的会议。结论是：①地方性，②青年性，③比《群众》搞得粗线条些。当然，这次会议的精神，也只是解决一些如何应付招架，如何“夹在《群众》与《华商》之间”找出路可以坚持而已，还没有把办刊的方针弄得明确起来。会议决定加强工作，把全体人员集中住宿，集中办公，以增加效率，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干部把力量集中到研究广东情况来了，于是产生“一年广东情况的总结”等作品。应该指出，这时期的努力是有成绩的，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打破了所讲广东长期黑暗的观点，看到统治者的削弱，看到群众斗争的兴起。以此精神，掌握材料，教育群众，内地游击战争的初展，我们也着急报道，并进行过到农村去的动员，但这时期既把主要力量集中这一点，结果不能照顾全面，反映广东斗争这一面加强了，但其他内容就没有改进，刊物变成单调枯燥。随着《群众》出版，《正报》销数日降，只有二千份印数，实销不过千五了。干部情绪大受影响，对刊物意义及前途，是普遍看不清楚的，再加上组织节约，原先（今年一、二月）有三百元的补助又已取消，困难更大，彷徨之极，遂有四月会议。四月会议先后开会六、七次，时间很长，收获很大。

（六）四月会议：四月会议的开端原系对林风同志的批评教育，开始后，林反省不深刻，大家认为必须再展开，并提出大家都来反省。这次反省又本来规定做检查各个人个人主义思想是否在城市工作而发展。大家都反省了，而令人触目心惊的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工作不开展，困难重重，看不见前途的情绪所引起的苦闷。我们抓住这一点，把会议集中到工作的讨论。当时主要结论是：经营上要努力开源而不是片面节约，反对打小算盘作风；编辑上要走群众路线，反对关门主义。这两个结论是正确的，以后的事实证明它的正确，恰在会议尚未了结时，杨奇同志调走，使《正报》干部大起波动。因为经济困难已成最严重问题，全社又正须在新的思想上改造工作的时候，这一调动，在干部已不足起码应付工

作工作之数的《正报》，是关系重大的。幸而后来找到适当的代替人，这才使《正报》能够按着自己计划去改造工作。五、六、七这三个月里，用扩大业务来克服经济困难，其办法为扩充门市、出版书籍、扩大定户、代理苏联书等。这些工作都有成绩，在支持经济上有重要作用，虽未能解决全部问题，组织上在这时期拨基金一千五百元，但已解决了大部问题。在业务发展上，是从单纯出报向一个完整的出版社发展，在香港出版界、书业界初步建立威信。但在全社工作上说，却形成偏向，经营工作有了发展。而编辑工作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削弱了。主要原因，当时干部或则全精致力于经营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文俞），或则改行做了青年工作（李超），于是又发生“六月跌风”，刊的内容老一套下去，愈来愈不振作，销数下降，定户收缩，外埠减书，最低印数跌至一千七百五十，实销不足千二，此时才回过头来，恍然了解工作的中心仍然是刊物，刊物销路不好，则经营上的努力变成舍本逐末了，八月开始注意改革。对读者展开调查和社内开会研究相配合，又征询了汉夫同志的意见，最后又到方方同志处请示，对刊物方针问题获得明确的解决，又有若干群众的意见供参考，决定把内容与形式都加以改变，工作转入第二年度。

（七）第二年度：五十一期开始的第二年度，是在新的条件下开始的，其中虽因文俞称病半休一月，李超工作忙，对报社兼顾更少。但由于①弄清楚了方针——为干部、为南方斗争；②了解了意义——所谓“夹在两大之间，但仍有其必须存在各种特殊的作用；③经济基础较为安定。因而对工作的信心提高了，乐观了。当时所确定下来的做法是：①反映和指导南方斗争，传播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教育干部；②把宣扬毛泽东思想和此时此地实际工作结合，和此时此地的社会生活结合；③力求活泼多样，反对老一套、沉闷枯燥的八股气息；④开拓稿源，向群众开门，逐步走向和群众一齐办报。根据这几项来改造工作，截至今天，只能说是部份地兑现了，而部份又落了空，显著的表现有：①对南方情况的研究和反

动派展开斗争表现了不够，比之今年春夏之间削弱很多。我们认为这由于人力不足应付，此一紧则彼一松，不能全面照顾。如在政治斗争上说，目前这一弱点，也是把主、次要任务倒置的现象。我们认为把李超调开《正报》工作，对于广东问题研究上是一个削弱，一个损失。②现在刊物和青年工作、文化工作有结合（虽不密切），但和工人、渔民、教师、学校教育等就没有结合；注意社会问题只开头做过一些，写过一篇文章（香港小姐），以后便没有了。③多样活泼，文笔通俗清新等完全未达到，沉闷枯燥仍然没有改变。④稿源初步打开，但处理来稿仍未尽责。但就目前销路看，已从稳定走向上升，新订户增加，好评较多，南洋反映亦好（蒲特同志带来的消息）。不过应该了解，仍有许多缺点存在，如不改进，也是不行，以我们主观力量之弱，客观困难之多，我们是不能有任何因少有成绩而沾沾自喜的观点！在经济上，外埠拖帐，内地钱慢，成为重大困难，如照帐面（比较确实应收的，而不是去年那种浮帐）看，还有赢余数目，但恐怕被南洋拖死的现象仍会重演，加紧努力突击，准备渡过年关，还是重要任务，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放松突击，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二、编辑工作检讨

（一）关于两日刊的编辑工作有些什么经验呢？

首先，在两日刊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思想未曾完全弄清，或者不能彻底弄清的一个有关方针上的重要问题，就是报纸的党性与群众面目如何才能一致的问题。共产党员办报（自己占有阵地去办报），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即党性与党的政策立场上，所谓人民立场，实质上就应该是党的立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由于主客观条件，我们办的不是公开的党的机关报，而是以群众面目出现，由于这个群众面目，在某一种特定环境可能更加取得中间分子的接受，从而使党的政策、主张更加能够走向广大群众中去，这也是对的。但是，这里并不能让所谓“中间性”这个东西，使我们的立场

发生含糊，方针上摇摆不定。所谓“中间性”，如果说那是要把报刊的内容设法搞得适合中间分子的口胃，争取中间分子，教育他们走向进步，而不是只照顾进步分子的口胃，使读者缩小在一个圈子中去，那么这是必需的。所谓“中间性”，如果说由于既不是以党报出现而以群众面目出现，因此在处理技术上、形式上和党报不同，那也是必需的；但所谓“中间性”，如果是削弱了或含糊了党的政策立场，那就完全是不容许的。关于这个问题，《正报》两日刊开创时期没有把它研究得清楚，加上环境陌生，特务威胁，故不免有点含糊，精神上受到束缚。此点到三十期李超同志参加工作之后，就比较清楚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故当时仍有若干在政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同意当时上级对这些错误的估计，不能同意《正报》两日刊办下去有害无益的评价，我们认为两日刊在展开广泛群众性的宣传上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而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改造、提高的问题。

其次，按照《正报》两日刊的经验（也参考《上海消息》三日刊的经验），我们认为在这些大城市里以这种小报形式的东西来争取中间群众（尤其是下层群众）仍然是有效的工具。这种小报其重要特点是保持“独有新闻”（或内幕消息），过去两日刊的处理方法上有可参考的经验者，如根据可靠材料，加上政治加工（例如将延安版的“参考资料”），推陈出新，结合现实，又叫座又有斗争意义。如根据别报消息，深入调查研究，详细揭露其过程真相（例如几次国特在新界暴行事件），都是行得通的。《正报》两日刊之群众评语是“言人不敢言”“敢骂”。要是言之有物（材料正确）、骂得恰当（策略、指中）、则是好的，广大读者欢迎的。不过由于疏忽，也由于情况不了解，故过去消息免不了有道听途说的东西存在，故骂得痛快淋漓之余，就有不尽真实弊病了。

第三，有联系群众的长处，特别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威信，例如海军船坞工人之追击撕报坏蛋，平安剧院炒票佬之痛打三青团，电车司机未到站也停车接报等。工团开会必请我们记者参加，而在

我们的办报方针上，也很注意联系群众之点：①稿件不关门，重视群众中来稿件，绝不让“作家”们占据阵地；②来信来稿，专人负责处理；③外勤记者深入群众。而主要的又在于报纸内容新鲜活泼，趣味多样，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些优点，改为期刊之后已完全消失，今后改进工作必需参考这些经验。

(二) 比较——两日刊和期刊：

过高估计两日刊的成绩固然不好，但过低估计也不好，抹煞了一切更不好。同样，认为把两日刊改成期刊不对，对期刊的工作悲观失望，看不见它的作用与前途也不好。因此，从新去估计，从客观实际出发去估计，从比较揣摩去估计，对于我们干部放下思想包袱，是有用处的。

两日刊的最大成绩在于它深入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这不但为期刊所绝不能办，就是《华商报》也远为不及。期刊读者只能局限于党内、党外干部分子、知识青年，局限于进步圈子之中。要改变这一情况，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努力。因此，在展开党的广泛群众宣传上，两日刊有其成绩，但只能做到敢骂敢言、大胆揭露。可是没有方针，没有组织，没有和实际斗争作有效的配合，故教育与提高群众，向群众指出明确奋斗方向则还做不到。例如言论上只成“聊备一格”，虚应故事。这样对照之下，期刊则能够有方针、有策略的进行宣传，配合和指导斗争，教育和提高群众。两日刊比较新鲜活泼，多样有趣，而期刊则沉闷，老一套，不是一般群众之所喜闻乐见。

这里又应该讨论《正报》“夹在两大之间”这个问题，“夹在两大之间”还有其存在与坚持的需要又是什么原故呢？这是我们在思想上曾经长期未得解决，直到八月改版前才解决了的。当《群众》出版时，我们的了解以为《正报》可以停刊，或者改变方式了，但上级的回答是：“并未考虑及此，继续坚持！”我们并没有了解“坚持”的目的是什么，观念上认为坚持的原故系等待时局变动后的发展，并没有认识坚持在当时现实有什么作用。可说是盲目

性的，没有自觉性（对任务了解，方针掌握上的自觉），就没有创造性，也没有积极性。这个现象的打破是关系重要的“夹在两大之间”的《正报》有其坚持的意义，系要藉以解决此时此地的斗争实践问题。这个任务，不适宜或不能够由“两大”来负，要由《正报》来负。我们做过一些工作，也有过一些成绩，但我们过去是不了解、不自觉的。了解党所分配的任务，认清自己工作的方向以后，我们干部就可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有信心工作，就可能逐步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一点，对于我们是关系重大的问题。

（三）方针问题：

方针问题是有关工作成败的中心问题，把方针弄明确具体之后，加上主观努力，工作就能够开展，就有成绩，反之，就不开展，没成绩，甚至垮台。

方针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工农群众呢？还是为群众的干部？这个问题，我们是很久没有弄清的。期刊开始筹备，我们并没有弄清对象，主观上以为可以把原有两日刊读者承接下来，那么就办一个为群众期刊，就必需总结两日刊经验加以发扬和改造，使之更适合群众，但完全没有这样做，而以主观的一套办刊。期刊出世后，马上读者群就改变了，丧失了工人和其他各阶层读者，剩下的只有党内干部、复员人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了。很显然，那就客观形成为干部了。但没有根据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去确定自己的方针，《群众》出版后迫着我们要“变”，提出地方性、青年性、但也只成为技术的讨论，没有提到方针问题来加以讨论。

“六月跌风”迫着我们要再“变”，这才把方针问题明确起来。我们《正报》的方针是：“反映及指导南方斗争，传播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教育干部。”弄清楚了方针，干部就有信心、有勇气，放手做事；弄清楚了方针，干部就从技术性、事务性工作的泥潭中拨身出来，打开脑筋，发挥创造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有其应有的经验教训；领导的任务是“出主意”、“用干

部”，一个新开创的工作或者一个工作的新转变，上级的任务必须向他的干部明确具体的提出工作的任务和方针（出主意），必须适时检查和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这才是善尽领导之责。《正报》两年来工作，就是在开头和转变关键缺乏了这一重要之着，因此干部虽然算得是努力忠诚，但免不了成为摸索前进，走弯路，不开展，事与愿违，事倍功半，进步迟缓，信心不高。有些干部，责备上级没有明确的指示方针，而自己就不去工作，这种干部是不好的，对党不负责任的；有些干部，由于没有弄明确方针，但肯拼命，苦劳可念，但也不算是好的干部，也不算是负了最大最后之责；有些干部，由于他们的忠诚，由他们思想方法的正确，他们能够很敏锐地体会上级的意图，又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加以研究，又善于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那么他们工作时时都有计划有步骤不断发展的，这才是最好的，最有能力独立工作的干部。我们《正报》的干部，不属于第一种，也不属于第三种，只能属于第二种。但在革命队伍里面，也就是这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对于他们，加强领导是必要的。

（四）最近编刊思想：

第二年度的《正报》（51期到最近），在编辑工作上有什么新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弄清了自己的教育对象的一些特点，由于香港和海外读者的水平低，远离实际斗争，没有真正把当前斗争看成与自己生死攸关。因此，进步青年对于政治上的敏感还十分不够的，我们党的许多文件，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我们党的行动号召，发表出来之后，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工作，来宣传鼓动和辅导学习，是不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更谈不上推动他们的行动了。这是一个重要经验，宣传教育工作要成为有效，就必须展开有系统的解释，决不是把文告登了出来就算。这是一。我们传达党的政策和号召，目的是要群众行动起来，为要使他们准备行动，就必须把党的文件精神，连系南方实际，指出任务，接触思想，发出号召，这也是一系列的

工作。我们不单只在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这是二。改版后的《正报》原定计划是依照上面两点进行时局和政策等教育的。例如，开始是“有事和群众商量”的思想教育，其结果唤起了群众对它的重视，一些反省文章也起过教育作用。接着是大反攻问题，我们有解释的，有反省的，有改造工作典型报道的文章，其中改造工作一文，对南洋“中艺剧团”起了教育作用。接着是三大文件，我们的意图是解释文件，指出任务，号召到农村去，和进一步从事到农村去的思想教育。我们认为这一个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应该坚持下去。但从这两个月来的经验，我们所做出来的工作比照拟定计划往往大打折扣，主观能力薄弱是一个原因，没有坚持发动青年讨论的群众路线又是一个原因。

第二，传播毛泽东思想，不是靠写大文章，也不是设讲座，而是把这思想武器与此时此地各项工作结合，和社会生活结合。这是原定意图，实行起来又是大打折扣，和社会生活结合一点原是重要事情（例如谈香港小姐离婚，《正报》一文是很受注目和欢迎的），可使中间分子也接受和受到教育，争取多些中间读者。但我们没有研究社会问题的习惯和时间，就成为昙花一现了。现在《正报》只搞到一个文学艺术部门，如高低问题、双喜临门问题、方言文艺问题等。这些问题一开始到现在都采取论争形式出现，这并不是我们故意如此，而是客观的需要。我们的方针是，只要在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下，容许任何意见都尽量发表，经过论辩，提高理论、接近真理，以利于改造实践。这才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指导性”，反对强调“指导性”，而只写结论式文章的填鸭式教育，发展在原则一致之下的自由思想。例如从麦汗的“高低论辩”可谓卑之无甚高论开始，到周达的总结性文章，就是一个从普及基础上提高的过程。又如关于方言的讨论，林洛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是在承认普及第一的原则之上来反对方言，则并没有反对党的文艺政策，而且他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偏见，不让它发表出来展开讨论，就不能在实际上打倒这种偏见，让正确的意见战胜一切，

这也是一种具体实际的教育。我们认为这也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实事求是的方法。现在的缺点是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光芒的武器向更广阔的方面发挥其作用，深入到社会生活诸般问题上去，〔还做得不够〕，这是一个努力方向。

第三，我们向“和读者一同办刊”的方向走开去，要更好的更广泛的联系群众。这就是开设“读者中来”一栏和征求“生活素描”稿件的目的。这一项在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只树立了一个意图，就是要从写作上的联系，走向把他们组织起来。

我们认为总起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深入检查，故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待我们再加研究发掘，改造缺点。

三、经理工作检讨

我们这次总结工作，没有很多时间来谈经理工作，这里只提一些对于经济工作处理的基本经验，以后再加补充。

第一，自己解决自己问题，刻苦奋斗，反对依赖支援，是基本的思想。《正报》有过几次依赖，其结果都是经营上的失败，两日刊前期完全依赖组织供给，期刊前期实际上也依赖供给。经验均证明如此：一有依赖，就减弱了刻苦奋斗的精神。五月以来，我们确立非万不得已不向组织要钱的观点，加强了刻苦奋斗精神，其结果证明是成功的。应继续此一精神努力下去！

第二，不是片面节约，但尽可能的节约，打小算盘，应开支的不开支，应购置的不应购置，干部生活要照顾的也不照顾，这种片面节约，使干部不安心，工作受影响，这样不对。要从开源方面设法，从业务扩展上设法，从打开刊物销路上设法，才能真正的克服经济困难。但是，当开源有些办法了，业务扩展了，现金周转比较容易了，就没有节约的精神，其结果必然失败。

第三，有效的开源突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报》开支比，经常收入每月不敷约五百元。为要解决这一难题，过去经验有

许多办法，如门市大减价，出版书籍，代售苏联书，招收订户等，都是有效的。要选择时机，集中力量，适时定出突击方向，一击得中，好比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赢得了这一场战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只能解决某一定时期（一个月或两个月）的问题，又并不能完全解决了以后的问题。因此，经济情况的客观实际决定我们不可能想象有安常处顺，只按照日常工作细则办事就行，而是不断的研究和布置各个突击性的战役。例如五、六、七这三个月，我们全力突击，又选取了正确的方向获得成绩。但当时还没有懂得这套规律的全部，以为由此可以安定下去。八月还没有什么问题，九月份就完全失败，这就是由于停下手来的原故。现在已经懂得这个规律，问题是在于正确的控制，就有办法。按照这一特点，因此又产生另一特点，我们的干部配备，第一必须有起码人手应付日常工作，缺一不可；第二，还要有一支机动部队（一个主要干部）随时可以空出手来，布置突击工作。目前经理部人员配备就是按照这一原则。

我们认为根据上面三点，加上主观努力，《正报》的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近半年来，我们经理部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比起编辑工作来，他们立功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不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就是没有起码的群众观点。

四、附录：对于领导上的意见

在我们总结的讨论当中，曾经多次接触到对上级领导的意见，现在归纳起来提供参考：

首先，如何提出明确的方针，又如何帮助工作干部把它弄清楚，然后放手让干部办事，这是领导上必须很好的解决的第一项问题。这种“细法”的领导，特别对于工作新开创与新转变的时机更为重要。在《正报》工作的两年来，特别是两日刊时期与期刊前期，我们觉得上级对于我们干部，放手的确象是放手了，但自流的状态又够自流。开始之时，没有帮助干部在思想上弄通许多必要问

题（到了三十期李超进报社时，原来确定要开会讨论，弄通方针，结果也因蒲同志事忙取消了）。两日刊停版出期刊了，也没有开会总结工作。这些时间之内，政治传达没有，会议极少。而工作干部由于思想还没有弄清，一投身于工作之内，又因事务忙，人手少，客观困难重重，便立即陷于事务主义的工作状态，那就愈做愈糊涂，吃力不讨好，全部工作只成招架应付，一切改进不过头痛医头。这里，我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深深感觉如果没有战略方针上的指导，要想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自己有责任，另一方面上级领导也有责任。

其次，关于犯错误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要求干部完全不犯错误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要求他少犯错误和犯了能够避免重犯。这里适时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对干部所犯错误采取帮助他弄通思想的领导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正报》犯过不少错误，特别两日刊时期被指摘更多。比如一出版之后，上级就有许多不满意，而这些意见我们认为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没有根据群众的实际反映。还是部队与解放区环境的要求，而不是客观环境的要求。又不是采取如何帮助改造提高的办法，而提议把它改掉，取消它。后来有些毛病，如“南天王”、“龙光反照”等由于疏忽或情况不了解而产生。然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问题，纵使我们办报应该更加谨慎，力求不犯错误，但这里必须帮助干部弄清思想。当时情形怎样呢？开首是听到旁人对我们说：“喂！老林〔对〕这一期有意见咯！”我们听了心里就七上八落，连忙在报纸里细心去找，找到了，到蒲同志处问：“老林有意见，是不是在这里？”蒲说：“你咭系唔系哩！”“小心的喇，唔系就停你地嘅喽！”我们听到了，为之郁郁不欢者三、四日。那时并不是对上级有何不满，而是深自责备自己“又犯错误了！”这种领导完全谈不上什么思想领导，不能教育提高干部，只有使干部终日提心吊胆，束手束脚，不敢放心做事（这都是两日刊的事情，以后由方同志领导，无此现象）。

第三，干部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工作单位，必须使它具备必须

具备的各种部门，只有这样，它才有办法可以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可以独立奋斗，克服困难，开展工作。例如期刊前期，采取节省人员，减少开支，以求经济自决的办法，此时只好把发行业务交给到的机关（海外是《新民主》。本埠一部分自发，一部分交书报社）。而其结果是事与愿违，并没有达到经济自给的目的。“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是工作发展过程。但其开始时的“简”，只不过是反对大而无当的布置，在按照实际需要上尽量精简，不要变成冗负充斥，架屋叠床，变成国民党饭桶机关。而并不是简到不能开展工作，一个新建立的机构，既叫它独立负担一定工作，又要它准备未来的发展，因此开初就必须配备起码的但又够用的干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干部配置的原则，麻雀小了，五脏不全的话，那就势必成为半身不遂，谈到不发展。建立庞大而臃肿的机构不好，因为这种机构势必变成松懈无力，工作人员势必产生雇佣观念，人多反做不出事情，“三个和尚没有水食”。但精简而残缺不全的机构也不对，因为这种机构势必变成应做的事做不通，工作人员束缚于事务主义，应付招架，忘记大事情，不能很好的改进工作，发展工作。前者，是国民党的官僚作风！后者，是农村小生产者的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精神和科学生产结合的无产阶级观点。《正报》工作干部的调动最为频繁，有三种调动情况：①原是临时工作性质，后来业务扩大之后，有使用的需要，但因另有任用，临时抽走（如杨明）。②不称职的干部的撤换（如林风、孙水、梁青）。③重要干部因别部门工作开创而抽走（杨奇、李超、文俞）。第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对工作有影响虽然不大，但因为新旧交替之间，生疏熟练之间，亦会使工作不能一直发展走上坡，而是走一点曲折道路。第二种情况，是不可避免而又必要的，因为机构既简就必须求精，简而不精一事无成。第三种情况，则比较值得慎重研究。这种干部的调动往往使工作进行的计划受到重大的影响，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调动又属于革命工作发展情况所需要，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体利益，不能闹本位

主义，不过这些调动却成为《正报》工作不能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问题在于有了调动就要有适当的补充。例如，第一次杨奇入新华社的调动，当时《正报》处于急需改革经营工作以克服经济困难的关键，方针有了，计划有了，需要干部去执行。这一调动，如果当时不能补充恰当的干部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打开经营业务，就完全不能和经济困难作战斗。

第二次李超调青年组，这是工作的需要，这一调动的结果使青年工作有了可观的发展，但当时就没有替《正报》补充恰当的干部，以为此一宣传工作可以彼一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但不会削弱《正报》，相反的可以加强《正报》，但这只是理论上说的，也只是从发展上说的，不可能在实际上立刻做到，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解决得好，还只有做到《正报》的宣传工作在主观主义地去配合青年工作，还没有做到青年工作密切和《正报》工作配合。现在第三次文俞准备调动，这也是工作的需要，虽然今天《正报》比较的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新的经验和做法也有了些基础，但如果没有替《正报》补充恰当的干部，而采取兼顾或配合的办法，执行起来则容易产生兼顾势成偏袒与两不讨好，配合又因新的工作必要有一定时间才可以走上轨道，势必产生一个不能配合的青黄不接时期，故此理论上说是不致削弱工作，而客观上（可能只是暂时）则必然削弱《正报》。这是一个经验上证明了的道理，是最有力的逻辑。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所看到的東西，提供上级参考。

《正报》编辑工作的检讨和改进

——十一月二十七日干部会议的决议

(1947年11月27日)

(一) 由于总结会议的不完整，许多具体问题均未详细讨论及检查，对于今后如何发扬优点，改进缺点，加强工作，力求进步的重要问题更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再次举行了两次会议，并最终通过今后编辑工作的计划纲要。由于时间仍未充分及其他条件，许多实际做法上的问题仍未能一一确定，有待于今后的编委会和编辑部逐步讨论诸实施。

(二) 这次干部会议，对于有关方针上的问题，在讨论时曾经反映干部了解上仍有若干未尽弄清之点。经讨论总结之后，已经获得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和明确化，有益于今后工作至为重大。我们的一致认识有如下各点：

① 我们的刊物是为谁的？答案是：为干部，为现在的干部又应该为未来的干部（干部的后备军）。因此不能同时求其成为广泛群众性的刊物，一身两任的观点是不对的。因此刊物之尽量通俗，写作技术力求深入浅出，浅易近人，使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读者也读得懂，要整顿文风，这是必要的，毫无问题。但做到这种地步，就并不是说刊物即可以成为广大群众之所能接受。因为这不是形式技巧的问题，而是内容问题。既以教育和培养干部为内容（如整风、工作方法、青运指导、文学论争等），则这些内容虽为干部或其后备军所需要，但不一定或一定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所需要。

② 我们的刊物是为干部，但这是毛主席所说的“工农兵干部”，而不是单纯是青年知识分子；不过也不能否认的是在我们此

一工作环境中，青年知識分子终究是占大多数。不認識前者，我们很可能把工作范围、教育对象弄狭窄了；不認識后者，我们也不能满足占多数的读者的要求。

③培养干部、教育干部为了什么？为战争，为农村，这是主要的，忽视这个工作就不算有什么成绩。为此时此地的斗争，这是次要的，没有做好也不成大毛病。因此，我们今后希望做到反映各阶层的生活及其情绪要求是应该的，我们应该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一项目，但如果在刊物里大声疾呼，号召对抗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行动，以至引起政治上的摧残的，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非常强调农村观点，到农村去的宣传教育，这个优点，应该保持和发扬。

(三)关于刊物内容的各个方面分别检讨，其优缺点及改进意见如下：

①时事教育——国际国内的时事论述方面，固为教育干部所不能或缺的项目。自改版以来，比之以前用“一周述评”形式有若干进步，其表现为可以对某一事件较为完整的论述，不再因“一週”的时间束缚影响事件的完整；其次比之过去没有那么呆板枯燥。但其缺点仍存在，以后首先要避免和《群众》重复，其次要吸收过去《文萃》及现在《自由丛刊》的优点，把一个人所关心的大事，有头有尾说个明白，使人看了这一篇就可以完整的解答了自己所关心和未解决的时事问题。最后，要开拓稿源，打破以往稿源贫乏、缓不济急的现象。由目前社内干部情况看来，这类稿件，仍须依靠社外供给，为此扩大和组织写作，实为重要。

②政策教育——党的政策主张及对时局的重要指示斗争任务等，应成为刊的每一时期的宣传教育中心的根据，这是毫无疑问的了。过去在思想上已有此認識，做了一些（例如大反攻、三大文件、宋子文问题、广东斗争任务等），但检查起来，最显著的现象是打折扣，刊物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和编辑部的计划比较起来只实现了一、二成。原因何在？首先是计划太高，其次是组织不好。以后

应该规定，凡有这类中央文件或上级指示到来，社内必须迅速展开学习讨论，并必须郑重其事地去研究如何进行宣传，定出确切计划，组织写作。又我们过去作的宣传，还只是从主观想像，自以为是出发的，不一定为群众所迫切需要，而且这些解释往往过于艰深。以后要根据群众要求出发来进行，要通俗使人易懂，要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③南方斗争（广东问题）——反映和指导南方斗争，应成为我们的任务的第一位，改版以后比年初时期反而削弱，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而且可能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刊物，但我们还未达到。原因何在？首先是思想未弄通；其次是人手少，分工不精，顾此失彼；第三是干部能力不足，又不努力加强；第四是对资料工作不重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片面了解一些读者的反映，认为读者对广东问题不欢迎，使自己放松了努力。其实不对，读者并不是不欢迎广东问题，也不见得以前的作品完全不被欢迎，问题是在如何表现。现在宋子文来了之后，广东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都走向尖锐复杂，举国瞻目，广东问题不被欢迎之说更非事实。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要认识局势，表示态度，号召行动，指导斗争，揭露黑暗，表扬光明。表现形式求得多样灵活，不要弄成定格，社论、示论、时评、述评、综合报导、通讯、简讯等，均不采用，按事件轻重、材料多寡而灵活确定。部队通讯应加以主动组织，适当指导，密切联系，以求来源不竭和有所改进。

④青年问题——本刊应该成为开展青运的宣教工作的重要工具，和组织工作密切配合，互相推动。过去做了一些，但没有做好。这种宣、组工作的结合，例如大反攻问题的教育，从解释形势到思想反省到工作改造，运用典型示范的办法以推动其他。事实证明有其成果，但没有拿这经验提高一步，坚持下去，遂变为昙花一现。以后要能对此加强。其次，我们现在的內容只能适合极少数接触实际工作的青年干部所需要，还不能适合广大的中间青年群众的需要。须知不能促使中间群众迅速走向进步就不能不断培养出大批

干部，因此今后对于思想启蒙工作，成为十分重要。再其次，我们对青年问题不能只限于工作指导和反映斗争，应该把对象扩大些，扩大到妇女、教师、职业青年、学生群众等去，把内容也扩大些，扩大到生活领域中去。

⑤文艺问题——文艺问题一开始就出现了批评和论辩，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没有大的错误，在原则一致之下发挥自由思想，展开论争，得出结论，从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方针是对的。但我们过去有弱点，首先是要讨论问题的文章没有标志，使人容易误为代表党的见解；其次，没有注意批评态度，可能产生不团结；最后是没有组织性，被动和自流，不能运用组织作用使论争走向我们所预定的目标，以达到传播毛主席文艺方针，整顿工作者的思想的这一整风目的。以后应依此三方面改进。关于文艺作品，过去刊出方言作品，这些虽非成熟之作，但系新方向上的摸索尝试。如不加提倡，更不能使其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作品的刊载，提倡新的是应该的，但目前文艺为青年所共爱，知识分子思想转变过程中、文艺感染的作用很大。故我们在提倡新的之外还应要求好的。以后成立编委和文委方面应密切联系，希望能够组织此种作品。

（四）如何进行思想启蒙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专题。今后增加的内容应该以此为首要项目。战后，此种启蒙工作做得最少，不但香港如是，国内亦如是。考其原因，我们想系由于整风中发现了战前启蒙工作的弱点，但却没有把过去工作的优点提高和继续，过去的丛书和刊物，成为教育青年使他们走向革命化的重要工作。其缺点则在于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贩卖教条主义。现在的思想启蒙工作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但不能不着重吸收过去的若干优点。

以毛泽东思想从事启蒙工作，我们《正报》过去也有一部份这项整风反省的内容，但这只对干部及进步分子有益，不能扩大对象。什么是今天迫切需要进行启蒙工作的对象呢？一般来说是中间群众，而且是这些群众中的向上分子。因他们是有正义感、有是非心，对社会黑暗的现实有明朗的憎恶的。这些人，我们可以根据他

们现有的觉悟程度来提高；另一方面是他们感到生活的痛苦，感到社会的压迫，有苦闷，有不平，有追求，有憧憬的，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生活情绪和要求来提高。把个别现象提高到社会现象，把非阶级的观点提高到阶级观点，把非科学方法提高到科学方法，把个人主义思想提高到为人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一句话，从群众的现有的觉悟程度出发，提高到使他们革命化。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但又是一个最迫切需要的工作，应该由全体文化思想阵线去努力完成它，我们《正报》也要负担这个任务。

两个源泉：一个从报章上所反映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例如香港小姐、紫菁台杀婴案，阻街女郎、强姦女童等事件，都为广大中间群众所注视（虽然不见得为进步群众所注意），他们自己都有其见解，有其一定的是非爱憎观，报章舆论也反映某一部分的观点，我们应该用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观点，把它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并批判某些带普通性的错误观点，这一来，就可以启蒙群众。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源泉，但这不是第一源泉，却是比较容易行的方法。一个是从群众联系中，深入发掘他们的思想情绪，了解其生活情况与苦闷，深知其所发生的要求和希望，再用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观点与方法来分析这种问题，解决其症结之所在，开示明确的道路，这种提高是深入灵魂深处的思想教育和提高。这是启蒙工作的第一源泉，但却是比较困难的方法。由此我们可知目前青年工作及其干部，仍显见不够深入和联系群众不够密切的严重弱点。

（五）过去把编辑工作看成只是撰述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把它主要的成为组织工作，这是重要的缺点，其结果是忙碌终日也顾此失彼。现在应当注意改正，使从被动、自流的状态变成主动的、有组织性的状态。过去对读者意见不注重，改版之后已经改变，对读者意见十分尊重，当为工作的重要参考。但还不够、还没有主动的、有组织性的反映读者意见。以后定期作有组织性的调查研究，十分必要。

拾月份保警处布置情形

(1947年11月30日)①

粵当局为扩展绥靖工作，肃清境内民变武装特将粤省分为中、西、北、东、南路，琼崖等区负责人。

中区：李福林 东江：张瑞贵

西江：谭启秀 南路：陈沛

北江：莫雄 琼崖：陈策

各区原日保安司令部裁撤改组为剿匪指挥所。

注：上述分区负责人只是内定，还未正式实行。

北江——南韶公路成立四个自卫队，清剿沿途匪患，保护行旅。

始兴县东部（澄江）组织反动自卫队五十人。

曲江县自卫队成立由薛汉光指挥。

曲江县内分六区成立自卫队实行联防。

乳源县驻军九十九旅二六九团之一部及乐、乳、宜联防队负责绥靖乳源。

南路——成立粤桂区总指挥署，由陈沛任主任，清剿布置为一切可能为奸匪窜出之水陵孔道全部堵塞，一俟包围圈缩小即可全部歼灭。

保十总队负责清剿南路奸匪，情况如下，沿廉江化县边界之挂榜岭一带搜索，继向化、廉、吴边界、鹤山桥附近进行反复扫荡。

化县、遂溪、钦县、廉江为奸匪盘据封锁禁驻区域。

保警队、忠勤部、忠明部、忠恕部负责清剿南路。

①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东江——翁源、新丰、和平、连平等县为共匪盘据封锁禁驻区域。

中区——南海治安会议决议：“派队巡逻市区及警卫市郊，检查民枪，实行五家联保及水上户籍登记，限期卸惹火栅物，区警火警之处理办法。

三水县治安会议决议每乡成立自卫队一中队。

中区治安会议“五县联防办法”如下：

1. 南、番、花、三、顺五县拨出三个保警中队联防。
2. 由顺德派出一个中队驻防小布澜石，交南海县指挥。
3. 由南海派第三中队驻小唐，交三水指挥，保护小塘至西南一带水路。

4. 南海派保警第五中队驻官窑，交花县指挥，巩固南花交界治安。

5. 南海派第七中队驻海心沙，交番禺指挥，防护中濠一带河道沿河派五线水艦守隘及巡还河道。

西江——四会、清远、广宁成立联合剿匪办事处，由威化乡长陈镜鸿任主任，每月经费由四会负担一半，余由两县负担。

兵役——于本年内本省建立几个旅，巩固治安，保警处决成立十个自卫队征集办法，两丁抽一，三丁抽两。

以上的资料综合系由K政府的大光报及建国报采集起的，用一种反面的估计写出来的。

十月份K军的进剿重点系在南路，但因为人民武装发展的地区广泛，而K政府没有更大的兵来打击其他地区的部队，所以除南路区以外的地域都发展得很活跃，从报纸上看到各县各属的请救电，就可知晓这个月来广东民变的发展及蒋政府兵力空虚的情况。

在南路K军集中兵力将各条，可能系部队出入的水陆孔道封锁起来，减少包围圈，进行反复扫荡，其他各区（在报上披载）系注重沿江税站，企图打击部队税收。

中区这个月的土匪很活跃，三角洲及广州外也常发现劫车及劫

船案件，这也因为十月份的经济又起了一次大波动，再加上早造水灾影响，失收，×征粮急如星火迫使回乡民众挺而走险来渡过这艰苦灾难的岁月。

K军为了补救其兵力之不足，曾决定今年在×东训练新军数旅以巩固地方治安，征集办法比在战时还要利害，规定两丁抽一、三丁抽两，而各乡又成立反动自卫武装，每乡一中队，各乡连坐，各保×保以及剿清经费，由各该县人民负担等，在此重重剥削与压迫下，只有使人民更加痛苦，民变更快的遍及全广东。

莫斯科资料室（红场）

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税收问题指示信

（1947年11月）

一、解放军全国性的大反攻早已开始了，崭新的形势正在我们前面展开着。为了迎接这个新局面，华南各地正在扩大人民武装，正在发展游击战，正在朝着建立新解放区的道路上走去。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没有相当充分的经费是不行的。要取得经常的充分的经费，靠海内外捐款是不行的；靠那种临时的征收保护税的方式也是不行的。这一切，东江纵队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了。东纵对于经费问题，是从募捐、保护税一直走到正式征收进出口税及征救国公粮求得解决的。建立正式的经常的税收，就可以保证部队的给养，就可以支持解放区的财政问题。因此，在我们建立人民武装的地区，必须以极大的注意力，来重视这个问题。

二、税收政策不仅是部队给养的问题，不仅是地方财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敌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也是搞垮蒋

介石统治的一个战斗。我们的税收增加，就表示蒋介石的税收之减少；我们的税收增加，就表示商人接近我们，而恶恨蒋介石；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入口增加，我们所多余的东西出口增加，则表现我们地区的经济的欣欣向荣。在形成解放区的过程中，应重视这一点，在建立了解放区之后，更应重视这一点。

三、税收政策不但是一个财政问题，不但是一个对敌作经济战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照顾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因为某些东西之准许出口，某些东西准许入口，都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密切关联的。过去香港沦陷时期，燃料奇缺，敌人大量搜购柴炭，而东江是产柴炭的地区，大多数人民，靠砍得柴炭以过活。当时我们只知封锁敌人，忽视人民的生计，曾下令严禁柴炭出口，引起民众的反感，他们迫于生活，挺而走私。对敌封锁，不但收不到效果，反而得到民众之不满。但禁粮出口的政策是对的，民众拥护这个政策，自动协助缉私，因而取得很高的效果。这证明税收政策是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仔细措置这个问题。

四、征收机关——特别是设在边界上的税站，不但是一个单纯的财政机构，而且是一个对敌作战的前哨，一个联络民众的宣传机关。因为它是与外界的商客接触的，所以它最便于做宣传工作；因为它是突出在边界线上的，所以它便成为前线上一个战斗单位。过去有不少税收工作人员就在他们的岗位，为革命、为人民，流出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例如一九四二年张光琼进攻宝安时，全区税站就受到严重损失，总站长也光荣牺牲；一九四四年塘沥分站也因敌军之进攻而流了血。这些血，说明税站的重要性，也要求我们要重视税站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有许多地方工作的开展，又是经过了税站的宣传组织及不断移向敌区而发展的。过去东纵及现在的西江，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五、在同一地区之内，税收机关要做到统一。在建立解放区的过程中，税收机关是不会一来就统一的。因为在地方政权尚未正式建立起来的时候，许多机关需要经费，部队更需要经费，甚至有些

友军或土匪也在收税，因而有税收“多元”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必经的，但我们应尽量使其不要延长下去。我们应尽量加快的采用统筹统支结束这种多元的现象，使其统一起来。税收统一不但便利客商和人民，而且可以减轻人民和客商的负担，提高我们的政治威信，这是建立解放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六、关于税率的问题，如果从社会政策的意义来说，实施累进税率是比较合理的。可是，在当前的状况之下，累进税率是不容易走得通的。一则是累进税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在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中，不但人民搞不通，就是我们的干部也是搞不通的。再则实施累进税之后，客商为避免负担，就会化整为零或不敢做大生意，这么一来，我们的税收就不会增加了。因此，我们的税率，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应以平易简单的百分率为原则，把商品分为四类。即：日常用品，重要商品，消耗品，奢侈品（种类见表），按值抽税。大约日常用品征百分之五；重要的商品征百分之十；消耗品征百分之二十；奢侈品征百分之三十或三十五。这是一个原则。各地情况不一，对于各物之多征少征，还应以各地当时的情形去具体决定。

七、为了照顾各方面，为了鼓励客商入口或过境，有时可以将税率打一个折扣，可以规定在一定数额（如五十万元）以下免税；可以规定在一定数量以上打一个折扣，藉以鼓励商人，推进贸易之发展。但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正规的，是否如此，还要看当地的情形去决定。

八、以过去的经验而言，我们在税收上最吃亏的地方是工作人员缺乏经济上的常识，不识货，不知价。因而便利一些奸商的欺混。他们把贵货报成贱货；把高价报成低价；以多报少，“珠混鱼目”，使我们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加强对于税收工作人员的训练，使他们精通税率，识货识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有计划的开设训练班，训调工作人员来训练，或使受训练的新干部到税站去学习。国民党税收机关中真正同情我们的

份子，在某种条件之下，是可以利用来训练我们的税务人员的，因为在技术上，他们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九、税收人员与外界客商接触较多，较易沾染不良习惯，较易使生活腐化起来。过去税站贪污舞弊的例子很多。如挟款潜逃，与商人默契不发税单等等，层出不穷。对于这些问题，加强干部领导，严密检查固然必要，但治本的办法，仍在于加强思想意识的教育，使他们舍去私图，而实实在在的为革命服务。除教育外，对于他们的生活，应尽可能地保障其必需，就是把他们的待遇根据工作需要提高一点，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待遇会使他们便利去工作，安心去工作，而不致利用其职权去从中取利。

十、根据过去的经验，根据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需重视税收工作，必须调动一部分得力的干部去负担这项工作；必须致力于培养税收干部以开展这项工作；必须密切的关照边界上的税站，给予必要武装配备，使其不至于受敌人的袭击而牺牲。必须把这一项工作认为是建立解放区的重要工作之一。

十一、以华南各地而论，目下的解决经费的重要工作是整理税收，是征收公粮（见另资料）。如果我们的建设解放区的工作能再推进一步，则我们的注意力就应突破这个界限，而要把建立公营的贸易机关和管理解放区内的金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关于市情、物价、金融以及其他有关财经资料，各地可以和香港工委的财经委取得联络。

(附表)

入口货

日常用品	主要商品	消耗品	奢侈品
布匹、毛巾、火柴、火水、肥皂、牙膏、铅笔、普通成药、电芯、线辘、针	颜料、洋纸、麵粉、电油、棉沙、棉花、皮具、工业原料、西药、五金、毛冷、绒口、玻璃、机器零件、轮胎、毛毡、鞋袜、洋腊	香烟、玩具、糖果、罐头、食物、元宝、腊烛、线香	化妆品、洋酒、装饰品、鱼翅、燕窝

出口货

牲口	菓菜类	什货	山货
家畜：牛、羊、猪 家禽：鸡、鹅、鸭	生菜瓜菜	油、糖、酒、豆类、柴、炭、盐、冬菇、草菇、土纸、咸鱼	竹器用具、麻绳、草包、藤器用具

用炽盛火力教训宋子文

——各地战讯综合报道

(1947年12月)

宋子文来粤准备为四大家族的垂死统治做绝望的挣扎，而广东人民答复他的是四面八方的胜利斗争。根据近日收到各地通讯，报道人民武装的战斗消息，虽然只是一鳞一爪，但已足表示广东人民

斗争的英姿，游击战争之火正在四处蔓延，这四面八方燃起的火，必定将蒋宋及其独裁反动制度烧成白地！

(一)蒋家翁源县长邓世棠，于十月底曾集结匪兵四个联防大队，妄图对人民队伍“扫荡”，即遭严厉打击。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武装对板溪伪联防队举行突袭，激战两小时，使敌人大为震恐。二十四日，吴越南匪部及伪县警队二百余人在沙溪公路上中伏，被击毙三十余名，伤二十余名，人民武装全无损失，战斗结束后，贼兵逃跑者亦达五十名，邓贼经此打击，溃不成军。

(二)当邓贼“扫荡”受挫后，翁源县府所在地的龙仙，爆发了一颗巨大炸弹，该镇获航队全体官兵，由队长黄社玲率领携带手提机枪一挺，步枪十三枝，驳壳五枝，光荣起义。同时龙仙镇镇长官世爵，亦不甘邓贼压迫，随获航队官兵一同反正，投到人民方面。据此次起义的五十余岁镇长官世爵称：“邓贼压迫执行三征政策，及强迫民伏建筑碉堡，并要供给二个连的蒋军伙食，此等工作均与本人良心愿望相违背，实感痛苦万分。现在从黑暗中逃出，走向光明，本人年事虽老，仍愿替民主事业尽一点力。”

(三)英德县黄塘一带人民武装活跃，十月十四日于金山径内全歼大镇警察，复于同日晚乘胜解决大镇伪联防队及将一切蒋府官员全数俘获。二十三日大镇圩遂正式被人民解放。

(四)十一月六日，新丰人民武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将该县马头圩之伪联防队全部解决，俘虏二十余名，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子弹及军用品一批，该圩遂为人民解放。

(五)据大埔来信述人民武装攻下大麻圩的详情称：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日，大麻乡人民纷纷赶市集，圩上一片热闹。约在十点钟的时候，大麻分驻所响起一、二枪声，但市集秩序还如常一样熙熙攘攘。五分钟后，人民队伍的政工人员出现于大麻牛岗坪了。牛岗坪一时人山人海，老百姓挤着听他们的演说。“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三征”……老百姓笑逐颜开，一阵复一阵报以热烈掌声。谷仓打开，大家分谷呀，穷苦的老

百姓取回了自己的血汗凝成的谷粒。人民武装占领了大麻圩共有十个钟头，枪决了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解决了压迫人民的反动武装，破了谷仓救济贫民，当他们完成任务整队开拔的时候，人民鹄立江干，额手称庆，大有依依不舍之慨。

(六)又讯：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人民武装带着大麻战胜的余威，又向大埔属之百侯攻打。当地区长巡官等闻风先遁，人民武装不费一弹即缴获反动武装长短枪百余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反三征斗争，直到是夜十时才安然返防。

(原载《正报》第62期，1947年12月13日)

评“省参会”三次大会

——广东时局述评

(1947年12月)

黎展

广东“省参议会”的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丑剧于本月一日开台，到十一日收档，照例是开幕礼，听取各机关工作报告，分组审查提案，讨论并通过提案，闭幕礼，开得一点也没有差错。可是省港各报的记者们都不满意，都说看了不过瘾，大发微词。一位记者描写道：“初冬之晨，议场之外冷清清的，议场之内也冷清清的，坐而听者颇感衣单，一线阳光自东窗射进来，场里人才微觉暖意。”“冷清清”成了他们对这个“三次大会”的共同的定评。他们说：“参议员”到的一天比一天少，这些“议员”们或者场外拉话，或者如〔入〕厕频频，或者练字绘花，或者喁喁耳语，或者盘膝打坐，

或者闭目养神……报告工作的是“云云照读”，起来质询的是“寥无几人”，答复质词的是“最精彩的外交词令”，讨论提案则是“有案皆提，无案不通”，决议中又多是“送省府酌办及参考字眼”。于是一位记者得出他的结论：“欲写紧张新闻，真是毫无办法”云。这就是所谓“省议会三次大会”的面貌。

为什么这么冷清清呢？一张报纸说这是因为“新人新任”，加上会场也是新的，声音太散的原故。我们认为这个分析倒也有一些没说出来的道理。真独裁假民主的戏不容易扮演，过去演了两台，再来这一次，可真演腻了。加上“新人新任”，宋子文不比罗卓英演得落力，当然可以使记者写“紧张新闻”，但恐怕宋子文不高兴，发脾气。所以这次会只能开成这个样子了。连记者们也不满意并天天在报上的冷言冷语的参议会，只有一个人十分满意，这个人就是宋子文，他在闭幕礼的“训话”中指出两点：一、会议中对政府少批评，这是“充分表现与政府合作的精神”；二、提案少，这是“切实表现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这个向来和人民无关系的省参会，过去还有些找热闹找“紧张新闻”的人觉得过瘾，现在连他们也觉得不过瘾，只有宋子文觉得满意、恰好，加以称赞，这种真独裁假民主的丑剧，也正如人民替它安排定的命运一样，快要唱完了。鲁迅先生的杂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群玉班”：“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两边墙壁都爬塌，连忙扯得牢，只剩下一担馄饨担。”——省参会，就是如此这般。

由于“新人新任”，所以这批大官们开的空头支票特别多。例如宋子文，在他的开幕致词里，要“使广东成为全国的乐园”。人们当然记得，他一到广东就侈言什么“经济建设”了，可是跟他一齐到广东来的却是经济崩溃的风暴，就在这次参议会上有人问他怎样办，他老实不客气表示“没办法”，他说：“关于物价高涨系全国整个问题，非一省可能限制，中枢无办法阻止高涨，本省亦无办法”。这个“经济建设”和“全国的乐园”的现实答案，不就在这里找到了吗？也是在这次参议会上，可以找到更多。例如财政厅胡

善恆的报告中列举数字，从本年五月到十月省府追加预算四次，共六百余亿元，而且全年度预算费早已给罗卓英用完，下半年的庞大经费要重新向人民搜刮。为了进攻人民，确定首先增编五个保安总队并提高待遇，宋子文在闭幕词中坦白地说了，明年治安费比本年年要增至二、三倍，为了救死，也就需悉力搜刮。他把“修堤”列为三大要政之一，并预计需款三千亿元，看来是件好事，其实则堤还是人民自己去搬石填土，他们乐得开个三千亿元的巨数作为抽征搜刮的藉口罢了。拿这些来做他所许愿的“乐园”的注脚，那么我们就可明白，宋子文心目中的“乐园”，是以白骨为支架，用骷髏作点缀，拿鲜血做涂料，让他们在那里安排人肉盛宴！可是，把人民当傻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一张假冒宋子文的条纸可以骗倒和吓倒杨仲理，使他马上交出港币十万元，一个宋子文说的“乐园”却永远骗不到一个人民，人民替宋子文准备的不是“乐园”，而是坟墓。

新任警保处长黄镇球开了一张期票，据报纸上描写，他用豪放而肯定的语调，说他的“绥靖”工作“三个月后见效，六个月内有帮助，当有确实把握，肃清匪患”，也曾博得参议会的热烈掌声。可是这种“豪放和肯定”的故事很多了，在“中央”有陈诚，在广东有韦镇福和蔡劲军。就在他的豪语同时出现的，是陈沛南路“督剿”的丧气而回，潮梅各地的清兵告急，曾经沉寂一时的中区人民武装的重新活跃，南雄人民武装的横扫百顺白云等乡……从十二月一句来的报章消息，已经看到人民所给予黄镇球的回答是什么了。香港《星岛日报》写了一篇叫“危机中召开的粤省参大会”的社论，也不大同意黄镇球那种“豪放与肯定”，认为他的“保证”，“曾博得参议员的热烈掌声，这固然令人兴奋，然而今天时局之严重及问题之复杂，必须多绞脑汁，周详计议”，因为他们觉得“和宋子文竞赛”的口号是十分坚定而有力的，并且“震惊于破坏力量（应改做人民力量——引用者）之可怕发展，焦众于危机四伏的阴森前途”。这是今天反动阶层的情绪的忠实反映，阴森可怕的死路

已经摆在面前，“豪放与肯定”的话语，究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

（原载《正报》第68期，1947年12月20日）

“国选”百丑图

——广东时事报道

（1947年12月）

桐 庐

所谓“国选”，在广州，的确也够丑态百出腾笑中外了。掌握全省国选事宜的所谓“粤省选举事务所”由宋子文兼任主席。这个事务所的任务，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威胁利诱，迫使全市合格的七十二万选民，印手指模或盖私章，投票选出官方要你选出来的人。这一场老百姓名之曰“选灾”的劫数，甚至和尚，尼姑和瞎了眼睛的老太太们，也在保甲长嚇叱之下，无法幸免。

对于这回事，广州市民自然不会有任何兴趣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国选投票的第一天，全市四十七个选所的门前，象魔术团一样，警察摇起了铜铃，但投票的除了另有任务的少数人之外，“不少是十二、三岁或十四、五岁的袖珍选民”，“女选民百分〔之〕八十都是年届五十的老妪”（以上及以下引文均系国选期间省港各报所载——笔者）。投票者的心情，正如美联社电讯说的，是“冷淡，惶惑和焦虑”。当新闻记者好奇地去问投票者有何感想时，一位什货店老板说：“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官不会轮到我們做，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一位市立小学的女教师说：“今天米价六十八万元，比昨天又涨了五万了，怎样活下去？”另一位老太婆则带着疑

虑的神气反问道：“选举之后，物价是不是会从此下降呢？”还有在陈塘区，七八个瞎了眼睛的老妇人由一个女童引带着来投票，她们说明保长交代要投卖万金油的胡文虎（按系胡文烂）的票。管理人代为办妥手续之后，告诉她们，眼睛既然看不见路是可以不必自己来的，她们却十分紧张地答：“那里敢开罪保甲长呀！”

正因为这选举是在一般市民“已为洶湧之金融物价波涛所冲激，多已陷入昏迷状态”的情形下进行的，市民从头到尾总是“抱着无关痛痒的态度”。这番风景摆在外国记者的摄影机面前，简直把宋子文急坏了。于是乎另外一种有效的办法拿了出来。在小北区的投票所，就是“香蕉，落花生，可口的饼干，一碟一碟整齐地摆在桌子上面，旁边一壶茶”。在第一天职业团体的选举中，一位女选民，“不经意地说出了五千元一票的秘密”。许多女职工则被汽车一批一批地送到投票所去，换得的代价是投一票吃一餐饭。同时，还有“简化手续”的办法：“个人自动往投者很少，多是一迭迭由人代写，按规定应凭国民身份证与选举权证换取选票，但多数已无此麻烦手续，总其成由个别代领代书”。这些一迭迭代书好了的选票，给一种特别的“选民”。他们由入口走到投票处投了下去，再顺着出口走出外面，手里又是一迭迭的选票，又是从入口走到投票处放入票箱，如此周而复始的手法，广州市民名之曰“车轮战”。

但是，虽然各式各样的法宝都使了出来，无奈结果四十七个票箱还是空着大半截。经过了两天（一共三天全市选民投票的数字，仅占本市七十二万选民的数字的“四分之一”弱），例如陈塘区共有选民四万，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五时，“投票者仅得七千人”，而市郊的三元里，票箱冷清清地摆在那儿，连一个选民都没有。整整一天过去了，据说一共投下的有三十五万余票，占选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不过另据一位“粤省主任阶层秘书而不愿宣布姓名之官员”的批评，当他指出“此次选举，可谓为国民党之失败”之后，接着便说：“据吾等之估计，此次往投票之真正老百姓，当在百分之点下”（《华侨报》）。

然而，尽管选票是假的，群狗争骨的所谓“竞选”，却格外认真。首先是黄培才等五十余个竞选人成立了“竞选人同志会”。猛烈攻击在“选举会报”上具有左右大局势力的CC头子，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密锣紧鼓，骂他包办，闹得二陈召余到南京面授对策。其二，当工会职团选举时，“党政提名”的马超俊为着最后战胜工干系拥出的并且把握票数最多的曾西盛，进行夺收工干选民的“选举权证”，引起工干人物极大的反感，磨拳喊打，拨毁选票，几乎演成流血惨剧。其三，二十三日机工会投票时，“竞选人陈士诚派出特务七、八十人到投票所，身藏暗器，看出有人写选别人者，则夺票撕毁。此等特务并以万字夹或锁匙扣为暗号，男性佩于左上袋，女性则佩于襟头，分组监视”。此外各色丑怪“明堂”无可能列举了。

最后，所有的选票都押送到市政府去“保管”。开票记票之时，你想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小姐们忙着把票迭成百张一扎，先生们忙着在记票表上飞快地填写着正字”。《华侨报》记者“目睹第十组有一女性写票员，埋头直写刘纪文的票数到十余个‘正’字，问以何所根据，该写票员竟无以作答。”最后，社会局职员以“请勿扰乱会场秩序”为词，把全体记者赶了出去。一直到国大代表的名字和票数被正式宣布出来，宋子文亲手导演的这出丑态百出腾笑中外的广州国选丑剧，才算收场。

（原载《正报》第68期，1947年12月20日）

两年来我们统战工作总结

(1947年12月)

一、统战对象的分析

日本投降后，我们城市里面的统战工作，就次第展开了。统战的对象，主要是下面这几个政治集团：

1. 民盟南方总支部：它是由抗战后期，分别在广西及粤东成立的两个支部合流而成，里面包括的成份主要是救国会和第三党及部分的无党无派分子。救国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在战前抗日运动高潮出现时，它就随着全国救国会的成立而产生了。那时，在南方的抗日运动中，它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抗战爆发后，因所要求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就无形地陷于瓦解了。以后，在整个抗战期间，救国会只变成过去名辞，它的大部分干部及主要群众都参加了我党，上层分子（如李章达、陈汝棠等）也只以个人身份和我党保持联系而继续进行他的抗日工作。过去团结在救国会周围的群众，现在都转到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来，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救国会在南方之参加民盟，而且成为民盟的一个构成单位，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有组织的力量，而只是一些过去救国会的上层个别分子。后来，由于救国会的个别分子集中到南方来的逐渐增多，再加上第三党在民盟内部的积极发展，救国会分子然后始有团结一致健全组织之议。但直到今天，内部还是十分松懈的。不过由于他们的阶级基础及其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多数文化人），至今还是我们在民盟里面较为可靠的朋友。虽然他们中间还有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

第三党是一个历史较长的政治派别，里面包括成份主要是上层

小资产阶级。但由于十余年来，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处境困难；一方面又脱离群众，没有实际的群众基础，为求生存，乃与统治阶级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它的内部，又容纳了许多中小地主及官僚政客进去。因此，便成为内容复杂，并带着浓厚投机性的政治集团。他们今天，表面上仍与我们的政治主张保持一致，并利用我们做掩护和号召，积极发展。他们的主要基础是在广东，故在今天以至今后，尚在许多地方成为我们上层统战工作上的主要对手。我们对它，必须争取它的下层群众及上层个别进步分子，帮助与鼓励他们继续进步，提高并紧靠我们，使顽固保守分子减低影响以至孤立。对他们无条件地整个的团结合作，与整个的排斥歧视都是不对的。

无党无派分子现在民盟里面成份不多，力量也不大。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相信此种成份必然日有增加。对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必须予以积极争取。

(二) 国民党民主派：主要以李、蔡为代表，人数不多，里面成份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坚贞的元老都不愿积极支持）。目前组织力量还是松懈薄弱。在民主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不大。但随着蒋介石统治的动摇，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可能成为大批投机分子的集团。我们对它，必须争取并坚定其进步分子，使之紧靠我们。对其整个集团，就革命的发展与需要来说，利用其反蒋的一点，而不必过份重视。

(三) 致公党：是一个失势的官僚政客集团。他的发起人是陈炯明。陈倒后，二十年来，已经销声匿迹。至抗战结束，民主高潮一时汹涌澎湃，该党遗老及部分人士，乃顿起重新复党的企图。其目的实欲在民主胜利后，以所谓政党名义，分一杯羹。故该党目前没有群众基础，只有香港、南洋、美洲部分洪门分子参加。主要领导人陈其尤系陈炯明的旧部，十余年间与蒋均有来往，后因某事，为蒋踢开乃转作民主方面的投机。其中个别较好的分子，则与我们颇有联络。

（四）民治党：是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成。主要群众是海外华侨。政协之后，他们才回国设立党部。但因久居海外，对国内情况不熟，政治经验不足，故K施引诱分化手段，就上了它的当，现国内党部已被K控制。最近海外方面对此已产生不满，有另行派人回国重新改组之议。在我们对海外华侨工作上来说，仍应注意争取其较好的分子。

二、各个时期的策略方针与工作检讨

首先，我们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检讨的统线工作，是指统线工作中属于党派关系的一部分。对于各级组织及各个部门所做的统线工作，并不包括进去。

对于这样的统线工作，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比较地特殊，它和完全以正式代表团面目出现的不同，也和完全以群众面目出现的不同。可以公开的时候它就公开，不可以公开的时候它就秘密，可说是一种半公开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它所负担的责任是有限度的，它所工作的范围也是有一定的。两年来的工作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做几个时期来说明。

（一）日本投降后至东纵北撤时期——日本投降后，我党力量开始转进大城市。但由于过去我们对城市工作的重视不够，上下层基础都很薄弱，故那时除一面输送干部到城市，健全组织加强领导之外，上层关系也开始注意。广州方面帮助梁岩塵等创立《晨报》。香港方面，支持《明朗周刊》，出版《正报》，筹备恢复《华商报》，及交涉设立东纵的公开办事处，希望开展若干上层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关系来掩护配合下层工作的开展。不久，政协召开，国内和平空气陡然高涨起来，华南K方对我政策举棋不定，一时陷于麻痹状态。我们当时思想上认为国内和平局面，很快就会到来，因此就强调公开合法的斗争。同时，东纵问题，又开始进行谈判工作，需要上层力量配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政治上提出集中力量突破广州市的法西斯堡垒。在统线工作上，就用全部力

量来推动及帮助民盟建立。建立之后又推动它开到广州去，在宣传工作上也配合这一方针。除广泛动员各种刊物展开政治攻势外，又决定在广州开设“华商”、“正报”分馆，计在这一时期，由我党独立出版的刊物和经过我党出钱支持的刊物，计有《华商报》、《正报》、《自由世界》等，同时尽量设法帮助若干民主人士的生活。

在群众工作上，我们也尽量让民盟出头领导，由我们从下面去支持。如此之故，甚至派遣不少干部到民盟里面去，以民盟做招牌，展开工作。同时并从多方面去帮助民盟开展它的群众工作，帮助它健全和开展。因此在这一时期，上层和下层，我们都与民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并肩作战。

我们觉得当时帮助民盟迅速建立，推动他们到广州去，并通过它做掩护来向敌人发动猛烈的政治攻势，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当时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我们当时帮助民盟推动民盟去打头阵，实在的目的还是觉得和平民主的局面很快就会到来，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弱，应该让民盟去冲锋以打开局面。所以那时党的大部分力量都放在帮助民盟这一点上，以为有了民盟的配合，就可以压倒敌人，取得和平民主的实现。

（二）东纵北撤以后至统委成立前后——东纵北撤前后，时局的恶化已逐渐开展。K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暴行，民主运动迭遭压迫，军事进攻又日趋扩大，各地当局开始取缔与封闭报纸杂志，广州的环境也一天一天变坏，各党派的民主人士先后撤退到香港来，东纵北撤后，这种情形更加严重。全国内战已经形成，内地简直不能活动。我们当时估计，认为时局可能有一个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因此在统线工作上就决定：

1. 推动民主党派把民主运动扩大到海外去。2. 推动民主人士，利用暹罗华侨捐款，组织华南救济会，一面通过民主人士去主持，一面通过此种社会救济的非政治性的形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继续活动。而我们则由此去继续团结这些民主人士。一面则利用这一工作来达到切实救济我们的复员人员及逃亡来港的群众，使

他们有工作可做，并和我们保持密切的接触。

3. 从政治上去坚定他们，克服他们的悲观动摇。在这样的决定下，一部分的干部就到海外去，先后成立了暹罗与新加坡的民盟支部。在香港则成立了一个各党派的座谈会，经常和他们交换时局意见，坚定他们，提高他们的信心。

在这一个时期，统线关系比过去更加广泛开展了。不只民盟，其他的上述各党派都和我们有了接触，有了经常关系。同时在政治上我们都争取了他们，使他们对时局都有了信心，对我党政策，都有了较明确的了解。然而由于我们对整个形势发展缺乏明确具体和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对统线工作本身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研究讨论，所以统线关系还是带着单纯的交朋友和日常事务商量的性质。工作空洞，没有作更大的开展与提高，甚至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调解他们党派间、人事间的纠纷上，而结果事情又没有做得好，统线工作成为替他们服务，而不是利用他们替自己服务。在经济上由于一向来对他们多照顾，便逐渐养成了对我们的依赖性。不愿独立去想办法打开局面，甚至我们的经济困难，他们始终不相信，少些帮助，他们就发出怨言。这也说明平时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性强调得不够。

(三) 统委成立前后至今天——自去年下半年国内形势的发展更加明朗化之后，党内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混乱已开始逐渐被澄清了。由今年初起，更明确的决定当前的中心任务乃在于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来作应有的配合。因此从那时起，我们的统线工作开始踏上比较有目标、有方向的阶段。但那时，在思想上还只是一种初步的自觉，在实际工作布置上，尚缺乏很好的研究，还没有根据中心任务使实际工作和它密切联系起来。不懂得怎样去配合，不懂得应该做些什么？没有详细的计划规定出来，工作上仍然陷于被动，未摆脱过去交朋友，多来往，应酬性质的工作作风。这种情形直到统委成立的时候，还没有解决。只是笼统的规定统线工作就是争取友军，就是多联络朋友，就是多推动他

们说说话，但争取谁？重点放在那里？那些必要去争取，争取他们做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解决。所以二月间李任潮来港后，很久很久，我们对他都还没有一定的方针。希望他做什么？怎样使用他这一个力量，我们没有确定。因之，他一来港时所发表的那篇宣言（上海起草好的），到今天检讨起来，就觉得有许多不妥的地方。

直到统委成立之后，责任比较分明，任务也弄得比较清楚，统线工作于是开始比较有头绪。在这个时期里面，我们首先对各个党派作过比较具体的认识和估计，因之有了比较明确的方针，开始懂得怎样适当的去使用他们。大体说来，对于李、蔡等，我们确定应使他们成为K民主派的中心，他们的任务在争取K里面的进步分子及中间分子，起瓦解蒋的统治的作用。对于民盟南总，我们确定应使他们成为香港开展上层民主运动的中心，来掩护我们来发展下层群众组织的工作。同时，对总盟起着反映下层群众意见争取上层进步的作用。

但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很大的缺点。

1. 对于统线对象的方针还不够及时的与具体的确定。
2. 对于统线对象的调查研究，还没有有系统、有计划地去做，了解上笼笼统统。
3. 工作上的主动性与计划性不够，被动应付，着眼于日常的琐屑事务，而没有照顾到长远的将来，接触来往也只局限于现成的政治党派，而没有根据需要去有计划地进行开辟工作。
4. 对于干部的阶级教育和统线政策的教育也不够具体深入。因此，工作上还只是开始转变，远未达到走上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目标的开展阶段。

三、几个具体工作的经验教训

在这两年的期间中，有过几件比较重要的具体工作，应该提出来专门研究，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我们今后进行统线工作的参考。

(一) 华南救济协会——这是去年七月间，东纵撤退后，广州方面民主运动遭受压迫，民主人士相继撤退来港，我们推动民主人士，利用暹罗华侨的救济赈款（十万元港币）做基金而建立起来的。建立时的目的有两个：1. 运用非政治性的社会救济事业，使一部分民主人士，可以争取与团结一些中间力量（社会上有地位人士）扩大活动范围，掩护我们的下层工作。同时，并通过此种工作来扩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强与各方面群众的联系。2. 利用此次赈款，举办生产事业，以救济解放区的复员人员及逃亡来港群众。因为觉得我们自己出面来做，在当时环境上有所不宜，所以全部工作都交由民盟及其他民主分子去负责，我们只派出一些干部从下面去支持。但是一开始就发生了纠纷。首先就是民盟内部发生争执，张文由此攻击李章达，说他逃跑来港企图分赃。其次则黄精一表示不满，认为由民盟包办，不照顾他们。老蔡也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利用他来做幌子，实际情形都不让他知道。而在内部呢，我们的干部和实际主持人陈汝棠又发生许多意见冲突，惹起陈对我们派去的干部极大不满。而所办的各种合作社都亏了本，刊物什誌、社团、学校借的款都无法归还，结果成绩少，怨言多。固然客观上存在着两个原因：1. 许多民主人士及社会名流只是挂名，不肯负实际责任，因此一切事情都交由陈汝棠一人去干。2. 因一般生意不景，影响许多事业无法发展。但是，今天检讨起来，我们当时处理这一事情，存有如下的几个缺点：1. 原则上，我们放手让民主人士去做是正确的。我们虽有把明确的方针和目的详细说过，但当他们在执行上发生偏向时，我们没有及时的很好的去纠正他。2. 民主人士普遍的弱点，是缺乏群众观点，不重视群众意见，而我们布置工作时不照顾这一点，尽量使机构及行政民主化，因而形成上层握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发生问题时不易纠正。3. 在执行过程中，当下层提出意见时，我们过份强调团结原则，不使他们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从上层配合推动他们去改造及执行。4. 我们的干部也存在着许多弱点（如吴思正），不能与人合

作，及各个合作社中我们的同志都不大负责任，没有把事情弄好，就是说，上下不能配合。

(二)《华商报》——是战争结束后，全部由我们出资恢复的，里面的工作人员，包含我们派去的干部，及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在内。我方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均属别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群众。我们的同志都掌握着各部门及各级行政单位的重要位置。初时由张枫同志直接领导及负实际的最高行政责任。后来感于业务不熟练，展开工作困难。萨空了来港后，乃请萨负付总经理职。但自萨入去后，由于他的官僚主义领导及个人英雄，引起下面的极大不满。下面意见不能上达，上面意见不能贯彻，使到整个工作的进行受到极大阻碍，工作人员情绪消沉。初时，我们只强调下面服从上面的领导，保持团结，不可闹意见。因此当时有和萨合不来的干部，请他辞职，藉此减少磨擦。然而，这样决定的结果，不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萨的意见更加固执，对下面的态度，更加不好，因而意见更多，情绪更低落（我们内部的领导以及干部中也存在着许多弱点）。一年多来，大家都感觉到《华商报》是一个头痛问题（当然不只因为上述的这一点头痛，因为我们这里只检讨统线工作，故只就此而论）。报馆内外，都反映《华商报》内部有宗派，不团结，官僚主义等等。但是我们强调统线的团结合作，始终把问题拖延下来，直到最近，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要向外发动捐款，因此引起各方面的批评，报馆方面也让下面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改造办法。结果，萨愿意摆脱实际责任，部分的负实际责任的同志也更换了人，情绪日见高涨。但统线关系问题是否就因此得到解决，现时固然还难说，但由于萨之去，内部工作人员的确是在精神上感觉兴奋的。

《华商报》是我们与别的党派及群众合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的例子在今后，必然还要普遍碰到。因此，对《华商报》的统线工作问题，我们有好好地加以检讨并从此吸收经验教训之必要。

我们干部与萨搞得不好，是不是纯粹属于个人间的问题？我们

认为不是。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般的所谓民主人士，普遍存在着
的共通缺点是：1. 缺乏群众观点，看不起群众意见。2. 领导上的
官僚主义，不能深入群众。3. 爱面子，不能接受别人批评。由于
这些缺点的存在，与我们在工作上的方法与作风就必然相反，因此
就必然发生冲突，关系就无法搞好。不仅《华商报》为然，也不只
对萨空了的关系为然，在其他工作部门与对别的民主分子，如果不
有正确的政策方针，也必然会发生的。

那么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一问题呢？固然加强我们内部的思想教
育，克服宗派主义，强调尊重别人，这是一个办法。但光靠这个办
法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一切统线上的纠纷呢？我们认为不可能，而且
单单强调这面也不对。我们和人家合作的目的，乃在于把工作弄
好，决不是和人家做到融洽无间，就算完成任务，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是不是把有缺点的人统统换掉，另外选择过一个人来，就
可以解决了问题呢？也不是。我们的统线工作，就是准备和这些有
缺点的人合作，由我们去领导，影响并提高他。如果我们一定要选
择和我们一切意见上都一致的人，然后来和他合作，那也是不可
能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私人间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政策的
问题。

根据我们的意见，认为和别的民主党派的_{合作}，一定注意下面
几个原则：1. 领导机关我们要占有一定的人数，才能保持和下面
群众的联系。2. 彻底的执行群众路线，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必需
在实际工作上实现民主原则，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做起来影响他们。
3. 上层的解释说明必须配合下层的群众斗争，才能保证工作的正
确执行。4. 对民主人士的合作不是降低我们的主张去迁就他，而
是坚持我们的原则去提高他。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认识这一点，并施
行干部的教育——以上可说是我们从《华商报》统线工作所得出的
经验教训。

(三) 达德学院——这与救济会和《华商报》都略有不同，它
是我们以外的其它民主党派所共同合作创立起来的。我们只以个别

同志参加进去工作，创立之初与创立以后，他们的主要负责人都和我们联系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也通过他们这些主要的人员提出我们对于该校的教育方针及教育方式。在里面的工作同志也在个别接触中经常贡献一些意见。但由于里面包含着几个党派的人物和成份，大家出力不同，大家权位有异，因而常常发生争端。例如，陈其瑗认为第三党空口说白话，拿不出办法来，而且私心太重，只争权利，不多出力，因此对三党分子采取不信任态度。三党方面则认为这学校由他们所发起，一切计划也由他们所拟订，故学校应由他们领导。陈其瑗系由他们推荐出来，但对他们的意见都不尊重，独断独行，个人包办，一切行政，既与他们的初衷违背，怎能再与陈其瑗合作，只好想办法打击他甚至赶走他。至于救国会方面呢，也看不起三党，认为他们无人材，却想操纵包办，不知身份。三党方面则又认为救国会对他们有成见，一切想包办，不照顾别人。其他无党无派分子，有时站于此方，有时站于彼方，意见不一定。总之，主要原因是争权力，争地盘，争职业岗位，不过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套。意见冲突以至争执纠纷，时常发生。在过去，每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双方就来找我们商量，希望我们提出一些意见，责备对方。我们在初时，也因为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办好，希望他们能够和衷共济，好好合作，故也不怕麻烦，根据我们的判断，积极提出意见，对于双方则根据事实，劝告他们互相照顾，各自让步。然而，舌敝唇焦，效力很少，有的时候，他们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则依然如故。有的时候，则对我们的意见不满足，觉得我们不帮助他们，责备对方。久而久之冲突愈大，纠纷愈多，因此就怀疑我们，偏袒一方，纠纷就牵涉到我们的身上来。事情不惟不能好好解决，反而使我们也陷身于麻烦，面面不讨好，一有冲突，就猜想与我们有关。

由于上层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因此影响到学生方面也发生同样的党派纠纷情形。在过去，学生里面的党派感觉非常锐敏。一有不同意见，就要问对方是那一党派，不论选举也好，开会讨论问题也

好，个人接触也好，稍有分歧，就疑神疑鬼，调查人家的党派身份。如果不是属于自己的党派，则不论它的意见是否对，就必然反对，甚至予以打击。大家都集中兴趣于党派关系上，而不是集中兴趣于如何使事情弄好及那一个意见更正确上。达德开创的第一学期，及第二学期的前半期，学生间的情形都是如此。故上层党派间的纠纷和下层党派间的纠纷，常常联结起来，愈弄愈严重。

后来我们研究了事情的真相之后，知道各有所是，也各有所非，思想不弄通，此种纠纷无法避免。我们参加意见进去，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此，就决定不理，公开向他们表明，他们自己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不过问。在学生方面则加强思想教育，反对过去只问党派不问曲直的倾向。强调学生利益，执行群众路线，谁的意见对，谁做得好，群众拥护，我们就拥护。谁的意见不对，谁做得不好，群众反对，我们就反对。不管他是民盟，是救国会，是第三党，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因为我们在里面的同志，有几个系统，有许多是互相间不知道的），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一律交到群众中去审查，由群众去解决，不必顾虑谁的面子谁的党派关系（我们自己方面，则事先交换商量，竭力求得一致）。这样，上层不理下层斗争，等待下层斗争起来之后，上层才在适当时机予以解释说服，推动他们走向一个正确目标。我们觉得采取这样的方法，可以避免他们里面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同时，并减少了我们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这一点到现在还未做好（事实上他间的纠纷，也无法完全弄好的）。但我们相信，对于别的党派间的互相合作与互相发生纠纷的问题，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对的——这是对于别的党派间的统线方针上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四、一般的经验总结

两年来的统线工作过程，时间是不短的，在这两年中，我们的统线工作有没有成绩呢？我们认为是有的。由于客观形势的有利发

展，加上我们主观的努力：1. 建立并打开了各党派的关系。各民主党派都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支持我们，并掩护我们在下层群众中发展工作。2. 争取了各个民主党派影响下的中间性群众，逐步地提高与坚定了他们对党政策的认识，和对我必得最后胜利的信心。3. 建立了几个各党派与我们合作的据点，使我们更进一步地在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中和他们亲密共事的机会，并得到他们在实际上承认我们的大党地位。4. 建立与争取了香港当局的非正式的公开关系，提高与扩大我党的地位与影响——这是两年来我们在统战工作上的收获，使我党在敌人封锁压制下冲出头来，逐渐得到公开而为社会人士所公认。但是在这期间，我们的工作有没有缺点呢？根据前面的叙述，可知我们的缺点还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干部缺乏思想上的领导与政策上的教育；对各个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策略、方针没有及时的研究讨论。因此，没有明确的决定，在工作中没有很好的收集材料，调查研究，以及不够灵活主动。按照我们的工作检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原则性的经验总结。

（一）统战的基本任务在于完成革命的战略目的，争取一切同盟者，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服务。因此必须区别统战对象（集团的和个人的代表性）的阶级成份，分清他是战略（直接）的同盟军，或是策略（间接）的同盟军，不能笼统，不能含混，不能一律看待。

（二）统战的原则是以为我为主，必须在政治上掌握领导权（自然不是在形式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指挥一切），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共同发展，更不是一切为了统战，无原则的联合，做人尾巴，给人抬桥擦粉，甚至变成投降主义。

（三）统战的目的在于发展群众，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削弱敌人。上层统战活动，为了掩护发展下层群众力量，不是无目的的应酬交际，联络感情。

（四）统战工作必须有团结又要有斗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批评、教育，说服，以至斥责打击）。斗争为了团结，只有斗争才能使团结更加巩固。必须上下配合，不发动下层群众做基础，

光是上面谈谈，也是没有效果的。

(五) 进行统线工作要有中心，有重点。选择主要的对象（集团和个人）按照他们的斗争历史、社会地位，估计他们所能起的作用和影响，根据主客观条件，在一定的限度内，主动的争取他们。特别要注意情况发展，及时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不要东拉西扯，不可事事被动，不能一成不变，尤其要着重争取有气节，有群众拥护，有正确观点的人物。

(六) 在统线工作过程中，一面要虚心倾听人家的意见反映，同时要了解别人的意图，经常收集材料，有系统有计划，调查研究，以备决定政策时的参考。

五、今后的工作方针

(一) 加强干部思想领导、政策方针及阶级教育。要经常进行分析与学习讨论。

(二) 对各种政治集团派系，尤其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阶级成份、政治主张及其活动情况，要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收集材料，写成报告或传略。

(三) 在反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反蒋封建独裁统治及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总原则下，去团结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运用各种方式（如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去影响与争取他们。

(四) 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应采取孤立的政策，而对其中的进步分子则要个别争取，公开反苏、反共的坏分子则要公开打击之。

(五) 对民主同盟应采取整个争取、个别孤立的政策，推动其下层群众影响其上层分子。

(六) 对救国会与第三党应采取一般团结、个别斗争的方针。

(七) 对其他小党派，不必过于重视，其中个别分子可以争取者仍应联络争取之。

(八) 对进步工商业家，特别是海外华侨，应设法多联系，采

取团结争取的方针。

附：华侨统战工作总结

华侨的特点：远离祖国的华侨，除了少数富有者，大多数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或手工业者。他们在海外久受种族的歧视和排斥及受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影响，具有浓厚的爱国思乡思想，素望祖国发展工商业以图强，提高其国际地位，杜绝后代寄人篱下的痛苦；并希望实现欧美资本式的“民主”政治，使他们在祖国的利益得以保障。但他们受华侨社会封建思想宣染和受二十余年K的政治欺骗，不了解祖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和革命的政策，因此，他们存在着相当深的正统观念。另一方面与外国劳苦大众的民主斗争接触的机会少，所以在文化上、政治上有相当的落后性和保守性。更以过去华侨回国投资的失败，被人“搵丁”，因此在发展工商事业谨小慎微，多趋于土地投资。特别是四邑华侨，在此几种思想交织影响下和多种经济基础上，华侨的思想有其复杂性，也有其阶级成份的复杂性。例如有个别华侨劳动者将其终生的积累在祖国投资于土地后，变成了小地主，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一般是中间性，没有多大政治成见的。

日本投降后华侨政治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他们在抗战期间为祖国抗战而出钱出力，敌人投降后，对祖国的光明前途有无限信心，对个人经济发展也有信心，充满着乐观，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K，对K有很大幻想。直至K破废政协决议时，华侨对K开始怀疑失望。到了去年七月，内战全面开始，华侨对K有莫大反感和愤恨。他们的觉悟速率，有甚于反满的斗争时期，为空前所未有。其主要原因是太平洋交通恢复后，华侨归国与出国不断增加，亲身体会到蒋管区的政治腐化、贪污勒索压迫的现象；而未归国者得到出国者及个别的家乡情况报道，例如美国旧金山有一个数十年K党籍的华侨商人，在政协后力为K蒋及其政府辩护掩饰公开反共，俟他返国见现实与其过去所想的相反，居留不满三月，愤而回美。初时对国内政治缄默，后来大发牢骚，公开抨击K，并肯定的说，救

中国的只有中共，还抛弃其有数十年历史的K党籍。

过去我们华侨统战工作的任务方针——日本投降不久，我们的干部有个别的从农村复回香港，为中国民主人士的需要而团结中间性的海外华侨，当时提出这个一般性原则性的方针。那时在我们的精神上首先从政治上入手，因此有带着浓厚政治性而缺乏乡情报道的《侨讯》创刊，也只有三星期的寿命。从这个教训，促使我们研究华侨的特点和要求，开始改变我们的政治奢望，从事于分散的点滴工作，实事求是的去建立以经济性的商行为团结华侨的桥梁。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们探摸的一年。从点滴的经验和局部的调查研究，至去年十一月间才有明确的方针。内容是：加强对华侨的宣教工作，报道乡情和国内社会现状，暴露黑暗，以提高华侨的政治认识；加强为华侨服务的工作，巩固商业阵地来提高我们的威信；以经济形式团结中上层的华侨及联络本港侨商，推动华侨的民主力量配合祖国民主运动的斗争。在我们的思想准备上，集中华侨的经济力量，发展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事业。这个方针，是根据当时华侨的政治标准及其迫切要求和国内民主人士的要求而定。

我们执行这个方针后有如下的收获——1. 华侨关系扩大了。已由我们自己的亲属、同乡和朋友，而至他们的朋友，开始向本港个别同乡会打进了；地方同乡会加强活动了。2. 各商行的威信在年内提高许多了。从华侨的存款增加可以看到获得华侨信任，甚至个别华侨素未认识而肯放心付存，又如委托我们干部倡〔创〕办大规模酒店。3. 各商行和旅社的业务发展，华侨委托代办代卖的货物日渐增加，目前处在冷落的商情，各行仍能维持其进支平衡。4. 通过我们的两个华侨刊物《四邑侨报》、《中山华侨》和各种教育方式，华侨对K的认识更进一步的转变了，一般来说，对K没有什么幻想了。

我们的弱点——1. 执行这个方针领导上未能及时重视思想教育和领导，以致有些同志只看到自己的暂时利益而影响为华侨服务的精神未能到达应有的发挥。2. 使用干部时，有个别只从片面认识，由于他为其家长亲属不信任，因此其商行建立起来，华侨先系

一筹莫展，业务停顿而结束（恩平的侨兴公司）。3. 我们的华侨关系，目前还是局限于中层，未能突破上层；因我们做华侨工作的同志，过去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基础，全靠家长的经济力量来经营，没有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的干部同志，社会经历少，特别是商业经验。第三，我们未积极通过中层去展开上层关系。4. 在海外未能推动华侨组织起来，因无干部输送出海外，又与海外兄弟党无关系，故在组织工作上有鞭长莫及之叹。今日团结的华侨，还是无形式的感情团结，经济上的联络。5. 有关门主义的倾向，因此在本港的关系开展，早已裹足不前，未能及时纠正，影响工作不少。今年七月间才开始进行思想教育，今日本港关系才能略有开展。

经验教训——1. 有群众观点才能执行为华侨服务的工作，通过实际的服务工作，华侨才能认识我们的忠诚，威信才能提高。目前工作展开的关键是建立威信，有威信一切困难可以解决。暴露的干部，如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华侨对他不会害怕，相反，党的威信正会提高。因此暴露的干部不应畏首畏尾，而要大胆放手接近华侨，公开明确解释我们的政策，过去华侨对中共所怀疑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政策。2. 对华侨教育要从其切身痛苦及其所受威胁联系到政治问题，他们才容易接受，不会说我们有政治偏见。3. 华侨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华侨特性老实，向他们建议或指导他们要具体而实际，否则华侨无信心，给予华侨不良印象，认为我们是空谈时，必会失掉华侨的支持。4. 在华侨工作中的干部使用，首先要了解其对工作具备了什么有利的客观条件。如果在华侨中存在着坏印象的干部而负华侨工作，就是将来可以改正，但华侨看到眼前事实，他虽有个人的华侨关系，也不能打开我们的工作。因为华侨还是信仰个人，宁可使用质素好的干部，他眼前的华侨关系虽少，将来有保证，可以发展，威信会提高。既有条件而已建立起威信和地位的干部，如无必要时，不要随便调动，造就专门工作干部，长期培养他为侨众所望的公开人物。如果朝培夕调，工作无法弄好。

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

(1947年)

(一) 由于敌顽前线连吃败仗，解放区总反攻即将到来，敌顽不只没有办法调兵南下，甚至仍有可能由后方增兵前线，故敌顽在粤目前采取：一、努力组织主力（警卫旅）作为野战军以对付我较大部队及活动地区。二、加紧地方反动武装组织，甚至收编土匪以维持其地方政权，对付我武工队游组。三、加强特务保甲制度，以镇压及代替地方势力，打击开明士绅以巩固其下层基础。

(二) 但由于恶政府的恶政策，三征的加紧，水旱的灾荒，兵力的空虚，内部的矛盾，经济的困难，财政的破产，群众甚至中立派之不满，故游战的客观条件异常成熟。只要我们主观上不重复内战时期非群众路线，没有统一战线，内部肃反的破坏团结，不善于利用群众性的游击战术的四大错误，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开展游战建立新解放区的任务。

(三) 中央已全部批准我们的工作布置，并着重指出：“从布置分散的武装据点到建立成块的武装根据地，在你们那里，还须经过一些过程，不要急于打大仗，也不要过早集中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应将武装力量散布得愈广，发动群众斗争愈多，先从多多消灭乡村地主联保反动派武装做起，便愈能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根据地奠立基础，就不致引起保安团队过早集中的调来清乡”，望将这个指示详细研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四) 在这个形势与中央指示底下，我们提供如下几个问题，供你们讨论：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1. 如何依据自己现有武装力量、组织力量，半年内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创造主力及比较大的据点，以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这里对地区的确定（与闽粤边联成一片），干部的培养，弹药的准备，上层统战工作的加强，党与群众组织的巩固与发展，都应很好地计划与配备。

2. 如何加强平原点线工作及坚持与发展这一工作，以配合将来山地根据地的创造，也应有很好的计划，这里对于群众斗争，群众组织的研究（照顾长期性），上层统线的拉紧，开明力量的培养，秘密武装或用合法武装及党的建立与巩固，都应讨论，才能避免过去内战时期山地孤立受封销而失败的错误。

3. 政策的执行应如何灵活照顾多方面，不过早打击不反动的地主富农、商人，斗争与团结应如何运用，也应加强研究与慎重执行。

4. 群众组织应如何注意在斗争中发展，并发现积极分子及群众领袖以及如何领导他们进行日常生活的工作，巩固与他们的联系。

5. 党员及武装队员的群众观点，内部团结的教育工作。

宋国合译（密）梁南人译

宋国合译（密）梁南人译

宋国合译（密）梁南人译

关于军事的几个问题

(1947年)^①

一、军队要有高度的组织性

军队与其他群众团体，虽然都是奔赴同一的政治目标，目前为打倒蒋介石，平分田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但军队与其他群众团体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军队是用武装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所以，有其特殊的一套斗争方法，即战略战术，也有其特殊的一套的组织，这套组织要求高度的统一，高度的纪律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军队行动的迅速、确实、肃静，而胜利的应付战争。所以说，军队是最富于组织性的，铁的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上，是集中多于民主。但我们过去怎样呢？我们组织不周密，无一定制度，超越级别处置问题，管理不够严密，平时太过迁就队员的散漫意见与行为，以致太过民主，纪律松懈，部队的游击主义作风相当浓厚，部队不够坚强。今后，我们应在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应多在平时纠正部队同志那些散漫意见与行为，使同志在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习惯组织性与纪律性的部队生活，而把部队锻炼得更坚强。

二、军队与人民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的兵法，是建立在军队与人民结合的基础上，只有人民用一切办法配合军事斗争，支援军队的战争，而军队又用一切办法援助人民斗争，为人民撑腰、壮胆，发动与推进其斗争，这样才能克

^①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服一切困难，战胜人民一切的敌人。所以，人民是军队的靠山，是军队的脚跟，若果，军队脱离了人民大众，就无所依靠，无法生存，而归于失败，被敌所消灭。但是我们部队怎样呢？一般的都存有相当浓厚的单纯军事观点，如“部队打得就得啊”，“部队一是打得几大都不怕了”；“世界是靠我们(单纯指部队)打出来的”。这是把人民大众完全忘记了的思想，由于为部队的思想很强，为群众的思想很淡薄，所以，伸手向群众要东西就很积极，怎样去为群众的目前利益，与提高其觉悟就被丢在脑后了，甚至完全忽视了。不仅这样，而且，有时连有些同志摘民众东西的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也没有被纠正呢？由此，我们脱离群众的现象如此惊人，即群众观点如此的不坚强，过去不能打更好的更漂亮的仗那是一定的。我们应深深反省，检查过去，把这错误观点克服过来，及警惕将来，紧紧的与人民结合起来，那我们一定打更好的仗。

三、指挥战争

指挥战争，不能超越当时的客观条件，即是有什么枪打什么枪的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敌人的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特别在战斗展开后，更需要随时了解变化复杂的敌情，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判断，下达自己的决心，才能正确驾御整个战争，使战争达到胜利。若果，不根据实情，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就会犯错误，如这次，我们打王老山反动份子，就是以主观出发，自以为一定攻得下，因此，事前调查情况就粗心起来，需要准备的东西也疏忽起来了，谁知，一打起来，实情就与自己的假想刚相反，就攻打不下，所以，以后，我们应紧紧记住，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好不打，无把握不打，特别在战场上更应沉着、冷静、了解情况，切不要暴躁冲动。

四、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战争目的：“歼灭敌人，保存自己”，主要是前者，因为，歼

灭了敌人，才能永久的保存自己。要怎样才能消灭敌人呢？最好的办法是战役上以大吃小，以多胜少，以集中对付敌之分散，集中比敌人二倍、三倍、四倍、五倍甚至六倍的兵力来消灭敌人，不打则已，一打务必尽力不使有一个漏网。因此，我们对敌人主要的是积极进攻，要我们重视伏击战、突击战、围攻，敌溃散的追击，不应与敌打那些以山头对山头的山头战、摆擂台战、风流仗，这是牛打架的办法，消耗了自己，不能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为了要歼灭敌人，避免消耗自己，我们必须要有大踏步前进与大踏步后退的精神。

五、要建立主力

我们部队的规模已相当大了，也在相当分散的基础上集结起来了部队，根据我们建军的办法，是逐渐提高，即由游击队而地方兵团，而主力兵团，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主力连或主力排，以搞好一连或一排，从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及以之起带头作用，号召全面向他看齐，以致提高全部为主力，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力量，来支持全面，与帮助各地区打开局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应克服平均主义，努力朝向这个目标而奋斗！

如何管教部队呢（研究）

一支坚强的部队，是靠不断的点滴工作去培养和经过无数次的战斗锻炼出来的，所谓点滴工作，就是平时要经常的积极的注意对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要怎样进行管教呢？

（一）我们的部队是由人民自己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而组织成的。因此，我们应把这支队伍看成是属于人民的，而非为己私有，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一切都为人民”的思想来管教我们的部队，切不能用自己庸俗的观点或关系来管教部队，如“单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威信与名誉”，把同志看成宗族、亲戚、朋友而摆起“家

长”、“上师”的架子这样的一种封建的眼光来管教部队，这都是不正确的。

(二) 我们队伍的每一个战士都是人民中的一部分，而且为人民服务的战士。因此，我们不能象统治阶级那样的苛刻士兵，压迫剥削士兵，害怕士兵聪明、觉醒、有办法，而相反，应该爱护士兵，要设〔想〕尽一切办法使士兵聪明、觉醒、有办法，所以，每一个首先都应抱有为士兵服务的观点，与提高士兵的觉悟的责任。

(三) 我们的部队都是青年人，富有朝气蓬勃的精神，同时，军队也需要时时保有饱满、旺健的情绪。所以，我们负责部队管教者，应注意使部队有朝气，生龙活虎，有年青气概，且不可暮气沉沉，老太龙钟。

(四) 我们是军队，我们一切管教都要适合军事的要求，即是能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要积极去发挥与创造。影响提高战斗力的，应要纠正。

(五) 管教上的几个具体问题。

甲、制度问题

一支部队的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多样的，范围相当广阔的，那么，怎样使这些工作统一起来呢？使这些工作符合科学化呢？有条有理，整然不紊呢？就是要有制度，我们的制度简单来说如下：

1. 要按级解决问题，不应超越级别解决问题。因此，各级领导人应时时拿出正确的意见领导下级，同时，又帮助下级，以建立各级的威信，使我们的制度更好的建立起来。

2. 各级应对自己的下属，应深入了解情况，实行领导，定期举行会议、会报制度，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检查对命令的执行情况，以贯彻执行命令的精神。

3. 建立值星、值日制度，这不仅可帮助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而且它还有培养干部的意义，同时，也要有一定作息时间表。

4. 行军前首长一定要检查群众纪律。

5. 建立一星期一次的班检讨会议，一月一次的官兵反省会议，互相坦白检讨，以加强团结，加深部队的指挥关系。

乙、赏罚严明

1. 我们部队虽有职别之分别，但官兵的人格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的部队要彻底禁止殴打、谩骂、侮辱的军阀主义的现象。可是，部队也要有赏罚，以得纠正部队那些坏的现象，以严整我们的队伍。没有赏罚就会影响我们的斗争变成儿戏。

2. 我们在赏罚上，是官兵不分的，应一律同一样受赏罚，以保证赏罚的严明。

3. 在赏罚同志时，应对同志进行思想教育，同时赏罚务求适当，对受了罚后的同志，应多注意积极教育、改造、切忌轻视，排斥的态度。

丙、体格锻炼

军队往往需要格力来解决战斗的，也需要以急剧的运动来应付战争的，因此，没有强健的气魄，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我们应注意每个同志体格的锻炼，如早操，爬山、打贡架、跳高、跳远等。

丁、爱护公物，保管武器

1. 我们的武器，是同志流了不少血，在敌人手里夺取来的，所以，我们的枪弹，是很难得来的，我们应要好好保管，应该建立人不离枪的习惯。

2. 应规定每星期六擦武器一次，同时进行检查。

3. 以后不准用枪来担东西，或重重地向地下或墙壁上乱投掷。

4. 公物是公家买来的，或向民众募捐得来的，公家的经济是由人民取来的，所以，我们不应随便浪费公物，以减轻公家也即人民的负担。

5. 以后补充公物，应切实检查旧的是否确实不能用，而决定重新补充，不应不经检查便补充。

6. 枪弹非经上级批准不能私自调动。同时，以后不能无原故擅自消耗子弹，与不留心而失掉子弹，若是无原故消耗与失掉子弹，应受到处罚。

戊、给养问题

1. 我们不仅要注意战士的精神教育，而且对同志的物质营养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应尽量改善同志的生活，使同志吃得饱，穿得暖。但过去我们的特务长很不留心，对饮食管理很随便，一般都是求其“容易”、“快”、“简单”，求其“是但”便算，同志吃得与否，完全不理，以后应纠正。

2. 应定期的将伙食收支数目向队员公布，给同志检查。

3. 连部负责同志与战士选出来的伙食委员会应经常协同特务长管理与改善部队同志的生活。

己、卫生问题

军队不注意卫生，便很容易沾染疾病，而减弱部队的战斗力，若果严重，便搞垮部队，我们应注意卫生。

1. 规定每星期六清洁与检查一次。

2. 凡到了宿营地，应天天派公差清洁。

其他问题（如教育、联络……等）另写。

连队政治工作的研究

一、政治工作的意义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因此执行军事斗争的军队，必须要与政治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一定政治目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就必须要有—套争取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是人民谋解放的工具，才能保证它坚定地朝向—定的政治目标来奋斗。所以说，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

二、政治工作的任务

我们是军队。是用战争去消灭敌人。这么样来为人民服务的。而要战胜敌人，首先，就要军队本身有高度坚强的战斗力。所谓战斗力，—般来说，是包括政治素质、军事纪律、战术、技术三方面的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最基本的，就是战士的政治素质。所以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的是如何提高战士的政〔治〕素质，即如何提高其觉悟程度，因为只有高尚的政治品质，才能有高度的军事纪律，与高度地去掌握与发挥军事技术，战斗力才能高度地提高起来。但是我们对这点有许多政工人员掌握得很不够，而将日常事务工作代替了政治工作，所以，只是单纯的注意解决实际问题，弄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忘记了从思想上、政治上来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其次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了政治工作，如说政治干部是卖“膏药佬”，耻笑政治人员是“政治人脚”，说“无政治这样打，有了政治又不是噉样打”，又说“军事还军事，政治还政治啊”等来排挤政治干部。上面这两种偏向，如果不克服，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使之逐渐走上正轨，故必须要努力克服。

三、政治工作的范围

政治工作范围包括三方面：1. 是居民工作；2. 是瓦解敌军工作；3. 是连队本身的政治工作。

四、现在连队的政治工作方向

a. 应以贫雇农为骨干，因为，他们在部队的数量相当多，同时，他们又是革命的中坚，故我们应依靠他们，这是阶级观点，但

是，我们不仅不大注意，而且因为他们样子难看，动作不灵活，还有看不起他们的表现呢，而去喜爱那些生得样子好看一点的，或会说话的同志，这完全没有阶级观点。以后应注意改变过来。

b. 在部队应立即展开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以便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端正他们的立场与思想。其次，是推动他们了解目前形势与任务，学好本领，以加强部队的团结，展开互相立功运动。

c. 实际参加群众工作，如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反三征，实行耕者有其田……等的群众斗争。

五、军队一般的实际政治工作

甲、政治教育工作。

一、内容：现我只简单提出：

1. 群众观点。

2. 劳动观点。

3. 纪律观点。

4. 形势与任务的教育。

5. 目前应注意纠正下列几种不良倾向。

a. 克服流氓主义，我们流氓主义的最严重的表现，便是不注意进行群众工作，与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反对流氓主义，承认红军是宣传者与组织者”的思想的。

b. 克服我们的土匪作风，如偷民众的东西，借部队的名誉去“敲竹杠”，打反动时就贪污落格，乱取俘虏或商人的东西等。

广东区党委给琼崖特委的指示

——关于提高党的水平、改进领导 作风和选举执委问题

(1947年)①

琼党在粮弹两缺、衣药困难条件下坚持胜利游击战，确为南方党之光，而应该向你学习。但据我们所得材料，琼党本身仍应深刻认识目前存在着的一些弱点，采取纠正办法，始能完成党与人民所热望的任务。

一、中央指示琼党游击战应为解放全琼向南路发展任务，是根据目前国内外有利形势而定，在目前解放区自卫战伟大胜利，蒋区经济破产，民变蜂起，特别广东全省各地游击战开展，顽军增兵至琼是不可能的。顽军在琼不只削弱而且已受广大群众反对，只要琼党采取既定依靠群众，适时分散，机动集中的战术，从不断作战消灭敌人开展工作，是完全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个别负责同志所谓“可以坚持到光”及“坚持不成问题只是损失大而已”的精神，必须纠正，才能长自己志气，教育干部群众认识胜利前途，有信心坚持下去。

二、长期游击战之能否胜利，在于我们能靠群众与否。琼党已有为群众服务光荣经验未被总结提高，个别干部打骂群众歪风未被制止，个别干部以琼崖特殊，不坚决实施党对改善群众生活的具体政策，军事行动时在“有钱人都是顽派”的口号下乱行没收，都是离群的危险现象，望能依照各个问题具体讨论总结，保证有效转变。

①作者和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三、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希望琼党必须注意如何以革命两面政策保护群众不受严重摧残；如何慎重使用与保存加强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改善待遇，克服疾病，轮流训练；如何进一步争取上层同情分子以掩护下层群众组织，不断增加新的力量；如何加强敌情侦察，把已有经验总结提高而系统的进行，并计划敌军工作。

四、发扬党内民主作风，造成全党团结去团结全国人民，以自我批评鼓励下级干部讨论琼党的具体政策与工作作风，倾听他们的意见来改善自己的领导。发动全党学习党章，学习刘少奇的修改党报报告，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对党员的领导及党对群众的领导。

五、我们责成琼委具体讨论上面所提各个问题，弄通思想，集中力量去突破一点，总结经验在全琼实现起来。特别对改善群众生活到减租减息解决土地问题。应将过去“特殊”观点修正。并将讨论及实施步骤复告我们及中央。

六、这一指示望根据实际状况在安全条件下召集琼特扩大会或各地党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及选举执委，冯、李明、庄，可提作候选人，其余候选人由你们及地方代表提出。执委人数十一人至十三人。区党委书记我们提议由冯负责，另选副书记二人，庄田有便即回琼，仍任副司令，李振亚、吴克之任第二、第三副司令。

广东区党委关于解决 农民斗争和民主联军问题的指示

(1947年)^①

(一) 农民斗争问题

自从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广东的农民斗争，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是否实行分田、废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三个情况。第一，全国已经进入彻底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进行最后决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和半封建剥削。农民斗争的高潮，在解放区及解放军所到之处，已经开始到来。但形势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第二，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反攻，采取外线作战。大军南下之后，纵横于江汉之间，一旦渡江，席卷湘赣，直逼两粤，随时都有可能。但目前广东的斗争，暂时还是孤立的。第三，广东游击战争，在全省各部地方普遍胜利发展，不仅把农民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并且大大地提高了农民斗争的要求。但基本上还是敌强我弱，斗争曲折，前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三个情况，说明广东已经处在土地革命的前夜，但一般地仍然不可操之过急。各地应根据下面的原则解决之。

一、按照农民真正的要求和决心的程度来决定方针，反对领导上以主观出发的命令主义。集中农民的意见时，要以贫雇农的意见为根据，但必须取得中农同意。抹煞中农的意见，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农民集中要求分田废债，就应坚决实行。如果农民首先要求分粮食、分浮财，然后就待机分田废债。或仅要求分耕减租，减本

^①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减息，及提高减额等等，均应按照农民意见实行。

二、放手发动农民，把斗争向前推进，步步提高，纠正把地主阶级作为统线对象的糊涂思想。领导上应对农民负严格的革命责任，不仅点滴不放松农民所应争取和所能争取的利益，还要保证胜利的果实能够真正巩固。这不是说地区一定要有得无失，农民不能受任何损伤。地区必然有伸有缩，农民难免有暂时的损失，但必须在基本上，尤其是最后地能够巩固胜利的果实。

（二）“民主联军”问题

“民主联军”的政治面目，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分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因为现在失意在野，所以反蒋，并以“民主人士”见称。但他们过去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军阀，性质上历史上是反革命反人民的。他们是封建主义者，是地主阶级政权的“保皇党”。他们之所以说民主，是要讨好人民，走入人民队伍来进行欺骗蒙混，企图乘机夺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这种伪民主人士，人民对他们应提高阶级警惕性。某些地方党对于“民主联军”没有认清其本质，因而在政治上代他们粉饰民主面目；在组织上帮助他们发展，把地区和税站退让给他们；在军事上和他們配合，把缴获全部送给他們。这些都是失去立场的，必须纠正。

对于“民主联军”反蒋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加以称赞鼓励，以便利用一切反蒋力量，来分散和牵制敌人的兵力，有利于我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反革命企图和违反人民利益这一方面，应加以揭露批评，使他们的反动本性在人民面前无法隐蔽，无法进行欺骗蒙混。在我们力量未达到或他们大我们小的地方，要利用反蒋的共同目标联络他们，以便建立和发展我们的工作。但在我们控制的地方，如果他们潜入活动或来争夺，应坚决消灭之，并声明是他们来找磨擦。军事行动可以互相配合，互相牵应。但以对我有利，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为原则。他们如要求我们加以收编，可以大胆收容，勿使被敌利用。但必须以绝对服从我纪律为条件，并即进行切

实的改造工作。

(三) 土匪问题

广东各地普遍都有土匪组织，因为我们的游击战争顺利开展，土匪希望倚靠我们以求投机发展的倾向显然加大了。又因为敌人积极收编土匪以补充其军事力量，及其他各方面势力也正藉收编土匪建立军队。所以我们对于土匪工作，有加以重视的必要。

在军事上应尽量争取利用土匪的武装力量，多方面谋取连络，加以组织和领导以至大胆收编，藉以对抗敌人。对于已被敌收编或并未被敌收编的，但拒不与我连络，并对我采取敌对行动者，则坚决消灭之。已被敌收编，而又与我连络，暗通声气者，则严加戒备，伺机消灭之。不打扰敌人，专打扰人民，人民痛恨者，加以劝告，劝告无效，也应消灭之。不肯受敌收编，又不肯与我连络，群众又不痛恨者，彼守中立我也守中立，彼犯我时，我则消灭之。

在政治上，应耐心改造和小心警惕。土匪是阶级剥削制度的产物，其基本群众是被迫无以为生的贫苦农民，对统治阶级蕴藏着很深的仇恨心理和很高的反抗情绪。但因为缺乏正确领导，就发生分化和变化。如上层份子生活腐化，发生财产欲望和官僚思想，剥削和压迫其下层群众。这些上层分子常常受官方收编，或与官方勾结，或与豪绅地主打成一片，出卖其下层群众等等。又因为上层份子的投机性，自私自利，没有人民立场，往往在严重的关头，一经利禄引诱，就可能倒戈叛变。所以改造的重心在下层，警戒的方向在上层。改造下层土匪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是长期的过程，要耐心，不能操之过急。有效的办法是发扬典型，鼓励落后，教育应多于批评。提防土匪上层份子最有效的办法，是争取其下层群众，使他孤立，就不足为患。

在组织上，应采取逐渐分解，以至全部消化在我队伍之中，受我收编的土匪，愿受改编分散者则分散之，不愿受分散者，则最好办法，我以加倍人数补充扩编之，保留其上层份子地位，配备我下

层干部，掌握其群众。与我联络之土匪，距我远而不能控制者，不给予名义，但应派出干部，推动他们打扰敌人，并通过他们做群众工作。距我近而能控制者，可给予名义。但必须服从我军指挥，执行我群众纪律，并接受我派工作队在他们的地区做群众工作（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处理土匪的原则，完全适用于处理“民主联军”，因为所谓“民主联军”，实质上就是土匪武装，不过挂上“民主”招牌而已）。

广东区党委关于游击战略战术的指示

（1947年）

根据中央战略方针指示，对你们提供以下意见：

一、解区自卫战争已在南线大反攻，战争已引向蒋区，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坚持解区斗争，一部在外线大量歼敌，建立新根据地，但外线作战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才能创立、巩固根据地，我们的战略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反复多次才能最后保守或夺取之。

二、战役、战术是以绝对优势兵力、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击其正面或两翼或一翼，但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对守备坚固之据点及城市，暂时放弃不打。

三、南征强大部队所采取战略战术，尚如此谨慎，对于我们群众性游击战来说，更不可不注意：

1. 纠正单纯以武装打天下思想，不懂我们游击战主要发展群众斗争。

2. 纠正不经过反复多次战斗，消灭地方反动势力而企图立刻

保守或夺取地方思想。

3. 纠正攻坚及打无把握之仗。

4. 纠正过早暴露，企图虚张声势，招致敌人大力回剿。

5. 主要是解决人民利益，奠定基础“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组织党的组织、秘密政权组织”。

迎接人民的新年

示音 (1948年1月1日《正报》社论)

一九四七年已经过去了。

一年来，广东人民求生存、求民主的自卫斗争，比之全国人民，毫不逊色，保持、发扬、光大了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光荣传统。

广东人民一年来由赤手空拳起来打破张发奎、罗卓英的“绥靖”政策，“清剿”政策，到建立了自己的基础以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宋子文竞赛。这个竞赛的第一阶段虽然尚未结束，但据广东当局在报上所透露的消息，人民的武装已经强大到三、四万人，而宋子文的充实十个和新成立五个保警总队的计划却正在开始；人民武装的据点已经由点、线到面、到各地互相联系呼应，而宋子文的反动联防则正在计划。显然的，人民已经走在宋子文的前头了。

我们并不想过低地来估计宋子文的成就，因为过低的估计对于人民的继续努力奋斗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人民既然有了这个胜利奋斗的基础，只要今天能大胆放手去动员群众、解决群众所最迫切要求的基本问题——土地改革，而又能不漠视群众的部分要求，去保护群众的粮食、冬耕、去解决群众即将到来的春耕的肥料、种籽、水利以至于诚意诚心的帮助群众喜欢做的事，则这个基础一定更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因而更加巩固与强大，更有力来保卫自己，以迎接解放军的南征彻底解放华南人民。

因此，一九四八年广东人民的努力方向是：

第一，根据现有的人民力量基础，广泛的到处去和人民做好事，取得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武装应该是人民的孝顺的儿子，人民就是人民武装的父亲和母亲，有了父母亲照顾爱护的儿子，就一定会更快的长大，就更有力量去对付那虐待父亲母亲的不孝儿子宋子文。

第二，应该知道这个浪荡的逆子宋子文，他尚有一帮匪兄弟，而且他还有强盗的干爹，他会带着匪帮来劫掠我们的家庭。我们与这一夥匪帮还有一场恶战，怎样使这场恶战敌败我胜，应该立刻做这些准备工作，才不会在匪帮来时手忙脚乱。

第三，应该警惕这个逆子和他的匪帮在打不过我们时假装“浪子回头”，从“文”的来抢夺我们的家产，我们要准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现在就要告诉我们的父母不要上他的当。

只要我们靠近父母，只要有力量打垮宋子文这一次的洗劫而又不上他的当，自然而然的一个新的局面——人民彻底解放自己的局面就来到了。

（原载《正报》第69、70期合刊，1948年1月1日）

艺术工作者到农村去

——广州纪念于子三烈士发出的号召

(1948年1月)

星子

我们处于这恐怖云团笼罩下的广州，对于于子三同学的惨死，加倍哀恸和愤恨，我们三十多位同学，在特务的刀丛之下也举行了追悼会。会场在一间很小的屋子里，没有电灯，只有摇曳着的烛光。几十张惯于沉默的严肃的面孔，平添了一层怒容。由于没有于烈士的遗像，我们惟有用洁白的中国地图，加上深红的血迹，图上写着鲜红的：“血海里种下了深仇”几个美术字。

开会了，房内的空气充满了愤恨与哀悼的交流，在向中国地图——于子三的遗像致哀时，有力地发出呐喊的对话：“……血海里的深仇！……何时报？……血海里的深仇，要我们去代报……快报……坚报……决报！”接着我们议决：一、发动个别募捐，声援浙大同学；二、制挽旗一面，送浙大自治会，聊表哀悼；三、把报导于子三惨死的情形的小册子翻印，发到各地去。最后决定发出号召——爱好艺术的青年们！应该到广大的农村去！该文内容大略如下：

于子三惨死了，追悼会开过了，泪也流干了，血海里的深仇，我们一定要报，现在，我们不怕流血和牺牲。

自由与民主的钟声响了，爱好艺术的青年们，我们不能让可贵的青春，掉在读死书，死读书的教室里，时代不同了，象牙之宫，不是我们居住的，我们没有金钱，我们没有美酒，我们有的是一颗燃

烧着的热爱劳动人民并为之殷勤服务的心。

只要我们的眼光放远些，用我们锐利的视察，去把周围环境纵横地进行解剖，便可发现包围着我们的形形色色的罪恶，和各种各样的屠夫。他们正张牙舞爪向我们张开血口扑来了！为着生存，必须斗争！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准备——准备到广大的农村去！

到广大的农村去！毫无疑问，在今天这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不但好的干部要到农村去，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甚至好的学生也要赶快到农村去！到农村去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帮群众办事，这才是实际的行动，伟大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爱好文艺的青年，离开了广大农村，便等于没有艺术的生命。“人民的文学”与“人民艺术”是早被提出了。的确，除到广大农村去，我们爱好艺术者，感到无地安棲！当我们要向工厂和码头去寻访题材时，不是时时受到军警特务的干涉吗？当你的作品刊在报章上，你总少不免被认为有政治问题吗？原因很简单：在你那作品里，引来了民主的光明，揭露罪恶者的丑态，从此，你的背后便常常有狼狗跟踪你了。

因此，要在艺术上求发展，应决然的马上到广大农村去，在农村生根，在农村发展，在农村结实！农村是我们万有的宝库，农村是无限新艺术的矿藏！只有在广大的农村，我们才可以自由的写纵情的书！

爱好艺术的青年们，赶快把木刻刀磨利，把画笔洗净，准备一手拿起枪，一手拿艺术的武器，到广大农村去锻炼吧！纯洁而朴实的农民，他们用充满阳光的微笑，向我们欢迎了。到农村去吧！广泛地动员艺术青年到广大的农村去吧！——到农村去是给予子三烈士的最好的纪念。

（原载《正报》第69、70期合刊，1948年1月1日）

走向胜利，一定胜利

——1947年的广东形势

(1948年1月)

俞 同

一、一九四七年，全国革命形势起了伟大的转变，全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了。这一年来的广东人民，为了配合和迎接全国斗争与形势转变，实行放手发动的坚决方针，群众斗争飞速地上涨，农村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的新高潮即刻就要到来了。

一九四七年的广东人民一扫前此的消沉失望情绪，充满了光明与希望；与此恰成对照的，一九四七年的广东反动统治者，充满了悲观焦躁狼狈不堪的景象。

一九四七年，广东人民的斗争，迫使他的敌手——四大家族的代理人张发奎、罗卓英归于失败，一九四八年，广东人民准备用更严厉的办法来打击新的敌手——四大家族头子之一的宋子文。

方针只有一个：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加强农村武装力量，建立革命主力和民主堡垒，破坏和粉碎宋子文一切反动阴谋，配合反攻大军，结束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

任务只有一个：一切为了农村武装斗争的胜利，争取广东、华南人民的彻底解放！

一年来广东时局的重要事项很多，在这里拟一一论述，作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广东人民和反动统治者间所进行的搏斗，是怎样走向胜利，今后又为什么一定胜利这一重要之点，加以论述，以供关心南方斗争的、特别决心投身到这一个斗争中的人民战士的参考。

二、当我们在年初总结一九四六年的广东形势时，也曾做了一个判断，指出广东蒋方反动统治到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已开始动摇了，而且一定继续动摇得更厉害，去年一年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没有弄错。但是，一九四七年决不同于一九四六年。有什么不同？我们也曾这样指出过，一九四六年广东反动统治的动摇现象表现于四个方面：第一，海南岛上琼崖纵队的坚持斗争与胜利，这个方面在去年间没有不同而且更向前发展了；之外，第二，东纵复员人员被迫重新拿起武器；第三，各地人民抗征开始出现武装斗争形式，但还只是零星的萌芽状态的；第四，土匪的滋扰。这三个都是广东大陆上的情形。一九四七年有了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在于广东大陆上人民的斗争再也不是零星分散的骚动，而是群众求生斗争和人民武装的紧密结合，有组织的人民武装斗争成为主要的形式，从萌芽状态进入发展生长状态，从无到有走向从小到大的过程，这奠定了争取人民解放的切实基础。

人民力量的发展已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在这里让一些“官方”公布的数字来说明吧。过去二年中，在报章上出现过的“官方”统计数字有如下几个：

（一）去年二月四日张发奎在行辕官舍举行三十六年首先记者招待会的报告中称：“粤匪（即人民武装，以下同——引用者）总数共有三万六千五百多人（按指东纵北撤前——引用者），经过剿灭后（按指东纵北撤及复员后），减小二百多，现在尚余一万三千余人，海南岛占了六千多，其余分布在闽粤边、东北江、南路一带。”

（二）三月二十二日韦镇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称：“本省复员初期本省土匪共约有三万八千余人，目前残匪仅余一万二千。”

（三）五月八日行辕举行之记者招待会中，行辕第二处科长报告粤桂区“匪情”称：“两广目前蠢动之奸匪土匪，据调查约计有一万四千至五千人。”

（四）七月十一日《大光报》载省警保处第三科周克诚称：“根

据各县报告，粤省土匪约共一万四千余人，流窜散匪亦有万余人，全省总达三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广东反动当局所谓“绥靖”所得的结果是人民武装愈剿愈大，发展到了今天，据官方的记载，已经差不多恢复东江纵队全盛时代的强大阵容，其活动范围有全省百分八十的县份，比东纵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什么是人民的武装？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是农村中贫苦农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求生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其最高形式，这是蒋党之清乡屠杀与三征交迫的结果，广东正规蒋军北调形成的后方空虚，又是广东人民武装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一九四六年七月东纵北撤，八月开始征兵，九月开始征实，广大农村立即兴起了反抗的骚动。循至去年年初，蒋府厉行所谓“扫征”工作，人为的粮荒威胁广大的生命，遂有规模广泛的“破仓分粮”斗争，到去年三月间达高峰。据蒋府田粮处统计，遭人民打破之各县粮仓，“自三十五年以迄十一月止，计有三十九个县市，共一百五十仓，损失赋谷四万三千余石”。这种破仓斗争，均系有广大群众参加（如龙门之永汉墟粮仓打破时有万余群众参加），由少数武装掩护或作战。如果以三十九个县份估计，那么直接卷入这一斗争的农民群众，当有一两百万。武装斗争和群众利益既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发展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的南路人民武装就在这个时候震撼了整个反动营垒，其他各江的群众性武装斗争也采取各种各样姿态活跃起来，使广东蒋府形成处处告急县县请兵的窘态。这些人民武装，除了南路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行动之外，其他各江的队伍，多数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形式，以广泛打击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其行动的目的，这是去年广东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基本形态，它虽然还是一种朴素的初级的形态，但收了很大的效果，于是各县乡镇反动武力被歼的消息，就终年不断的传播出来，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鼓舞着群众。因此，农村中群众斗争也在发展着。各地农民的减租退租的斗争，在人民武装活动地区以至毗连的蒋区内，相当普遍展开，而且它出现的形式比之过去抗日时期有所提高，已有采取清

算恶霸的斗争，也有实行停租废债。武装斗争向着较高级形态发展，群众运动向着土地改革发展，一个属于全国意义的华南新战场行将出现了！

三、就去年一年间人民与反人民的斗争全局说，由于人民力量之广泛、分散、放手发动斗争的结果，蒋方完全陷于被动，忙于招架，穷于应付的状态，而在某一局部或某一局部的某一时期，则蒋方是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这是一种犬牙交错的局势。蒋方战略是重点作战，一年来没有变化，这是他们兵力不足的结果。

去年四月以前，蒋方进攻作战的重点在琼崖。

他们认为只要消灭琼纵，广东绥靖大业就可以完成，他们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广东大陆埋下的炸弹会爆发，会燃烧。于是把百分之六十以上兵力投到琼崖孤岛上作重点进攻，由蔡劲军主持的“半年清剿”于前年十月开始到去年三月结束，开始时动用兵力为整四十六师十九旅两个团，保二、三、四、五、六、七共六个总队和约七千的地方部队。采取所谓“薙头政策”，薙了一块又一块，首先进剿琼山、文昌两县。前年十二月，十九旅北调，削弱了兵力，蔡把半数兵力作守备，半数兵力集中起来，大举向澄迈、定安、乐会、万宁及琼山六区进攻，企图捕捉琼纵的主力而歼灭之，没有结果。至去年二月间，蔡军主力又向临高、儋县、白沙、昌江、感恩、崖县等地猛扑，也没有结果。蔡劲军的“半年消灭琼纵”的阴谋被完全粉碎了。他的“战绩”，可以用两个材料来作说明。第一个，琼纵司令部发表的公报称：在半年中只以较大的二十多次战斗来说，歼灭蔡军千人，缴重轻机枪二十挺，步枪三百余杆。第二个，在去年三、四月间“倒蔡运动”的健将云实诚所说：“蔡劲军用图表数字来欺骗，说上月克复某县，本月计划进攻何地，剿获土匪枪支若干，一味在报消，在瞒骗。比如他说：卤获土匪机枪十几挺步枪百余支，但他被土匪抢去了几十挺机枪，三百支长枪，却一字不提。比如他说某日剿灭土匪，收复了某地，何曾有这回事！”蒋方在琼崖的重点进攻就是如此。

四月以后，广东大陆吃紧，驻琼保总抽调，仅余保三、四、六、七共四个总队，兵力削弱三分之一，加以久战挫败之余，十分不济事了。琼纵的情形恰恰相反。遂有去年入夏以来的主动反击的不断胜利。去年四月到八月的反蔡劲军“全面清剿”战斗中，据不完全统计，琼纵歼灭蔡军八百余人，解放了保亭县城和灵山、迈号、罗豆、和乐、南坤、中原、博赞、南楼等市，以及北架、下坡、通大、东高、那豆、加训、应解等据点。去年八月到蔡劲军解职止，即蔡之所谓“清剿新阶段”中，根据已知材料，琼纵计歼敌七百多人，收复和解放白沙县城及南丰、加来、东山、白马井、安江、美党、北连、牛漏、公馆等九个市镇。

六、 总计蔡劲军在琼崖进攻人民的一年又一个月中，崖琼人民的英勇战斗，共歼敌约三千人，解放和收复县城三座（一座被敌重点）市镇据点三十二个。在人民军队的保卫之下，白沙人民已经动手起来进行翻身斗争，实现土地改革了。

四月以后，重点在南路。

去年春间，广东大陆上群众破仓分粮斗争，有如春潮泛滥，蒋党广东当局的一场春梦从此破灭了，最使他们惊惶失措，谓为“空前未有”者是南路。据三月间他们官方宣布，高雷钦廉防五属的茂名、化县、吴川、遂溪、廉江、海康、合浦、灵山、防城以至东端的阳春、阳江各县，都有枪械齐备，人数由几十至二百的人民武装在活动，于是各县紧急戒严，厉行夜禁。三月八日绰号“铁胆”的南路反动头子遂溪县长戴朝恩中伏毙命。至此，南路人民武装的声威震撼了蒋方全省。钦县县长孔繁校、防城县长陈济南以“剿匪不力”撤职，化县县长任颖辉、廉江县长蔡熹田“虚报匪情，惊惶失措”受处分，七区行政专员林时清、八区专员林荫根又均屡次呈辞不干。整个统治阵营可谓“阵脚大乱”，于是抽调兵力向南路作重点进攻，成为必要了。四月成立“粤桂南区剿匪指挥部”，林英为指挥官，调六十九师一部入南路，无济于事；五月间琼崖保二、保五两总队回调，以行轅特务团一个营增援南路，也无济于事；七月

间，“因匪势坐大”，又增调正规军入南路，也无济于事。七月一日警保处成立，陈沛取韦镇福而代之，蒋介石限令“三个月内击破匪之主力，六个月内彻底搜剿肃清”，于是陈沛稍事处理事务之后，即于九月底亲自兼任粤桂南区剿匪总指挥，迺赴南路，其时兵力稍有变动，正规蒋军一个团一个营共三千人调走，陈沛则率保一、保二两总队赴南路，连有原保九、保十共为四个总队。根据上月省警保处交代礼中陈沛报告的“剿匪概况”，我们就可以发觉陈沛也无济于事。他所定军事行动三点：一“固守据点而截匪”；二、“机动搜剿而歼匪”；三、“联保连坐而灭匪”；要补充的还有一个构筑碉堡据点的办法。不管他怎样说得五花八门，其实际成绩就不过是完成了湛江市十个区的碉堡据点，固守自保，因而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语：“格于环境条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了。南路人民武装队伍以新兴未久之师，抗拒蒋方全省近百分之六十的进攻兵力，能够巍然屹立，可谓难能可贵。

在其他各江，蒋方由于兵力不足，完全处于被动。他们的办法是实行联防制。去年四月以来，有南番顺、南始仁、增龙从化、六邑（成立指挥部后改为联防处）、英新佛、四会广宁（成立绥江治安会）、新鹤高等县际联防机构，区与区，乡与乡之间也实行联防，行辕曾颁布“一般城镇村落守备办法”省府颁应付抢粮办法，省府飭令各县组“清匪保乡会”这些东西，都是企图驱迫地方反动势力出来对抗人民，而把仅馀的两个保安总队及部分正规蒋军，作为机动兵力，寻找人民武装的主力来打击。这些办法都没有效果，东西北韩江各地人民武装的发展活跃，至令人兴奋。九月蒋方警保处整补会议后，宣布撤销联防制，就是他们前此的办法完全落空的反证。

张发奎、罗卓英时期进攻人民的计划，完全失败，这是他们不得不先后落台的重要原因。他们的失败就由于有了兵力不足，矛盾重重，人民痛恨这些致命的弱点。一年来，人民武装的全面性的分散的主动的进攻的发展和活动，取得了胜利，打下了今后进一步发

展，正式开辟新战场的良好基础。而就全局来说，蒋方由于兵力不足，陷于被动招架与采取重点作战的战略。在他们重点作战的地区，他们集中了相当优势兵力，保持了主动进功的地位，可是由于这一优势并不是很大的优势，又由于内部矛盾，互相掣肘，人民痛恨，因此也归于失败。在这种比较强大的压力之下的人民武装，同样取得了胜利。

四、去年九月十九日蒋府行政院临时会议，任命宋子文为粤省主席，十月省府改组，十一月宋兼任行辕主任，以黄镇球为副。自此，广东情况开始了新的变化。

关于宋子文来粤，本刊已曾不断论列，为了节省篇幅，许多东西不拟重复，在这里，只列出一些要点：

第一，宋子文来粤之后，要赶紧出卖广东以至华南几省，换取美国援助。他到穗之后即见“宾至如归”，和许多美国战争贩子及经济侵略专家们，作了相当广泛的主权贱卖的谈商，黄埔、榆林辟港供作美国军事基地已在进行，把广东作为美式新军训练基地之一亦已确定。可是，我们应该指出，今天美国的援蒋政策，基本上虽然不变，但实际上仍然采取一种使蒋“吃不饱，饿不死”的政策，直接援蒋内战之不能挽救蒋的必亡命运，已经逐渐为美国反动派所公开承认，美国帝国主义逐渐对玩弄所谓政治新阴谋增加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所谓美国投资“开发”，在广东人民斗争泛滥全省的今天，只是一种哄人的神话，其次是大量的美国援助，仍然只是蒋宋们的主观幻想。反过来说，又并不是美国不援助，宋子文来粤后的广东，行将成为美国军事援蒋的运输站，美国侵略者逐日加强对广东的侵略和控制，又是必然的。

第二，加紧进攻人民，成为宋子文的中心任务，已有无数事实可作证例。他的作法，不外整顿机构，实行军事一元化，起用“宿将”（失意军人），企图统一地方反动势力，增加兵力，筹组新军几点。就目前所知材料，宋子文已把它的统治机构作了新的改变，如同他本人的身兼军政职务一样，九个行政区均成立“剿匪指挥

部”，各区专员兼任指挥官，也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各县县长亦开始更调，在已发表的二十三个县长中间，差不多均属军人，由省到行政区到县都做到所谓“军政一元化”，以便全力进攻人民，实行宋子文式的军事独裁制。起用“宿将”出任专员兼指挥官，也许宋子文认为是“得意之作”。这批失意军人，穷途潦倒，一方面想出来捞一把血腥钱，一方面还幻想着宋子文的“自成系统”的政治阴谋出现之日可以藉此高升，因而不惜以过去总司令军师长的身份出来供宋驱策，甘作反人民的鹰犬了。但统治者的困难不在于“将”，而在于“兵”，兵力不足。因此，宋子文不惜竭泽而渔，吸干人民血汗，供应军费，已决增编五个保安总队，添加他的反人民的赌本。此外并有收编伪军、游击部队、土匪的计划。在前线被歼后之广东部队（传共六个旅），陆续南调补充训练，可能兼负进攻人民之责。宋子文进攻人民的战略，将是以各行政区为独立作战单位，现在设置的“剿匪指挥所”，机构庞大，独裁一切，除指挥官外，并设副指挥官一至三人，其基本兵力有一个至三个“清剿大队”，前此组织之义勇警察、自卫队等均一律取消，重新编组。至省保安队及部份正规蒋军则作为机动兵力，要“集中机动使用”作“重点战斗”故他们的“重点进攻”战略可能不变。

第三，准备玩弄政治新阴谋，积极布置所谓“反蒋和平运动”等到蒋统治已不能维持的时候，便用所谓以“小蒋介石”代替“大蒋介石”，或“新蒋介石”代替“旧蒋介石”的办法，依然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之下，在华南、广东出现一种“自成系统”的政治闹剧，目的在维持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于一隅。这一政治阴谋把戏，由宋子文主持其事，而以一些对蒋不满的失意军人，和括号内的民主人士作为拉拢勾搭的对象。这些活动，已极频繁。在这里，我们得郑重声明：人民是宽大为怀的，谁在以前作过恶，但今天已经肯悔过为善，则决不咎既往；但人民又是严峻的，有谁甘自绝于人民，投入美蒋宋所布置的政治骗局之中，谁就免不了惩罚，勿谓言之予也！

对于变化中的广东形势，应该怎样来认识呢？

第一，我们承认宋子文的垂死挣扎可能增加对人民力量的压力，广东成为美国援蒋之一个基地，美国侵略者增加对广东的控制，以至所谓“反蒋和平”阴谋未能及早打破，在将来也可能若干增加对人民的压力。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人民力量在过去一年来的胜利斗争，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武装斗争向着较高级形态发展，群众运动向着土地改革发展，广东的农村游击战争向着开辟新战场发展，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并不是宋子文要怎样做就能够怎样做，而是宋子文要这样做，广东人民不准他这样做，破坏他、粉碎他！一个竞赛——这是广东时局的实质。

第二，宋子文困难重重，例如大量美援目前不能实现，调整反动机构，今天只是个空壳，起用的“宿将”，虽不少是过去反共健将，但目前显然没有信心（例如叶肇对记者表示蒋党现在已经“丧失天心”，张瑞贵表示“手上无直属部队，指挥上欠灵活”，出任八区指挥官有困难）；扩编部队，则兵源成问题（本年度征兵只得万人，仅四分之一），训练要时间，经费有问题，增加的兵力又未必能够赶得上人民力量的发展，即未必就能确保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财政因绥靖机构扩大而更加困难（下年度预算赤字一千六百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内部不和互相掣肘的现象也不能免；宋子文极其想望动员地方土霸势力来进攻人民（强调所谓“用兵不如用民”便是），但大势所趋，共产党必兴，蒋介石必亡，已成人所共知，因此这些所谓“民众”力量的动员就见困难，土著势力多数不愿以自己生命来做宋子文的赌注。这都是摆在宋子文面前的困难。因此，我们承认宋子文进攻人民坚决性与疯狂性，但又必须承认宋子文有着许多不可能克服或不容易克服的困难存在，这是蒋宋必败人民必胜的原因之一。

第三，宋子文的赶紧出卖和经济独占，势必绞杀一切民族工商业及榨干人民血汗，伴随他们的进攻人民的反动措施而来的，又必是竭泽而渔的剥削人民，因此城乡经济必定加速崩溃，人民的求生

斗争势必更为汹涌，群众的觉悟将普遍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将迅速增涨，这决不会是遥远的事了，这是任何杀人计划反动阴谋所不能遏阻的。这又是蒋宋必败人民必胜的原因之一。

第四，应该了解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全国革命新高潮到来的时候，群众斗争发展，谁要是用平时的尺度去测量它，谁就一定落在客观形势的后头，在解放军战略反攻，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的新形势下，广东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只要予以适当的领导，群众斗争便如暴风骤雨，日涨千丈，这又是蒋宋必败，人民必胜的原因之一。

第五，我们有自己解放华南的决心，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可能性。反攻大军的南下一旦成为事实，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将使南方局面急激的转变，并迅速地葬送宋子文的统治。

时间在前进啊！就在这些特点上，展开了广东人民一定胜利的一九四八年。

（原载《正报》第69、70期合刊，1948年1月1日）

青年的魂灵挺立起来了

——一年来的青年学生运动

(1948年1月)

胡其亮

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鲁迅

一、青年的魂灵已经挺立了起来，过去一年的学生运动是以前没有看见过的，它是空前的广泛、深入和壮大，它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展开来了，在蒋介石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剑。

这是从去年一月间的抗暴运动开始的。在这以前，随着去年七月大打开始和政治形势的日趋恶劣，战后的学生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沉寂。抗暴运动以预料不到的规模和速度展开了，从此以后全国的学运在基本上就没有休止过，就此起彼伏地，前呼后应地发展着。

从运动本身讲，有三次全国规模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一月间的抗暴运动。这个运动，在表面上是由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而起的，实际上是长期的层出不穷的美军暴行，是战后蒋政府丧权辱国，美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逐渐暴露教育了学生群众，是战后复员“劫”收的现实教育了学生，所引起的。这次运动第一次向大众宣布学生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在运动中不仅仅提出要惩凶，赶出美国兵，取消蒋美商约，倒是运动的中心口。在这次运动中，实际上已指出了学生们以后一定会继续作更进一步的斗争的，学生运动一定会长期性的展开的。第二次高潮的五月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暴

行反压迫的斗争。这是在蒋政府教育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解放军大踏步胜利，转入大反攻前夜的情况下发生的。蒋政府的反动统治，已普遍使人民活不下去，已使得整个的教育势将全部破产。这次的高潮，从许多分散的个别的运动汇合成一致的浩荡的大队伍大运动，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坚持之久，都是空前的。第三次高潮是下半年的人权保障运动，到十一月的于子三事件为最顶点。这是随着五月运动以后的蒋介石恐怖统治和学生更加觉悟和团结而来的。争自由反压迫的人权保障运动是胜利的，这不但表现在通过这运动更加暴露了蒋介石的狰狞面目，教育了学生群众和广大的社会人士，加强了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团结程度，还表现在独裁者真的在群众的铁掌下面受到反击，不得不把大部分被捕同学放出来或者移送“法院”去。整年的学运便象是波涛起伏的海洋，而三次高潮突出在海洋的中央。假使要再详细叙述的话，那末，值得提出的，是在第一次高潮和第二次高潮之间，还有上海的爱用国货运动，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被殴身死的“二九”惨案。在第二次高潮和第三次高潮之间，则有全国规模的助学运动的展开。助学运动遍及京、沪、平津、昆明各地，运动的展开，是在五月运动之后，启示大家，反饥饿，只有靠自己的团结的力量，而助学运动本身又进一步的巩固了同学间的团结。

从运动的性质来说，在抗暴运动以前，所有的运动，基本上是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是向蒋政府要求的运动，是属于合法运动的范畴的，抗暴运动则第一次打破了传统的亲美思想，是反对蒋政府及其后台的，因此也是带有反蒋的性质的。在五月运动的前半期，是向蒋政府要求的，但后半期，到反内战反暴行的阶段，则由要求到反抗，到全体学生群众与蒋统治完全对立了。助学运动是在独裁者的压迫下展开的，到后来的人权保障运动则纯粹是保卫自己与蒋统治抗争的运动了。

从学运的主观力量来说，则抗暴运动第一次大团结了个别各校校内的力量，经过了沉寂时期的学生群众是开始组织开始团结起来

了。到五月学运的前夕，绝大部分的学生自治会都已是民主的能代表绝大部分的同学们的意见的了。参加过国内学运的人知道，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胜利。在五月运动以后，全国学联在七月十日正式成立了，除此外，各大城市都成立了或巩固了自己的区域学联。学联在蒋政府眼中是非法的，然而在同学中间却有无限威信。这威信，在助学运动中更加巩固了。到十一月的抗议于子三事件的斗争中，则学联完全表现出了它的力量。

主观力量的成长，更表现在随着全国学联的成立，中国学运与世界学运结合在一起了，已经是世界学运的一部分，并且不止一次地得到世界各地青年和学生精神、物质的支援。中国的学生不但是团结了，而且是永不孤独了。

英勇的学运便是这样的发展和发展的。

二、和蒋政府的尖锐对立是今年来的学运的主要特点。正如上面我们所指出的，学运发展到五月的下半期，基本上已成为反对蒋政权的一种斗争。客观上是如此，学生们的主观认识也是这样，不论是人权保障运动也好，是助学运动也好，基本上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来和蒋斗争。这在“五·四”运动所没有看见过的，“一二·九”运动也不是这样。“一二一”运动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这对立不是人工所能制造的。是在学生群众自己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运动显示了学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的政治觉悟在运动的锻炼中一次次提得更高了。这可以从每次运动中明确而肯定的口号及目标里看出来，更可以从学生自己创造的文艺活动中看出。在抗暴运动里面是“美国兵滚出去”，在五月运动里是“团结就是力量”，而在最近的抗议于案运动里是反复重唱的“反动政府要垮台”了。也必须指出，这政治觉悟的提高不仅仅是少数积极分子的事情，是至少代表着热烈参加运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的事情，不但是学生的事情，且更在广大的蒋管区人民间有着深刻的印象。蒋管区学生，蒋管区人民，是今非昔比了。

这对立还表现在它的尖锐的程度上。一方面是蒋皇朝的日益疯狂残酷，由侧面的阻挠到正面的压迫，由非法的压迫到已经是“合法”化了的压迫，由水龙到木棍、石子、小刀，以至于手枪，由“自行失踪”到公然逮捕杀害，但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抗的英勇顽强。学生并没有在反动派的疯狂压迫下低头，那一次的压迫真正的使学生驯伏了下来？没有的。相反地，学生的反抗是象野火似地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对立还表现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面。经济性生活性的斗争不再是和政治性的运动分离的东西，而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抗暴运动是政治性的，然而也不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由民族意识的昂扬的基础上，学生群众对于切身生活的不满而促成的。五月运动是由经济性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斗争开端的。到后来，反内战口号被提出，发展成为政治性的了。以后的助学运却又是从纯粹的经济性开始的。到后来又和爱国的口号结合。到人权保障运动，是政治性的〔又〕是争自由争生存权利的，但也是争保障自己的学业读书前途的斗争，是包括了学生群众的生活要求。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密切结合保证了运动的深厚基础。运动是由分散到集中统一，又是由集中统一到分散的。五月运动最为典型。它从分散的个别的运动到集中的统一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又从集中统一的到分散的反暴行反压迫争自由求保障的运动。一年来，运动一直是此起彼伏，有时又是一呼百应的情况下继续着的。从广度来讲，三个高潮范围之大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它包括了五、六十万学生和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从深度讲，也是前所未见的，每次运动不是少数积极分子的事情，而是大多数同学所参加的事情了。开除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学生领袖，换进了数以百计的特种学生。然而，运动并未因此而稍灭，通过各地坚强的学联组织，全国规模的运动更已有了牢固的组织上的条件。

社会同情的一次比一次广泛也是值得注意的。这表现在这次学运同盟军的增加。在抗暴运动中，没有教授公开反对。到五月运

动，第一次有了教授的同情罢教，到最近，则不但有教授同情罢教，更有讲师助教罢教，更有校工罢工，不但是同情罢教罢工，在浙大，在昆明，还组织了师生委员会。在五月的上海和十一月的昆明，更有家长联合会的组织。这更表现在学生运动一次比一次社会影响的加深。再也没有人称学生运动是“学生闹风潮”了，谁能说八月间上海金都戏院宪警冲突所引起的警察罢岗不是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呢？

在学运中所表现出来的，还不仅仅是学生觉悟的提高，学生抗争的英勇顽强，还重要的，学生是更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怎样运用策略来取得胜利了。百炼成钢的青年民主斗士，是更为富于经验勇敢善战了，研究一下现在的罢课，是和以前怎么样的不同了呀。群众在运动中有多么大的创造，每次的学运，都是很好的贯彻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的。

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便是这样的一支不可克服的力量。

三、这一年来的学生运动教育了大家再度认识了二个简单而不移的真理：“团结就是力量”，“唯有斗争，才能胜利”。一年来运动的总经验是：反动派是可以打得下去的。只要自己团结，只要更坚决更英勇然而也是更灵活的斗争。

一年来的运动是担负了并且担负着人民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和组织的任务的。学生运动的“真实效果是在于通过每一次学生运动使广大学生的志气和认识提高和坚定，同时又推动了学生以外的各阶层人民的觉悟与团结，然后当学生群众与学生群众以外的人民结合到一起，汇成巨大的力量时，就终能够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沈友谷）。一年来的学生运动是初步完成了上面的任务的，以后的道路是继续执行这任务并彻底完成它。

以后的日子必将更为艰苦。但以后学生运动必须努力使它更为壮大。蒋统治在它的最后的日子一定是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就需要不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和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但也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更加灵活的运用策略，更加坚定

地团结力量，更加紧密地和群众在一起。不老一套，这必须是起码的知识了。

一个学生运动要和人民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那是一定的。一方面，要在“通过每一次运动使广大学生的志气和认识提高和坚定”的同时，要“推动学生以外的各阶层人民的觉悟与团结”，要主动地扩大学生运动的社会影响，要主动地担负起自己的先锋队，推动者和组织者的任务，成为蒋管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核心。一方面，在主观上必须认识：学生运动是要支持战争的，通过运动来困扰敌人，瓦解敌人，这是一面，培养大批干部，直接到农村去参加农村武装革命斗争，又是一面。

有人称现在的运动是新“五·四”运动。假使说，旧“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思想孕育与发展的开端，那末，这次的新“五·四”运动，事实上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胜利实现的前奏。鸡鸣报晓，胜利就在眼前！

（原载《正报》第69、70期合刊，1948年1月1日）

面 向 着 祖 国

——一年来的香港青年学生运动

（1948年1月）

方 敏

过去一年的香港青年学生运动，在逐渐发展与步步成长着。香港密迩国门，祖国人民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斗争，香港青年学生运动是和它息息相关连在一起的，过去一年是祖国青年学生爱

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一年，一个接连一个的斗争巨浪，推动了也教育了香港青年学生。战后复员恢复了初步基础的青年学生运动，在那些巨浪推动之下也激起了波澜：年初的援沈抗暴运动作了一个开端。五月国内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爆发，香港青年学生迅速响应，以无比的愤怒谴责蒋政权的滔天罪行，用精神和物质，给祖国同学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支援，香港的青年学生清楚懂得，他们和国内青年同学的命运是共通的，必须携手向共同的敌人坚决斗争。到于子三惨案发生，国内同学掀起反迫害的人权运动，消息传来，香港青年学生又普遍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沉痛的哀悼，把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向世界人士控诉。

香港的青年学生运动在祖国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展开阵容，反过来也对祖国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作了有力的支援。

年初的援沈抗暴运动，由于脱离群众目囿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群众情绪虽然高涨，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就沉潜下去了。到了五月支援运动之时，小圈子主义已被公开提出加以批判，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开始学习掌握付之实践，积极分子回到群众中去，并且已经起了团结组织的作用，所以这一次运动就冲破以往那个狭小的积极分子的圈子，成为较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复员以后只有青年团体的分散孤立的存在，学生工作一片荒芜，偏枯跛行现象克服过来，队伍扩大了，动员的范围广泛了，香港有了群众性的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暑假结束以后，各主要青年学生团体整顿内部巩固基础的工作，又为未来的发展作了准备，声援于案和响应回农村去，显示了运动对群众的影响，是天天在扩大中。

不只队伍扩大，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香港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原有干部能力加强，新起干部也不断涌现。如果援沈抗暴运动时还只限于单纯的爱国热情，到了五月支援运动，大家就一致看出了蒋政权卖国残民的狰狞面目。于子三惨案发生之后，则更深切认识到蒋介石与青年学生势不两立，真正爱国家爱人民的热血青年，除了直接拿起武器打倒独裁统治，就没有别的出

路。所以对于回农村去，在青年学生中间，表现得特别热烈踊跃。暑期的学习运动和大反攻后反省思想改进工作的进行，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干部的工作能力，起了不小作用，尤其是后者，典型示范的影响，曾远及海外南洋。

更重要的是：过去一年香港青年学生运动，在形势教育和实践斗争中，领会了本身首要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什么了。复员以来香港的青年学生运动曾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混乱现象。这个混乱现象的形成，没有明确的方针指导是主要的原因。那时动员群众教育干部的最终目的到底为了什么，是弄不清楚的，所以学习教育没有中心，组织群众的工作失去标准。五月支援运动把香港的国内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联系起来，但是香港的青年学生运动对祖国人民的斗争，究竟能起与应尽何种作用，这个问题直至大反攻的讨论和于案发生之后才获得一致的结论——香港的青年学生运动支援祖国人民的斗争，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培养并动员大批干部回农村去，发动、组织、参加农民的武装斗争。这就是香港青年学生运动的首要任务和工作方针。任务已明，方针既定，香港青年学生运动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向。

支援了国内青年同学的爱国民主运动，扩大了本身的队伍，提高了青年学生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干部的工作能力，确定了今后运动的首要任务和工作方针，这些就是过去一年香港青年学生运动的主要成绩。

这些成绩的意义不小，但是和祖国人民斗争的胜利形势比较起来，却就觉得运动的发展，仍旧落在形势要求的后头。

首先表现出不够的是广大的青年同学还停留在运动之外，已经参加到运动里来的，还只占全港青年学生总数中很小的部份，很多团体兜来兜去还是那几十个；其次是已经团结到运动里来的，还不能及时给与必须的教育以加深其认识加强其能力，团体的组织松懈疲塌，内部生活枯燥空虚；再次是干部极端缺乏，到处闹人手不够，回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开始之后，这个现象更显严重。

形成这些落后和不够的原因，应该承认主要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足。长期对运动的方针任务了解得不明确，使许多工作变成事倍功半；运动不能和此时此地青年学生群众的切身要求融合起来，干部群众观点的缺乏，使工作在总的方面来看还是脱离群众；再加上一些宗派主义在作怪，满足于眼前成绩的沾沾自喜阻碍了向前进取，就使得工作不能不落在形势的后头。

但是有了过去一年的努力，香港青年学生运动继续扩大发展的基础是奠定了，今后的问题是好好地总结经验，获得教训，掌握紧工作方针，团结更多的群众，培养更多的干部，配合祖国人民向独裁卖国的统治者的大反攻，胜利前进！

（原载《正报》第69、70期合刊，1948年1月1日）

困难紧跟着敌人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1月）

黎展

本报新年社论曾经这样指出：

一、“和宋子文竞赛的第一阶段虽然尚未结束，但据广东当局在报上所透露的消息，人民的武装已经强大到三、四万人，而宋子文的充实十个和新成立五个保警队的计划却正在开始；人民武装的据点已经由点、线到面，到各地互相联系呼应，而宋子文的反动联防则正在计划。显然的，人民已经走在宋子文的前头了。”

这段话拿来去做去年宋来后三个月的小结，是非常恰当的。遥望

新春，人民的前景更美丽，而困难则紧紧的跟随着敌人。

不错，我们不想过低的估计宋子文的成就，但三个月来他做出了什么事呢？绥靖机构整顿过了，几省联防在筹划中，新编五个保总委出了总队长，算作成立，据说还要增编五个，可是原有的十个保总已经破破烂烂，决定要加整补，残兵南调则有一百三十一旅开赴琼崖，行将调回的在报章还发现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九两个旅的番号；这些看来似系“大事”，但考究之后，令人觉得堆积起来的東西，在目前还只破铜烂铁，须经一定时间和物质条件的打磨，才能拿去和人民较量。

正是这必需的物质条件造成了敌人不容易克服甚至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综合所知材料，兵源、粮食及财政三项困难的存在已至严重，打击着宋子文增加反动兵力的中心计划。

言财政，由于绥靖机构扩大和军队的增补与提高待遇，这笔反人民军费的增加，使得全省经费预算数字激增至二千余亿，而收入方面仅得四百余亿，不敷达千六百亿之钜。上月胡善恒（财厅长）脚宋命赴京，要求蒋补助，但并无具体解决办法。

言兵役，三十六年度广东征兵定额四万五千名，若能全数征足，征足之后若又能扫数由宋补充军队，那还算不错。可是，据去年十二月六日美联社报道则征起人数仅及一万；十二月底原系限满，但据黄世途（军区副司令）报告，共征得二万七千名，仅超过半数不多，迫于展限到本年一月二十七日截止。据黄世途称：此次征兵困难由于水灾和“匪患”之故。其实如果他们不藉着水灾，乘人之危，夺人之命，把流离失所的壮丁拉掉，恐怕征兵的“成绩”更加有限。

言征粮，困难更为严重。据广州《华南日报》载称：由于增编保警及提高待遇的结果，粮响支出殊为庞大，假定征实征借能如数征足，省级公粮仍不敷十余万石。可是征粮十分不易。三十六年度征粮原拟三期征起，去年十一月要征起二成，十二月征起八成，本年一月照额征足。但据官方报告，截至十二月十日止，仅征起五万零二百四十六石，中区台山、恩平、赤溪等县，每县仅征得二、三千

担。十二月十九日省报所载数字，只微增至七万石，至此田粮处纷纷派员到各县督征，各县则官兵四出坐催，在这种残酷抢掠下，征起数量，到十二月底已跃曾到四十八万余石（见田粮处长黄秉勋报告），但这不过是全额十分之一强而已。黄氏承认，“今年征实工作困难较往年特多”，也是由于水灾和“匪患”之故。现在宋帮已“需粮孔亟”，一方面设法向湘桂等省及暹越购粮以济军需，一方面严飭各县加紧征榨，并拟用省委大员亲临各地催迫，穷凶之态，可见一斑。

人民反抗征兵、征粮、征税的普遍和有效，既保障自己切身的利益，又严重的破坏宋子文“取之于人民，用之于反人民”的企图，破坏宋子文进攻人民的阴谋计划，成为我们继续走在宋子文前头的一个有力因素。

困难一直紧跟着敌人，使他们挣扎走向死亡，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原载《正报》第72期，1948年1月17日）

前所罕见的粮潮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1月26日）

黎展

情势汹涌的蒋管区今年第一个经济风暴，结合着广东本身的因素，形成了万分严重的粮食恐慌及金融物价大波动，其势之凶险，打破了向来的纪录。现在粮价正高达一百六十万元的高峰，中下等

米亦在一百三十万至一百五十万元之间，而举凡日常必需品均一致上涨，柴薪油盐甚至菜蔬肉类已较十日前平均涨价百分之八十，糖面什货起至双倍以上，黄金港币，携手上升。省港各报章无不惊叫，认为空前险恶，实所罕见。

从粮价上涨为领导的经济大风暴，是宋子文主粤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涨风），宋子文“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有成绩”的牛皮已经破碎无余了！风暴之来，除了十万元大钞如海潮一样涌入市场，所谓“新货币”发行的酝酿，以及因打败仗的原故大批游资南下等原因之外，还加上广东本身严重的粮食缺乏的原因。据报章所载，官方统计广东平时已每年缺粮一千八百万市担，加上去年水灾的损害，估计缺粮在五千二百万市担以上，而征实征借的搜刮，扩充反动武力的军粮消耗，尚未计算在内，至使目前距春荒尚有三、四个月，已经弄成前所未有的粮荒，似此情形，人民咬尽树皮草根也难得侥幸活命！

十一月涨风来过之后，广州市内已是百业凋零，盗窃械劫、自杀路毙，天天都有，形成一片悲惨纷乱的图画。现在年关迫近，又逢此一大风浪，雪上加霜的这个残年景象，还堪想象吗？现在蒋帮既没有办法来应付这种经济灾难，又只会猛烈的增加灾难。上周翁文灏到粤和宋子文进行了多日的商谈，决定资源委员会和广东实业公司合作，从事所谓“工业建设”，这不外是用美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结合起来的力量，扫尽现尚残存的一切中小资产阶级被迫他们走向破产！至于经济风暴一个接一个而来，粮食恐慌已经空前严重，三征抽剥一天比一天紧，庞大的反动机构要靠人民的血肉喂养，又迫着广大人民走向死亡。

蒋帮在愈近死亡就愈加贪婪与残暴，现在已暴露无遗了，活路也愈来愈给他们关得更死了，广大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要想自救，只有更加团结对蒋×斗争！

（原载《正报》第74期，1948年1月30日）

从广州看宋子文（广州通讯）

（1948年1月）

绿 波

宋子文去年一登台就无耻地说他“最低限度做到广东老百姓人人有饭吃”，而且六个月就要有“成绩”出来。果然，为时未及六月，单就宋氏衙门所在的广州市，恐慌、饥饿、死亡、自杀、抢劫这一类的“成绩”就显露出来了。

工商业破产

宋子文带给广州市民的，首先是物价的高涨。人民最关心的米价，在十一月中还只每担四十四万，但到了十二月十万元大钞发行的消息证实，突然就涨到了九十五万元，现在黑市是突破了一百四十万了。前后不过二个月，涨了四倍以上。其余生活日用品无一不贵。小康之家也难于捱活下去了，穷人怎样过得下去呢？民间资本的工商厂家已经濒于绝境了。据商界权威某君（报上没有发表名字）说：今年旧历年关二十亿元以下资本的商店起码百分之七十要结束生意，因为今后生意毫无把握，每月要支付沉重的捐税，要支付工资、皮费，又要交一大笔房租（广州的房租，如浆栏街等店铺每月至少交租港币二千元，而且要在旧历年初预收一年租值），加上官僚资本的垄断，政府出入口的管制，一般工商厂家为了免强生存，减薪裁员的手段被迫使用了，于是遍及各行各业要求加薪复工的事情愈来愈多，例如机制饼干业、印刷业、纸业、鞋业、内河轮船机工、机器锯木、纺织、洗衣等员工，提出加薪额，以原薪百分之一百五十倍或二百倍为起点。大小的抗议、怠工和罢工，层出不穷。

饿死、冻死、自杀

中小人家的没落因而贫民也就日渐加多。这些无业无靠的贫民究竟有多少呢，根本就没有法子统计。市社会局印行的行政月刊上说：“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止，五个庇寒所收容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八个施饭站中，施赈人数统计一万五千人；十二月平民宿舍收容人数二万二千零七十八人，难童教养所儿童三百人，合计三万九千五百一十八人。”即就这些暂时获得救济的数字看来，全市一百四十万人口中，就有三十五分之一的人是无告（靠）的饥饿难民了，何况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呢。同时，在这种所谓“救济”工作的后面，经常是跟住一连串饿死冻死（即“路毙”）的数目字的。据广州市卫生局统计三十六年一年内殍拾路尸二千八百八十九具。死去的人大都是失业无靠的贫民，当寒流袭来的此时，马路上每天都有冻死的人，只看十一月份的官方公报，广州市内活活冻死的就有一百七十四人，至于为生活所迫的自杀案，十二月份内轰传市面的即有：一日邓祖贤上吊自杀，二日男子卢观满跳楼自杀，三日公务员离奇服毒自杀，四日手车夫李荣服毒自杀，十三日男子黄剑虹投河自杀，十三日方少芝上吊自杀，十六日妇人周桃投水自杀，十七日军官×福林上吊自杀，二十九日某校务主任服毒自杀，三十一日少年潘君棣服毒自杀，等等。在这里，从手车伙、职员、军官到教务主任，总之都在宋子文的“人人有饭吃”的施政方针之下被迫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劫案如毛

广州的劫案频繁而普遍，就是宋子文时期的超越前代的成绩。从新年元旦几日算起，就有一日下午一时带河路猪仔圩抢案；三日下午七时河南涌尾路大光油厂被炸劫业；六日却一连发生劫案四种；即是说，只在今年一开头，这五、六日内已报案的就有上述七起了。上至梅花村陈公馆，百子路薛公馆这些军政要人的住宅，下至

文德路聚仁坊公厕内，都发生过劫案。甚至天河机场弹药库的炸弹，守库的官兵也成排合伙把它盗卖，失手炸死九人。

好了，整个宋府衙门所在的广州，在宋子文民死政策之下，变成了工商破产，失业饥饿，路毙纵横，遍地抢劫的黑暗世界。

（原载《正报》第74期，1948年1月31日）

替农民撑腰，斗争才发动得起

（1948年2月）

恨 填

潮汕在今冬将收割之前，刮了一次大风，禾苗普遍的被摧坏了，尤其是靠近山地一带，所受损失是更大的，有的仅存了四五成的谷实，有的连三成也收不到，千万农民眼看自己所支出的血汗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收获，都在摇头叹息着说：“苦命呀……”，有的在愤恨的发着牢骚：“×母蒋介石坐位，无一年是好年冬！”有个老伯父还回忆过去的旧事，他说：“以前起农会那年，是真好年辰呀，禾苗大，蕃薯也好……在后再不见有了”。农民遭遇歉收后，不但感觉着没有“隔夜粮”的痛苦，而且地主对他们还是紧逼催收地租，农民要求地主减少些，有的地主，不肯答应，有的说：“我的是‘铁租呀’，今年纳不够，明年再补上去。”农民被地主逼得没有办法，叫苦连天，怎么办呢？有些较积极的农民，跟着就走到潮汕人民抗征队部去，要求他们帮助说服地主，减轻些租息，好减少负担的痛苦，抗征队很诚恳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就贴出了减租减息的布告，号召各地业佃双方实行二五减租。各地农民看见了减租减息的布告，都在兴奋的在奔走相告，由丰顺汤坑到八

乡，由揭阳下林、棉湖到三五区南山，灰寨及河婆一带，由普宁大南山到平原，由惠来南阳山到陆丰边境，成千成万的农民都在嚷着说：“应该减租减息呀，不减就不得活了。”人民抗征队准备协助减租减息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以为这次工作开展，一定是很顺利的。

首先是在八乡山开始进行了，他们热烈的号召农民开会叫地主谈话，当他们对业佃双方提出减租的时候，农民说很好，地主也表示赞成，但当真正要实行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农民敢先带头依照决议条例去做。而地主在暗中还是继续照旧催收，并在恐吓农民说：“你如果不照旧时数目缴纳，我就把欠数记起来，明年再算”。农民害怕了，对减租觉得没有保障，有的已经缴纳了，要去退租，更感困难，结果搞了十多天，没有得到半点成绩，工作人员扫兴了，因而埋怨农民太落后太害怕了，骂地主太狡猾太枭雄了，有些则归究到工作实行时间，来得太迟，今年是不能实行的了，甚至有些说农民目前最急切的是种鸦片，不喜欢减租的，如果减租减息下去，农民将借不到钱买肥料，倒对农民无益。在脑子里充满了一些不正确的糊涂观念：把那些困难、弱点，都推在客观上某些原因上面，自己主观上所存在的缺点，倒是没有提到。因此，起初想“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固然不能实现，而反面的“影响全局”，倒成了一种现象，许多人以为在山地都不能进行，对平原更无信心了。这是一个失败的教训。但是后来大家再去想想，交谈，研讨，并提出一些疑问：如果说：时间来得太迟，因退租困难，不能实行，那么第一，为什么还未交租的也行不通？第二，为什么许多地方不但可以减本年的租息，且还可以退回过去几年的租息呢？第三，假如说，农民是真害怕，不是积极的拥护，那么一般农民看了减租减息布告，为什么表现那样热烈，而且那样多的农民因此而拒绝送租谷给地主呢？从这些问题研究一下，就可知道这次工作不能开展是有问题存在的。时间较迟，增加些工作上的困难，是事实，但不是主要的原因。许多农民不肯送还租谷给地主，显然不是害

怕，不是不需要减租减息，农民和地主在生产关系上矛盾，正是他们的基本矛盾，那些一切缺点表现，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没有正确的工作方针所产生出来的。一方面反对“包办”和“恩赐”是对的，但却要反对只有“发动”，而没有“引导”“帮助”的偏向；为了争取少数的中小地主共同反对三征，对地主开头采取“说服”办法是对的，但只有“说服”。而没有去使用群众力量“斗争”他们，是不对的；地主们从自己谷仓里退出谷子，是不愿意的；农民向来不敢在地主面前放个屁，一下子要他们实行减租退租，在地主头上“动土”，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些事实，正是在减租减息问题中的本质所在，不容易推行的一个症结。因此，他们研究的结果，对农民必须要把“发动”与“引导”结合，对地主必须要把“说服”与“斗争”并进，才是正确的工作方针。他们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又继续干下去了。他们回去之后，对农民解释推动之后，开始就叫农民进行退租登记，并带领农民到地主家里去退租。但起初许多农民不敢出来登记，已登记的带他们去退租也不敢跟上来。个别的虽然勉强去了，但到了地主家里，还不敢开口，等到人家帮助他讲好了，他的布袋还拖捏在屁股后面，不敢取出来。地主们看出了农民们还未有组织，还没有胆量起来，他们抓住这些弱点，又在暗中放出空气：“退罢？我把帐记起来，等红军走后，看你要不要退还”！又说：“如果白军来时，先出头退租的，就叫他先死”！农民听到了，又折回头来，不敢动弹了。由此，农民依然感觉到对减租减息是没有信心的。工作人员看看这种情形，在脑子里，又浮起一种观念，什么“引导”也搞不起来的，“农民，烂泥涂不上壁！”那种失败情绪又紧紧盘踞在心头。

一天，有个贫农，在被推动下，到地主家里去退租，但一到门口被一个姓陈的地主殴打。这件事传出后，更影响了“大局”，农民更不敢到地主面前去了，看来第二次工作进行，又会“失败”了。那时候人民抗征队恰在八乡，有一位果敢而灵敏的队长，便跳了出来：“他妈的，不把地主镇压一下，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事来

的！”于是便把那个凶恶的地主捆起来，宣布他蔑视农民合理要求的罪恶行动，要他向农民赔罪，并罚了他的款，这样一来，地主们害怕了，农民从此看出了部队的力量了，知道部队确是为农民的好兄弟，他们的信心也就提高了一点了。部队这种公平而合理的做法，不但得到农民热烈的拥护，同时也博得开明士绅的同情，他们说：“你们还不会看看大势，大家决议过的事，就要执行才对，陈某那种做法，是自惹其灾的。”好了，经过“发动”与“引导”的结合，又经过“说服”与“斗争”并进，情况就改变了，地主们从此再不敢公开造谣破坏，表示愿意遵守决议和条例了，农民也逐渐敢抬头来做了。首先在旧时红军古大存部队工作影响较深的地区，许多农民，便热烈的起来进行退租行动。百数十人成群结队的，担着竹箩，拉着布袋，到大洋地主家里去退租了，浩浩荡荡，一阵又一阵，一山穿过一山，唱着山歌，叫口号，你唱我嚷，歌声震动了山谷了，有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的呀”。有些老辈则说：“我在以前古大存时期，曾经是带枪打入大洋来担谷的，现在空手来担谷了。”他们一阵一阵的去，又一阵一阵的回来，行到半路休息的时候，个个笑吟吟的，有的伸手在谷箩里取出谷子来，看了又看，对着大家说：“这谷子好精干呀”，农民对自己汗血所得来的谷物被地主掠夺去了又得担回来，心坎里好象充满了意外的温暖。他们担回家去的时候，有些婆婆或嫂嫂，笑咪咪的接着谷担，“真是担得回来呀”，很诧异似的叫着。随后伸手去摸摸箩内的谷，又干又精，欢喜得说不出什么来。有些没有胆量去退租的，看见大家担回谷，在后侮说“我错了”。有的妇女骂他的丈夫怕死，又埋怨工作人 not 和他们登记。

减租减息运动展开了，各乡各村，好如波浪一样，一阵阵的掀起来了。××乡有一佃农民和一地主，原是有亲戚关系的，本来只差八斤谷，也不肯讲人情，硬要取回来。另一地主对退租的谷额，想在第二个地方去对数，农民怕麻烦不肯答应：“你不退回，我就去报告红军！”地主连忙说：“不要报告，就退回去，退回去！”

农民也会使势了。

八乡山人民在过去有事情发生时只向丰顺蒋政府的区乡机关请示解决，现在却向人民抗征队请求解决了，过去对乡事不敢出声的，现在也敢提意见了。甚至高基坪村，有一妇女被他的“细郎”（即丈夫的弟弟）打了，也来部队投诉了。

现在减租减息才告结束，他们又湧起了冬节的赎田运动。过去因为租息太重，许多自耕农的田，被债主盘剥，被迫卖了田，现在都要减息赎回他们的田地。目前组织了一个租息调解委员会，处理赎田问题，他们已贴出布告，把冬节赎田期限，延至旧历年底，八乡山减租减息，已深入了一个阶段。现在他们在斗争中，已逐渐看出他们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团结，是可以解放自己的。他们为了保卫冬耕生产，已组织了自卫队，不久以前在戏子潭举行正式成立典礼，广大的农民热烈的参加，他们已寻找着自己解放的道路了。

在山地获得这个经验后，平原地区也陆续的进行了。在揭阳三五区如南山、长滩、灰寨、河婆、龙潭一带，在普宁大南山周围，在惠来南洋山周围，同年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这广大的地区上工作进行中，正如八乡山一样，遭过了许多困难曲折，有些是“半生不熟的”，有的是掌握不紧政策方针，不敢大胆开展，有的缺少经验，不知如何下手，有些在靠近城市周围，只贴出布告，没有人去协助，农民徒在等候，不敢动手，有的自己动手，受了地主压迫，无法发动起来。但这次潮汕减租减息运动，虽未得普遍与深入，无疑地已激起空前罕见的浪潮。已经进行过减租减息的，计有丰顺、饶平、揭阳、普宁及惠来等县份，直接得到全部或部分减租减息的实际利益的，约达二十万人。直接受影响而波动的有二百万以上的农民。他们目前虽未得到许多利益（影响所及，地主害怕，自动减多少租的也有许多地方），但他们都说：“明年一定可以减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的信心已经比前提高了。这些已经说明，半封建的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上的矛盾是主要而尖锐的矛盾，只有从土地关系上和农民利益结合斗争，才能掀起普遍而深入的运动，才能

激起伟大斗争的浪潮。这次运动，不算普遍和深入，但无疑地对削弱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对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及提高群众，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只是潮汕减租息斗争的经验之一，供大家参考，证明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打破主观主义的感想和虚构，说明能依靠群众，一切事情是办得通的，斗争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

（原载《正报》75期，1948年2月7日）

新春论粤局

（1948年2月17日《正报》社论）

在中国革命斗争一全局，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早已到来，美帝及蒋帮的反革命车轮急激的走向覆灭的道路，中国人民的革命车轮急激的走向胜利的道路。革命，必然走向全国胜利，敌人，必然走向彻底死亡！在广东的革命斗争，这个伟大的变化到来了没有？不错，这个伟大变化也要瞬即到来了。在全国范围说，中国人民的春天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即战争的第二年的第一季，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的时节，已经开始到来了；而广东人民的春天，就将开始于这个新春季节。

广东人民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景象，是由于解放大军雄据江北，迫临南渡，以及广东人民及其子弟兵在过去一年来的斗争胜利所产生的；又由于蒋帮之急速崩败，和宋子文替美蒋准备“南方基地”的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事与愿违，心力不牟所产生的。人民走虎步，敌人走龟步，随着时间的流驶，愈显现宋子文的落后。然而人们可能因为只惯于注意全国局势演变而没有注意广东的演变，只留心全国斗争的情况而没有留心广东的情况，只看重战争主力军的强

大而对广东人民力量则估计不足，由于这一思想上的习惯，就或则被宋子文的夸夸其谈和种种有名无实的措施所迷惑而至被吓倒，或则对广东形势的估计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我们在迎接人民的新春的今天，就有肃清这种不敢于胜利的思想的必要。

毛主席的文告中，是这样告诉我们：对于革命斗争形势的估计，一方面是，全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与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而另一方面是，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应付一切国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与挣扎”。但这两个方面，是不是相等的，一半对一半？显然不是。前者是基本的主导的一面，后者是副次的一面。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他叫我们时常都要辨别：什么是“临时起作用的东西”，什么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拿起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武器，正确分析具体情况，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就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与战胜任何困难”，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不必再去详细叙述过去一年的事实，只须指出：过去的一年，广东敌人是完全的输了，加上全国范围上又是彻底地输了的情况，产生了宋子文南来预备后事的这一着棋，这是国内外敌人要作“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的重要一着棋。他曾经宣称“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有成效”的，可是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个月，成效究竟又在那里？据一月二十三日省港各报发表一条所谓“行辕决定新策略”的消息，内称：“宋主任对彻底绥靖本省匪患策略，最近有新决定，该策略原则为不急于求功，而须收实效”。这就是“六个月有成效”之决无成效，并且决定加以取消的证据。

当然，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实际，要明瞭粤局的实际，有待我们作具体的分析。

宋子文最大限度的挣扎，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一、争取美援；二、整顿机构；三、增加兵力；四、回师整补；五、政治阴谋。五个月来，各项都做了一些，并打算继续做下去，然而：

第一、关于美国援助，这是要出卖领土主权去换取的，目前正在积极进行中。贝祖诒赴美乞援，打开了全部出卖的阴谋了，华南（包括海南）和台湾的全部资源和军事基地，成为奉送给美国的主要礼物。蒋帮开出的价目是五亿美元，纵使拿得到手，也只是拿在老蒋的手上去，亦不过是在全面崩败中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宋子文原拟把黄埔筑港和粤汉铁路等作代价，单独与美国进行一千万美元的贷款计划，可能因此成为画饼。蒋介石这一出卖计划，对广东局势当然也有其直接影响：美国将加强对广东、华南的控制，甚至对基地实行占领，使宋子文感到有了王子直接撑腰，稍壮胆色，这是一面。但是所谓发展生产建设，则不过是神话，大量和单独的援助，则又是不可想像。美援对宋子文的挣扎有若干帮助，是事实；但这种助力微不足道，也是事实。而另一重要方面，由于出卖所引起了民族义愤和民族工商业的加速破灭，使它必然带来反出卖、反美帝侵略的爱国运动，则成为一种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成为人民革命运动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力发展的条件。

第二、关于整顿机构，这是五个月来宋子文用全力去做的事情。他成立了九个剿匪指挥部，又实行省县间的联防，成立了三个（粤赣湘桂边区、粤桂南区、闽粤边区）联剿指挥部，和若干个几县联合的联剿指挥所，最近又有在三月间成立华南五省剿匪总部的传说。这化费了宋很大部份的时间，放在人事配置上面。因为这一整顿，按照宋之主观企图，原想统一地方反动势力，协以对我。但做出来则离理想甚远。现在只做到吸引一批失意军官，也拉拢了一些地方恶势力，又用组织什么“戡建会”或“绥建会”或“座谈会”、“设计会”的方法，吸引大批地方反动势力参加，企图收罗为己用。但是，这并不等于团结了统一了地方反动势力，形式上好像成立一个反动大团体，但实质上则并没有这个东西，各打算盘，各自矛盾的情况并未改变，蒋宋的出卖和经济独占，还不断在加强这个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加上形势迫人，大局所趋，蒋帮必亡，人民必兴，以及人民力量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大部份地方势力不

肯出头，以图自保。而且，这批失意军官，莫不失掉信心，也在各营后路，下车伊始，大家都只知大扒大杀，不特人民群众起反抗，而地方人士对这个做法亦会不满。因此，宋子文的努力，究竟发挥到什么程度，亦可获得答案。

第三，关于增加兵力，是宋子文阴谋中的中心项目，办法则有增编保安总队和招抚土匪伪军，也可能有若干的增加，但是决不能如他所想的大量增加。因为兵源枯竭，去年度征兵仅得半数多一点，有官缺兵成为部队普遍现象；粮食恐慌，征实遭受人民的大力破坏，截至最近仍不足原定计划四分之一，向外购贮军粮也不易实行；财政困难，自调整公务员后预算赤字达两千亿，要求中央拨助未有切实结果，整理沙田计划可望而不可即，剩下只有向人民搜刮竭泽而鱼一途；这些困难又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加上将失信心，兵无斗志，哗变起义，已成风气，敌人兵力的增加无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和人民力量的迅速生长相比拟，目前敌人所仍保持的若干程度上的军事优势很快就归于乌有。

第四，关于回师整补，已逐渐见之事实。这种调回残兵，已发现有几个旅的番号，他们可能在整补期中一面协助绥靖，但他们又是不敢或不善和人民作战；而前线的崩败，使大量回师不可能，能否长期留粤也成为问题，这又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

第五，关于政治阴谋，这是蒋帮最后挣扎的一着，宋子文也在努力布置中。然而这个阴谋已经初步被揭露，群众的觉悟也有了提高，阴谋家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削弱并将不断的被削弱，他们的活动已开始被群众警惕的眼光所监视。

以上所述，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用以说明宋子文五个月来的努力所得是一些什么成效，而且可以预见今后宋之继续努力又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成效。如果拿来和广东人民武装的飞跃发展的形势相比较，又拿来和广东群众斗争进入高潮的形势相比较，我们说完全有理由来断定宋子文在这个竞赛中注定的输光了！我们又完全有根据来向广东人民宣告：广东局势的伟大转变就要到来了，新春是人

民的！客观形势已经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争取完全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加上伟大的主观努力与正确的指导，胜利一定是人民的！

（原载《正报》76、77合刊，1948年2月17日）

蒋宋刘卖整个华南

（1948年2月）

桐 庐

自从去年三月，罗卓英与美商潘宜公司进行其所谓“广东实业建设”的投资谈判开始，我们就首先向广东人民指出，那是蒋罗出卖广东换出美援的阴谋。去年十月，宋子文主粤大吹“经济建设”计划之后，美国资本家和官方代表接踵而至，广西湖南两省主席相继奉召来粤协商“经济合作”，我们又连续指出他的“经济建设就是出卖”，指出他是，“更猖狂的出卖”，号召全广东全华南人民起来制止和粉碎蒋宋出卖整个华南，换取美援继续内战的罪行。时至今日，这些说过的话已为眼前的事实所完全证明，在蒋介石×军到处崩败，财粮物资枯竭中，这种出卖行为变成蒋介石最后挣扎的唯一计策，并且已经由宋子文个别经手变成蒋政府出来正面主持，由广东一省变成整个华南的出卖，由零沽碎拆变成全部交割了。

作为美援交换品的魏德迈“开发华南”的计划，由于贝祖贻赴美而确定了具体的内容，而蒋介石则奉命行事。据合众社电，一月三十晚蒋在其包括张群、俞大维和翁文灏在内的高级官员会上，就讨论了魏德迈的（建议）并且下令要立即实施张群的“对外（美）国商人给予一切便利”的所谓“自助”经济计划。在此前后，蒋帮做了一连串的通传事主查点傢私的活动。在治安联防的邀请中，宋

子文把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湖南省王东原都叫到广州来了，把两广和湘粤的“经济合作”（即联合出卖）列入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而江西、福建、台湾三省主席也同样受到邀请。蒋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一月二十一到广州，副委员长兼煤业总局局长孙越崎则于二月十九日经湘赣一路“考察”也到广州，他们会商的也正是“建设（即出卖）华南工矿业”，而且翁宋共同发表了什么“建设（即出卖）粤省工矿声明”。经过孙越崎的“考察”了的江西省府，于二月二十九日便发表“江西工业化计划”，把该省官营工业从纺织到砖瓦各工厂都列为美国接收的对象了。试问在蒋介石命令下，这大批官要的交头接耳，人影憧憧，除了通传事主通盘出卖，还能够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蒋介石诚恐拍卖容有遗漏，尤其对于劳动美国财主们，像亲自进行大凉山和积石山“探险”（即调查），颇感不安，于是设立“川康滇边务委员会”之类负责调查该地区的工矿交通，甚至通过对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诱胁，把西藏也开放给美国；和这一样，蒋府经济部“川、桂、赣、皖、台湾和西沙群岛工矿地质调查勘察计划”的进行，正是力索穷搜，下及黄泉，尽其所有点交与美国。而还在这些大规模的替美国进行调查之前，什么海南铁矿、台湾铅矿、粤北湘闽煤矿，广东铀矿（原子弹原料），乃至云南锡矿，一切新旧矿藏的质量，每日都在报纸上喧嚷着，尽情地把人民自己的家珍细软故意在美国财狼眼前摇晃，勾引他们来打劫。

然而蒋宋的拍卖与美国的侵入还是以华南特别是以广东为主要对象。以前曾经说过的不再复述，这里只略举新近较为重要的几件事。第一，在广东，随着翁宋共同发表之“建设”（即出卖）粤省工矿声明”，把滙江水电厂，广州电力厂，狗牙洞煤矿，海南岛铁矿交给美国之后，粤北八字岭犬牙洞两大煤矿，已用资委会名义组成南岭公司着手开采，并决定以一千五百亿元修筑粤路之坪石狗牙洞支线。至于便利美国商人的蒋令，也在广东实现了。向输管会华南分会申请登记为入口商的美商二百个商家，获准者已经一百余

家（二月二十三日美联社电）。第二，在美国富人称为世界一大钢库的海南，田独及石碌铁矿，则在美方指挥部署之下，将于三月一日全部复工；而该矿已经产出的矿苗早经资委会根据美国意旨，以二十五万吨的巨额让卖于麦克阿瑟统治下而正愁重工业和军火原料缺乏的日本八幡钢铁业，使得当地钢业老板，举行正式庆祝仪式，欢呼“可使八幡之钢铁业出产量大形增加！”（二月十六日中央社）。而海南的环岛铁路和渔业基地，也正在美工程师加紧筹划之中。第三，在实际已成为美国基地的台湾，所谓“中美合作开发（即出卖）台湾”，连张群也公开承认的了。美国控制台湾的一切，甚至中国人入口也需要护照。目前每年出产四千吨的台湾著名铝矿，经过所谓“中美合办（即出卖）高雄铝矿谈判”之后，结果由美方出资七百万美元，合办到美国雷诺金属公司去了。并且闽北的铝矿也被囊括在这公司之内。其他如高雄的炼油厂，及全台电力和制矿工业，不消说的，早已全部落入美国资本家手里了（后二者也落在雷诺公司手里）。

单从广州、粤北、海南、台湾四个主要地区的矿工商业加上粤汉铁路，这些彻底割卖，证实了华南特别是广东，是整个给蒋宋奉献在美帝国主义的獠牙血口之下了。

事实说明，蒋美妄想将华南变成美国完全殖民地，变成反动的最后堡垒，并以完全控制广东作为达到此种阴谋的前提，因此在这次的五亿七千万的借款中便指定的款以改筑粤汉铁路，并紧急开采粤北煤矿以供给粤路，企图保持此交通大动脉而贯彻其镇压广东人民，殖民地化广东作为侵略整个华南的基地，作为垂死的对×××反动势力的最后基地，宋子文的“使粤省成为一个工业及交通的中枢”，魏德迈的“使华南经济及政治安定，则美国对华之援助，当自动实行”（二月二日美联社电），其全部阴谋被事实揭露无遗了。

但是，蒋美的妄想毕竟是一场无耻的做梦，广东人民、华南人民早已看穿任何美国援助决不能拯救蒋介石的死亡，更不能对宋子文的挣扎起什么作用，广东人民解放斗争及其已经存在的武装力

量，已使得宋子文×帮手忙脚乱，此种力量，在华南人民反出卖的义愤，反掠夺反饥饿破产的斗争中，在解放大军日日胜利逼临南渡的鼓舞中，在不断的攻战中壮长得更为雄健，任何交通线随时会变成寸断，任何港湾城市随时会变成死港孤城。事实的发展将说明广东，华南是人民的独立民主幸福的革命基地，而不是奴役和反动的基地。美国的侵略计划和蒋宋“安定华南”的妄想和挣扎，一定在人民斗争火海中化为乌有。

（原载《正报》78期，1948年2月28日）

再论粤局

（1948年3月6日《正报》社论）

我们在“新春论粤局”里面，曾经分析蒋宋在以广东为重心的南方，所进行的挣扎的各个方面，并指出其必然归于无效和最终失败，这已为每天的现实情况所证明。现再就广东斗争的发展规律及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列。

广东人民向敌人展开正格的斗争，可说是在一九四七年开始的，而在一九四六年秋冬间，广东蒋军北调所形成后方空虚，统治者对人民的疯狂残害与掠夺，人民自发的求生斗争及城乡骚动，则替一九四七年的斗争准备了一些条件。一九四七年的斗争，主要的是武装的人民对反人民武装的斗争，而在这一年来，敌人的战略是着实的输了。

从去年到现在，敌我军事斗争可大略分为三个阶段：从一月到六月为第一阶段，六月到宋子文来粤为第二阶段，宋子文来粤后为第三阶段，现在尚未结束。

第一阶段是敌人之全面进攻，而人民武装斗争则刚在发轫。敌

全面使用兵力，四面搜剿，一发现人民武装的活动，便立即全力扑击，志在歼灭。但敌之战略失败了。他们全面使用兵力，但地方广大，兵力不足，实际上是处处空虚。而人民则分散发动，闪开强敌，破仓分粮，到处燃起斗争之火，先打薄弱孤立的地方反动武装，不断歼灭之而壮大自己。在局部地区——南路更为大大发展，震撼了敌人。于是张发奎、罗卓英之流发觉自己的失败了，由四月到六月逐渐增兵南路，结束了他们的全面战略进攻的第一阶段，把战略转为重点进攻，把全面使用兵力转为集中机动使用兵力。这就是敌在第一阶段失败后，企图首先打破南路人民力量，然后转锋他处，达到各个攻破之目的；而在南路以外的地方，则采取攻势防御，施用短促突击，以战役上战斗上的进攻来达到防御与巩固点线的目的。这也就是我在此一阶段中的胜利，已经迫使敌人在大部处于防御地位，使他只能在局部仍然保持进攻地位。这样开始了斗争的第二阶段。

这个第二阶段的斗争，敌人输得更惨。敌在南路集中大部分兵力，取得了若干优势地位，进行“围剿”，但他们就是在兵力的数量上也没有能够取得压倒的优势，加上将官不和，地方未协、人民反对等因素，故敌仍然不可能形成全面的包围和有利的进击，只能在若干地区限制了人民的发展，就在这些地区里也没有能够致人民力量以严重损害，相反的吃了许多败仗，如保十总队一个时期由一千余人被歼灭与减员只存三百余人，且在包围不到的地区，人民力量还有很大的发展。敌人这样集中兵力作重点进攻而大部处于防御地位的结果，则是南路以外的广东各江，琼崖，闽粤赣边及广西这个大部地区内，人民力量以空前疾迅的速度发展，取得了无数的胜利；在琼崖，打破了敌自日本投降以后一直未停的进攻并转入自己的进攻，解放白沙，保亭县城及许多市镇，并在几个县的边区实行了土地改革。

九月底十月初，张、罗撤职，宋子文来粤，结束了斗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第三阶段。宋子文大概还看不清楚广东人民的力量，

下车伊始，便趾高气扬的喊出“三月有把握，六个月有成效”的豪话，替自己阵营打气。实际情况开始在教训他，他完全泄气了，彷徨了，去年年底一连开了六次有关绥靖的重要会议，也没有提得出什么新的方针，于是不得不公开承认是个“长期”问题，只能照现状办事，不能急求事功了。然而，宋子文是知道的，如果只能照现状办事，其结果是走向完全的毁灭。故他的主观愿望是要打破现状，力求组织新的力量，以便恢复全面攻势；可是在实际条件上，他又不得不只能维持现状，只能继续其失败了的重点进攻战略，而在被迫处于防御地位的大部地区只能稍为加强待机打开危局。故宋子文今后的动作如何，他的战略方针能不能改变，应视他能够组织起几多力量来做判断，更正确的说法，应视他所能增加的力量与人民力量的生长发展的对比来做判断。所以，“和宋子文竞赛”，和“走在宋子文前头”的口号，就成为人民在第三阶段斗争中的行动号召。

关于敌我力量增长的谁快谁慢问题，是决定今后斗争形势变化的关键，在这问题上，今已成为无可争辩地确定了，人民走在敌人的前头这一趋势已经确定了。

敌人在这一点上有种种挣扎，但必归于无效，我们已经历次指出，今后的事实必继续证明我们的判断的正确。在这里我们再强调指出一个核心问题。宋之增长力量的中心一环，在于统一地方反动势力。敌人曾经在苏维埃时期这样做过，而且成功了，把广东的苏维埃运动打败了。现在敌人企图把历史重演。可是历史决不能重演。今天蒋宋在广东能够不能够获得广大的反动阶层的拥护呢？不，这个反动的社会基础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因为大势所趋，共产党必兴，蒋××必亡，没有人敢否认了。广东人民力量必兴，解放大军一定南下，没有敢以螳臂当车的了。而且人民武装方面，今天对于敌友之分，是非分明，只要不作蒋宋走狗而不反对人民的解放的都在争取团结之列，这就是所以地方反动势力多数懒于出头，宋子文五个月来的努力只能有很少的效果的原故。由于这个主要因素，加上其他因素，宋子文要想统一地方反动势力的主要阴谋，是很难达到了。

人民力量则相反。自去年至现在，各地人民武装的发展，少的三倍五倍，多者五十倍一百倍，这个力量已超过苏维埃时期的南方游击队（主力红军除外）的总和，亦超过抗日时期的东江纵队的全盛时代，在武器配备上比过去为多为好，在南方说，这个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在活动地区说，亦是前所未有的广阔，等于苏维埃时期与抗日时期的总和。就基本群众力量说，今天已是农民斗争的高潮，从反抗三征到破仓分粮，到减退租息，到清恶霸，到停租废债，到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与武装起义，这一切反蒋×反封建的斗争，都是以直接革命行动，来达到推翻蒋×统治、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目的；而且在一部分巩固区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敌我力量的对比快将决定地改变，有利的战略形势必定更加变得有利，土地改革的高潮也要到来：这都是不可抗拒的！

国内外敌人在广东的各种阴谋，各种挣扎，我们应该清醒地注意，但是他们一切措施和努力只是临时起作用的东西，而不是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因为如果各种措施和努力是替人民服务的，那就一定成功；如果用来暂时改良，也能够暂时缓和人民，也会暂时的起作用；但今天反动派完全不可能这样做，他们的一切措施和努力，都用来反对人民，一点改良欺骗都不可能，所谓“七分政治”不过是抢掠、贪污、烧杀的假面具，因而人民就更加猛烈的反对他们，其结果是他们的一切措施和努力，终究要完全破产。人民力量则相反，我们一切措施和努力，都是为人民办好事，为人民服务，故其发展和胜利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谁胜谁败的政治基础。因此，我们全部人民的队伍，必须增强自己的群众观点，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用一切努力来紧密自己的群众联系，特别是紧紧的依靠农民，把帮助农民翻身，平分土地，打垮封建势力，建立人民政权的任务，作为我们斗争的基本任务，一切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负责；能够这样，我们就很快胜利！如果相反，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则我们就要失败的；单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但服务得不好，群众得不到真正的好处，或者反而有了害处，则我们也

会失败的！

广东斗争的目前阶段快要走完了，更伟丽的斗争新阶段快要到来。蒋宋的阴谋要我们主动地去全部粉碎它！我们要做革命的行动家，我们决不是清谈家，我们深知敌友我一切情况完全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和胜利，我们深知敌人的挣扎与阴谋一定完全破产，但我们更应知道，事在人为，在认清客观规律之后，主观能动性就是改变一切的唯一力量，决不能等待现实形势已经烂熟了才去动手，我们要站在现实的前面一些，来指导现实斗争走向我们所要走的方向。最大胆放手争取胜利的时候了！

（原载《正报》79期，1948年3月6日）

为加强广东人民战斗的一翼 发起万元办报基金筹募运动

（1948年3月13日）

广东人民的斗争纷传胜利的春讯，这一个春天将是广东人民永远的春天的开始。北起五岭，南迄海南，东自潮梅，西至粤桂边，人民的武装队伍，天天在发展、胜利，现在是大胆放手争取胜利的时候了！配合此一形势，凡属有关广东人民斗争的各项工作，都应加强起来，以便促使胜利的早些来临。

本报自东纵北撤之后，改为期刊，于今将近二十个月了。我们在此时期工作，究竟替广东人民办了应办的事没有呢？虽然还很惭愧，还没有办得很好，但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贡献。在所谓广东遍天黑暗使人觉得长夜漫漫的时候，我们曾经用心研究广东情况，指出了天空暂时的乌云不会很久就要消失的，人民要斗争，而且一

定胜利。我们的话没有说错。一九四七年揭开斗争的幔幕，我们就不断做着战斗声音的传播，不断指出敌人的狼狈与困难，在许多关键时际，我们提出正确的论断和号召，以供广东人民做行动的指标或参考。我们灭掉敌人的威风，我们增长人民的志气。我们进行各种有关思想整顿的工作，藉此齐一和加强人民的队伍。我们进行农村工作的讨论，藉此提高城市青年的觉悟、认识自己的道路。……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广东人民的解放的目的。我们虽不能算是一枝配合农村斗争的文化大军，但我们仍不失为一枝短小的轻骑队，我们的武器也许还不是上乘，但我们经常闪亮着匕首的光芒。我们并不夸大自己这些微的贡献，相反的我们时常向读者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是月月日日不断和自己的缺点斗争而前进的。然而我们敢于宣告我们始终是老老实实办事和向广东人民负责任的！

现在，我们更应加强广东人民战斗的这一翼了！

我们热诚地向社会各界人士发起筹募万元基金运动。

我们不怕叫穷，人民的文化事业如果有钱那才是怪事。我们也有信心向读者及各阶层人士伸手求援，因为我们相信人民力量的伟大。但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要取援于群众的，只是在我们的困难不易由我们几个工作同人所能打破时，才向自己的“地田”吸取力量。去年一年，在读者捐助的支援和鼓励之下，我们在经济上力求平衡收支的努力，是很大的。例如门市部的多次改进，各种业务的扩充推展，出版工作的加强，以及工作人员坚持刻苦的工农化的生活等，其结果是达到帐面上的平衡了。可是由于一些主观力量所无从改变的情况，最典型的是外埠拖延帐款及呆帐的情况，使我们的流动资金又用完了，经济陷于新的困难之中。这里我们取得一点经验，必须保有比较充足的基金，可以用来加强某些生产性质的工作，才能避免这种周期性的困难，不致使我们为了印刷纸张稿酬制版以及柴米油盐的筹措，花费气力，从而可以专一的加强人民的文化事业。万元基金运动的发起，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呼吁本港及海外劳动人民给我们以援助——我们过去收过

你们不少血汗钱，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更深知责任的重大。你们拿不出许多钱，但你们的钱带着血汗，化为热力，使我们受到无限的鼓励。所以我们向你们伸手！

我们呼吁青年学生群众给我们以援助——你们和我们一向有紧密的联系，你们时常给我们以助力，希你们能够作一次突击！

我们呼吁工商界、爱国爱乡侨领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给我们以援助——我们相信新广东快将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一定很高兴，一定能够在各方面来支持广东人民的斗争，因此对我们的呼吁也一定十分高兴接受的！

为加强广东人民战斗的一翼，请大家热烈响应我们此次万元基金运动！

谨订酬谢办法如下：

乐捐港币一元以上者赠毛主席像一帧以为纪念；

乐捐港币三元以上者赠平装本解放区画册“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一册以为纪念；

乐捐港币五元以上者除同上办法外加赠本报一月以为纪念；

乐捐港币五十元以上者赠精装本画册及本报全年以为纪念。

正报社同人谨启

三月十三日

（原载《正报》81期，1948年3月20日）

放手发展，大胆进攻！

(1948年3月20日《正报》社论)

宋子文今天所面对着的难关，依然是兵力不足，财政不敷。计兵力方面宋子文现在所掌握的十个保警总队全部兵力只有七千人，其中四千多人集中对付南路和海南，二千多人分散于东西北江及潮汕一带，能够集结起来使用于一点的，顶多不过五百人左右，还要防守交通线及据点，以抵抗人民武装的进袭。因此在整个广东的战场上，不能不被迫留出许多空隙，形成顾此失彼的状态，这就是宋子文今天在军事上所处的战略形势；财政方面，据报纸的报道，本年度广东财政不敷将达五千亿元，首级机关现已大量裁员，并打算停止公粮发领，以搏节支出，扩编五个保总的经费虽说由南京拨助，但至今还未发下，据说还要在两个月以后才能见诸实行。捉襟见肘依然是宋子文今天的财政局面。

对于这两大难关，宋子文过去所采取的办法，不外是：起用失意军人，希望通过他们来团结地方反动势力，组织及收容流氓土匪武装；扩编保警，补充正规兵力；出卖主权，乞援美帝；借用残兵败将，防护点线等等，这套办法，今天还在积极进行，效果未见很好。

宋子文此次赴京，目的是向蒋求援，根据他回粤以后的谈话，表面上看起来似已完全得到圆满解决了，其实也有点近乎虚张声势，因为今天蒋介石统治的困难，不是主观上的，而是客观上的，蒋介石虽然重视华南，但他能够抽出多少力量出来，却不是蒋介石个人可以决定，而是要看人民看客观形势是否许可。

对于这一点宋子文也未尝不知道，所以他回来之后，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的两个动向，一个是借重邻省，出兵借粮，一个

是加紧搜括，直接从广东人民身上吸血吮髓。前者这里不去说它，至于后者依宋子文的办法，可说是十分狠毒与残忍的，敌伪统治时代所不敢采取的，他现在都来执行了。这些办法就是：

第一，在财政方面实行剥皮拆骨竭泽而渔，其中宋子文今天最热中的是所谓整理沙田，详细内容虽然还未看到，但就已公布的要点看起来，其凶狠的程度，就因为亘古所罕见，其办法主要分做两项：一为补价登记，一为转押官有沙田。计补价登记办法规定，广属各县无执照之沙田每亩要缴纳稻谷二百市斤，持有上则执照者每亩缴纳一百二十市斤，中则者缴纳六十市斤；潮钦廉属各县无执照者每亩缴纳一百四十市斤，持有上则执照者缴纳八十市斤，中则者缴纳四十二市斤，一律换发新的所有权证，名义上叫做确定业权，实际上是敲骨吮髓，搜括军费军粮，按照这一办法，全省各县沙田，如依战前征收捐费之亩数，达二万〇九千多顷，实则亩数则达四万五千五百多顷，若一一加以征收，再加上田赋沙捐等项，为数就无法可以计算，查战前沙田升科补价，每亩所收毫券才不过数角，敌伪统治时期，广属各县也只是上则收七元，中则收五元，和宋子文比较，相差何止霄壤？再说所谓转押官有沙田，到底沙田中那些是官田，那些是民田，径界含混，百数十年间早已无法分辨，今日所请转押者，究何所指，不得而知，一旦实行，那就无异于占夺，其数量也是无法计算的。其次就是垄断，现所发现者已有燃煤的统购统销，这一举在宋子文的预算中，准备保证每月收入达数十亿元；再其次是扭紧螺丝钉政策，即是宋子文下令顺德榨糖厂及其他公营厂矿，限定每年要获利若干亿元，据说单单顺德糖厂一处，就决定数万亿元之巨，名义上是所谓以事业发展事业，实际上也是搜括军费，再有就是拼命加税，经决定的有营业税加一倍，所得税加五倍，屠宰税则招商包承，这都是加重搜括的方法，至于其他垄断金融及进出口贸易等等，则早已见诸实行，不俟细说。总之一句话就是无情搜括，吸干广东人民的膏血。

第二，是兵源方面实行大批抓捕，现在进行的有所谓一保一兵运

动，没有兵出的，则微收所谓安家费慰劳金等等，一面藉此敛财，一面可以购买壮丁，但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最近就决定大量捉拿，正式宣布的有将走私商人拨充军役之举，其次则为收容土匪伪军，已见者大宗的则有南番顺之土匪，均已先后委派名义，其他零星股匪，亦经分别收容，给与名义，任其打家劫舍，这一点现在各地也已普遍进行了。

综合这些，可以发见得到的，是宋子文今天因为火急燃眉，不择手段，想以紧榨穷掘办法，赶快组织起一个新的力量，来展开对人民武装的进攻，企图一举加以扑灭，稳定江山，支持大局，续图挣扎。

但是宋子文这一企图是否能够实现呢？很显然的，宋子文在这里忽视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除非人民武装坐着不动，或者闭着眼睛睡觉，才能够让他顺利地拨弄他的如意算盘，不然的话，宋子文还是徒耗心血的。

今天的事情已经非常明白，凡是能够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就必然取得不断的胜利和不断的壮大，一年来广东人民的武装斗争，由于能够彻底做到一点，他今天已经壮大起来，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了。在广东九十多个县中，占了八十多个县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跡，斗争与水平不断提高，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渐连成一片，走向对宋子文统治的包围，向着独当一面的独立战场的形势发展，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不仅对广东，就是对全国也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今天在广东人民面前，和全国一样，最主要的危险是发展上的保守主义，害怕困难，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不敢放手发展，大胆进攻。有许多人好从表面去观察问题，他们看见宋子文现在还保有大城市，保有交通线，还有美援，而又积极组织力量，准备作更大的反扑，因此就容易给他吓倒，从表面的敌强我弱做出发，以为现在还不能采取战略进攻，到处发展，扩张面的占领，冲破敌人的包围限制，缩小敌人的据点，反转来包围敌人，这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无疑的，敌人现在还有相当力量，敌人还掌握有许多优越条件。但我们要认识，敌人的力量和人民比较起来，是在不断地向下降，敌人今天虽还可能组织对一两个地区的重点进攻，但决无可能组织全面的战略进攻，敌人的现有力量是一撮孤注，不能到处打赌，他要向人民武装采取更强大的进攻，他还须大大地补充一些本钱，敌人现在虽已拼命地如此去做，但这也是有限度的。敌人现在所采取的紧榨穷掘办法，决不是表示他还有多大力量可以发挥，而是表示他已经接近于走头无路了。敌人而且即使新的力量补充起来，到了那时，人民武装力量又是一番新面目了。

因此，我们今天对于敌我形势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打败敌人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有足够的信心，放手发展，大胆进攻，避开强大之敌，选择敌之弱点，推进占领，发动群众，壮大力量，扩大控制面，围困敌人，迫使敌人全面防御被动，从四方八面，展开对敌围攻，以扭转关键，转变形势，配合全国大反攻，争取全华南的彻底解放胜利。

（原载《正报》81期，1948年3月20日）

农村第一，面向农村

——“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孰轻孰重”讨论总结

(1948年3月)

黄安思

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孰轻孰重及其相互联系的问题，是个有关中国革命特点的重要问题，过去由于这个问题没有正确解决，曾经使得革命斗争受到很大的影响。但自从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之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容再有争论了，我们在这里所产生的争论，必须指出，它是由于另外一种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所产生的，但这同样也证明还有许多人不懂得或不善于学习与掌握毛泽东思想，没有照正确的理论办事这一事实。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以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这个城乡工作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分析产生此一争论的思想情绪上的原因，以及提出一些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以供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一、“城市工作孰重”是有关中国革命特点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农民解放自己的斗争，多次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加上敌人强大及长期占据城市并残酷的反对革命，因而使得革命先锋队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农民斗争，取得革命在农村中的胜利，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敌人的主要根据地城市，取得革命的全部胜利；这就是毛泽东解决城

乡斗争关系的完整思想。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第二节中，毛主席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后，曾经有力的批评了轻视武装斗争，轻视农民游击战争，轻视农民革命的根据地，轻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等观点的不正确。在批评了这些观点之后，毛主席才接着指出：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而是，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必要的足够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

第一，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首先在农村中取得胜利，然后才能在城市取得胜利；但必须在城市取得胜利；才是革命的全部胜利。由此：

第二，必须首先着重农村工作，把农村工作放在第一位；但着重农村工作，并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但城市工作在经常情况下只能在斗争中起配合的作用，只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起重要的作用。又由此：

第三，在某种条件之下，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同等重要。又是农村工作重于城市工作，农村第一；又是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同等重要。这并不是矛盾的。当广大农村斗争还未取得胜利，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动的城市的形势还未形成之前，前一口号是经常适用的；到了上述形势已经出现，革命已经走向夺取城市与决战的时期，那么后一口号就适用了，到了这种时期，如果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就变成保守主义了。

二、革命新形势之下这个问题应该认识清楚

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

现在的革命情况有没有改变了农村武装斗争的特点，先占领广大农村再夺取城市的特点，及以解放农民为基本任务的特点呢？都没有，大反攻以后的新形势，更加证明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在大反攻当中，先占领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再

夺取大城市成为正确的军事原则之一；在广大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彻底完成农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坚强保证；在蒋区内人民应以自己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改革，作为对解放军大反攻最有力的配合；凡此种种，都是无须争辩的了。又为了避免大城市中的人民运动因为大反攻形势的出现而冲动冒险，以及为了避免因为新形势到来之后可能产生轻视农村工作和不适当的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的产生，在新华社社论中曾经指出：

“从今年七、八、九月各路人民解放军先后转入大举反攻以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了，被蒋介石恐怖统治所压迫的各大城市的人民斗争，在这个革命高潮中间所能起的作用，只能是配合性质的，而且只能有效地发生于最后成熟的时机。”（十一月六日社论：“蒋介石解散民盟”）——这就完全明确的解答了大反攻以来的城乡斗争比重及其关系这个问题。

三、农村斗争的加强是南方人民粉碎蒋宋挣扎阴谋的中心环节

在我们南方，特别是广东，上述这一条原则今天是特别适用。因为广东处于农民游击战争天天发展胜利，向着新战场的开辟；农民的直接革命斗争已经出现高潮，而美蒋宋亦作垂死挣扎，幻想把南方筑成反动的最后根据地。据此情况，把革命战争猛烈进行，放手发展，大胆进攻，实行土改，创造解放区及无数游击据点，缩小反动区包围敌人于城市孤岛之中，坚决打击宋子文的计划到完全粉碎它，就是广东人民当前的共同要求。在此一形势和要求之下，把农村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一切工作面向农村，要求一切人民战士面向农村，随时准备穿上军装到农村去，这一切的强调是必要的，这是三千万人民的共同要求，而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愿望所能加以修改。然而我们时刻记得，“着重农村工作，并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这一条，必须在城市中也坚持艰苦的工作，支援和配合农村斗争，不致使农村斗争成为孤立，相反的使敌人完全孤立，并在不断的艰苦工作的过程中，积蓄及磨砺革命的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有效地配合农村争取城市。

四、面向祖国面向农村是我们这里的正确战斗方向

上面所说，蒋管区的城市是这样，如果移到香港海外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在我们这里，对于反美蒋，土地改革的当前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来说，能够起的作用就只有支援的作用。我们这里有广大的人力物力，在政治环境及地理条件上面，又使得不断培养及推动人民战士直接投身祖国的斗争成为可能，因此，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这种支援作用可能是很大的，但却不能够有比支援作用更多一些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搞好城市工作，这是必须的。但是搞好城市工作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不首先解决的，否则这个“搞好城市工作”便会成为空谈。如果我们离开了支援南方斗争，特别是首先支援南方的农村斗争，如果我们没有把一切工作面向农村，我们的一切工作没有能够有效的达到培养及推动大批战士直接投身农村斗争这一个目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就很少意义，至多只能说在长远的打算上有其意义，而这个长远性质的意义，又必须有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来做前提。这些特点又是由这里的客观实际所决定，也不是任何主观愿望所能修改的。

五、由此解决了我们所争论的问题

由此我们明白：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同等重要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据这个说法所提出的“搞好城市工作”的方针和办法，是无的放矢的。由此我们明白：只有农村第一，强调一切工作面向农村，一切人民战士面向农村的说法才是正确的；根据这个说法，根据为了农村的原则所提出的“搞好城市工作”的方针办法才是有的放矢的。由此我们明白：强调农村工作，号召回农村去，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认为“过火”，提出“纠正”的人才是不正确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强调得太过，而相反的在于强调得不够，不够广泛、具体、深入，特别是不够贯彻，没有把“农村第一，面向农村”的思想贯彻到各个工作部门中，贯彻到各种人民团体中，贯彻

到各部门工作的干部思想中，因而使得这个伟大的行动号召没有变成很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使得许多工作变成脱离了这个正确的方针而削弱了战斗意义。“身边就有工作，这儿也有斗争”的说法，无疑的把革命斗争庸俗化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某一些工作真的已经离开了面向农村的方针，也会逐渐变成“身边琐事”和“清谈”的危险。这才是今天要严重注意的问题。而对于一切工作的面向农村的观点，以及回农村去的号召，今天并不是“过火”与“纠正”的问题，而是更加强调与真正贯彻的问题，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六、由此更加肯定了“回农村去”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伟大历史任务

由上面的分析，那么，城乡工作孰重的问题解决了，城市工作为了什么的问题也解决了；从而关于知识分子回农村去的问题也可以获得解决。“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之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重要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热情号召，我们是应该作为一个行动的指南而经常地热烈地响应的，到了今天，就更应该迫切地响应了。南方的农村革命斗争迫切的需要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去参加，到农村去参加武装斗争和土改斗争就是我们赶在宋子文前头的迅捷途经：所谓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是首先要到农村去和农民结合当中来实现的；知识分子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首先要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来实现的；知识分子的有文化、有科学知识、有政治敏感的长处，必须在参加农村斗争中才能更大的发挥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妥协性、思想的虚幻性以及其他身上的弱点，也必须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的。到农村去，担负历史最光荣的任务，我们自始至终，以不变的音调，热情地向青年学

生及知識界呼喚着，然而我們仍然承認城市工作的某些崗位或陣地還是必須堅持的，因此某些工作者為了特殊的需要還是需要他們堅持城市工作的。着重農村，不是放棄城市；但特殊需要下的必須堅持，又不等於城鄉並重。

七、引起這個爭論的還有其他思想情緒上的原因

我們開頭就說過：引起爭論的是由於另外一種思想情緒上的原因，如果不很好的加以討論，則上面所做的分析並沒有完滿地解決了問題，因為在理論上即口頭上，相信誰也不會反對上面指出的原則，不過當到遇着一些具體問題，一些表面現象時，由於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與方法去處理，因而實際上就離開了正確的原則，這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問題的另一面。為什麼既承認了正確的原則，而當到解決那些屬於實際性質的問題時又會離開了它呢？這就是把理論作為教條，脫離了實際的原故。就是忘記了或不懂得採取毛澤東的思想來分析问题、解決問題，而採取了錯誤的思想去分析、去解決的原故。因此，如果不把上述的正確原則概括地重述一遍，不把毛澤東的思想明確地提了出來，叫大家在正確的原則之下求一致，而單從某些枝節問題搞來搞去，同樣也不能完滿地解決問題。我們又應該了解，由於接觸到某些客觀現象產生了在思想情緒上的不順眼不滿意的感覺，因而滑到離開正確原則的這種情況，還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帶一若干普遍性，所以熱烈的討論和完整的解決是十分必要的。又由於提出了城鄉並重的論點，在客觀上確有使部分群眾引起迷惑的可能，有造成遁辭拖住可能前進的人們的足步的可能，所以熱烈的討論和完整的解決又成為必要。

現在，究竟有哪些屬於實際性質的問題還要解決呢？

八、對待推動“回農村去”工作的一些缺點，有兩種態度和方法。

過去一年，我們確曾非常着重地強調農村鬥爭和知識青年到農

村去的重要性。到了解放军大举反攻和广东武装斗争急激发展的时候，确曾有一批一批的知識青年回农村去了，这不是很好吗？是的，好得很，然而有缺点。例如这批要回去的青年，自己抛开书本不读，要读其他回去用得着的东西，而且大声嚷着“ $x+y$ 无用论”；自己抛开身边工作不做，而且大发议论，说城市工作毫无意义；他们骄傲起来，变成很“嚣张”；他们号召其他同伴一齐回去，但采取“轻率的态度和急性的方法”，甚至发出“不下农村就是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极端议论，等等。这确曾破坏了一些团体学校的和平宁静的气氛，使一些人受到了刺激，也使一些人看得不顺眼和担心起来。对于这些缺点是要正确的，但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种，是大惊小怪起来，以为那是了不起的不良现象，以为这批青年人已犯了很大的错误，因而更以为强调农村工作和回农村去的号召也犯了错误，是片面，是过火，是取消了城市工作，因而提出纠正，提出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同等重要的论点，要大家恢复平和宁静的气氛，要大家多打身边琐事的“实仗”。然而这种态度与方法，其结果就是迷惑了群众的認識，在回乡的热潮中浇一勺冷水。

第二种相反，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杞人忧天，因为这个城市里的平和宁静的气氛是应该打破的，应该把许多人的美梦惊醒，才能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战斗的路向，才能刮掉糜烂的城市加诸人们身心的锈垢，才能把革命力量活跃起来。至于一批首先觉醒起来的青年，他们亮开眼睛，看到革命高潮的澎湃，听到革命号召的响亮，他们就产生了一股很大的热情，他们也来呼喊。他们坚决起来行动。须知道，要在这个平和宁静的城市里，冲破漫天颓废享乐的氛圈，投身到艰苦战斗的农村，如果没有一股很大的热情在推动，那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他们做出许多天真幼稚的行动，说出许多极端的怪话，刺激和触破了别人的尊严与自尊心等等，都只是由于这股热情的发动所带来的个别缺点，我们只须稍加指导改正就够。他们勇敢开路，他们热情沸腾，

他们惊醒了别人的美梦，他们敲开别人麻木的脑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在回农村去的号召上，我们比较狭隘，一般化和只照顾少数，没有根据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而逐步提高；有点突然而来，不能让群众有较长的思想酝酿；没有发掘和解答群众藏在心里的许多具体问题，不能切实和深刻地帮助群众弄通思想。又如只注意少数觉悟分子的发动，只能做到叫这少数人面向农村，而不是叫他们和广大群众一道面向农村。这些觉悟分子当中，也确曾犯了骄傲自大，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没有耐心诚恳帮助群众的精神等思想上，作风上的毛病。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很郑重地去做检讨，很周密地吸取经验，很严格地来改进工作，以便更好的达到为了农村斗争来搞好城市工作的目的，而并不是什么强调农村过火，或城市与农村并重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九、对待“青年的苦闷”，也有两种态度和方法。

现在确有不少青年发生苦闷。他们徘徊城乡之间，他们还有一些思想关节没有打通，有一些实际问题须要处理，他们也许被上述的极端的怪话所压倒，自尊心受到损伤，等等。因而他们在犹豫未决，不知所从，甚至垂头丧气了，学习工作不起劲了，生活呆儿郎当起来了。这也是必须正视的，而对待这些现象，也有两种态度和方法：

第一种，是所谓悲悯心怀、温情态度，觉得活泼可爱的青年忽而变得愁眉苦脸抬不起头，那真是了不起的坏，因而寄予同情，倍加抚慰，说身边就有工作，这儿有斗争，城乡工作一样重要，叫他们何必自苦，等等。而不知道这种苦闷，表面看来是坏的，实质上却并不坏。苦闷的由来是不满自己的现状，如果发誓不回农村的人难道也会苦闷起来吗？苦闷的由来又是觉悟不足决心不够的表现，如果发誓要回农村去的，难道也会苦闷起来吗？因此，这些青年人的苦闷，是一个虽然痛苦但很重要的思想斗争；是革命利益与个人

利益的冲突，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为个己打算的矛盾，是做一个战士还是做一个庸人的选择。在这里，采取“轻率的态度与急性的方法”，固然无效，但是采取悲悯温情态度，叫他们毋须思虑，何必自苦，替他们设下虚幻的道路，自慰的遁辞，以便心安理得起来而收拾心绪，照原样的生活下去，其结果是客观上拖住他们可能前进的脚步，那是更为不对的。

第二种，即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则相反，是看见这些青年人的苦闷的实质，承认这是知识青年思想觉悟过程中一个必须经历而又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要在这一关键之点把他们引向进步，而决不能把他们引向保守或退步。我们不是采取急性的方法，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帮助他们弄通思想的方法，使他们放下包袱，穿上轻装，大踏步向前迈进！

十、我们的收获和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回顾一个月来热烈的讨论，我们已有不少的收获，但我们的讨论还要进一步展开，并期待着更大的收获。

这次讨论的所以有收获，是参加讨论的朋友们以严格而又诚恳的态度批评了错误的论点，一方面证明着重农村斗争和到农村去的思想已为群众所有力地拥护，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经过这次讨论又把这种思想变成更加洪亮的声音，变成新的行动号召的开始。又由此，我们解决了城市工作的位置及其任务这个问题，从而促使城市工作的各方面有检讨改进的必要，而这种检讨改进将要对南方的革命斗争增强了援助。

这次讨论之所以可能有更大收获，是因为我们已发现出青年的苦闷必须正确对待，以及过去工作上的缺点又必须严肃地改正，以便有效地帮助广大青年群众搞通到农村去的思想，使增强我们对南方斗争的援助成为可能。我们已发现了问题，也揭露了缺点，那么我们的进一步的讨论，就应该是一个“搞通思想，改造工作”的讨论，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老老实实的把思想上的苦闷、把藏在心里

的疑难，提供于自己的同群之前，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又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利用这一园地，进行有关工作上的批评或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

（原载《正报》84期，1948年3月27日）

△△在三查三整中的自我反省

（1948年3月）

前面几句

这是一个同志的自我反省，把它拿来给三查三整中每个同志作为自我反省的镜子，谁能照到其中某一点是属于自己的，谁能从中启发到自己的毛病，谁便是开始面向现实，面向真理。谁以为这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谁便是冥顽不灵，谁能在反省自己后求得如何克服的具体办法，不断和自己斗争，谁便是开始面向布尔塞维克，谁以为谈谈便算了，或者把自己痛骂一顿便算了，谁便是清谈家或者是两面派。

编者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

我完全同意×同志传达的××同志对我的批评。一年以来，我的错误非常严重，除了损害了无数群众，破坏了许多地方党与群众组织基础，使党在群众中威信降低，力量削弱，造成今日××的局面严重情形等等之外，根据所反映的许多事实，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由于我的影响，一年以来，在××党内军内造成了两个极恶劣的倾向——反领导倾向与反人民倾向，至今还未能完全改正过来，这种

损失之大是不能以数字计算得出来的。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反抗××的正确领导，把××同志带着走一年歪路，这就是一年来错误的实质。对于这次错误，我完全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现在××同志既已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我的错误，清算了我的影响，这是××党的大进步，是党的成功。我希望我也能够跟着改正自己。

(二)

我的错误的根源，是我的流氓性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幼年娇养，不知稼穡，长大读书，薄有才名，甚为自负，耽诗嗜酒，玩世不羁。“九·一八”前后，思想左倾，参加当时的群众暴动，拿石子棍子去打警察局，夺门放火，都奋勇争先；暴动的结果是大批被屠杀（一九三一年十月的广州永汉路惨案）十余天后，便服毒自杀，正所谓今天参加革命，明天便要胜利，明天不胜利，后天便自杀。我正是这一类型的人。自此以后，脱离家庭，醉心于流浪生活，无论在城在乡，有业无业，结交之人，大都是失业的游民群，学上了他们的习气，自以为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因此我这个人，就有两重性格，静起来一天也不说话，高傲孤僻，目中无人，放荡散漫。有所谓名字派头；动起来非常粗暴，不顾一切，心狭如丝，性急如火，是流氓气习，这两种意识，十余年来，自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它保存下来，很少修改，因为自己常常以为这是好处而不是坏处，或也承认是坏处，但以为是无关宏旨的，没有更好但也没有大害，纵容了它。

此外，还背着三个大包袱。第一个是自以为有功，以为是××恢复组织以来的第一批功臣。我被提拔得很快，一九三七年一月做市工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一月做市委书记，四月做省委执委，“××是我做组织部长时他做干事的呢？”或“某人那时只是做小组长或支书呢”等类的话，是这类包袱的一种表现。这包袱背得最久。

第二个包袱是延安包袱。到延安学了几年，别人没机会看的书我看过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同志的报告也听过多次，记得几句零

章断片，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我是整过风的，学过党史的，参加过七大的，便自觉了不起。总之，自以为已经反过教条主义，我是没有教条主义的了，我是懂得理论也懂得实际的了，是有能力来独当一面，分析大问题解决大问题的了，正因为背了这样一个包袱，因此那么大胆妄为，敢于标新立异，自己弄出一套反抗××的政治领导。

第三个包袱是华北游击。跑过许多敌后根据地，见闻较多，扩充了一鳞半爪，便以为尽知全貌，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自以为是多见多闻，熟识国情的。这是我把华北经验硬搬到××来的很大的原因。

这是三个最大的包袱，还有无数的小包袱，因自己读多几本书，便多才，又读过几部兵书便以为不但能文而且能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事实上是把自己看成各方面都很完全的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缺点。

三个大包袱、无数小包袱、加上名士派头、流氓习气，这就构成了我整个思想意识的特点——极度的自高自大，骄傲、偏见、不能容物，粗暴，急性、冲动性、破坏性，散漫无纪律等等。

这种坏意识越发展，党性就越少，组织观念就越薄弱，思想方法也就越偏了。这期间的错误，表明了这种坏意识是发展了的，发展到在脑子里占了统治地位了。对上级是看不起的，对同级也是看不起的，对下级更没有倾听之意了，即使有，也是俘虏他们，挨以自重。对××同志，是根据在延安听到的一些流言蜚语，便认定他是个投降主义者，从前是投降主义者，现在也还是，心中早有了这种偏见，因此这次当自己的见解和△△的见解有了分歧时，便首先把△△是大投降主义，阿△是小投降主义肯定了，再不肯去考虑上级意见。这确实是偏见，因为对△△同志过去的全部历史我自然并不了解，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这是主要的，他所领导的××，是抗战以来蒋区里保存得最好，成绩最大之一组织。他尽可能还有许多弱点，然这一点之为难能可贵，我是已经知道，而且

应该懂得的。对△△同志的看法也是这样，只是根据八、九年前见过他的那种局部的片面印象来肯定他今天的整个，而不是全面的与根据他在八、九年来领导××与区党委的成就，从他的进步发展这方面来看的，总之，十年前的△△同志还是识字很少的，这印象是我那时候和他同住在一起时留下的，我就没有想到十年的时间是由初中一年级读到大学毕业的时间了呢。因此，我总是想△△同志是平平常常的，没有什么能力的。这拿来讲今天的△同志固然不符，便是十年以前的也不符了，那时候，他除了比我少识几个字以外，无论任何方面，也还是比我有能力得多的。讲来还是一句话，只是因为自己背上的包袱大了，把自己看得高，就把别人看得低，对上级如此，对同级就更不必说了，尤其是起事之初，已经搞出了一些表面成绩起来以后，更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自以为我的见解是和中央路线一致的，而△△等则是投降主义；流氓性发，则肆意谩骂，极难听的话都骂了，不但不是对上级的态度，而且也不是对同志的态度了，其毫无纪律，毫无组织原则，真是太离谱了。

(三)

我认识错误的过程是很慢的。组织方面较早些，因为究竟还是个党员，有时冷静下来一想，拿党章来一对，也就不能不觉得自己错了，△△同志回来时我请他转达给△△说我的组织原则全违犯了，××工作是必须△△来领导的，难道由我来吗？这可以说是对这次错误的认识的开始，但那时候对这种错误的严重性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而且也还只是单纯承认了组织方面的错，对政治上（原件一行字不清——编者）要在以后的期间，也还有反抗领导的行为。但此时的态度也多少和上半年不同了，上半年的态度是：不管上级同意不同意，我搞出个局面来再说，那时候看我正确还是你正确吧？下半年的态度是：我的主张是正确的，但这样闹下去我也不对呀，还是要到上面讲理去。所以上半年我是很容易来，但我自己不愿来的；下半年则是我屡次要求来而最后自动来了的，这种态度

的变化，是使我又靠近党，终于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自己错误开始改造自己的第一步。

我是准备了要挨骂的，第一天见了×同志，便告诉他。我骂了你们。“×同志一点也没有芥蒂”，只说：“你太主观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写个报告来呢，我们只是觉得你那样做带危险性，很担心。”谈话以后，我很悔恨，很惭愧——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早点来把意见谈清楚才回去做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我把他骂得那么凶，他还是对我那么亲切，我是多么糊涂和狭隘啊；这样想，越想越难过。

在这里四个多月，尤其是参加了学习班以后，在党的教育与其他同志的影响下使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逐渐觉得自己是片面的，浅薄的，而人家却是全面的，深入的了。我以前是认为我最敢放手的，但听了△同志的放手大搞的报告后，听他讲以进攻粉碎敌人进攻，以发展粉碎敌人进攻以后，觉得他比我还大胆，而他这种大胆是有分寸的，有根据的，和我那种一知半解比起来，就很明显的看出我的片面与浅薄，看出我的冲动性，冒险性乃至破坏性等等。我原来甚有自信的一套“理论”开始动摇了，承认自己那时候那样搞法是过早与有危险性的了。和△△同志多次接触以后，对他的印象也变了，觉得他很有经验，很实际，象这样的人做事是不容易失败的。但最重要的还不是只看到这些同志的真材实料而由轻视转为佩服，而是由于这种观感的变化，愈加使我觉得过去自己反抗领导之糊涂，英雄主义在这种相形见绌之下被打下来了，组织观念便又被提升了，觉得服从上级不但是在理论上要承认而且在事实上也必须的。上级是中央指派，全党拥护的，他们之所以能实行正确领导，也主要的因为这种条件，我一离开党的领导，就犯出错误来了。

在学习中，各地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能不使我深思的，人家没有象我这样做，也搞起来，而且成就比我更大，错误更少，为什么呢？这样来比较，也就逐渐认识我的错误；几个月来，脑子里总是

在这些问题上打转，看起来我象是无心学习，其实我是经常把这些问题想来想去，不能静下来。△同志之来，给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他又提出了许多我所未知的材料，使我在许多久思未决的问题上也恍然大悟了。我认识错误的过程是慢的，然而接受△△同志的批评是快的，比较干脆的，如果没有几个月来的准备，这样一下子接受全部批评自然也很困难。

数月来看到△△领导方面的民主作风，集思广益，倾听下级意见，经常修改与补充原来的见解，正所谓从善如流，这种作风，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也是用这种作风来领导工作的，错误也会少犯些吧？可是，过去我是只会“独行其是”（？）不但不理会下级意见，而且连上级也全不考虑，这样而不撞板，才是怪事啊！

（四）

我过去是不承认我是速胜论的，因为第一，自因为是说中了几件事，如预言半年后反攻等等；第二，我也说过困难的，如三月间在△△有同志问我再过半年能胜利不，我是说过还要准备打三五年游击的；第三，我也不是根本否认长期性的，我只是说：“由××城到××全程三十里，难道走到×××亦还是说尚有三十里吗。”正因我也确实是曾经这样说过的，才使我一年以来非常顽固，自以为比上级更有先见之明——我是首先看到胜利敢于胜利的，而你们那时还在那里觉得患失，不敢讲胜利，只是重复过去的老调，高唤长期。我现在是不但承认那是速胜论，而且亦了解了那实质上是速胜论了。因为第一，问题不是我说中了还是说错了，而是这种预言是凭什么根据的。算命先生有时也说中一些事的，但那决不是正确的，因为那只是瞎猜而不是科学。我那时候有什么条件可以预言半年后反攻呢？除了每月歼灭他若干旅，再过半年必能歼灭他若干旅这个假定的算式后，是没有其他凭据的。如果我只是个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而不是身当一方革命工作重任的人，这样说说也没有什么，因

为那只是讲讲而不是要按这样分析来办事的。要办革命的事，在去年初来分析国内形势，不能只从这一个可能的条件出发，因为再过半年歼灭他若干旅，在当时还只是个愿望而未足实现，当时的实际是敌兵力仍占优势，我仍占劣势，战争仍在敌攻我守的形势中，敌的外援内变或我可能的某些错误，都足以延长攻守优劣形势的变化，当时的现实是我有半年后转守为攻的可能，然而这只是一个可能而不是唯一的可能，就当时的条件来说，更大的可能还应当是战争形势的变化可能拖得更久些，在这方面必须有充分的估计。然而我当时实质上是没有去估计这方面的。第二，攻守易势以后又如何呢？在我那时的想象，只要一旦攻守易势，战局就会急转直下的，所谓蒋军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一往后退，便军心涣散，土崩瓦解了，所谓“可传檄而定天下”，所谓到那时候连张发奎也要高喊我早就是反蒋的呀了。把这些情形片面夸大起来，没有想到就是攻守易势了，而由我系以农村对抗城市，以劣势配备对优势配备，以无外援对有外援（物质上的）以全国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二，以非正统对正统（毛主席在“七大”曾讲过的国际承认与国际不承认）更加以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多，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民党有二十年的统治历史与在中国人民中有六十年的影响等等条件，国民党并不是那样快就土崩瓦解的。这和陈涉亡秦的时代条件是根本不同的。因为把这种土崩瓦解想象得太乐观，于是就强调“挨过半年就没有问题了……”（附注：我当时说半年后如何如何，等认识具如上述，△同志反映的材料所亏，我认为半年甚至三个月后解放军大军就打到××来，那可能只是一些同志由于我这种语气而产生的误会，因为这条路我是走过的，我是知道这样短的时间，光是走路也难走得到的）。第三，因此，我当时虽然也说过有困难，说过长期，说过要打三五年游击等等，这些都不是我当时主要的思想，不是经常的，而是偶然的，不是经过仔细考虑而是随便说说过后便忘却的，或只是人家问起随便拿起来应付一阵的口头禅。总之，那性质不是正确的看到胜利又看到困难的两方面之一边，更不是毛主席在七大

所讲的“准备困难，一定胜利”的那种作最困难的准备（如毛主席在七大举出要准备的十五件的困难）出发的精神。这样，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就只有胜利的打算而没有困难的打算，就是孤注一掷的作法而不是慎重将事的做法了。我以为我的速胜论的实质是这样的。

（五）

××党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但这些基础绝大部最集中在狭窄的滨海平原。如果照顾到斗争的长期性与困难，则对这平原地区的力量，必须考虑到不宜过早暴露，以免受敌人的集中推残，而于恢复武装活动之初，一面在平原老地区集结适当数量的部队，多采用两面的方式坚持，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如何推入山地新区，建立更普遍的山地新区工作基础，等待主客观形势的更加成熟，然后放手大搞，这样，老地区不会损失，山区新区更大的发展起来，平原原有山地支撑，山地有平原配合，这样做，正如△△所指示的分散小搞打下大搞基础的方针，是比较稳健可靠与实用的，假如××也照这方针来做，而不过早大搞，把准备的时间放长些，准备工作做多些，则今天的局面必然不同，力量会更大，地区更阔，组织更普遍而有力。然而我由于没有看到××党的这种特点，——主要的还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上认识的速胜论观点，心里急于搞出个局面来给人看、显显自己本领，急于见功。（中略去一段）当时如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心强些，虚心来检讨，全面地来讨论，这种错误可能及早改正，而不至于影响到如此甚久其得吧？然而，还是个人英雄主义把我迷了，我实在还不肯认真正视自己的错误，因此此时虽然也提出“招牌挂得高，工作做得低；”组织形式要“上小下大”，“胜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村政权村农会村民兵组织得好，减租减息工作能否普遍深入”等等话，又说“这天下又是打得下来的，是做出来的。”“用大搞精神从小做起”等等话。但我既然没有把自己的错误作彻底的批判，领导其他同志来肃清我给予他们的坏影响那就自然谈不上。正如上面所说的对长期性和困难的看法一样，那

只是偶然有过这样的感觉，它还是很浅薄的，很游离的，连自己也没有坚决把它付之实施的精神，因此，它并没有能够真正起了扶危为中的作用。如果我组织观念好一些，稍有尊重上级之心，在当时既然自己也觉得有些毛病了的情况下，△△等同志来传达了△△要我更多注意困难，作长期打算的指示，我应该是可能接受下来，共同仔细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引上正路上走的。然而我却满腔成见，充满阿Q精神，以为你们是看不到胜利，不敢作反的，没资格来批评我，而△同志此时又有了某些错误，如“准备第二次撤退”与叫我三天内赶去××歼灭保十总队又回师××歼灭保九总队等，却给我抓住了，便以为你政治上是比我右的，军事上是比我更左的，我有疮疤，你的疮疤比我更大，你简直是思想混乱的，那里有资格来领导，听你说话去做，就什么事都糟了。对他们的意见，一意不歇不睬，毫不考虑，这么一对立，就连自己的疮疤，不管它大小，既不专医，也不肯承认了。那时起初还有这种心理——这种毛病，由我自己来指出，我自己还甘心，由你们来指出，我就不心服，搞起了局面，你来做政委做书记，让你来做就是了，你来了就拆我的台，丢我的脸，这样都是不成的。有了这种心理，自然是再不肯去检讨自己了。

何以他们未来之前，我反而肯自动来检讨一下，他们来了以后，甚至连这一点工夫亦不肯做了呢？这自然是由于以个人为重党为轻的意识出发，但其中也还有具体的原因——他们没有来的时候，事情是由我独立负责搞的，虽想搞出个局面来夸耀自己，但也还怕真的搞不成，那时候名也没有，位也没有了。还有，我虽有出风头闹独立之心，主观上也还有把革命搞好，为革命立功之心的；因此那时为公为私，都有改变一下更好的感觉。他们来了以后，由于地位观念，个人成见，心理又有一重变化，此时的心理是：我搞出了这样的局面来了，你不让我搞，我就交给你。这生意，我做掌柜的时候是下钱的，现在你要做就交给你，做得好，反正功劳簿上是少有自己的份的，做不好，也只是你负责，拖累不到我。因为原来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观念就不是主要的，此时个人主义受到了打击，

正所谓失意之际，这些观念就更淡薄了。我这一段话，不是说假如他们不来，我自己还可能自动改正我的错误。这样可能当然也不是没有，因为我还是个党员，也总还有向好之心，而且就算我意识坏到更差，党也还是不会放弃对我的领导与教育的。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也许变得更坏。总之，为个人打算的意识不首先被纠正，在任何情况下，彻底认识与改正当时我的政治错误是不可能的。×等之来，不是他们来造成了我更深的错误，而是他们来了，增加了这么一种条件，使我的地位观念，冷热病，闹意气，不负责任等等毛病，更加乘机尽情暴露而已。

(六)

原来我也曾想过，全省各地未大搞，我这里首先搞，不是太突出，吸引敌人重点进攻吗？在这举事之初，也曾考虑过的，也有同志提过。那时候我说：“难道敌人只杀××的共产党，不杀其他地方的吗？我们这里搞起来，其他地方也只好跟着搞的。当时想象，以为××留下的武装，必较我们那里多许多倍，他们一搞起来，自非××可比的。现在××不敢放手，我们这里一放手，虚张声势，把敌人吸引过来，×××××就必乘虚而起，××也就只好修改他们的意见了。这里可以看到我那时候的心理，不是在上级的整个计划下来担负一定的工作的，而是企图标新立异，独树一帜，造成既成事实来“领导”上级的。这是目无组织，目无上级。根本不去想，革命不是儿戏，不在上级的整个计划的领导下，这样扶持一方，自作胡为，纵使是天大的英雄，也是搞不出什么真正的成就来的。如果我不是这么的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这样的目无组织，在起事之初，既然自己的见解和上级有不同，应该立即来报告，来请示，把自己意见对上级讲得一清二楚；即使自己是对的，亦要使上级接受同意，弄出整个计划来，大家去做，那才能把事情办好，做得成功呀。然而我却只知一时逞意气，逞英雄，先肯定了人家是投降主义，来这里讲只是浪费唇舌的，不如不要理他，自己先搞起来，拿成绩给他看

了，他才没得话说的。这样，依然是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的懂得中央正确路线的人，是我领导△△，而不是△△来领导我了。这样就不但秘密违犯上级指示，而且公开在下面批评与反抗△△的路线，在干部中普遍造成抗拒△△政治领导的思想，更加以对△△负责同志的污蔑打击，藉以抬高自己，因而使△△同志在干部中的威信非常减低，对地委其他同志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时造成许多同志只知有老△不知有其他的宗派。这虽然不是原来有计划去组织起来的宗派，然而确实是一种物以类聚的宗派。所谓老△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

(七)

大概未下乡前，头脑尚较为冷静，还肯顾虑得稍为多些，对一些地方，还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对一些政策，还叫人不要乱来。但此时身在×××，如坐针毡，不能稍忍，心里只是想下去带着兵，痛痛快快的打他妈的，不胜如在这里天天给他查户口，查身份证，受尽闷气好得多。这样铁胆一被打死，我就急不可耐，连急连忙就下乡去了。一下乡去，带了部队，就忘其所以，一心一意，只看着那几条枪，别的都不管了，我在××逗留约七天，对××地方工作该如何做，可以说完全不闻不问，只是说，你们看能搞起来就搞起来便是了，总之，要造反。经××时如此，经××时也是如此。就是带兵也是如此，只管军事，不理政治，带一个团只管这个团，带一连时只管这个连，每战必亲临火线，自以为这样才叫做勇敢。而此时又获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便更冲动头脑更昏了。只要搞起队伍来，不分地区，不问轻重，不讲方式，不讲究政策，只是叫，你去搞就是了，不管什么人，做共产党，就要敢造反，他不敢造反拖也拖他出来，硬要他造。在这种精神下，××、××、××一部分，大约还有其他地方，都在我直接布置或间接影响下，把许多地方基础连根拔起了，许多未应弄红的地方弄红了，未应出来的人迫出来了。党的基础垮了，群众组织也垮了。思想方法之偏、急性、冲动，在这些时候表现得很明显的，我下乡以来，没有作过

一个报告——政治报告也没有，工作计划报告也没有，没有和任何一个地方的负责同志详细谈过话，我的意见，只是鸡零狗碎的随时讲几句，给人只是一个印象；造反，搞武装、下面的情形究竟如何，我也不去问了，一般的说，未下乡以前，虽然也是不了解下情的，但总是问得多些，谈得多些，想的问题，也还多方面些，复杂些，下了乡以后，简直就只有带兵打仗这回事了。就是对于带兵打仗这回事，也还是只是单纯军事的，局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是急于显示自己，所谓急于见功、要见功，就只要在最短期间里把武装搞得更多更大；第二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对上级的反抗，也以此时为尤甚，因为表面的成绩已经做出些来了，这时候便洋洋自得，那态度是——你来看，你正确还是我正确。

(八)

畸重军事，也就形成了严重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在部队单方面强调军纪，不注意政治教育，我自己有时也用军阀态度对待老百姓。急于把部队搞得整齐一致，就强调把他搞得越简单越好，强调命令，许多地方不加选择采取旧式军阀的管理制度与方法，或纵容这种情形的自流而不加以制止。这样部队里便逐渐养成了有管无教，有军事无政治，只看到枪杆子不顾群众甚至反群众的倾向。我初下去带兵的时候，心里是首先把部队搞到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以拿出来打仗再说，政治工作以后慢慢再来，反正原来有些底子，坏不了的。因为那时急于集中大兵来打开局面，不去顾政治工作了。后来△回来了，那时我也觉得部队的政工有点问题了，那时××原决定××同志做司令，我做副政委的，我曾经在地委会议上提出在我代理司令期间仍兼副政委，专管部队政治工作，△同志则集中精神管地方党和政权工作，这个提议，△等没有表示可否，他们讲话中连提也不提到，我心里想——大概是怕我弄权吧？越想越不高兴，越想越心窄，心里自己说：

“好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让我搞，我看你怎样搞吧，你有什么本领搞得它掂。”这种心理以后大约和△△△同志谈话时透露过。自

此以后，对于部队的政工，我是有意放下不理，消极怠工的，几个月来，对于部队的政工，可以说一个意见也未提过，私而忘公的意识，在这个工作，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了。在历史上△同志对政工也还不是能够抓住原则的，他自己也常带以军阀态度对部属及老百姓，不去找老百姓谈话，这样，政工更往歪处流，不能及时纠正了。

(九)

我未下乡之前，曾提议停止打车，为什么下乡以后，都把经济政策弄得如此混乱无原则呢？大约是未下乡之前，头脑还稍为冷静，想得周全些，下了乡以后，自己带了兵，急于要拿这些兵来打天下，在弄到饭给我这些兵吃再讲的心理下，就只好有意无意纵容无原则的经济政策，“抢之”之论，虽以开玩笑话调出之，然也表现了我此时的心理，而且也流露了我的流氓意识。军事之初，正直青黄不接之时，由于一年余以来撤退复员时期强调土匪式的活动，部队已沾染了不少土匪作风，（所谓做世界）又新收编了许多土匪流氓成份，面对着这个特点，此时我强调的应该是如上述停止打车或如××村及××村会议所曾经提出过的反对流寇主义的思想，而不应强调“天生天养”，“有了枪杆子怕没有饭吃”的思想，这样才能及时从思想上引导在经济政策上走入正轨，然而由于我此时思想上单纯军事观点事实上经常占了统治地位，群众观点很稀薄，因此虽偶然接触到上述诸问题，总是一触就离，而不是认真去想过与坚决执行过的。五月以后，军需供给组织交由△同志负责了，我心里不高兴，以为这应该是司令员管的，为什么你来越俎代庖呢×，又是有意来夺我的权了。五、六月间在××，一团政委曾提议带两个连去××区打船，我还说，“这样不好，解放军去打船抢劫，老百姓看起来名誉不好。”没有准他们去。（略去一段）

(十)

一般的说，经济政策的混乱，是我知而放任的情形下犯的，而

肃反政策的过左，则是我不知而自流的情形下犯的。我对于肃反不像对经济政策那样有过一套理论，相反，我对于这问题注意得很少，处理得也很少，谈得也很少。不过如追溯我的作痛俑之责，那么大概是在前年冬，我第二次撤退复员以后，特务及地方反动分子极猖獗，告密捕人封村之风甚盛，尤其在××，我损失很大，此时我强调镇压政策，说：“杀佞的契弟啦，谁说共产党不杀人的，不杀好人，却专杀坏人。”当时△同志还未走，他也常有这样的话。那时候我们还未恢复长枪队的活动。去年三月下乡以后，我就很少理到这种事，大约此时我们势大，已经是我们到处杀人而不是人家到处杀我们的时候了，各地干部来报告，也就极少提及这些事，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或他们知道了，也自以为不是什么大事，不用来说，而我也毫不在乎，从不追问，脑子里很少想到这些事，四月间在××××村，一个同情的士绅请我吃饭，席间他向我提出“要得天下，千万不要多杀人，文王是不杀人才得天下的。”我当时也和他说我们是要得天下的，一定约束部下不准他们乱杀人。当时△△△同志及一团队长政委俱在场。现在想起来，大约这老先生当时已经知道了很多杀人的事，想直说又不敢，故而隐约其词吧。而我当时在极度的骄气之中，以为局面已搞开了，还有什么问题？一点也不把这种反映当作什么一回事，应付几句便了事。现在才知道原来杀人如此其多，不但其他同志吃惊，连我也吃惊。不是事先制定了制度或限制（如毛主席在审干反奸时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便来昌时提出了镇压；把放手了，又经一年之久，不去过问，不去审查，这也够充分地表现了我在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与不负责任的态度了。本来，过左的肃反政策的危险，我不是完全不明白其理的，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听到的也不少，我在△△也曾对人提出过“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等话，然而一，由于我缺乏实际经验因此不知在何种情形下最容易犯滥杀，在何种形下最需提防滥杀；二则由于一味想表现自己，给表面的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只是在想如何和×同志等闹意气，对上级闹独立性，根本不化脑筋来想这方面事情了。

(十一)

我在军事上过早集中大兵行动与打了几次被动的消耗战，最足以表现我的言行不符。反对打大仗，反对打无把握的仗，反对打被动仗，强调非伏击袭击不打，我是写过小册子，经常讲的，但为什么自己带了兵又不照自己平日所想所讲的行呢？我以为这主要的是：第一，是由于政治上的速胜论来的，因为政治上认识的速胜论，因此过早集中大兵力行动，想来此一下播下大局面。第二是意识上的冲动性，许多仗是原来不准备打的，到时忽然压制不住冲动的感情，就拿出去一拼了。××××之战，最为明显，原来躲避敌人躲了几天，早就说不应打不能打的了，最后却不禁激气，拿出去打了，其结果便打了一个大消耗仗。

我以为对军事上的错误的认识是较早的，虽然并不彻底，然而总比较接近些。打下××××后第二天就提出分兵发展，那时还在一帆风顺之中而不是经过挫折以后，×回来后我曾提议由我带四团过××发展；七月那次无准备的集中千余人入×之行我是不同意的；△叫我三天内赶去××连续歼灭人家两个团的命令，我是没有执行的；又他那时再歼灭敌人两个保安团，六个月内完成建立××边区的计划我不同意的。然而我的态度，不是既然看到了这些便极力去想法大家团结，共同研究出一个是对付敌人，而是拿了他这只痛脚，作为自己攻击他的本钱，反抗他的命令，削弱他的威信，提高自己。其结果还是内部相闹不结，而外则无法粉碎敌人的扫荡，向前发展，招致今日的挫败局面。

(十二)

过去我常自以为——我在组织原则上是错了的，意识是坏的，但我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正确的。因为我在延安学的那一套，本来是完整的，不是片面的，先生并没有把片面的东西来教我，如果叫我静坐下来，把那些东西写出来，大概也还是写得较为周全些的。我写那

个论游击战争的指挥问题的小册子作为一例。就是其他许多东西，我也不是只讲一面不讲其他的。因此我就拿这个当包袱，说我也说过困难呀之类，如在布置工作上关于政权的建立，我也说过要经过长期反复磨来磨去才磨出来的之类。但，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矛盾——非无产阶级意识是掌握不住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个人英雄主义出发是无法把革命工作做得周全的，从我上述的错误，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写了书，讲了话，都是讲得好好的，但做起来便走了样是一种，讲话时候拣合自己胃口的一些多讲些，不合胃口的少讲些，如所谓专拣些古灵精怪的故事来讲，这样连讲的时候已经走了样，做起来便更走样又是一种，自以为用不着，根本不去想，不去讲，或根本忘记了，又是一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以为最该打的是不把××村及××村会议提出分兵发展与反对流寇主义这件事向××报告。这次会议，本来是检讨了初期的部分错误，约略接近了真理的，当时的参加者有一团政委、团长、四团政委兼团长，××正副县长及县委，司令部参谋×××等，无论从形式从内容讲，都是×在未回前此时期工作中唯一的带总结性的会议，△回来后我向他作报告，这个会议是必须讲的，但我大半年来直至我离开的那天，始终不对他们讲，这除了掩蔽自己的尾巴之外完全没有别的理由的。假如我那时候能坦白向他们讲出来，根据这个会议所已经接触到的，对此时期错误的检讨，进一步来了解××的方针指示，共同来研究情况，那时候来挽救错误不还是很容易吗？但我完全不是这种想法，而是一意把已经初步看出来的尾巴也掩蔽起来，文过饰非，可见没有无产阶级意识是无法掌握真理的，即使接近了，也会稍从即逝的。现在我最后悔的即这个机会。那时候本来是可以不错的了，但它还是继续错下去了。

(十三)

我的工作态度，五月以前和五月以后不同，五月以前是积极的，想独立搞出个局面来夸耀自己，即所谓出风头。五月以后，自己的意见不能引行了（那时候还不是感觉行不通）便消极起来，不

讲话，不提意见，不去想办法，这里也可以看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心是非常之差的。

(十四)

我认为我的组织上的错误比政治上的更严重。固然两者是相连的，没有组织上的错误，则这次的政治上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我同意△△的同志的批评——组织上的错误是自觉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不自觉的，但和组织上的错误有密切关联的。在极度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下，有意的反抗上级领导，闹独立性。如果我是在失却联系的情形下，由于自己的冲动与幼稚，冒险盲动起来，政治上固然也错了，然其性质也还是不同的，在那种情形下，除了检查错误外，对于这种自动大胆放手的精神还可以奖励，而我现在，则只应有处罚。这处罚，我以为主要的是因为反抗领导，闹独立性是违犯党纪的，必须受党的纪律制裁，除了撤消工作外，我以为仍应受严重警告，并把这件事向党内宣布。

对下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如上述的各种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我也准备在今后工作上改正它。我要求今后把我的工作职位分配得小些低些。经过这一次，我才知自己的空虚，治国平天下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以前的心情是未出茅庐自比管×，现在的这种心情是很少了，似乎失去“信心”，不过，我准备谦逊些，谨慎些，做得小些低些，总想勉力替党再做些事。有一点我现在自信可以保证而且需要保证的，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做到尊重上级领导，遵守组织原则，这点我必须时时警惕，我以为如果做到这一点，则我便会少犯错误了。

我这个反省只是我认识错误的开始，今后还准备在长期重视经已存在或可能又吸收进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斗争，在党的帮助下不断改造自己，我相信我是改造得好的。

一九四八、三、十六抄完

附注：

1. 因为已有△同志的报告，因此我这里只侧重于写我错误过程中的心理而没有多举出事实。有些事实也已经在我以前的报告中讲到了的。

2. 篇中亦多讲到认识错误的过程与我错误问题前后的看法，我以为这样可以使党了解我对错误认识的程度来，继续帮助我，批评我。

蒋宋出卖华南的新阶段（广州通讯）

（1948年4月11日）

辛之

伪善而阴险的司徒雷登带领着美国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一行，四月八日飞到广州来了。“南宋”王国的群僚们忙于接风洗尘，眉飞色舞，大唱祝词。事实上，司徒这一行，的确是标帜出蒋宋出卖华南已经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性的出卖发展为军事性的出卖了。

罗卓英计划搁浅

惨胜后罗卓英奉蒋命从人民手里劫搜广东之后，蒋罗政权便已经决心把广东进而把华南作为一份礼品来贡献给美帝国主义，从而去换取美援，去引进美帝侵略势力，在这样勾结中图谋稳定这一片南方土地，作为其垂死挣扎的堡垒和退路。于是去年三月开头，罗卓英便和美商潘宜公司进行所谓“广东实业建设”的投资谈判，订立了“接纳外资办法”三十项，让美资来进行十一种“建设”（目前美宋所积极进行的如黄埔筑港，粤北狗牙洞煤矿以及宣传最久的滘

江水电厂都在这时已经公开宣布了)。然而由于罗卓英毕竟买办资望不够，并且上述这三大项目，在去年五月的省议会中被告决掉了，弄得美商失去信心。虽则罗卓英着急的在条文里写上“经营合同签订后不得迟过六个月即须施工兴建，政府并得在合约上规定其完成期限”，但实际上一直到宋子文去年十月登台为止，“施工兴建”终于还是一片沉寂。这情况叫蒋朝十分焦急，理会到假手罗卓英省府的面目来完成出卖任务，显然是不可能。于是国舅爷 TV 宋南下主粤跟着出现了。

TV一来其门如市

因吞金过多而被同族政敌挤入冷宫的宋国舅，经蒋首先在去年九月十八的国民党中常会替他洗了脸，宣布从宋的钱袋里松出一亿八千万元（中国银建设公司资产），作为“党员家属救济基金”（实际即充作剿共军费），平息一下同族对他的忌恨；之后，调任粤省主席的任命便宣布了。这一来果然大得美资欢喜。国舅十月一号正式视事，二日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找TV谈商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十三日潘宜公司副经理找宋商洽原定生意和黄埔筑港问题，十五日欢宴美驻华大使馆参赞纪伯狄交换商务意见；同时，粤北煤矿、广州汽车厂、乃至陈纳德航空公司等的接洽也活跃起来。并且，十三日这一天，宋通过海南参议员王大芹的建议，公开打销海南改省的原定计划，把它收归自己的拍卖范围。这是宋子文下车伊始的第一幕戏。

开年以来全面出卖

其实，美国的胃口岂止于广东一省，它早已决计把整个华南作为其支持蒋王朝侵略全中国的基地，由殖民地化华南来达到它殖民地化全中国，而蒋宋也早已揣摩到他的美国主子的意旨，妄想靠住这个美国侵略基地进行最后的挣扎和作为逃命的退路。被《南侨日报》所揭穿的魏德迈亡华秘密计划中，就分明地拿北纬三十度以南粤桂

闽浙湘赣六省定为所谓“华南经济建设区(即殖民地地区”，并且公然宣称：“使华南经济政治安定，则美国对华之援助，当自动实行。”(二月二日美联电)对于这，一月三十晚老蒋在其包括张群和翁文灏等的高级官员会议上，便讨论了这个魏德迈“建议”，并下令张群立即实行他的“自助”经济计划(合众电)。而宋子文则向美国保证“使粤省成为一个工业及交通的中枢”，和翁文灏共同发表“建设(即出卖)粤省工矿声明”，接着把海南铁砂二十五万吨送到日本八幡，粤北狗牙洞煤矿则假借资源委员会名义组成南岭煤矿公司着手进行，并决定修筑粤汉路之坪石狗牙洞支线。

同时，除了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和孙越崎来粤之外，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蒋府主席在宋的邀请之下，先后都到广州会议，在他们的所谓“治安”协商里面，每一次都露出“经济合作”(即串同出卖)的消息来。即使是尚未派员到粤的江西省府，也于二月二十九日发表“江西工业化计划”，把该省工业从纺织到砖瓦各工厂都列为美国投资的对象了。在这里，粤桂湘闽赣诸省串同出卖的合约中间，湘省主席王东原提出的城陵矶开港计划是值得注意的，这一港口的完成，可沟通长江流域各支流的货物，由此驳上粤汉路出黄埔港(比之经汉口到上海出口，缩短了距离百分之四十七)这将替美帝增强了对湘省及其邻境富庶地区的吸血系统。

从这里明白地看到，自今年一月以来，在蒋军到处崩败，财粮物资枯竭中，这种出卖行径变成蒋朝最后挣扎的唯一计策，并且自己已经由宋子文个别经手变成蒋府正面主持，由广东一省扩大到整个华南的出卖，由零沽碎折变成全部交割了。

“军建”声中司徒南来

在这蒋宋对华南的全面出卖中，检查它半年来的事实发展，可以看出它目前的真实内容和显著的性质来，把蒋宋所渲染的“开发华南”的大计划，特别是宋子文大肆吹牛的经建方案，对照着它在作为“开发”或“经建”中枢的广东所表现的实际看来，所做到的

完全是内战的军事“建设”。宋子文吹得最响亮的广东经建方案中除了其它什么工矿业之外，举其大者有如下列之多：黄浦港及黄浦大道，粤汉铁路及狗牙洞支线，珠江内港及西南大铁桥（粤汉路接广三路），海南环岛铁路，汕头涂水港，韶（关）吉（安）铁路，粤桂铁路（三水到梧州），中（山）澳（门）、广（州）汕（头）铁路，榆林渔业港，海南、东江、粤北三大屯垦区，珠江三角洲及东西北各江一百七十处堤围水闸等，真是应有尽有；但是，宋子文除了把现成的海南铁砂二十五万吨的确送到日本之处，实际上部分完工及限期完成的，只有黄埔大道（黄埔通广州大道大部完工）和黄浦港口码头（四月完成）而已。粤汉增修工程、广州内港、西南铁桥、狗牙洞煤矿则确在积极筹备中，只是经费尚没有能够在美援中占个确定的充分的数目，经宋子文上京力争，也因南京军费火急，不得要领。其他普通工业，乃至至于滄江水电厂，也因工费无着，宣告“划出”不理了，尤其是各江堤围，经去年六月半省陆沉的大水灾后，到处失修，宋子文的官样文章虽然通令各地修理，但各地钱粮已被TV宋劫掠一空，所许给的工程费四百二十亿元还有待于“变卖五市配售米粮”之后才拨来。如果去年水灾不幸今年依时重来，则五十万灾民和一千万亩田禾淹没的悲凄画面，行将在TV宋的“做到广东老百姓个个有饭吃”的经建口号面前出现。所谓“经建”的全部内幕便是这样。

在美蒋宋对广东的拚命进行军建中，伪善而阴险的司徒雷登带着蒋朝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一行到来了，官报显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将是加强海南成为海空基地和练兵场所，将把粤汉路铺成双轨。这正是说明：宋子文的经建实质是“军建”，美帝的“开发”实质上是“开刀”。

（原载《群报》第14期，1948年4月15日）

论宋子文“经建”骗局之败露

(1948年4月)

桐 庐

所谓广东经济建设，自罗卓英决定计划初步实施算起，到现在足足一年，从宋子文百般拉拢拼命执行以来，也足足半年了。我们从开始就指出，这是蒋朝勾结和配合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广东、华南，出卖华南人民利权换取美援，并企图依附于美帝这个华南基地上面，作为其最后挣扎的堡垒及最后逃命的退路，我们指出这是美蒋罗宋借“经建”之名进行反人民的设施的诡计骗局。时至今日，事实揭穿宋子文的“经建”实际上是个“军建”，而且这“军建”的实际又把宋子文“六个月有成效”的牛皮宣告破产了。

首先看看宋子文“建设”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TV宋吹牛吹得最响亮的经建方案，除了一连串的什么工矿业之外，被指为最迫切的交通和水利，就有如下列之多：黄埔港及黄埔大道，粤汉铁路及连接到狗牙洞煤矿的支线，广州内港及连接粤汉广三铁路的西南大铁桥，海南环岛铁路及榆林渔业港，汕头深水港，韶(关)吉(安)铁路，粤桂(省梧)铁路，中(山)澳(门)铁路，增修东南干线，西南干线，粤闽边三公路等公路网，还有海南，东江，粤北三个屯垦区，马安围、芦苞，曲江枫水湾等水闸，修理东西北三江及珠江口堤围一百七十处，真是工矿、港湾、路政、农田、水利，无所不有。然而实际上，那一连串的工矿业包括所谓海南钢铁厂、滄江水电厂、广州电力厂、粤北大煤矿在内，除了海南的石碌和田独的现成铁砂二十五万吨，陆续奉送到日本八幡之外，其他都没有下文。只有TV宋指望最切的海港和铁路，其中黄埔大道和黄埔港的

码头货仓据说已经大部完成（其他也须等待下文）。至于关系全省民命民粮的各江堤围，去年六月曾因各江水涨，其围被冲决四百二十八处，造成半省陆沉的大水灾，以致沿江人民随波逐流漂没丧命者六千二百余人，无告灾民五十余万，淹没禾田九百九十余万市亩，房屋被毁五万四千余间（均据当时官方统计数字），宋子文的官样文章虽然通令各地修堤防潦，但地方钱粮已被掠夺殆尽，无力自行修理，结果除了宋子文准备替美国实验农业机器的马鞍围之外，至今只完成应修工程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官方报告）。三水、南海、新会、四会、清远等县人民频频催促宋省府拨济工款，但TV宋除了命令各县长派兵下乡“坐催筑堤工款”之外，竟悍然宣布中华救济团原定拨作修堤工程费的四百二十一亿元，要待变卖“五市配售米粮”（即美国配给五市的米粮）之后才能发来。五月份就是江潦汎滥的节季，不幸去年涨势重来，更悲惨的人民巨灾如何能够避免！铁一般的事实在人民的面前作证；宋子文把人民财产去抵押来的美国金元，全部花在有利于美国侵略和输送军火货物的美海军基地——黄埔港上面，花在替美籍日本挖掘铁矿铸造援蒋军火的海南铁矿上面，而对于关系民生的建设甚至于最紧急的防潦工程，则一钱不给；宋子文无耻讹称“最低限度做到广东老百姓人人有饭吃”的所谓“经建”，实际上仅仅是蓄意用来绞杀广东人民而支持他们自己的最后残喘的“军建”。

宋子文一贯就企图用“经建”的招牌，开出五光十色的“经建”方案，来掩护他勾结，配合美帝侵略，出卖人民物业，获取美援，以遂行其屠杀人民的“军建”计划。另一方面，他还企图借这块“经建”招牌，诱骗美商和华侨投资来兴办工商业作为同样的掩护，并补充其“军建”资本之缺乏。TV宋下车伊始，便一连串的和美商如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潘宜公司副经理及其他美国商家，谈商投资这个投资那个；同时又大事招来侨商回来“开发海南，”并且曾经引起一些响应。但因为整个广东没入在人民战争中，宋政府的统治在广大农村大大地削弱，他们的城市“治安”，也因官僚资本的

牵制物价的波动以及过渡的勒索苛扰而陷入恐怖纷乱，美商感到投资之毫无保障，于是踌躇停顿终至忘记这回事了，所以至今半年，一切开发的预定都没有事实出现。就如去年三月最先和罗卓英签订“接纳外资办法”约定经营十一个企业部门并决定立即开业的潘宜公司，截至今日为止，“尚无丝毫具体之投资事跡出现”，且据宋省政府传出消息，“潘宜尚在美国活动，集资一事，并无任何显著之结果”（均见四月十三日《华侨报》），其他美商自不屑说了。华侨资本家对于国内情况，特别是对于宋府的统制政策与宋家的资本垄断情况更为清楚，而且随着TV的南下，省营一百八十七个工厂，全省的蚕丝、土敏土、纺织、糖业等企业都落这宋记的垄断之下，侨资的独立经营无插足余地，除非把资本投向宋记的口袋里去。譬如去年美国华侨司徒美堂曾经准备在广州投资包办全市汽车业，但目前看见的不是什么侨资兴办的公司，而是宋记嫡系郑芷湘出面集款百万元港元，购定新车百辆的全市计程汽车公司（四月二日《国民日报》）。正因为蒋宋政府的日即崩溃与信用彻底破产，美商侨商的资本骗取不到，于是他的“经建”方案得不到丝毫其他正常的新兴工商业的掩护，终于得不到暴露出他的瘦骨嶙嶙的“军建”的血腥真相来了。

然而，即使宋子文的“经建”仅只缩小到剩下“军建”这一面，从全面“军建”缩小到只搞一些港口和主要交通线这一点，依然是成效稀微，无济于事。依照TV宋“军建”的中心意图“使粤省成为一个工业及交通的中枢”，就是说，使广东成为美援的码头和输送的中枢，成为美国侵略和控制华南的中枢，那末，除外别的港口公路网不说，最少须得搞好黄埔港，黄埔大道和粤汉铁路，或者更完整些更须得搞好广州内港，珠江水道和连接粤汉广三路的西南铁桥，经费怎样解决呢？根据官方最底的预算数字，完成黄埔要六千万美元，粤汉路包括必需筑好的九十二座钢樑正桥，十一座便桥（全线共一四〇座，抗战时被毁一〇三座），更换五百四十二公里的铁轨和九十万根枕木，增添一倍以上的车卡等等，一共需要四千

一百万美元；狗牙洞支线要二千四百余亿元；珠江内港要七百万美元；西南大铁桥要七百万美元，依此计算，即使撤开广州内港，西南大铁桥，甚至供给煤运的狗牙洞支线都不算，只算黄埔港和粤汉路两项，起码工程费便达一万零一亿美元，即比从美援四亿六千万美元中指定拨出的华南建设经费六千万美元超出四千一百万美元，现在宋子文连清丈沙田的经费，都是以沙田收益做抵押，去向四行借二千亿元来做本钱，“军建”当然百分之百要靠从南京分来的这一杯羹了。但即此经过蒋朝专使赴美长期叩头，并经美反动派竭力活动调解才得在国会通过的这四亿六千万美元借款，一次也只能供蒋朝花费不上一个月。所以宋子文项下的这个六千万美元经过二月上京向蒋求救力争不得要领，弄到黄埔港现得的只有价值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器材，TV宋红着脖子限令四月一号要码头“落成”，但至今仍未见分晓，乃至黄埔大道一小段公路也未全部竣工；粤汉增修云云，尽管牛皮吹得怎样响，距离实现还是遥遥无期。被蒋宋看成南方政局的定心丸、看成他讹捧嚇诈的主要本钱的“军建”真相原来如此，无怪宋子文的口气，从“六个月有成效”，变成“不可求急功近效”。上月到广西求救时又变成“兄弟实在是感到无限的伤悼”了。任何相信宋子文的“气魄”，被宋子文的吹牛所麻醉所嚇倒的人们，这难免要被宋子文自己加以消笑的。

事实证明广东人民和反动头子宋子文的力量比赛，人民是越过了宋子文的前面。在宋子文登台的半年来，人民力量千百倍地发展壮大，蒋宋统治在广东的地面上逐渐被缩小被削弱，无数乡村市镇掌握在人民手里，遍及全省的大部的交通线控制在人民的手里；而宋子文自己恃为反动法宝的“军建”却仅只是黄埔一港，粤汉一路，也还没有全部完成。自然，宋子文“军建”的失败和洩气，并不等于他从此就不图欺騙与挣扎，相反地，他又装出一切又有办法的嚇人姿态，带领着司徒雷登和巴大维又到海南岛去鸟瞰一番，在美帝势必进一步撑持垂死的蒋政府并借此搜得更大的对蒋区的控制权，特别是南方侵略基地的正式获取的阴谋中，他不惜把广东特别把海南如台

湾一样双手奉送给他的美国亲爸，藉以达到协同“肃清”海南和南路，并获得更大美援以实现其全部“军建”计划，达成其变华南为最后反动堡垒和逃命退路妄想。可是事实既经证明而且还要继续证明这个妄想，在广东人民反对卖国，反对侵略，反对屠杀人民的罪恶设施的民族义愤与灭蒋决心之下，在广东人民坚强的打击之下，决无实现之可能，“军建”将永远无补于蒋宋的毁灭。

（原载《正报》85期，1948年4月27日）

广东财政经济概况

——财经收支及物价与金融状况

（1948年4月20日）

一、粤省财政状况

（甲）支出方面：

（1）今年三月底（按省级财政年度系由四月一日起至明年三月底止）以前，省府每月支出共需四百二十亿元，全由南京拨助。

（2）今年四月起按行政院调整公务员办法，每月支出增至八百六十亿元，南京拨助仅约六百四十亿元，每月不敷二百二十亿元。

（乙）收入方面：

（1）省税收入按规定为田赋二成，营业税及土地税等各五成。

（2）田赋所收实物，全部拨作保警、公教人员、学生等公粮，过去仅够应付，团队扩充后，就不敷供应。营业税及土地税之收入，亦仅足供临时开支之需，不能移作政费。

（丙）整顿方法：

(1) 开源方面：

(一) 提高税率：决定营业税提高起征点及改善征收办法，以往系按季征收，即第一季查定税额，第二季收款。本年首季查定税额为六百余万元，但至四月底共只征起二十亿元，故决定今后改为按月征收。土地税亦决定重估地价，提高征收率为百分之十五。

(二) 开辟行商营业税。

(三) 整理沙田：所收实物拨充保警公粮。

(四) 县市地方财政除分别提高各税(屠宰、房捐、营业牌照、使用牌照、宴席、娱乐等为地方税)税率外，决定开辟竹木、水产二种特产税。

(五) 开办自卫特捐，充作省、县自卫经费。其办法为分向法人及自然人由省府按级核定征收，税率无规定，由省、县、市府按实际需要及地方财力拟定总额之后，决定分担数额，开始征收。

(六) 清理官户，清查省营事业收入，清理债权债务，办法及内容未见。

(2) 节流方面：

(一) 裁员：五月一日起，省府裁员百分之十五，为数约一千人。

(二) 减薪：由四月起，按月递减至八成止。

二、物价与金融

(甲) 物价：

(1) 四月上半月，发生数度剧烈波动，港币由七万余元涨至最高时达十四万五千元，一个月内法币币值跌了百分之六十。

(2) 米价齐眉上米每担二百万元左右涨至最高时达五百二十万元，有一天涨了六、七十万元者，一个月内计涨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

(3) 四月二十五日以后，虽同时略呈低跌，但港币仍盘旋十二、三万元左右，米价仍盘旋于四百万元左右。

(4) 原因：报纸认为①华中战事失利影响；②京、沪游资大量南流，兴风作浪。

(5) 与今年一月比较：港币由二万六千九百元涨至十四万五千元，计涨了百分之五百四十七倍；黄金每两由八百六十五万元涨至四千八百五十万元，计涨了百分之五百六十七倍；米价每担由七十四万元涨至五百二十万元，计涨了百分之七百倍。

(乙) 金融：

(1) 游资南流：广州金融界估计，南流的游资每天至少达三千亿元，都是由京、沪、湘、鄂逃来的，现在广州游资据估计约达十万亿元。

(2) 港币流通：据估计在粤、桂等省流通数量约占港币总发行额的三分之一，其中广州又占百分之八十。计港币发行额截止去年底止，共为六亿七千四百万元，以三分之一计，即占二亿二千四百万元，广州一地占百分之八十，即为一亿七千九百余万元。

三、官僚资本南侵

(甲) 据估计，目前广州商行，外帮的占百分之五十，外商的占百分之三十，本地的占百分之二十。

(乙) 外帮中大部分是最近迁来的，如孚中公司广州办事处外(宋系)，上海实业公司广州办事处等。

(原载港《大公报》，四月二十日)

《华商报》改进刍议

——检讨《华商报》存在的问题 及改进的意见

(1948年4月23日)

张其光

一、我到《华商报》工作快要半年了，虽然有心提供一点关于改进本报的意见，但由于自己没有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的工夫，只凭多少见闻所及，藉以作为提供意见的依据。自知很不充分，所以下面所写的只为“一得之愚”有待修正：

二、“救报运动”带来的总检讨，的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指出了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并因而确定了今后的改进方针：要“群众化”和“地方化”。我觉得这个检讨的总结和改进方针的决定，完全是对的；虽然当时我还未参加工作，但根据参加工作以来所体验，许多事实在证明这“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点依然严重地存在，便可知道在过去那严重的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不能不说，“救报运动”以后在作风上的进步还是很慢的。

在大多数的会议上，我们老是听到二、三领导人的长篇大论，而且几乎都是训诲性的言词，使大家感到厌倦，其他工作人员倘即使发言，大抵都在“邀请下”或“轮流下”循例说说，而且是各说各的多。大部份参加者——尤其是那些职位较低、工作岗位较不重要的人，多半一言不发，沉闷的空气在统治着。

会议以外的工作意见交换，也常只限于二、三领导人，大部份

的工作人员是被忽视的，即有意见，也被漠视。各个工作人员各干各的，互不侵犯，也缺乏融洽协作的精神。

上级对下级缺乏认真的工作考查，也没有在平时多多接近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干事，充分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生活状况、工作状况。

下级对上级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心悦诚服地巩固和帮助他们的领导。于是，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隔膜日深，就招致工作上不能密切联系和调协一致。

检讨、批评，似乎是有的，但可惜只做到形式上的检讨和批评，而没有真正树立批评的制度，发挥批评的实际的作用，大家只从一般的或碎屑的现象作轻描淡写的“检讨与批评”而没有深探错误和缺点的根源，提出责任问题，严加纠正，从而信赏必罚。所以实质上没有批评，相互间各怀不满，闷在心上，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貌合神离。但是，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着一点共通的长处是该承认的，就是大家都有相当的责任心，工作的自觉性。就够维持今天和过去那样的状况，我看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这一点，则其散漫的程度真会达到不可救药。

我默察大部份的同事们都有工作热情，都热爱本报，他们也有着尚未发挥的力量，照理应该把本报弄得更好起来？但是，归根结蒂，由于官僚主义的作风统治着，大家无能为力。我们检察整套机构，很容易知道只有由上而下的领导，而没有真正做到“公司章程”上所载明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真正的“集中”。现在的状况变成既没有“集体领导”也没有健全“集中领导”。虽然由上而下的领导，但又不是强有力的“由上而下”的领导，这种“不上不下”的样子是造成目前（或连同过去）那种“特种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主要根源，——我说“特种的官僚主义”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由上而下”的一切命令或官僚主义，从表面看来，《华商报》似乎不大见得出官僚主义的，因为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做到应有的领导，没有经常的明确的政策和策略以至技术上的领导，

生活上、学习上的领导。许多事情既没有领导，就似乎并不见得官僚主义，而实质正存在着浓厚的官僚主义。

三、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评论方面的公式、教条、空洞，使读者对“社评”日渐不加重视，甚而不自知。新闻标题的夸张、抹杀、轻佻，使读者引起反感。新闻报道的“客里空”，语焉不详，或故事铺张，使读者降低新闻的威信。好“卖野人头”，客观上造成读者对偶像崇拜的观念，又培养了民主领袖、专家学者的“权威”而产生自高自大、轻于下笔的偏向，又使认识水准较高的读者丧失过去对民主领袖、专家学者的信仰。

“热风”和“读者版”都同样没有根据读者大众的要求，而是根据主观的“方针”，生硬地制作给读者“吃”。所以至今仅限于成为少数人所爱阅读。数月来曾经有过几次严重的错误。

关于统一战线的把握不正确，使冯、李、蔡、陈（此生）等引起大不快。

关于战争形势的把握也不够稳，过份强调了“大军渡江”，和一城一地的得失。没有正确地启示读者了解战争形势和我军战略方针。

关于土地改革的重视不够，尤其是没有充份关切到华侨工商界对土地改革的态度和要求，加以反映和解释。

关于国际形势的报道和分析不够明确和通俗，对“第三次大战”问题没有给予读者明确的了解。

关于此时此地的香港人民生活 and 意识心理等缺乏填密精确的研究，没有仔细的把握读者大众的意向。

总之，这些错误和缺点，在在显示着我们思想上、认识上的落后，对政策方针、原则立场、工作技术、工作态度都缺乏足够的修养。以致造成内容上流于教条，形式上流于八股。

在香港这个地方，应该特别重视“争取中间”、“提援落后”，因为政治认识和文化水准都一般的低。由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作祟，不管读者接受如何，反应如何，只管我说我的，我骂我的。

结果还是使工作上、业务上遭受损失——也就是政治上的损失。不少人说，《华商报》这班人“文化气太重”，苛刻一点的就是“书呆子”，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大抵大家的确没有在思想上肯定地把报纸这东西看成政治斗争的武器，组织的工具。大家在观念上，只把它的宣传任务看得重，甚至以为宣传就是其全部任务。而且，对“宣传”的认识也不完全正确，没有肯定地确立“事实”第一的老实态度。

四、对内部所形成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没有走群众路线。对外，所表现的主观主义，是由于没有群众观点。业务上、经营上的困难与失败，是由于没有依靠群众，由于内部组织生活工作制度不健全，工作表现不够好，证明主观努力不够强。客观困难是存在的，而且相当大，可是上述原因也是增加客观困难的因素。同仁们不耐强调客观困难，而没有承认这一点，是不很有益的。

要支持下去，要改进起来，对内对外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定要使大家对这个报纸关切，那末，一定要使他们把本报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社委会、董事会虽有智者，虽有对本报深有历史大有功绩的人，但只靠几个人不论怎样殚精竭力，到底于事无济。

五、枝节琐碎的问题，本来多得很多，可是一定要提及的就是关于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工作秩序、生活处理。

编辑部的工作分配有不适当的地方，有些工作人员分明对现任工作不胜任的，历久又没多大进步的，仍让他干下去，不调换一下；有些同一性质同一待遇的工作人员，其劳逸不均；或勤怠不一，上级历久不注意，不纠正，好坏勤怠一视同仁，如何使好的勤的心服，必至慢慢向坏的怠的“看齐”。工作苟且，态度傲慢，生活腐化，没人劝勉，你抢我藏；严肃一点的，只能“独善其身”。办公厅、宿舍，到处肮脏，窗子关得密不透气，小工友吵闹打趣，展声雷动，通宵高声谈话，碍人安眠。诸如此类，使认真工作、认真生活的人，大伤脑筋。红笔浆糊，永不齐备，整个编辑部，难找一把剪刀、发稿不签名，不设发稿簿，稿子失了，不知如何失法。又

诸如此类，大大妨碍了工作效率。归结起来，就是没有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散漫到极点，这是我在官式、半官式的报馆所不曾见到的。新的一套没有建立，旧的一套不去细心研究其某些优点、传统经验，学取过来。这是一个危机。

六、当今之计，要从新作全盘的深刻的检讨，彻底的改造了。大部份现有工作人员都是善良、纯正、有为、有能的。个别上级其本身本位工作也不错或者很好，但领导上的组织能力、领导技术却一般的缺乏，所以自己动手做可以好，领导别人做就成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有那长处，便自信过高，不承认集体力量。群众干部力量的合成，要比任何领导人的力量都强大，所以结果欲善不达，反而更轻视干部和群众。

整个报馆弄得不好，上下每个人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领导者们，次要责任在干部，愈下级责任愈少。所以第一要求领导者们多多反省，多多领导大家来整风。

整风的道路在：①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②养成严格批评的风气；③确定并自觉执行的纪律；④加强政治的与业务的学习。

现在的组织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可说是头重脚轻的。现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社务委员会”可算上层，这层的构成，至今我未清楚其内容，粗浅的了解，觉得他们多半与报馆日常工作隔离，以耳作眼，如何洞察真象。总方针、大计划、大问题、大事情，只有他们商量，工作人员不曾过问，不曾与闻，有很多事尚且“对内秘密”如此又如何使全体工作人员“以报为家”、“以报务为己任”地去提高积极性。这一点，大概与本报创立的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创办人只是当作“同人性”来办这报，工作人员都是雇用关系，这无形的“劳资关系”不因“民主文化事业”这一点而能完全泯灭，似乎不可不注意。今后如何要把这报纸由全体工作人员出心出力办好它，不管是这班人还是换过别班人，也一样要注视这问题，好好改正。不真正放手把这事业交到大家的手上一齐来搞好，就永远不能彻底搞好。我个人曾有过关于“群众经营的新闻

事业”的理想，写成了一个提纲——是卅三年在狱中草成的，如需要，可提出来给大家指正。

至少，除了经费问题仍由董事会或社委会权理之外，一切社务改由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作决定，这是起码的组织改造。

再一步，按照各工作单位成立小组，各组有代表联席会议，执行检讨、批评、设计、竞赛、奖惩。一个民主报馆怎可以没有民主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的工作制度？如果让同事间互相批评，自我批评，上下之间相互检讨批评，成为经常生活，又怎会不进步？领导人有了被教育的机会，他们才能领导得更好。这就会影响到全体的发展。

经过共同热烈的讨论，订立明确的纪律或公约，共同遵守，赋予领导者以随时监督执行的权力，实行集体制裁和集体奖励的严格纪律，谁不长进，谁便淘汰，公公道道，那个不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呢？

政治与业务学习，同时是小组的经常生活，不能像过去偶然开一次座谈会就算。政治学习以时事问题为主，业务学习，我主张编辑部和经理部分工合作去草写一本《新闻学大全》之类的书，各就本位工作有关的部分分章分节从事研究，以本身经验、心得及书本理论、国内外报纸作参考，由小组集体研究，计时计期完成若干章节，慢慢修正，最后交换校订，看有没有价值，才付诸出版，成为我们“理论与实际”的集体著作。这是益己利人的好事情。

有了上面这套办法，我们的作风可以改造，每个工作人员的修养也可以提高，同时谁跟得上谁跟不上，也可以清清楚楚，我不行，就滚我的蛋了，不要姑息。新来的人，要如“公司章程”所规定严格考查、试用，用了没有进步，还是要换。如此一来，人人勇于改过，勇于上进，队伍就能加强。同时，谁好谁坏，主要鉴定于大多数同人，而不是凭三、五领导人的看法，群众、集体眼睛最锐利最准确，对于不行的人，大家又要仔细了解他有何困难，我们帮助了他没有？特别是领导人要把下级的缺点看成自己该负的一部份责任。

过去，几乎什么毛病大家都说到了，指出了，承认了，也研究过根源何在。结论既然又得到了，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改进方针也确定了；要“群众化”、“地方化”。可是，事隔数月，改正不大，进步不多，群众化、地方化也还没有做得好。是何缘故呢？主要是在内部没有整顿，没有从根本上着手改造制度、纪律、作风、有以致之。所以今后着重之处，首在队伍，次在报面，因为事是人做出来的，不先整顿人的队伍，事情是无法做好的。

七、推深一层来说，如果循着现有的经营性质基础，从事整顿和改进，依然无望无效的话，这张报纸又要存在，而且发展，我认为仍有两条道路可走：

①把它成为真正群众经营的报纸，以广泛招股来把本报交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做主人，原有的股东、董事是当然股东、董事，从新向海内外大量吸收人力财力，乐捐固欢迎，出钱而要领股票来做主人的更欢迎，由新的股东大会产生新的董事会、社委会，全部人事可以调整，每个股东有一定的对本报义务、权利，他们在各地各职业部门为本报而经常尽力，广告、推销、新闻通讯、提供意见，都靠他们。这计划虽庞大，但不是不可行的。

②把它成为各民主党派共同经营的机关报，由各党派代表组织领导机构，作成合作协议，调整人事，改版出版，共同经营，须共同支持，作风就是统线的方针，也是总线的，由中共正面出来领导，各民主党派经营起来。

以上两个办法，固然可能有许多困难，但总可克服。它比目前那样既非党的，也非真正完全统线的，也非群众的经营，要“简化”一点。经营的性质是决定这个报纸的业务和做法的主要基础，这问题总值得大家考虑吧？

八、最后，对于编辑部方面我特地提点意见：

①从新考虑工作人员在工作配置上是否适当，领导者要知人善任，充分了解工作人员的能力、个性与特长，培养他们，发展他

们，千万不要勉强他们负责那些力所不逮的事情。

②把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人选条件标准提高一点，不要把这新闻工作看成“单纯的文化工作”，而要他们成为有高度的政治斗争的积极性、警觉性的坚强战士，他们不仅要作宣传员，而且要做组织者，经常同读者群众接近，把读者会扩展起来，每个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到读者小组中间去，起码就有二十多组的读者经常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一切工作就易于依靠读者群众。不合于这政治斗争的宣传兼组织任务的工作人员，要帮助他学习，鼓励他在实践中改造自己，改不来的就另作安置，不必一定留他在原来岗位上。新闻工作本身是一种群众工作，缺乏或全无群众工作的意见与能力的人，是难望他做好新闻工作的。

③某些部门的工作强度表现得不够，主要在采访课，我们需要强有力而老练的外勤记者，对人态度和对事观点都有较高的修养的人才好让他当外勤记者，因为他们经常在外间接触，关系本报的名誉威信很大。

④我们的社评、社论一定要有战斗性、教育性，而又须重视群众心理，多作客观的反映与指导，不要尽管自己判断，自己说教。

⑤专论要公开征求，不勉强专家学者写来，写了来也不要徇情滥刊。不要怕没有人投稿，不怕的。初期也许不热烈，但“打开了大门，一定有人进来”，不要只相信专家学者，不相信读者大众的潜在伟力。

⑥新闻要采精编主义，篇幅不一定要增加，但目前滥用篇幅的样子该彻底改正。采题一律照比例改小，最大只用“初号”，小至“老五”。这样，计算起来要比原来增多刊下约八分之一的字数。

⑦版面排列的呆板须改正，每个编辑多用一点心思，搞得生动活泼一点。每格中间的铅片一律可取消，既使版面干净，又使排工省工夫，对出早报有帮助，且可节省一些材料消耗，这虽是“新奇”，但仍是合理的创造。

⑧通讯网一定要建立，而且可能建立，只是没有认真的做。要

花点钱也不惜完成它。

⑨副刊——“热风”不要弄成文化人文艺之家、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园地，要与广大青年群、工人群、学生群、店员、小贩、妇女紧密连系，不要只是把“我们这一套教给他们”那样子，不要把政治性表现过强，而要从生活出发，面对生活，慢慢提高到政治认识，生活需要兴味，需要热力，需要安慰，要使读者在副刊上喘一喘气！全张报纸都硬邦邦，彻头彻尾谈政治，在水准较高的正是好事，但为了照顾多数，就要改变。应该抽出每周的二、三天独立出版“工人”、“学生”、“妇女”、“家庭”的周刊或双周刊，也是一样要做到“群众化”的，千万要把“专家化”的歪风改过来。

“群众化”起来，不免被我们周围的朋友一时不满的，他们不爱看，不紧要，因为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有别的书刊可以满足他们，千万不要“眼睛向上”，有意无意把“水准提高”。我们目前的工作，主要在普及，不是肯定的吗？

⑩“读者版”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篇幅要固定而且要扩大到可容五千字以上的版面。积极推动读者会，广泛严密，这是主要的群众工作，全体参加做去。如果真要把这一版产生它可能产生的重大作用，便该在人力配置上注意到，至少要两个人来负主要责任，一个重在对内，一个重在对外。否则只坐在编辑室来“编”，“读者版”永编不好。来信日多，每天三十至五十，平均每函二、三个问题，一天就有一百个上下问题，要答复，版面复不了，直接函复，复不了，约面谈，来客每月平均三个吧，一谈就要二、三十分钟，问题解决不了，要到外边问律师、旅行社、商店，或找书、找人，如此繁复，一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得周到的。这工作既然重要，应该加强，愈加强愈繁复，所以人力一定要加强。内部对“读者版”重视不够，据我所知，只有一、二位领导人重视的。相反的，在外间的读者却重视一点。今后要走“群众化”，“地方化”之路，对“读者版”的看法与做法都要改进。不管谁来负责主持这一版工作也同样如此。我对“读者版”的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因为

我自己的确能力不够，这工作要博学多能而有优良的品质修养的人才能做得好一些，但也要靠别的力量支持——读者、同事、朋友。

“我爱《华商报》，连同它的瑕疵”

1948年4月23日

广东之窗

(1948年4月—10月)

公共事业加价

广州公营事业自来水、电灯、自动电话等，月来加价百分之五十以上。广大路四十二号二、三楼黄宅，用电灯八盏，而三月份电费通知书上开列着七百余万元的数目，平均每一枝灯月费九十余万。用户望灯兴叹！

二十八种税

目前市民应纳税捐一共有二十八种：警捐、自治献捐、壮丁安家费、消防费、地税、土地改良物税、印花所得税、遗产税、营业税、营业牌照税、娱乐税、筵席捐、长途车日饷、手车捐、三轮车日饷、屠捐、行商税、住商税、冥镪奢侈税、出入口关税、广告税、鱼、猪、牛不入屠捐等等。市民对上述税捐虽非全部直接负担，但间接均为消费负担，物价高涨与此有关。

蒋像没有人要

日来广州“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干事，携大批铜制的蒋介石半身像向各大机关公司推销，每个收费三百万元，声明所得款项是作为“劳军”（？）之用的。此事引起商家反感，认为是“强迫派捐”。

（按这与上海蒋像滞销，先后辉映。蒋朝中央印刷厂向美定制

蒋某照片六十万张，质料十分精美，在沪向中华书局等处照原印费六折批发，但要先收钱。老板坚决地回答：早几年就是六百万张也有把握销，眼前只愿寄卖，不能先付钱）。

农民逃赋新法

中山县三区农民自发抗纳田赋，在该区田粮办事处催收员何锡被打死后，农民在附近山头设瞭望哨，每天轮流派人守望，发见催征人员到来便放哨号，农民逃走一空。

八折薪也领不到

宋省府财政罗掘计穷，除将公务员不断裁减外，现存人员两月来八折支薪。财厅负责人对记者公开说：粤省府全部经费，百分之九十靠中央补助，但省府本年上半年度预算，中央迄未核准，公教人员生活整调待遇所需，中央也未拨到分文，我们有什么办法？

《国民日报》供认道：“穗市年来堕胎炽盛，据一般警政人员估计，月达百余，多为公务人员。”

兵贩子和兵市场

TV宋搜掠全省壮丁去当砲灰，于是“兵贩”成为一种新的经纪业。台新恩开四邑一带，经常有兵贩经纪二百余人，活跃于广州与各县之间，和广州市内的“地下募兵组织”直接联络，押运“兵猪仔”。其猎取壮丁办法计有：（一）以介绍职业为词，诱骗到城市来；（二）利用特权诬陷及龄壮丁，说是“奸匪间谍”，拘系起来；（三）伪冒某某志愿兵报到处，公开招募被生活煎熬的青年。

“兵猪仔”的身价，四会一带已由千多万涨至四千万。东莞石龙一带，则以实物计算，黑市暗盘要谷八担，连佣（手续费）要十担。出钱雇代的人家，立刻破产。

“总统”涨风

“庆祝总统”的鞭炮声中，广州港币由十二万四千突破十四万

大关，黄金由三千六百五十万突破四千万，美钞由六十五万突破七十万。米价则由五百万赶上六百万，突破全国纪录。
(4月28日——这是1948年《正报》发表《广东之窗》的月、日。
下同——编者)

一口饭四百元

照四月二十二日的市价，广州万元可籼米市秤三两八钱左右，一位记者用精细厘戥计算结果，每百元蒋币结果可得完整白米四十四颗，半粒或小粒之白米共六十四颗，尚以两小当一粒计算，共得白米七十六颗。每颗白米值蒋币一元三角一分。照普通人一口饭一钱米计算，每一啖饭值蒋币四百元。若与往昔承平时代相比，今天的米的确等于珍珠。

在饿莩群中练兵

四月二十九的《大公报》说道：韶关米价高至五百六十万，贫民叫苦连天，街头每日均发现饿莩，西厢每日有数十男女结队同赴山岗采挖草根、树皮充饥，体魄强者已变了弱，弱者则生病而死。

高喊“使广东老百姓人人有饭吃”的TV宋则定韶关为练兵基地之一，运到饿莩群去的不是米，而是美国枪炮。

砍断指头不当蒋兵

广东军管区四月二十三开会，说今年抓兵只抓到万多人，只及预定一二成而已。于是抓得更惨了。四月二十四日的《大公报》说：东莞第四区石马乡民刘亚保，家有一妻两子，靠捕鱼渡日，听说县府派员来抽壮丁，急得团团乱转，心头一横拿出菜刀砍掉半只食指，顿时血流如注，晕倒在地上。

还要更“古怪”些

四月十八日郁南桂河乡乡长卢銮壩率领乡公所内职员和一部分

乡民起义抗暴，破了谷仓，把赋谷一千五百余石挑光，并把警察分驻所内的枪弹缴清。

四月二十四宋省府的《华南日报》发表这新闻时标题道：“郁南有点古怪了”。妙在“古怪”二字。整个广东都未免“有点古怪”了呀！

地方公务员反饥饿

曲江县政府公务员因四月份米贴一粒未发，生活无法维持，一部份在县府开膳的也被停止。众人愤怒之下，联合向专署、县长、县党部、县参议会请愿，要求蒋府恢复发给六市斗的公粮实物，并提出公开清算历来克扣津米的粮科和稽征处帐目。老蒋基层政权的员工也都迫于无奈群起进行反饥饿运动了。

蒋警营游击队守布告

中山县某区署接到游击队的信，声明如果在它辖内的减租息布告被撕掉，则唯警署是问云云。这一来，减租布告的旁边经常站着一位上了刺刀的警兵。这样对两方面都有话说：“我们把住不准人看呀！”对上级说：“我们怕你们的布告被人撕下来呀！”对人民部队说。（5月1日）

县长实际是镇长

据《星岛日报》记者实地视察的报告，他发见这一座杀人王张光琼的第四区清剿总部所在地的惠阳一片风景，他说：“司令台的县府周身已经麻痹了。基层的工作也跟着麻痹起来。据说全县五十四乡镇中，健全坚固能受完全控制的不过二十乡镇”。“政府的力量慢慢地退化了，心脏虽然无恙，四肢却运用不灵，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所以有些绅商用幽默的口吻说：“如果练县长再不到各乡镇巡视去，他会从县长降为镇长了。”（四月九日《星岛日报》）

潘宜代替了雷诺

阿拉碰到雷诺，国舅又碰着潘宜。“经建”大业实在经不起美国商人的讽刺。“潘宜公司于去年四月在前省主席罗卓英任内商订投资华南经建合约后，瞬经年余，照合约规定，如一年后仍未履行，合约即行取消，现逾限约一月，该潘宜仍无履行迹象”。这一回急得建设厅老羞成怒地对该公司副董事长李仲生粗口质问说：“贵公司拖泥带水，不特害了贵公司，同时也拖累了建设厅！”（五月二日《国民日报》）。

但此种现象原来却给宋子文自己的预言料中了的，“治安无办法，则一切无办法”，美商不肯上当非无因也。

“绅士还乡运动”

一个到过广东解放区的官方记者说：“经过了分谷、分田、献枪的教训，各县稍有资产的士绅们或乡保长多秘密逃走出来，集中在惠州城里。各乡失去这类中心人物，抗匪运动便无法领导起来，更便利共党对农村的控制。”因此，他主张“绅士还乡运动是绥靖的要目。”

事实上，在人民部队依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平处理之下，不是死硬派的多数地主们并无需害怕，所以“秘密逃走”者，主要是避免足以使自己倾家荡产的“清剿经费”的“献捐”。

反动的父亲杀死进步的女儿

南路梅茂县（新设的）“剿匪保乡委员会”委员欧筱裳，其次女欧秀容思想进步，曾参加人民解放工作，四月十九日欧女士回家，其父恐防受人嫌疑，将她扭交县府，当被县警开枪击死。（据四月二十八《星岛日报》）

欧筱裳用他的罪行教示青年朋友们，在压迫者与反压迫者的阶级斗争中，家庭血统的感情是靠不住的。

銜隆来粵

前任暹罗国务总理銜隆，继保大爪牙阮海臣之后，四月二十九日到了广州。TV宋“即晚举行了一规模盛大之宴会，招待其贵宾。政府各机关首长及若干外国领事均被邀作陪”。（五月一日《新生报》）。一般人推测这与蒋宋阴谋组织东南亚反共集团有关。事实上，暹罗法西斯小丑的螳臂岂能有补于“南宋”的崩塌，不过当此宋财神财竭神昏的境况，想向这富有柴米的近邻骗点军粮和铁路枕木，倒是真情。（5月8日）

“水、旱、蝗、宋”宋记“修围”的叫声未完，曲江老猓水库，三日被雨水冲激崩垮，“附近刘黄两姓村落尽成泽国，禾田被淹三千余亩，灾民无家可归者达万余人”（《广东日报》）。其他地方如潮州的潮、澄、揭一带入春以后苦旱，咸潮倒灌，三分之一的耕地已无法耕种；上月尾以来则大雨成灾，潮、澄、揭一带蕃薯尽被浸死；潮揭一方面并且蝗虫丛生，成群为患，新插秧苗，多被咬坏（见四月五日《大公报》）。加上宋子文的三征，全广东人民正处在“水、旱、蝗、宋”四灾交迫之中。

宝安保警中队起义“驻防宝安乌石岩圩内的保安第二中队，于上月十四晚叛变，杀了中队长陈德甫，及伤毙队员十余名，集缴全中队武器，抗入共产党去了。”（五月七日《大公报》）。“南宋”仅有一点保安团队，频频兵变，越来越多，财神最近体重连减了五磅（四月廿八《新生报》）实在事出有因。

兵贩子到香港，壮丁市场正入于旺月，特别是四邑一带，求过于供，于是兵贩子们竟涉足到香港来了。“买主均为衣裳楚楚的中年人，遇有状类失业而流连街头者，若辈则鼓其如簧之舌，向之游说”。条件是“五百元之安家费，沿途之费用饮食，均由买主负责”。（港报）

郁南镇长被迫造反 西江要埠的都城镇镇长吴耀枢，因积欠

兵粮，无法交出，愤恨县府抓兵括粮的诛求无厌，四月十八日率同职员民众挟轻械二挺，步枪六十余枝，起义投降人民武装。四月廿九日的《国民日报》透露这个新闻之后，对吴镇长这次义举，大骂“荒谬”。

“四方头”也喊无钱，宋子文对广西确在想法子扶助，使之成为“南宋”右翼，但钱却不易满足黄旭初的最低要求。黄于五月六日返桂前，对广州记者说，他遵宋的“暗示”，已把地方保安团队由四团扩为五团，经费弹械由中央拨助。接着便大诉苦情：去年省库不敷，中央议拨助八十亿元，今年上半年预算已定，但南京助额未有消息。言下大有失望之意。

罗定自卫队掉转枪头 继都城镇长吴耀枢率众起义后，罗定又有两个自卫中队造反，这是四月三十日的事。“罗定县府获悉有土匪在泗沦八十里外潜伏，县府即派自卫队两个中队往剿，不料这些自卫中队在行军中途就“掉转了枪”。（五月六日《星岛报》）

“掉转枪”，这对宋子文的“增编”工作，未免又是一场“最痛心的伤悼”。

TV宋一搵难忘 五月十二日的《国民日报》肯定地报道：“用以解决粤省煤荒之粤汉路狗牙洞支线，原定于本月一日开始兴筑，现以若干问题尚待考虑，故仍须稍延时日始行着手”。但宋子文在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是：“行将兴筑竣工”。TV宋给事实搵这一巴掌，实在够受。（5月15日）

学生连坐法

广州市教育部长祝秀侠，十三日召集全市中小学校长，宣布各校于五月底以前，应照“联保连坐办法”，填委员生名册呈缴该局，以防“奸匪”混入云云。

这是扩大学生杀戮网，过去杀一个只是一个，今后杀一个可以“连”他几个。

罚到你停业

广州直接税局开征三十七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因商情惨淡，缴者寥寥，现在实行前所未有的罚钱办法：过期十日内缴款者处以百分之二十罚款，过期二十日内者处罚百分之五十，过期三十日内者罚一倍，过期四十日者罚二倍，过期超过四十日者罚三倍，并停止其营业（五月十七《华侨报》）。

重罚至于停业，为的是“以裕库收”这一件。

地下公文

粤省府为了“避免共军检查耳目”，最近一切下行公文，多改写为寄××街××号××先生收之普通函件，而不敢冠以收件机关之官衔，叫做“地下递寄”。据说现在海南岛除琼山文昌两县外，其余十四县都用此种办法。

从来官府文书就是最公开最威风凛凛的，如今却要避免人民的耳目，实行“地下递寄”，确是一件历史的珍闻。

“上山联保”

各地都是实行“五家联保”的办法，五家中一人参加人民部队，则其余四家遭受株连。盖欲“以死惧之”也。但结果相反，据佛冈熟友来言，那里的乡民们大家相约：“谁若欲上山，应通传其他各家，一同动作”。所以那里现在每每发生五家同时投向人民部队的事实出现。（5月22日）

“王大夫”南来

TV宋由于粤局难搞，连自己的肉身也“轻了五磅”（港报），这回第三次上京讨救，蒋世凯的回答是御赐他一位太医王凤岗，先TV而飞广州，忙急地替“南宋”按脉救急。王凤岗是河北

省第十区行政专员，据说在他辖区内实行他向八路“学”来的一套去对付八路，除了能够采用“流动战略”之外，曾经“实行土革”能够“掌握民众武力”总之是“向他的对手学习过来之后，再双手回敬过去”云云（见五月二十五日《国民日报》）。

蒋宋之势穷计尽，至于拿王凤岗其人当救急的法宝来用，其效果如何，《国民日报》自己已经看清楚了：“桔过淮为枳，他离开了人地时三者皆宜的河北第十区，就会没有办法，试问他这种办法，能不能行诸广东？它还给TV宋自白一番衷情：“这好比一个病人，当奇难什病一齐发作，中西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王凤岗忽然以青草医生的姿态，用着他自制的膏丹丸散，把这病医好了，怎不叫人欢喜，今天广东治安上的毛病还有许多，打针服药均未见效的时候，请这个王大夫来诊视诊视，也是好的。”

抓丁与人荒

粤南师管区司令林英在海南抓兵特别紧，壮丁被迫逃亡，以文昌人逃亡最多，次为琼东、乐会、琼山等县。澄、临、儋、崖的老百姓则拚命逃向山里。“全岛二百四十万的人口，经过这种不断的大流动，结果便造成一般乡村有田没有人耕，有屋没有人住的荒凉景象。”（五月十八日《大公报》）

“总体战”

羊城小蒋于兵事惨败中，颇善于叫出吓人的口号，“我乃燕人赵翼德是也！”企图以此吓退武装的广东人民的进攻。前些时候东江紧急，从何彤的嘴裏叫道：“宋主席”将获得美国的直升飞机，用来杀灭山地的“土匪”！如今连中区都危急了，宋营里则齐喊“总体战”了。好吓人的名词啊——总体战！

在这里我们不妨查一查“词源”吧。当去年四月南路人民武装打得厉害时，张发奎、罗卓英发布了“党政军指挥一元化”的办法，一些官报把它叫做“总力战”。但结果“总力”始终没有表演

出来，只看见南路伪指挥官林英和副保安司令韦镇福的互相掣肘反而更甚，连南路士绅都怕官方筹款和危险，都纷纷逃入城市，急得林英大属自己的一伙是“视乡事如秦越”！今天广东全局的吃紧超过当时南路一角，“总力战”已叫旧了，来个“总体战”还更富于广告性些吧，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人力结合是破产了，换上一个“精锐员兵”（指每个清剿区在新编中的独立营）、“新式弹械”（如直升飞机之类）、“海军舰艇”（最近多了四条内河炮艇）三位一体的物力结合（见五月二十五《国民日报》），会更加厉害些吧？人力垮了，物力还顶得起什么呢？何况那些物件还有待于美帝的赐给呢？“总力战”的计划，去年被南路人民打得变成屁，“总体战”这另一计划，等一等也一定要在人民的全面出击中变成屁的。

演剧养官

宋记各县财粮枯竭，连官僚机关所赖以“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陷于“穷饿散”的三部曲中。惠阳县级公务员的待遇，最高月薪不到二百万元，最低不过七十余万。目前米百斤七一六万元，七十余万的薪俸只够买十斤米。公务人等“感到啼笑皆非”（五月七日《大公报》）。中山县县级高级职员连公粮在内还不过五百万元，等于港币三十元（五月二日《大公报》）。曲江县级公务员，因县府取消搭膳，饥饿的他们群起责问，几乎闹出乱子。杨县长别出心裁，商请前锋剧社假座醒群戏院，自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一连两晚公演筹款，作为公务员救肚之用。（五月二日《大公报》）（5月29日）

炮艇射杀堤工

潦水在涨，各处堤围民众为了活命抢修。南海第四区升安围去年灾情惨重，附近上滘村梁黎各姓群众，本月二十日上午七时许，正忙于从事堤工，突有一区清剿部巡河炮艇经此，“目睹基围农民

成集，遂即广集机枪扫射，各堤工人员一时走避不及，结果当场击毙堤工一名，重伤三名。”堤工们在“极度悲愤”之下，为了安全，多不愿再往工作。（五月二十六日《华侨日报》）

蒋军去年在河汛区经常从飞机开机枪射杀筑堤民工，TV宋则从炮艇来扫射。

王凤岗的收场

被党报宣传做“剿匪英雄”的药渣王凤岗，“南宋”群官的吹捧使他得意忘形，大献其抗共法宝，二十六日在行辕吹牛时，至于“汗珠淋漓”，“先脱帽子，后卸军装，仅穿一件内衣”（二十八星岛）。然而结果引起宋官们的冷消热讽，表示怀疑和憎恶。特别他的“先行平均做官的田”和“任用年青人”这两条最激起他们的恼怒，认为前者“过份刺激”，后者则“与政府重用地方耆宿之宗旨相背驰。”盖若照王之办法，则他们自己家里就有“失地”之险；若果让三十岁以下的年青小伙子被“任用”，自身便“有得捞”矣。王凤岗来时赫赫，去时仅几名向来报上无名的人员送机，原因就在这里。

夏日乐园

中山大学的学生们，近来动员全校八百多人，开辟“洞庭湖”游泳池。靠大家的双手建设个“夏日乐园”来散散闷，并且借此破除读书人一向手脑分家的不良习气，是一件好事。但是学校统治者却着了慌；只因事关学生全体不便正面反对，只好从侧面阻挠：“你们霸占人家地权，妨害水利！”学生去和石碑乡联保保长董伯平交涉，他回答却是：“没有妨碍，你们安心去做好了”。学生于是一齐动手起来，六月一日泳池落成，还要选举大批“劳动英雄”呢。

反动派甚至于可以这样做好了罪名：你聚众挖池岂非“实行土改”？但是学生在群众公共福利的号召下，八百人齐动手，“夏日

乐园”终于提早完成。

梁华盛逃了回来

正当省报用头条新闻吹嘘王凤岗的时候，夹缝里露出一段寥寥几行的消息，而其实却是一樁要闻。那里说道：“东北九省保安副司令兼吉林守备司令梁华盛将军”，在尝尽东北解放军的苦头，丢吉林之后，“潜归故乡”——茂名去了。可惜这条新闻被小到很少人注意到。

有人这样说：宋子文请王凤岗按脉，其实不如就近求诊于梁华盛，盖梁之挨打经验最丰富也。（6月5日）

黄皮美军失威

七日下午六时许，黄埔中正中学学生和海军第六炮艇队士兵，发生连直二十四小时的打鬥，双方受伤多人。起因是该中学的几个学生到平岗圩买东西，经过第四基地油库时，看见两株长满芒果的芒果树，他们用石块掷树上的芒果。在旁边站岗的艇队哨兵，用国语喝令学生们停止掷石，双方语言冲突，争辩之下继之以大毆斗（见六月十六日《大公报》）。

第四基地的黄皮美军，学生哥就瞧他不起，首先予以抗击。

驻增城正果圩的蒋军离防时，不管你农忙，沿海强拉民众作“挑夫”，正在田里的农民八十余人被迫放下锄头。有的恳求蒋兵照顾一下农忙不跟他走，蒋兵就把他们拖到水里去淹，直到说愿意挑了才放他出水。（十三日《大公报》）

抢尽粮食但又不让你耕田，这就是宋子文的“增产计划”。

戡乱戡及绅士

喻英奇剿民失败，归罪士绅，十月在汕的清剿会议席上，指骂剿共不力的士绅是“骑墙分子”，而且“骑墙分子就是坏人，应当不客气向他们打击。”（十三日《大公报》）

戡乱对象今天连绅士也被包括进去了，这在历代的戡乱记录上是新的材料。

由“换”到“填”

说起更换县长的原因，开始一般是官僚派系的争夺，到后来加上“匪剿不力”这一条，现在，又加上“阵亡”这一条了。六月十日省政委员会通过撤换的六个县长中，四个是第一种原因，一个是第二种的原因（遂溪），一个是第三种原因（乐东）。第二第三种是属于非常的原因，竟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又已经不是普通的“换”，而且“填”了，遂溪梁传楷原是填阵亡的戴朝恩，现在又须再填；乐东的×××是填阵亡的韩云超。还有一个特点，“填”的人物不容易找，也不容易捱得久，把梁传楷填上去了但终于“不力”下来；韩云超的填继人则还没有人敢当，省委会的记录上只好暂时打三个×再说。（6月19日）

不走也是“附匪”

喻英奇自从喊出“不抗匪便是附匪”的经济性口号之后，果然言出“法”随，分别电令各县市局长，将託故离境士绅及乡长姓名列报，在汕头的限三天回乡，在广州香港的限十五天回乡，在上海的限二十天回乡，否则把他的家产“查封充公”。揭阳五经富的富绅曾穗南可就倒了大霉，他并不敢“託故离境”，只因上月下旬共军林震部窜至五经富时，曾氏“没有领导村民抵抗”，结果就不免被喻英奇“带到五区指挥部，直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六月十八日《大公报》）。

官兵尚且阻不住共军的“窜”，这叫曾穗南又如何“抵抗”得了呢？但无论如何曾氏的家产是逃不了喻英奇的手心了。

县参会抗拒抓丁

清远团管区派新兵中队长张则良到高平乡捉兵，激起公愤，该

乡长李求当场和张则良冲突殴打起来。团管区生怕因此引动全县的反抗，“影响役政”，自愿赔偿李乡长的医药费了事；但省参会则认为团区纵属扰民，扬言要全县各乡停送征兵。军管区和师管区派员前往调解，至今僵持不决。

抓丁暴政发展至于今日，就是乡长县参议的地方上层人物，都忍受不住了。

曾举直“直言”

所谓六区行政专员兼清剿司令曾举直，这回到省城求救，《大公报》记者问他辖区治安情形时，曾某这就的确有点“民主”作风了，他直举实情说道：“地方自卫队的组织因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如意，故难如理想。枪弹缺乏，壮丁远出南洋谋生。加以华侨不如往昔，要地方人士筹款办理自卫，实在是困难。”曾某又进一步坦白道：“当前的治安日坏，非兵力所能挽救，必须政治有办法才行。如不能改善人民日益贫困的经济生活，也就无法击破共军以分田、平仓拢络人民的作法。”（六月十七日《大公报》）

这一席话，实际上是代表广东各区的“清剿将军”说的。

蒋厕杀人

接着汕头中山公园厕所坠塌受伤多人的消息之后，二十二日《大公报》又报道说：该市福平路一座公厕，因不堪大雨侵袭，十八日晨全座突告倾塌，结果二三十个入厕者都被压坠落粪池里，有的头破血流，强有力者首先游泳生还，余者则被救起，内中有一个十二岁小学生彭子忠竟惨死粪溺中。

这小事情反映出蒋朝末叶的市政之腐败，竟至厕所也成为市民们丧命的危险地方！（6月26日）

“震怒”之下

七月五日赤坝抢米潮发生后，张瑞贵“震怒非常”下令“嗣后

如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准予开枪轰击暴徒，以靖治安。”谁料过五天后，人民军却攻进城去“搜掠”中国、中央二银行，不知张“总司令”又将怎样的“震怒”？

“医牙”

六月底粤省四次伪参议会上，陈述经提出向港政府交涉不要“窝藏”“叛国分子”的议案。参议会开幕后第三天，宋子文就飞港“医牙”。连日在浅水湾私邸秘密会商。此“牙”恐怕不容易医。

“分肥”

去年五月间，蒋府农林部拨了四万磅肥田料“施赈”给陆丰县农民，直到今年六月间，现任县长赖舜纯才通令各乡镇长到县府具领，开仓后，发觉所藏肥料已有一半不翼而飞，仅存二万一千磅。县长又提出二成充作县银行基金，三成作县府费。把余下的万零磅配由乡镇发赈。其中，甲子三乡镇可分得八千余磅，但被县府从中再扣除慰劳官兵布鞋一千五百双折合肥料一千五百磅，故实得仅七千余磅。在由县启运到甲子一段路程中，又被报销运输消耗费一千〇四十磅。剩下的六千多磅运到三乡镇时，谁被几位乡镇长和士绅“分肥”了。农民一磅也得不到。

三十六计

普宁县弥乌乡乡长张增其，因共军攻势甚烈，工作棘手，弃职逃往暹罗。当由曾县长报请司令部将其家产全部查封，“以敬效尤”云。

还有准备逃跑的区长、县长、专员、将怎么办呢？蒋、宋将来也逃到纽约去又怎么办呢？

比美南美洲

六月二十九日蒋府农林部华南视察团团员之一的“美国朋友”

薛礼文博士到海南兴奋地说：“海南岛黄金满地，农林业富有希望，如治安良好，配合开发，将来可与南美洲比美！”韩汉英听了很得意，立即向记者表示要争取多量美援，开发琼崖。他哭丧着脸说：“真的，琼崖太穷了，需要多量的美援！”这是向美国爸爸说：如果我把治安弄好，就得多给钱！

全家集体自杀

潮汕各县因受天灾人祸的侵害，旱季没有收成，农民已告绝望。纷纷逃往福州、厦门、台湾，但多举目无亲，流离失所。以致自杀事件，不断发生。七月五日，潮安城北濠竹山台水面，浮有死尸一具，附近居民前往捞起，发觉下面又连带死尸多具，都是用绳索捆绑，下面系着一个大石沉下的；又，潮安秋水乡石×头溪面，也发现水尸用绳索捆绑的男女老幼七人。

这情景诚然使人悲痛，然而人民会集体求死，也会集体求生的。（7月17日）

君嵩不睡觉

七月十五日，粤第七、八区参议员梁省常、何萃等质询黄镇球说：“当局今后对湛江市善后办法如何？能否保证今后无同样事故发生？”黄镇球答：“余已派张君嵩同志赴湛负责办理。如君嵩同志就任后，睡觉不理事者，当然要他负责。”时张君嵩亦在座，闻言立刻站起来说：“报告黄副主任，君嵩不睡觉。”

但不知张瑞贵醒未？

真是无办法得很！

七月十二日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突袭沙头角附近之溪涌后，一五四旅参谋处负责人说：“中共武装在这一带并不是军队或武装组织形式，这一带的人民，都是匪军。他们可以成日在田里耕田，在家里抱孩子，但顷刻之间，他们可以很快的集结起来。”“他只要

一放下武器，回到田里或家里，就是老百姓了，你怀疑他，一点证据也没有，真是无办法得很！”

这位一五四旅的参谋处负责人的确很坦白。就在第三天，果然又在沙角涌“无办法得很！”

“为数尚少”

省参会副议长陈述经于十八日接见本港《星岛报》记者说：“喻英奇未到任前，五区内的股匪不过三数百人，到了现在，匪已坐大，扩至一万多人。”又说“喻某驻的潮安县城，城外就是匪的世界了”。

这位新任的副参议长，本来要打喻英奇，却连带把宋子文掴了一巴掌。他竟忘记了六月底宋子文在参议会上的施政报告说：“该区的匪为数尚少……匪势已挫，自新日多。”

“蜜蜂”不吃“蜂蜜”

七月十二《新生晚报》称：“宋子文‘对于吸引华侨投资建设黄埔事，仍念念不忘！’”又黄埔市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李缘超说：“将来要将黄埔变成蜜糖来吸引蜜蜂”（华侨）

无奈“蜜蜂”不肯去上当，宋氏“几经试探”，“港侨并不热心”云。

受港币统治

根本港银行界权威人士估计：现存于银行及流通于市面之港币，约等于港币发行客之八成，其余二成，则流入华南区者为多。根据此项比例数字，则外流港币约一亿四千万。港币的控制力已深入广东农村，因为富人均以收藏港币为安全之保障。怪不得在第四次省参会上，凌维素说：“广东老百姓在表面上是受‘宋主席’统治，实际上，则受港币统治，老百姓没有‘宋主席’还能生存，但如果没有港币便不能生存了”。

涨风吹倒局长

金融管理局局长丁世祺看见广东涨风披靡（七月十二日每元港币为蒋币五十五万元。至十七日涨至八十三万元），实在是“管不了”，故此“知难而退”，电呈财政部辞职，态度“颇为坚决”云。（7月24日）

飓风所阻

张君嵩从六月起就嚷着赴任，直到二十六日才“决定”行。据七月二十六日《星岛日报》说：“渠之迟迟未成行者，是因沿海飓风所阻。”但同日《华侨日报》的星期特稿却直率地说：张君嵩为着“请兵”，迟迟未赴“镇压”。

好待遇

这次新会、三江、龙泉二乡械斗，据七月二十七日《星岛日报》通讯称：打手待遇每日发给工资港币二十元，一钱重鸦片烟，三餐饭和一餐宵夜。开火后，工资倍发，鸦片烟改发一钱重的干烟泡。传说每日双方都消耗鸦片十五斤以上。

而新会地方团队，每名每日的副食费才蒋币一万元，现在“提高”至六万元，升港币不到六分，不知团队士兵有何感想？

一物三价

五百万大钞出笼的消息传至东莞后，市场一片混乱。二十一日交易，竟有一物三价者：买美丽牌香烟一包，持十万元面额者，每包四十万元；五万元面额者五成计，须八十万元；四万二万者再五成计，须一百六十万元。

曾有人统计：瓜子一粒五百元，大便一次用纸五千元，百元国币二十张，可换卷烟纸一张，火柴每根三百元，米一粒十五元。

“济匪”

七月十六日闽粤边区在松口召开绥靖会议，是晚共军李通超部四十余人，竟出现于离松口五里的云车桥，把富商陈敬良家里守望的五支长枪拿去。于是边区总部以陈敬良有枪不报，为共军取去，当作“济匪”论，把他的家和陈广隆铺子都封闭了。（见七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其实，陈敬良也可以告涂思宗一状的：他的家离涂思宗召开“边区绥靖会议”的地方不过五里，那不是涂思宗有“纵匪”“庇匪”的嫌疑么？

又现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和粤中师管区司令温靖家，亦于月前被共军拿去长短枪数支，亦应依陈敬良例，撤职查办并查封其家产，以充“自卫经费”才是。

从“征”到“割”

粤省第一清剿区司令部为防范共军“抢割抢运”，特发动所属五邑各县地方团队，切实“护运护割”，并于必要时或勤务暇时，动员员兵收割，“以利农民”云。

从“征”到“割”，是宋子文剿民的进一步措施。

催征吏大不易为

据粤省田粮处统计：三十六年度征赋期间，给共军、歹徒枪杀、虏去或被打伤的田粮征收员共有一百三十三人，内被杀死的六十八人，被虏去的五十六人，受伤的十三人。被杀得最多的县份是陆丰，占十一人，化县九人，龙门七人，中山、钦县各六人。

从前是催征吏猛如虎，如今《大公报》叹曰：“催征吏大不易为”！岂民众都变成武松欤？（8月1日）

吓呆了便抢

广州市长欧阳驹和宋子文商定，在所谓新币发行后稳定物价的计划中，采取非常办法进行。办法包括有：（一）经常派出经济警察，随时随地检查各商号行庄帐目。（二）扑灭黑市金融活动，一行发觉炒友，立即拘返严办，或处死刑。

到头只能用“死”字吓人，吓呆了便动手抢。

税捐增加五倍

广州九月份起全部税捐改征金圆，全部税额为一百万元。按八月份市府税捐总额五千亿元，如改征百万金圆共达三万亿，比原额增加五倍。（八月二十六日《华侨报》）

老眼看分明，蒋券发出后还可巨量增加税捐。

帆布袋还有销路

抗战结束后，由香港向广州的货物中，新旧帆布经常获利百分之八十，成为走私一大目标。帆布的主要销场是做大型旅行袋，商家买去装蒋币，阔气的用新帆布袋，节省的用旧帆布袋。日下改行金圆券了，内地皮具商纷纷向香港采购大批羊珠皮、拉链和胶片去做银皮包应市，准备顾客们买回去装金圆券。（八月三十一日《华侨报》）

这一来，各地往时大好生意的帆布旅行袋老板大受淘汰，皮具业商人则喜气洋洋。

寄语皮具商且莫得意，帆布袋还会跟着金券的惨跌而畅销的。

“欲归不得”

抗战期间因地方沦陷，侨汇断绝，特别是民三十二年的大饥荒，潮州人逃难入江西者不下百万。目前因旅费无着，滞留赣江两岸者尚有十余万人。江西当局不独不帮助邻省难民回乡，而且陆续

捉去当兵，横加欺虐，南昌广东同乡会一再交涉无效。（八月三十《星岛报》）

反动政府是连互助邻封的一点人情都绝灭了。

“查户口”刺死学生

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海珠中路八十四号四楼，被三个穿警服穿中山装的凶汉闯入，藉口查户口撬开门户，枪刀齐下，把越山中学高中一年级女学生黄锦美杀死了。（省港各报）

蒋朝的法律，是包括了查户口可以杀人这一条在内的。

监狱关不住囚徒

广州地方法院看守所囚徒骚动之后，新会法院囚徒又暴动逃亡。事情发生在二十四日深夜，百余囚徒击杀看守员兵，并夺去枪枝和狱内财物，一百一十一人自己开释自己。

这事件将蔓延开去的，监狱虽多，其如关不住人何！（9月4日）

血账赖不脱

九月三日的广九车出轨惨案，宋帮原来打算乘机发动个“嫁罪”的造谣攻势，以推卸责任。但可惜事实太分明了，捏造很难见效。因此宋帮内部有些人也说出实话来。建设左长谢文龙亲自查裁结果，对记者说道：“所云奸匪拔去鱼尾板及路钉亦无从证明”，而且“白昼为我车追剿时间，奸匪仅能于夜间活动，而此次肇事则在日间者”。（九月七日《星岛日报》）。十日，省参议会和国大代表联谊会代表团，实地察看后，列举三项理由，否定“拔钉”，指出“出轨原因，系速率过高所致。”（十三日《大公报》）并对粤汉路局说：“对于失事责任，不愿再事推诿。”（十三日《星岛报》）。

这真气煞宋子文，嫁罪之计不成，血账照旧贴紧在自己的额上。

广三路又出轨

据十一《大光报》载：十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广三路第六十次快车，由佛山满载客货开来广州，距甫驶至三里三，将抵横滘车站时，客车四辆突然出轨，损害详情还未清楚。

广九车、广武车、广三车，十天内都发生惨案。蒋区路车，实际上变成商旅的陷阱了。

台湾抓紧了福建

蒋朝为了出卖福建，早就献出漳浦、古田等地的铝矿给美办的台湾铝业公司。去年被攫去的铝就达一万吨之巨。七月雷诺公司又探采金门岛，说那里铝矿质量较漳浦还要优良，并且指出闽粤沿海还有其他地方藏有更多铝矿。（十三日《西南日报》）

单从采铝看来，实际为美国所管辖的台湾，已渡海紧抓着福建了。

自筹自足

宋子文为了搞起更大的地方恶霸武装以保卫四大家族，于是所谓“自卫团队经费”便成问题，而南京补助的诺言有诺无实，最近并且宣布从用金圆券后，“地方财政应自筹自足”，故到底又是向人民身上勒索。宋伪府已经决定的办法是：各县土地税附加一倍征收，契税及屠宰捐则附加百分之五十。

但南宋到如今正如林则徐的奏议说的：“不独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练之兵”。

穗警局自认“为非作歹”

早已成为抢劫世界的广州市，七日晚中华中路的鸿利钟表店被抢，又在警匪枪战中打死一个店员。事后警察局指出这敢于顽强枪战的劫匪原来是警备司令部报队的老弟兄们，以致黎铁汉要警备

部“将已解散的谍报队的名册和相片交与警局参考”。但警备部也反过来执警察局的痛脚，“在有一次的党政军的联席会议上，警备部方面的人又说有些抢劫是警探队的人做的。”警局方面结果也只得承认：“在某一时期，有些引线人确曾为非作歹”。（十三日《大公报》）。

多谢他们有了这回互相指摘，证实警备部也好，警察局也好，原来是广州市抢劫的参与者。（9月18日）

宋后炮

“改币前夕调用公款套购港币之广州隐名人士，闻为宋子文，各方极为震惊”。

这是南京的消息（十月七日《文汇报》）。和CC监委对宋记六架直升飞机提出弹劾，说是“擅辟机场，侵越国防部权限，破坏革命体制”，一样是宋最切齿的。宋虽硬嘴说“不怕攻击”，但毕竟是正朝着自己宝座的砲声，在他一周年庆功纪念中听来，的确不免感情上要“激动”一番。

不准乱检

老宋在自己主持的经济管制督导处之下，设个专检别人的“经济检查队”。高信却在陈立夫指示下搞起个“经济调查队”，要用协助经管之名而专检宋系财宝，这着实叫“国舅”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在六日宋主持的经督处、物价审议会，物资调节会三机关的联合工作会报上，宋督导咬紧牙关挤出下面一项最要紧的总指示：“非法定机关，绝对不得有此越权检查情事”。

周岁后的粤宋，要碰的钉子还多着呢！

“老虎仔”又捩耳光

六日黄镇球在省参会驻委会报告七、八、九三个月粤省治安情形，说“毙伤俘匪达一万名”之后，驻参们纷纷提出质问，尤其第四五

区议员问得更周到。海陆丰议员张诚说：“海陆丰匪情猖獗，平原地带之赤西等地均被匪占，大安洞且设有训练班，远近学生且有闻讯赴训者”。潮汕参议员方书彪报告则称：“惠来县只得空城一个；潮阳、澄海、饶平等县均有发生毛匪缴械勒谷等情事，该区除汕头市及南澳区较为清静外，余皆匪势逐渐扩大”。

只此一端的“补充”，就又把黄镇球的荒唐报告掴一个响亮的耳光。

未打先移营

十月七日《大光报》载：“闽粤边区剿匪总部，原设松口，决月中迁移潮安办公，并于松口设指挥所，由莫副总指挥希德兼松口指挥所主任。”

喻某升官还不到满月，眼看势头不对，快点儿收缩到潮安平原，以其紧急时较易逃命也。

“只有想想”

粤省府三十七年度下半年支出的总预算是一千七百万金圆。其中的保警经费呢？南京的规定是一百万金圆，编入省府总预算则增至四百余万，而实际保警处自己的预算则是一千四百万金圆，占省府支出总数百分之八十。

收入来源呢？本来三十七年度田赋附收积谷每亩一斗五升，即系补助保警经费预算，总额为八十七万市担，其中除去运耗仓耗等（其中四十余万市担系折征金圆），一共伸金圆约一百万。相抵后缺额为一千三百余万金圆。

物价波涨中，结果这一千四百万还是不敷。新闻记者问财政厅长胡善恒这钱如何筹法？胡说“只有想想”。又说：“财政厅是天天在伤脑筋中渡过”（十月八日《华侨报》）。

小诸葛干吗？

九月三十日，白崇禧到桂林，停留两天才又飞走。表露出来的行

迹是：巡视环湖边正修筑的私邸，出席地方行政会议，大谈总体战。是在准备后路。也妄想再走老路。但在今天的广西，老路是断了，后路也不可靠了。结果吃几顿桂林米粉倒还实际些。（10月16日）

拒用金圆券

币改雷厉风行了一个多月以后，内地还是没有普遍通行。例如东江博罗，除县府税收改以金圆券为标准外，商场交易照旧还是以法币为本位。有人从别处带来的五元或十元的金圆券，在县境行便，多被推说：无款找续。茶楼酒馆竟有公然贴上：“金圆券交易，过半找续”。手持蒋券的人都摇头叹气：带金饭碗当乞儿，真系倒运！

“今年完”

“金圆券”一出场就大踏步前进，老百姓个个恨透了。在上海，被称为“真完券”，在广州被称为“今完券”在客家地区则叫“今年见”。意即今年就完蛋，明年不得再见也。

这都是群众的预言和结论。

“难办得很”

据十月十九日《大公报》消息：“各县地方团队待遇，队兵每月给饷国币四十五万元，折合金圆券仅为一角五分。”虽然粤省伪保安司令部已通令各县政府从速提高自卫队的待遇。同时在九月下旬，宋子文也已派遣了九个什么督导组分赴各区切实督导，然而据来穗述职请示的县长们说：“各县自卫队粮械都甚感缺乏，地方自筹困难重重。提高自卫队待遇，除了增加人民负担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言下都表示：“难办得很！”

如要停车，乃可“经建”

十月十九《华侨日报》载：“海南岛路局亏本百余万元，在粤

汉铁路局各线均入不敷支，自顾不暇之际，对该铁路之悲况仅予同情而不能有所补助，杜局长镇远迫得下令该铁路由本月十日起办理结束，全部员工设法就地疏散。”

宋子文正拉住中美合作署署长克利夫兰和驻华副署长葛里芬，再吹“经建”，但这长仅一百八十公里的海南铁路，即在国庆日“执笠”了。（10月23日）

坚决执行正确方针

（1948年5月1日《正报》社论）

广东人民在过去一年胜利斗争的基础上，确立了放手发展、相机进攻的向前奋斗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我们要争取今天对宋子文作力量发展竞赛的胜利，同时打下明天彻底击败宋子文的基础。今天的任务，在于坚强有力的粉碎美蒋企图变华南为反动最后基地的军事政治阴谋，以便明天最后葬送革命敌人到坟墓去。今天的任务，还在于积极努力的建立广东人民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配合全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战备进攻，以便明天与南下大军一道实现华南人民的彻底解放。坚决执行这个明智果断、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广东人民的斗争就必然获得应有的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由于它是有着过去一年来斗争的胜利成果做基础的。革命武装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其活动范围由点联成线，由线扩大成为面，又由各地单独活动到互相联系配合，逐渐打成一片；同时群众斗争从掩蔽方式转变到直接革命行动，这些就是过去一年的斗争成绩，人民的方针之确立即以此为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而突然提出上述方针，则这个方针就不过是空谈；如果目前有了这样的基础，却不敢提出这个方针，便只有让斗争停留在原来状态上，不能踏前一步了。

这个方针之所以正确，还由于它恰当地规定着我们进一步展开斗争的可能和应该提高的程度。革命斗争应该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但什么时机提到怎样的高度，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敌、友、我情况的估计与群众可能接受的程度。不懂得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落在客观实际的后头，错失时机，便犯了错误；不懂得有步骤的提高，不懂得在人民解放的总目的之下今天为了什么，明天又为了什么，与两者的区别和连系，而过高，过急，过早的提高，也要犯错误。过犹不及，都是不对的。而如同我们上举今天的目的与明天的目的，则我们可以坚决肯定：以过去的胜利作基础，加上正确的主观努力，我们完全能够达到我们当前所指望的目标。

这个方针之所以是正确的，更由于我们清醒的知道：敌人正在做着最大限度的挣扎，如果忽视或过低估计他们这种努力，轻视了敌人，把斗争前途看成全无阻力，那是错误的；但如果过高估计敌人，把他们的主观意图当作既成事实，徒然吓怕了自己，那就更加错误。敌人企图虽大，困难极多，半年以来，成绩很小。今天敌人仍在继续挣扎，美帝的侵略活动也更积极，对宋子文的撑腰自有若干加强，但离开可能发动对人民全面进攻的条件还很远。我们对于敌人的这种挣扎，是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战斗进攻的方针，把它全部或大部打破，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使自己立于坚强的地位；如果相反，坐视敌人的准备或误认敌人的准备已经完成，而自己先泄了气，只作消极的防御的准备，则敌人的挣扎将必获得比较顺利的结果，而我们自己就要被迫处于困难的地位。

这个方针，是在原有胜利基础上走向更大胜利的指南。广东三千万人民都将以坚决奋斗的精神，求其贯彻；人民的先锋队队伍更须坚定不移地掌握这个方针，引导人民群众走上胜利的大道！

敢于胜利的坚定思想以及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乃是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正确方针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对于我们所以特别重要，就因为我们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独立作战环境，对全局形势发展变化的了解比较缺乏，容易因敌之夸大宣传（蒋宋正在使用这一

手），而受其欺骗失却信心；加上二十多年来我们南方游击战争曾遭受多次挫折，干部精神易受拘束，所以懦弱无能的思想易于抬头，敢于胜利的精神时常欠缺，审慎往往成为犹豫，斗争容易陷于保守。而我们现在既处于全国规模的革命战争到达转折点以后，又处于广东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的时期，要向广东人民负起胜利之责，我们就必须在精神上来一次大解放，把革命气概大大昂扬起来，以充沛的胜利信心，领导人民勇往前进。

另一方面，坚定贯彻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又是与周密了解情况，灵活决定办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艰苦严肃的工作分不开的。因为斗争环境变化复杂，工作发展有不平衡：何时何地应该坚决进攻，何时何地应该暂作防守，何时发展，何时巩固；何地发展，何地巩固，什么情况可以实行土改建立政权，什么情况又应暂时采用较低的过渡的斗争形式；所有这些都不得依据教条公式办事，而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一时一地的具体做法，必须服从总的方针；但总的方针，又不可能代替一时一地的具体做法。因此，必须严肃谨慎，戒骄戒躁，实事求是，精勤学习，时时刻刻都要开动思想机器。毛主席说，我们需要明智的将军，不需要盲冲瞎撞的鲁莽家，就是如此。

为了贯通思想，下面几个问题还必须弄清。

首先说人们最关心的渡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楚，就容易产生对于执行正确方针的不坚定性。我们晓得，解放军渡江南下是战局发展的必然规律，是解放军在目前战场上全面进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必然结果，这是完全对的。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革命必然走向全国胜利的前途；认识这一点，对南方的斗争就能产生极大的鼓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斗争之胜利是寄托于渡江；要是那样，就完全不对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就存在着那种情绪，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在认识渡江的必然性之外，加上各种各样的臆测，化作许多空谈，造成许多幻想。事实的发展决定的与一切主观臆测不相符合，于是人们可能从一种神经过敏的冲动情绪，转到怀疑

或另一种错觉，影响了斗争胜利的信心。这完全是自己思想上的鬼。主观误事，清谈害人，就在于此。我们已在上边首先说到：我们的方针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的；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依据现在力量基础及可能发展提高的具体条件而提出的。只有清谈家、幻想家才会把南渡看作自己希望寄托的唯一所在；而革命行动家则相反，既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实际基础上，又决不失掉对形势发展的敏锐感觉。

还有另一类问题，例如：美帝的军事干涉可能性，美蒋布置的政权阴谋等问题，也是目前人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这类有关全局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其中一些问题，对南方斗争的关系甚至是更加直接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在斗争前途可能发生的事变或暗礁，应该清醒地加以注视，应该严肃的探讨，应该有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革命行动家的特色，却在于对某些可能事变有了预见之后，不是首先想到如何规避它，而是首先去想如何以革命行动来防止、破坏以至粉碎它，并由此使自己立于常胜不败的地位。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完全符合这一精神与当前时机的。因此，我们对于某些可能事变或暗礁的估计探讨，只会产生对于执行正确方针的更大的坚定性与积极性，只有更坚决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打下我们的更好的更能应付任何事变的基础，这一种积极意义的效果；而决不应该产生影响了坚定性的消极效果的。如果不是本着这个精神来研究问题，不懂得我们的任务不在于仅只说明现实，而主要的是改造现实的话，那么，便可能反而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产生混乱思想，结果有害无益。

坚决执行正确方针，清除懦弱无能的思想，反对工作上的保守主义，勇敢坚定，不骄不躁，放手发展，相机进攻，努力争取广东斗争的更大胜利，这就是我们当前任务。

（原载《正报》第87期，1948年5月1日）

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5月)

蓝川

自从三月初旬，广东人民武装在东韩江一带，攻城陷镇，使反动统治当局一时惊慌万状，纷纷告急；又在三月二十九日，“攻陷海丰县城”见(四月十九日《国民报》)击毙反动科长两名。自此以后，从三月底直到目前，民武斗争却不是径情直遂地继续做成煊赫的攻势，从报纸上或表面上看来，显得似乎稍为沉寂了。然而这绝不是真正的沉寂，这只是进步与发展过程中一时的迂迴现象，并且在另一方面，斗争还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几个特点

根据省港各报发表的新闻材料，综观这一个多月来民武的斗争，大致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目前民武的斗争更加深入和普遍的发展，使敌人焦虏徬徨，穷于应付。在广韶公路线上的禺北吕田圩，那里离广州不过百里之遥，而且又在交通线上，三月中旬民武包围自卫队六十余人，蒋军急从广州开出增援，双方又激战达六小时。甚至近在咫尺的广州东山附近的东圃圩，四月三日突然发现民众武装，把驻防东圃谍报队包围，缴驳壳枪五枝(省港各报)。这虽然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斗，但发生的地点却在广州市郊，因此也给了敌人精神上的威胁。从发展上看，民武即能在近郊活动，则说明民武到处都有了群众基础。不但在老地区，而且在新地区，甚至在宋子文统治的中枢的广州外围，民武也能来去自如。

下面的事实，同样说明这一点：作为广州外围重镇之一的佛山，离开那里十里左右，在石湾榕洲堡一带，民武异常活跃。四月十一日一区清剿副指挥官罗献祥亲自率领刑警队会同南海县长往“剿”，但到达时，全村民众都走光了，不剩一个人；而且实行空室清野，蒋军只在一个破屋里才找到了一张破棉被，一煲隔夜饭，罗献祥只得默然而返（四月二十日《大公报》）。这说明了群众对民武之来视如一家，对蒋宋×军则恶如寇仇。

其次，斗争逐渐走向与土改相结合，比过去只进行减租减息更进一步。这是特点之二。根据官报报道，东西北三江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分田废债，而且先后建立了范围不同的民主政权，并且只在广宁一带就已发展有三个纵队的兵力（三月十一《星岛报》，琼崖方面分田废债更其普遍，而政权的建立也已出现，有十六个民主县长及两个行政专员之多（《国民报》）。上述各地现在都已掀起了土改的热潮，譬如东莞惠阳方面，虽然在广九沿线驻有蒋军一五四旅，深圳也设有虎门要塞司令部，而龙岗也有土蒋军一中队，但“离龙岗圩十里就有（民武）税站，离三十里就分田”（三月三十一日《大公报》）。可见这一运动的进行是如何大胆而深入了。现在宋子文也在唱其甚么“耕者有其田”，并已草拟“实施授田计划”，而且“要在南海实施土地改革，先择定适当乡村示范”，这只能说明人民的土改实施对于宋子文及其统治打击的严重，迫使他们慌忙要来“东施效颦”从事一套欺骗。实际上，代表大地主大卖办阶级的蒋宋统治竟大叫“土改”只是一种无聊的笑谈而已。

再其次，宋子文阵营里的频频兵变与起义，又构成为月来斗争的第三特点。就手头的报纸材料就有下面这么多的事件：

一、东江方面，三月间惠阳警察第三中队长钟清，率领中队全部携轻机两挺步枪二十余枝起义。四月十一日驻防宝安乌石岩的保警第三中队突被民武包围，队内士兵从中起义内应，击毙中队长陈德甫及小队长潘山。全队四十余人，携轻机三挺，步枪数十支，参加人民武装。（各报）

二、西江方面：四月十八日，郁南著名大乡桂河乡长卢鑑堦，率领全体所丁及当地农民，会同本县自卫警团委员会主任李光汉及大队副李希文率领第一中队全部起义。队伍计逾千人。当晚攻破收纳仓库及警察所，将库内存谷一千五百余石分发贫民，并将警所全部缴械。（四月二十六《华商报》）。

三、北江方面：四月六日清远保警一中队由队长朱焕文率领起义，但事机不密，朱焕文被扣留。（各省报）

四、南路方面：四月初，阳山七拱太平乡保长邓迪栳，保队长刘佩昌等，率领农民百余人起义，包围自卫班，将班长李生及恶霸陈承如、陈诗光等押出枪毙，率领全体参加民武队伍。（四月二十二日《华侨报》）

以上事实都在同一半个月內，发生于东西北三江及南路，说明了宋子文阵营里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已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那是他们卖国叛民的结果。这种现象过去已经零星地出现过，而今天出现渐多，相信以后将会更多地出现的。

谁在进攻

根据上面材料，我们就看出了表面上象是宋子文在各方面发动进攻，实则上则是人民各方面的进攻，处处取得主动，而陷敌于被动。宋子文的所谓重点进攻与分区“扫荡”实则上则是处处招架应付，而处处又感到了兵力的不足。譬如对琼崖，宋子文已下令所谓四月展开全面“清剿”，又有所谓海陆空军全体出动云云，然而事实表现出来的则是：

乐东县长，感恩县长及海南行政专员公署官员被俘（联社四月二十四日电）。卸任县长王衍祚被俘（四月二十二日《大公报》）。昌江县长及保乡会主任委员李济平三月间被俘（南中社讯）。儋临交界要镇抱舍圩被千余人攻陷，当时因宋子文及司徒蒞琼视察，各方对该项消息守口如瓶（四月二十二日《大公报》）。琼山福昌乡被攻入（《大光报》）。离韩汉英司令部仅数里的琼山县道堂圩又

为人民武装攻占（四月十七日《华商报》……）

而在所谓全面“清剿”琼崖声中，四月六日韩汉英对记者的谈话却已充份露出软弱无能，毫无信心了。“他认为清剿工作不是容易的事，估计需要两师兵力，需时半年然后见效。”（四月十七日《星岛报》）。可见宋子文的所谓攻势只是说说骗人，甚至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也是已表示了怀疑。我们再看广州行辕四月十日发表的“剿匪战绩”统计：关于琼崖方面的数字，据说“战斗一次，毙匪三一名，卤枪一二支”（四月十八日各报）。这也充份显出宋子文所谓攻势何等泄气。原来所谓开始全面进攻以来，却只战斗一次，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人民各方面的进攻，宋子文只有招架应付，甚至连招架也招架不来！

又譬在加紧“清剿”“扫荡”中的广九沿线上东（莞）宝（安）一带，宋子文除了派出上述的一五四旅驻防沿线，加上一个虎门要塞司令驻防深圳之外，又把新编的保十三总队调到了去，连原防保八两个中队，及两县的地方团队及警察大队等，兵力倒也不少。但民武还是来去自如，三月中打下了东宝间重要据点乌石岩，十七晚把莞樟线上分布了七八十里间的全部桥梁连同许多段的公路一晚间同时破毁了。二十四日又在莞樟线上伏击省保八团两个中队及县警队数百人，当堂打死九名，伤十七名，把土蒋军全部打得狼狈鼠窜。到了四月五日，又打宝安屏南乡土蒋自卫队，缴轻机一挺，步枪六支。蒋军疲于奔命，赶到来的时候，民武早就凯旋回去了，这些消息也正好作为说明人民是在进攻的例子。

各方面的胜利

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能把报上披露的月来各方面民武胜利的消息尽量报道，只选择一些较大的，则还有如下各处：

南路方面：四月八日南路民武在遂安公路伏击，歼灭保十一营三连八十余人，伤亡过半，毙数十名，遗屍十三具，内有连长一名，缴轻机二挺，枪尾砲一，步枪十二，其余军用品甚多。（《华商

报》四月二十六日)

西江方面：三月中德庆第一区高良、旺埠、都洪、罗阳等处，民武扫荡土蒋自卫队，共缴轻机六挺，步枪百余支（中央社讯）。

东江方面：龙门民武二月中旬包围永汉圩，毙大队长陈清扬，自卫队七十余人缴械。又打驻龙田围之自卫队，缴轻机三挺，长短枪二十余支。在惠阳与紫金之下松坑围困土蒋保八团周义心部达十昼夜。支队长徐东来率队来救，在安墩地方中地雷伤亡十余人。是役共毙伤敌四十余名，在战斗中逃亡者又有二十余名。

中区方面：四月十九日台山民武在大窟洞附近黄麋澳地区展开反“围剿”战，当周汉铃（一区副指挥官）率领下之蒋军两连及台山警队数百人过河之际，民武半渡拦击打得蒋军狼奔逐突。并将一部团团围困，由十九日下午五时直至二十日晚间，乃被其乘雾夜竄去。这一役蒋军伤亡甚大，把周汉铃的“围剿”整个粉碎了。

韩江方面：四月三日雷岭民武继下汙村的胜利之后，又打垮由赤竹棚进犯之土蒋潮阳及南山保警百余名，毙伤二十八名，逃散二十余名，一名大队长受伤，二名小队长击毙。又三月底粉碎五区副司令林贤察之四路围剿。在锡坑、樟树棚等地，被民武分路伏击，死伤四十余名，内毙排长一名，升平派出所长一名。四月二十四日又传来梅县有数的大乡丙村有被民武一度攻陷的消息（四月二十四日《华商报》）。

以上这些消息虽然极不完全，但已说明了一个事实：人民不断胜利，而宋子文则不断失败。

“无力抵抗”

这里再借粤省参议会向蒋中央呼吁救兵的电文里面的说话，替本文补足几句吧：

“目前保安队力量单薄，不敷分配，地方武力不但分散各处，且素质非佳，械弹短缺，非只无力防剿，甚且无力抵抗。非中央迅派有力国军来专协剿，匪势将更扩大！”

这个电文错误的是，以为蒋军多调回来就有办法，但说对的，是宋子文非只无力防剿，甚且无力抵抗。确实，初时宋子文也以为调一些兵回来就有办法的，然而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了已经调回了几个旅的残兵败将，还是毫不济事。现在明知道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攻势之前蒋军再也抽调不来，宋子文便只好连月来拼命的加紧征兵。可是在人民反抗的怒潮中，无论怎样限、催、抓、买，宋子文征兵迄今征得还不足二成（黄世途谈话）。因此，宋子文要发动什么总体战，什么要请美国人来练兵呀，这些都只是骗局：一以骗人民，企图把人民吓倒；二以骗手下，替那一班已给人民打得头破血流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的手下人打气；然而人民是吓不倒的，相反地人民正在跨步前进！

（原载《正报》87期，1948年5月1日）

TV宋“整理”沙田

（1948年5月）

闻 挺

一、宋财神的真面目

TV宋在蒋党里面一向被称为“理财专家”的，他搞钱的确象狼一般的狠，善嗅精抓，吃人的本领特别强，一发现那里有肉味，就竖起耳朵贴着尾巴去追寻。他来了广东以后，好几次会经向他的僚属夸过大口：“没有钱便问我。”人们听起来，着实觉得这位财神真真了不起，也许会从毛管里漏出钱来，然而实际去研究一下，所谓财神也者，不过嗅觉灵敏，手段凶狠而已。不信，请看他来到

广东以后的一套做法吧。

这里不说他如何开捐加税，恢复包商制度，也不说他如何通过公营事业，加紧榨取等等，单就他去年底所决定的所谓整理沙田计划，就足够使你吃惊。按照宋子文的预定计划，企图把全省沙田“整理”一番之后，从中刮到一笔由四千亿元到六千亿元的巨大数目，在蒋宋财政罗掘俱穷的今天，这确是一块大肥肉，而且据报纸登载，宋子文还不等这项整理工作开始，就将全省沙田押给四行，借进五千亿元的巨款了。这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五千亿元的巨款今后就非从沙田佃户的身上搜括出来不可了。

本省沙田一向有广东粮仓之称，所以宋子文一来粤之后，很快就嗅到这一股肉香，赶紧向它打主意了。但是宋子文的计划怎样？实际企图如何？什么叫做沙田？为什么要整理？一切这些，读者们也许不十分注意，或者尽管注意却有许多地方弄不清楚，现在作者打算从头来说一说这些问题，好给我们对宋子文的阴谋诡计有一个认识。

二、沙田的故事

说起沙田，那真象一篇故事似的，非得从头说起不可。

所谓沙田，原来是只在三角洲地带才有的，在我们广东来说，就是珠江沿海各县，如南番中顺东宝等；韩江口各县，如潮澄饶；南路如钦廉二州所属各县等，那里因为地濒大海，再加以河汉纵横，汇注入海，潮水涨落，淤泥壅滞，冲积而成沙田。但因为时间久暂，成熟之程度有所不同，最初是所谓水坦，长于咸流之中，略见水草，属于斥则；其次是所谓草坦，因时间较久，淤积愈多，逐渐增高而成，但仍贴近碱水，潮涨没水，潮退坦露，惟草已萌生者，属于下则；再其次是熟田，可以耕种，其形成则为草坦逐渐坚实，潮水侵袭较少者，属于中则；最后是围田，是将熟田圈筑成围者，土壤最为肥沃，属于上则。所有这些统统都叫做沙田，它们和泥田的分别，只是泥田经过的时间更为远久而已。那么全省的沙田

到底有多少呢？据估计广潮钦廉四属合计起来，全省约有五百余万亩，其中广属各县约占三百余万亩，占了七成，中山等县早有万顷沙之称（百亩为顷），就是为此，潮属各县约占九十多万亩，钦廉两属各县约占百多万亩。大多连接在一起，水涨时纵目远眺，恰象一片汪洋，不但可以种稻，高亢地方还可以种蔗植桑，本省人口寄命在这些沙田上面的真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说起耕种这些沙田的农民，可也真是够苦命的，他们不仅受着一路地主、二路地主、三路地主以至四路五路地主的剥削，而且反动政府一向都把这些沙田看做肥肉，除了和其他泥田一样征收田赋以外，还要加征所谓沙捐护耕及种种名目繁多的附加费，而这些捐费都给地主转嫁到农民身上。所以沙田尽管肥沃，不要肥料，不要除草，劳动力较轻，而收获还是很好，但是农民却依然是终年辛劳，不得一饱。这里姑不去说地主怎样榨取农民，只来研究一下反动政府向来怎样对付沙田。

原来沙田虽由河海冲积而成，但也要经过人工的围筑工夫，才可变成适宜耕种之熟田，因此，出力围筑的人，就是那一幅围田的田主，许久以来都是如此，沙田原是民田。可是二百多年以前，明室倾覆，满清入关，一面因战乱频仍，沿海居民，流离迁徙，一时造成地广人稀之现象，许多久已成熟之沙田业主，亦不少散失流亡，以致造成强抢豪夺之风；另一面则因满清政府覬覦沙田，视为禁脔，认为大可从其中开拓财路，于是想出一条妙计，一面举办沙田登记，颁发执照，承认其耕种权（只是耕种权，不是所有权）；一面又于田赋正税之外，加征沙捐，由此就开了沙田特有负担之先例。迨至民国时代，军阀官僚，藉口防护偷割，举办学警等，更征收护耕附加等费，以至于今日，相沿未改，所以沙田的负担比诸其他任何田地都来得重大，就是为此。

但是前面已提到过，沙田有别于泥田，一则因为河海冲积，沙田范围，逐年均有所增加；二则因为沙田面积辽阔，经界不易确定，致于强者以霸占抢夺之机会。故经历若干年代，沙田的面

目就有了大大的改变，军阀官僚政府利用这一点，每当餽需困绌的时候，就援往例，举办所谓清丈整理，重新登记，好从中大捞一笔油水，计由清康熙年间至民国二十五年，先后登记整理，据发执照者不下十八次之多，执照先后，形形色色，新旧杂陈，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每进行整理一次，人民的负担不免又加重一层，而且以后除了重新登记之外，还有所谓补价升科条例，因为沙田历时较久，成熟程度提高，过去以下则登记者，若干年后，均须提升为中则或上则，再行登记，并补缴价款，换发执照，作为取得耕种权的代价，如有图瞒不报，作侵占瞒税论，律例相治，历代亦没有所改变，敌伪统治时期，以沙田利厚，亦会订有整理计划，终因困难太多，未有实行。总之，政府每有变动或当财源枯竭的时候，就往沙田上面打主意，整个沙田的历史就是一页登记，发照、纳税、收捐、强抢，霸占、贿赂、阴谋等往复反复的历史。

宋子文是一搜括专家，正当蒋介石小朝廷摇摇欲倾的时候，兵粮两缺，财源告绝，际此时会出主广东，自然不能不承袭这一套惯技，又来一次大抢劫了。

三、宋子文的整理计划

按照现在公布的宋子文的整理计划，可说是胃口相当大，依去年的预算，宋子文的目的要做到筹足法币四千亿元到六千亿元，现在谷价上涨了几倍，这个数目当然又要跟着增加了。

宋子文的办法，跟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举办重新登记，一律补价升科，统一换发土地所有权状。补价的办法规定广属各县沙田，无执照者每市亩缴纳稻谷二百市斤，有下则执照者每市亩缴纳一百二十市斤，有中则执照者每市亩缴纳六十市斤，潮钦廉诸属各县无执照者每市亩缴纳一百四十市斤，有下则执照者每市亩缴纳八十四市斤，有中则执照者每市亩缴纳四十二市斤，一律升为上则。按照宋子文的这一办法，全省沙田大约可以收到四五百万石稻谷，数目可算不小。

除了这一项收入以外，和整理登记后相随而来的还可以增加田赋，沙捐及护耕费等的收入，其数目也相当可观。据宋子文政府宣布，广属各县沙田，现有册籍可考的仅得九十余万亩，和实际亩数相差达四倍之巨，故每年田赋及沙捐等费之收入，仅及实际应得收入的四分之一，损失甚大。如果经过整理之后，所有沙田都全部登记，则增加的收入亦可达数百万石稻谷。这里我们不防来替他计算一下：先说田赋，战前沙田，钦廉属各县每亩收法币一角，其余各属收二角，战时至今田赋改征实物，以去年来算，按战前田赋额一元之土地，合缴实征借征购等一起，实征稻谷五斗二升，以沙田每亩负担田赋二角来论，则缴纳之稻谷应为一斗零四；至于沙捐，除潮属外，则每亩一律年征法币三角，依上述征实率，折合稻谷应为一斗五升六；再其次为护耕费，战前每亩年征毫券一元，折合国币约为七角，依征实率计算每亩应缴稻谷为三斗六升四。三项合计起来，每亩沙田每年负担的税捐应为稻谷六斗一升八。以全省沙田合起来计，宋子文的此项收入，也可得稻谷三百万石以上。此外再加上登记费，丈量费等，连同前述的补价，则宋子文经此整理之后，实际将可收到稻谷一千万市石以上。

宋子文的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搜括。如果还把将来开始实行整理的时候，清丈人员，征收人员，登记人员的种种骚扰，纳贿餽送等负担也算进去，则田主与农民所受的有形无形之抽剥，就很难加以计算了。

四、沙田的负担

现在我们不防再来研究一下，在宋子文的这种横征暴敛底下，沙田的负担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

根据前述各项，合计起来，一亩沙田今年的正项负担，平均当在二百市斤稻谷以上，这是指宋子文政府公开的直接的征收而言，但实际上，由于沙田环境的特殊，以及国民党官吏一贯的贪赃枉法，在实行征收的时候，必然还有许多见底不见面的诛索苛求，这

是和国民党政府发生接触时所估计到的。同时沙田这块肥肉，一向都有无数的寄生虫滋活在这上面，所以沙田除了负担政府的所谓正项税捐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当地乡警，土匪及其他应有尽有的苛杂附加，为数也着实不小，例如中顺各县，那里因为“捞家”武装的普遍存在，他们的生存，大部分均仰给于向沙田征收所谓“禾票”，通常每亩征收稻谷二三十斤，这是比较大宗的一种，此外零星的或临时摊派的漫无规定，每每难于统计。但就以正项负担和这些额外负担粗略地计算起来，一亩沙田今年的负担就非在二百五十市斤稻谷以上不可了。

可是一亩沙田全年的收获共有多少呢？依广属各县来说，普遍是四百斤左右，最少的也有少至三百斤，但最多的却不会超过四百五十斤，是则一亩沙田的收获单单缴给大蒋介石的就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了，余下的由原来地主、二路、三路以至四路地主和耕农去分配，实际数目不过一百五十斤左右。如果地主照例把其中的一部分用别的形式转嫁到耕农身上，则耕农不只白白劳动，甚至连生产成本也将无法收回，这无非等于白给宋子文做一年劳役吗？

这样的剥削，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只有濒死无可挽救的统治者才勇于悍然出此一途。

但今天在宋子文的这一做法实际是抢劫，沙田田主们，如果和宋子文串同起来，把一切负担都往耕农身上推，那只有激起农民迅速的反抗，只有田主首先拒绝宋子文这一行动，不去登记，反对登记，然后联合农民，驱逐清丈人员，保护收割，只有如此，才能够粉碎宋子文劫掠沙田的阴谋。

（原载《正报》88期，1948年5月8日）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社论）

（1948年5月25日）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是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主要内容，因为封建剥削制度，它是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要民族独立，就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民权自由，就要反对出卖民族利益剥夺人民自由的独裁统治；要民生幸福，就要反对独占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其同盟者的封建主义，就要实行土改，然后才能发展农业生产，然后才能繁荣中国的农村经济及民族工商业。

但是，封建主义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铲除它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因此必须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来进行，好比吃西瓜一样，不能整个的囫圇一口吞下，而必须把它破开一片片的来解决。

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段说道：“消灭封建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封建剥削制度”。这就是教导我们不可急躁、不可无策略、不可单凭主观愿望而不根据环境情况与农民的觉醒程度和组织力量来解决消灭封建势力，以致反造成“欲速则不达”的许多岔子。

南方的土改工作，一年来虽然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方针，集中力量于减租减息、退租退息，调整耕地，保障佃权，征借地主富农余粮，救济荒灾，从这些运动中来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

觉醒程度与斗争情绪；但是个别地区个别同志的过于急躁的主张实行土改，不策略的企图在一朝一夕中把土改实现起来，显然和毛主席的这一个方针是有违背的，在斗争上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当然，在一些地区自从农民发动了武装斗争以后，群众不只已经普遍组织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参战，敌人由于兵力不足，一年当中，不敢到这些地区探头探脑，基本上这些地区已经巩固了，群众对于土改不只有了迫切要求，而且有了决心在分了土地之后为着保卫土地而战，如果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敢领导群众动手起来彻底实现土改，那也是不应该有的右倾观点。

又有一些地区虽然尚未巩固，敌人也仍能时时来“游击”，但由于这些地区的土地，或者是属于本乡祠堂庙宇的公田，或者是属于本乡的地主的所有，农民认为可以平均分配而不致引起外来的推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未尝不可进行土改。

这种分别，就是地区的分别，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占领的地区进行适应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之变化。”

至于说到分阶段，我们一年来基本上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方针的。一年来我们的打击对象是集中于一切蒋政权的下层反动机构、反动武装；对于不是反动的地主，我们除在经济上限制与削弱其封建剥削外，对于他们的安全与自由，我们给予保证，甚至对于豪绅恶霸，我们也只打击那为群众最痛恨的最坏的分子，而且不算旧账，不念旧恶的只打击现在仍为非作歹警告不变分子。虽然个别地区个别同志也曾经犯着过急过左的错误，把打击的面扩大到一般地主的身上，或者是无意中侵犯了工商业家、华侨的利益，但都在不断纠正错误，向群众承认错误以至于尽力赔偿他们的损失。这也可以说，是执行毛主席说的：“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

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打击豪绅恶霸分子，集中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

以上所说，我们只是说：我们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而并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为什么在执行毛主席的方针中仍不能避免错误、避免偏向呢？这是由于：

（一）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思想的掌握仍不巩固，因此对于毛主席的“有步骤地有策略地”的思想方法，每易为一时一地一人一事所影响，容易对于坚持这个思想方法发动的动摇、修改，假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动摇了整个策略方针的。

（二）我们仍然缺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基本工作方法，部分同志一看到全国《土地法大纲》的宣布，一看到晋绥方面提出如何整党，便不根据客观事实决定在我们的地区应该如何办，而只是要求照样画葫芦的学着做，结果当然要出毛病。

虽然，我们的工作尚没有“离谱”，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由于基本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得来的。但是，我们决不自满，我们要获得更大的成绩，因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来研究毛主席的方针，来纠正与防止我们已经发生或尚未发生的错误倾向，为坚持毛主席的方针与思想方法工作方式奋斗到底，取得我们更大与更彻底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八、五、二十五

（原载《正报》91期，1948年5月29日）

广东水灾可虑（综合报道）

（1948年6月）

玉 尧

今年入春以来苦旱，清明节过后还没有大雨，特别是潮汕一带，有八个县大半田土龟裂，先后发生了“六十年来所未见”的蝗虫。甚至水量较丰的西江一带，沿江两岸农民都筑沟蓄水，以备灌溉。西江的支流新江则已完全呈露了河水干涸，全河尽露沙洲，江中最浅处行人可涉水而过，水深仅八九寸。不但是民船的往来甚感困难，而且沿江两岸的水田也大部不能下种蒔秧。有一位记者到那边视察时写道：“如再经十日不雨，则旱象必成，才经去年大水患之农村，如复遭旱灾，则农民之苦不堪设想”（见四月二十六《公报》）。却不料到了四月底开始下雨，一来就到处山洪爆发，澎湃汹涌，汇流入河，于是各江河水陡涨，从五月初起到目前，东、韩、西、北各江水位差不了多少就追上了去年水灾的最高纪录（去年是六月初才水涨的，今年早了一个月，只在五月初水就到来）。这不能不引起受过去年水灾严重损害的广东人民无限的警悸。现在广东虽然尚未普遍成灾，然而看各江的水位。少者比去年最高水位相差一公尺余，多者五、六公尺，平均都是相差二、三公尺，而且照其来势之凶猛，当这时候才不过是雨季开始不久，假如继续再有几场大雨，则大水之出现是谁也不能保险的了。而且按其范围来说，去年灾区最严重的是广东，广西亦有一部成灾，今年广西则已有武鸣、灵山两县电省报灾。江西方面，赣江暴涨，南昌告急，决堤九处，淹没禾田数千英亩。湖南方面，灾情更重，全省七十九县中，灾区遍及四十个县之多。湘、资、源、沅四江同时暴涨，长沙、湘潭、

益阳大水入市，源水上游激流的洪水且曾冲倒一座山。受这次水灾影响的人达八百万（合众社五月三十一日电）。总而言之，今年的大水几乎有席卷华南之势，这就不能不令我们更加提高警惕了。

目前广东水灾虽尚未到严重程度，然而以五月三日曲江老猺水库的崩溃开始，这彷彿是向广东人民投下了一个爆炸弹似的信号，东江从老隆以下，龙川、河源、观音阁、惠州、以至石龙到处河水泛滥，一望滔滔，成了一片汪洋。北江则有清远一带被浸。至于西江，则灾情更较严重，上游从广西开始，汇合了抚太两河，进入粤境后，复与浚汾两河冲下的潦水汇合，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尤其是羚羊峡以下，至三水石岐交界的思贤滘等处水势湍急，奔流如箭，以致省梧、省都、肇省等轮渡都不能不改航东海了。五月十九日由梧州到封川的一艘渡船，搭载乘客百余名，出航未久即被风浪捲沉，溺毙七、八十人。又有一艘米艇，载客八十余人，白米数千斤，开过火山附近，突被波浪捲没，二十余人溺毙，货物全部丧失。沿河城市如都城、悦城、德庆、四会、肇庆、三水、佛山等处，都是大部或一部街道被浸。尤其是德庆、悦城、都城等埠，街道水深过膝，市民在街市驶艇往来，商业大受影响。由德庆至肇庆间两岸田地多半被河水淹没了，只以德庆一地而说，所有禾苗、蔗、番薯、芋头等被浸坏的，损失在三百亿元以上。这和一个月前的苦旱，真是彷彿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在这一旱一水之间可以想象的是人民已付出了多么的辛酸和眼泪了。

二 粤省当局这半年来哇哩哗啦地吹嘘的什么围堤建筑，已由老猺水库经不起六个小时骤雨这件事说明了其可靠的程度。这水库是花了八亿元以上才建筑起来的，从去年十二月底开工，到四月底才“完工”，但刚一“验收”就遇了大雨，全坝九十公尺的围堤，一下就给潦水冲崩了三十公尺，库内大水冲出，奔腾泛滥，把附近黄刘两姓村落及大片禾田都淹没了。这是五月初的事。在五月十五日，三水的永安围古塘段被潦水一冲，又告崩缺数丈，水淹禾田七千余亩。跟着永丰围又呈露裂痕。五月二十二日南海的小塘商木洞围又

告崩缺。这样接二连三的崩围，还在大水没有真正降临的时候，倘若潦水继续上涨，后果更要不堪设想！这一事实说明了，宋子文及其一群尽管怎样想粉饰一下他们的咀脸，伪装慈善家的模样，然而毕竟禁不起事实的无情的揭露。从下面的事实更加看清楚了这一点：五月二十日上午，南海鼎安围堤工们正加紧赶修围堤，恰巧宋子文的一艘巡河炮艇经过，水兵看见岸上人头耸动，大吃一惊，立即用机关枪扫射，当场打死一人，伤了三人。那些受了袭击的堤工们吓得乱走，有些人吓得爬伏在地上，于是这艘炮艇“胜利”而去了。象这样的丧尽天良的罪行，宋子文竟然大白天在广东人民的面前做了出来！

说起围堤建筑，贪污图利，妄顾民命，在罗卓英时候就已开始了，但宋子文却已显出比罗家班更狠的搞法。TV初时本来准备修建一百零六处，其后见其他的无甚“捞头”，便缩手只修筑七十三处，据说全部完工的有二十四处，但老猯水库便是其中所谓“完工”者之一。现在甚至连那夸最新式最完备的马鞍围工程，据说也有一部分不可靠（见省报载），但不管宋子文如何吹牛推诿，沿江千百万广东人民不能让他轻轻逃避责任的。筑堤用款五千亿元的基金，包括去年各地人民募集的账款，都在他的手上，当时是换取外币及物资储存的，到目下就应该不止增值一、二百倍，然而据省堤工会报告的账目，共用去了三千五百亿元，其中花在各级官僚手上的所谓工程费（包括所谓开办费、财务费、业务费之类）就已达二千八百亿元，里面的重重剋扣贪污且不去说它，据说目下尚存二千余亿元。堤工会便是这样企图发表这一个存余数字以示其清廉，但人民是看得明白的。区区五、六千亿元的浮报数字决不能顶得上应有的数目，关于这一笔款，宋子文及其一群是吞不下去的。现在所谓什么验收堤防小组已纷纷前去各县“验收”，并加紧督催民款，征集民工，那就是他们想吃饱了这大笔黑钱之后，还要向人民身上继续搜剥，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已从人民身上刮尽了钱粮人命，迫得人民活不下去，现在当看大水灾迫在眼前，不但漠视民

命，而且还想藉灾发财，沿江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向宋子文要钱修堤，把人民自己的血汗钱，点滴用来抢救堤围，自救自卫。

(原载《正报》92期，1948年6月5日)

香港工人对“五·一”口号的响应

(1948年6月)

鲁保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引起了香港工人的普遍重视，首先就认为今日中国人民在走向全国胜利，封建独裁反人民统治迫近灭亡，中国劳动人民应该一致起来联合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老蒋作最后决战，准备领导中国发展工业生产的时候已经到来。因此，香港工人对于“五·一口号”，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笔者在工人群众中倾听，加入他们曾在《华商报》读者版发表了出来的意见，略加整理，写成本文，虽经过工人群众的批准，自行发表，但在执笔之前曾和很多工人代表人物谈过，并且很多意见都是工人群众直接供给的，执笔时亦极力避免主观，笔者确信，它的内容足以代表大多数香港工人的意见的。

香港工人虽然侨居国外，但是由于他们有很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因此，他们对于祖国的事情是非常关心的，他们在报章上看到祖国蒋管区工人兄弟被统治者残酷地迫害，他们眼看到祖国工人兄弟在蒋管区无地立足或无以为生而跑到人浮于事的香港来寻求生活，阶级意识和爱国心驱使他们感到反动政权毫不足惜的应该迅即毁灭，民主联合政府应该迅即组织成立。同时，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现在日本货已大量湧到香港来，香港的胶厂织造厂等纷

券被迫停工歇工，轻工业工人失业者日众，工人眼见“五·一口号”的指出完全系事实，因此，香港工人，特别是纺织女工，首先意识地或直觉地接受了“五·一口号”的号召，他们觉悟到，如果不结束美帝的扩张政策，香港工人将来的生活一定更不堪设想。由此证明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显然不仅代表了国内，而且代表了香港工人的意见。

大约是由于香港工人的政治生活过得不很多，因此，他们对于新政协并不很感兴趣，他们认为新政协，不过是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政协是应即结束的。不过，他们觉得新政协有一个特色，是参加会议的成员不限于各民主党派，而且加入了人民团体，领导开会的不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他们对于这一点非常赞成和积极支持的。他们认为新政协的召开，宜早不宜迟，开会时间也不宜过份拖长，应该速议速决，以便迅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在蒋府未全垮之前比在全垮之后更有意义，理由是各党各派和各地人民，不仅有责任去参加建国，而且有责任去参加灭蒋，他们认为一些人“等待共产党打垮了老蒋之后才去认份”的思想应加以纠正。

他们要求新中国的领导权能够保落在无产阶级手上，他们曾经解释，他们之所以要坚决要求领导权，丝毫不是为着想做官，为的是要保证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实施，以便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他们认识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不相同，是在于前者属于资产阶级领导，后者属于无产阶级领导。因此，他们坚决地表示，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要想中国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的。也就因此，他们重视了在全国人民代表会的代表所占席数和将在各级政府中所占的委员席数。虽然截至目前，他们提出应占席位的比率尚未一致，有的主张占百分之二十，有的主张占百分之三十，有的主张占三分之一。但是他们要求确保将来的领导权落在无产阶级手里的精神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这样，因此，他们主张加强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主张全国总工会迅即成立，主张加强解放区、蒋管区和海外侨工联络，他们并希望解放区能够有联络人员派到香港来。

对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们比较关切的是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劳资关系部份，他们坚决地要求参加工厂管理，他们主张在国营工厂或企业中由工人单独组织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直接对政府负责。在私人资本的工厂中，也要组织有工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工厂的产销全部业务均须由管委会通过批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劳资合作，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确保将来的生产是为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们对于工资工时和一般待遇并不过分强调改善，他们表示将来为了国家社会生产，只要生活的困难有办法克服，这些小问题可以斟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坚决争取的，就是生产利润不能让资本家独占，同样他们也不要求给工人自己独占。虽然他们曾指出利润是由劳动造出来，理应全数归工人所有，但是他们经过讨论，认为为了提高资本家投资工业热忱，酬谢资本家的出资本，因此，他们主张利润必须合理分配，他们具体提出了劳资双方各占百分之三十，公积金（劳资双方共有的变为股本扩大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福利金（劳资双方均得共享）占百分之二十。他们解释说这不仅有利于劳方，同样有利于资方，因为这样可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产品成本一定减低，获利必厚，他们预言，资本家如果合理分配利润，可能比独占利润获利更多，同时这样的利润分配制度，有了公积金的再投资，也必然会促进社会生产。这是合情合理合乎实际的。

香港工人迫切希望祖国新民主主义政权迅速出现，他们希望能够早日回国服务去，他们憧憬着美丽的前途，表示了将来为了祖国的生产建设，生产的积极性必将提高，劳动态度将有极大的改变。我们可以预言，在将来中国的工业生产中，香港回国服务工人将必凭借其优良的生产技术起指导和领导作用。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提出，使到香港工人见到全国胜利的

形势日益迫近，中国人民的死敌灭亡的日子已在不远，激发了他们更坚决地更积极地和全国劳动兄弟一道为灭亡旧中国，推进新中国而奋斗的热忱，因此，他们要求全港工人阶级加强政治团结。香港的工人领袖们，干部们，已经感到他们的所负任务日益加重，为祖国发展工业立功的时候愈来愈近，他们自觉地去自动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能力，为着迎接中国的新时代作充分的准备了。

最后我觉得值得提及的，就是香港工人对于“土改”甚感兴趣，随时随地都发现他们讨论这一问题，他们有些人提出侨工也要分一份或半份的要求，甚至说，如果在他们侨居海外未能参加耕种时，可以由当地农会暂代保管，分配代耕，保留地权给他们。大概这是由于香港工人的失业恐惧印象过深，作必要时回乡耕田的打算，他们忽略了去想象那时候的祖国，工业已在蓬勃发展，多多人唔够用，工业劳动英雄不愁无用武之地了。

（原载《群众》22期，1948年6月10日）

半年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

（1948年6月19日）^①

（一）半年以来，我们以发展和进攻去粉碎宋匪的重点进攻这个方针，虽然已经获得成绩，使宋企图歼我主力之计划完全失败，而我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扩大，但在政策上我们却患了许多错误，如不及时的严重的指出与立即纠正，我们将走上脱离中央路线而陷入失败的危险。

（二）政策的错误表现在于：

^①原件未署作者。

①军事上打大仗，打硬仗，打消耗仗，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除打仗之外，整军工作则异常微弱，把发展看成只有大的军事行动，而忽略武工队的使用与各种方法的研究，以先打下基础再来大搞，或在大搞中迅速打下基础；个别地区则在敌人进攻已经分散为班排摧残群众时，又不敢有计划消灭它，因此虽然使我们胜利的粉碎敌一期清剿，但个别地区受摧残，个别受编的地主、土匪部队因不整理而叛变，个别地区武装因分散而瓦解。

②群众斗争上未能根据群众情绪与目前形势肯定暂缓分田，而集中力量于反三征与减租减息，生产救荒。分耕分粮时侵犯中农利益，过早的分浮财，使不反动的地主亦反动起来，甚至有些地区捉华侨家属罚款，有的地区打车打船侵犯工商业者利益，有的地区则只有部队“打土豪”，而不解决群众要求。

③整党工作成绩微弱，且已有个别地区不从教育改造而采取惩办制度以至枪决。

(三) 上举这些错误，虽然现在尚没有更多材料，但其性质是违背中央的总路线与总政策。(见毛主席“4·1”报告及中央“5·25”指示)

(四) 宋匪二期清剿现在开始，固然九二、九九两旅已调走，但新的五个保总及每个专署一个保大已建立起来，敌的重点进攻虽然失败，但将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地”以配合其重点突击，故我们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来应付而粉碎它，并打下新的发展基础。

(五) 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掩护山地边区之建立根据地这个方针，是粉碎敌二期清剿的中心问题，我们丝毫不能动摇平原游战的坚持与发展的信心，以免重复广东过去内战时“缩山”受歼的错误。因此必须：

①平原如仍适当大部队活动时，切不可忘记以小部队去开辟山地，切不可忘记配备短小精干准备长期坚持平原游战的组或武工队，使他在群众中生根及取得中上层统线掩护，以便敌一来时主力得以转入山地有利条件以作战，而平原又能坚持。

②平原游战能否坚持？除了坚决的信心，群众关系以外，还须看我们的政策如何执行，能否利用中上层统线力量而定。因此目前打击对象应集中于蒋宋下层机构、反动武装、地方恶霸。除此之外，对不反动地主，过去反共目前不反共分子，愿意暗中助我的乡保长警察，都不能去动它。对地主富户的征借应有有限度，使其愿意接纳，对华侨、工商业者、中农必须绝对保护。过去弄错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尽可能赔偿，无法赔偿也应说他心服，将来赔偿。只有这样做才算坚决执行中央与毛主席方针。

③对违犯纪律的地主土匪受编武装，立即改造，如不接受而有危险性的，应缴械解散，争取其中好的分子，以后不随便给名义这些部队，只能作为有条件的联络，而暗中派干部去工作，帮助其进步。应将部队的主力的战斗力与纪律同时提高，纠正骄兵悍将的错误思想。重质不重量，在一定的量底下就不大量发展主力（个别吸收），把量放在普遍组织不离生产的民兵上。

④对群众生活改善仍以反三征、减租减息、借谷救荒（有借有还）、生产合作，……为主，暂时不分田、分耕、分粮（只分蒋朝公粮及恶霸之粮）。已经分田、分耕、分粮地区应查明，如有损及中农利益的即全数赔偿认错，对地主富农的则酌量处理，使其心服。减租减息亦应有一个限度，不要使到地主不能生活或群众借不到债。

⑤整党工作着重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反对山头主义，反对不执行上级指示，反对骄傲自满（参看中宣6月1日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建立支部的切实工作的日常生活（反对夸夸其谈，总结好的支部的工作经验）。个别干部不愿改造进步的，应采取组织上的调整，不能任令屍位阻碍党的政策的实施。

（六）我们现正在收集材料总结工作，以准备各地来人报告讨论，然后发出新的指示，目前先提出以上意见供各地讨论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应立即报告理由，请求我们批准，否则对以上方针都不能作原则上的修改。

1948年6月19日

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6月)

蓝川

一、西江民变蜂起

东韩江告急，是三月间的事，使得宋子文慌忙把那还没有整编得好的、所谓“因兵额尚未补足，故未能使用”（黄镇球谈话）的保警第十二、第十三团分调去潮汕及惠阳应付；又调了九十二旅一个团到汕尾，一三一旅一个团到汕头，并向福建方面请了两个保警团的救兵，然而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五月西江又告急了。那是以四月间德庆斌山中学校长兼县参议员徐儒华起义缴了高良乡公所的械为开始（黄镇球也说：“西江北岸股匪最初由德庆、广宁、怀集边区发现，及至德庆某中学校长叛变后，声势逐大”——五月七日对西江清愿代表谈话）。跟着在四月底郁南都城镇长吴耀枢、桂河乡长卢鑑壩及自卫队筹给会主任委员李光汉、大队副李希文等又相继起义，都城水警也有一部份起义响应（见省广报），一下就号召了千余人，接连打下了桂圩、峡上、通门、迴龙、狮子崖等处乡公所。把自卫队缴械，并开放田粮仓库济贫。这些起义的所以会令统治当局大为惊恐的，因为第一，发动起义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士绅（五月一日《大公报》说他们都是富绅），包括县参议员中学校长到乡镇长、自卫大队长及中队长等，这正如火山的爆发一样，从反动统治的内部爆发出来，成为空前一次的“绅士作反”，这是统治当局万万料想不到的。其次，这一起义一开头就与群众的利益相结合，到处开仓济贫，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故一开头就声势浩大，到处如摧枯拉朽的打下乡公所，扫荡反动的自卫武装，造成了轰动一时

的攻势。据中央社讯，计高良、旺埠、都洪、罗阳等处自卫队共被缴去轻机六挺，步枪百余支云（省报），这就使得那一向以浮报邀功的伪三区专员陈文一面向宋子文告急求援，一面慌忙从广宁赶到了都城亲自督“剿”，同时宋子文也慌忙调出了手下那一个“空额太多、官多于兵”（五月八日《华侨报》）的保第十四团到西江，并派了六艘巡河炮艇前去协“剿”。然而在这当中，从罗定县调去“剿匪”的两个自卫中队到中途又倒转了枪头，跟着起义了（五月六日《星岛报》）。而且，正当上述这一连串的起义闹得统治当局昏头昏脑的时候，南路人民武装突然向西江跃进，与原日活跃于中区及西江南北两岸的人民武装相配合，于是声势更加浩大，造成了西江民武活跃的高潮。于是各县纷纷告急，而西江肇罗阳等十六县的官僚地主之流则组成了所谓“救乡会”向行辕及保警处请愿（五月七日），同时宋子文也把陈文撤了职（改派莫福如去），这些事实正活画出了统治当局由上至下的徬徨恐惧与手忙脚乱的图画。

二、坚持南路，跃进西江

的确，西江形势的骤然告急，这彷彿和东韩江方面的民武活动遥相配合，形成对广州外围东西夹击的两钳，威胁了南宋的统治中枢，这不能不令宋子文大感苦脑了。本来对南路方面，宋子文早就使用了保警第一、二、九、十四个团的兵力，并在今年二月派张瑞贵成立了粤桂南区“剿匪”总部，联合广西方面的反动武力对南路人民武装进攻。甚至宋子文还派了八区专员董煜到越南与法越当局接洽。董煜曾与法方的越北中将师团长圣松，谅山指挥官韦佳，西贡指挥官佛罗蘭、茫街指挥官兼外交专员等数度往返磋商（五月十一日《国民日报》），据三月十八日《大公报》息：“法军正沿朔江、茶岭两线推进，与我（即土蒋）团队夹击。”而且据另讯：“法机不止一次地飞往游击区作侦察和骚扰”（参看《正报》第八十七期桂西南通讯）。这些消息说明了反动统治当局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丧心病狂地媚外求援以遂行其反对人民的毒辣阴谋，这是今后人民将会向他

们作总清算的。南路民武在敌人不断的所谓“围剿”“夹击”的艰苦情境之下，一面以发展对付敌人的进攻，一面则保存了主力，随时找寻敌人的罅隙给敌人予歼灭性的打击，如四月八日在遂安公路上的伏击，歼灭保十团一营一连八十余人，其中伤亡过半，毙连长一名，缴轻机二挺，枪尾炮一门（四月二十六日《华商报》），即为此种战斗之一例。到了四月间，民武分向东西两路跃进，而在他们南路的根据地周围，留守部队和广大民兵的战斗，显出更为顽强和机智，使那妄想乘势突入的敌人终于在遭受严厉抗击中逡巡却步，如五月六日遂溪民武攻袭杨柑墟土蒋自卫队，俘六名，毙伤两名，缴轻机二挺，长短枪十七支，子弹千余发（五月十九日《华商报》）；又四月底五月初驻遂溪塘旺圩之蒋保警第一连，由连长周某率领在城月湛江公路上受伏击，毙连长周某以下士兵十二名，俘三名，缴轻机二挺，步枪十支，手榴弹二十枚；跟着杨村土霸被袭，爪牙四名被歼，七名被俘，民武缴轻机二挺，步枪十六支，子弹千余发，（六月《华商报》）等等。这些消息都说明南路人民部队决心和十六县人民同甘共苦，不让宋家狗腿子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南路民武的主力部队则钻进了敌人的空隙，取得更大发展，但也随时可以故地重游。当部队的一路跃进西江，其中一部经茂名大井圩进入信宜边境时，信宜的警察大队长陈英昌率领了两个中队前去“堵截”，但看见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吓得躲进山兜里不进迎敌，坐视着民武大军渡河。（五月二十三日《大光报》）又恰当阳江新县长罗巩就职之日，民武进入离城四十里的北惯圩，袭击乡公所，俘乡长范某一名，缴枪二十余枝，其时县内有六个警察中队，却都不敢援救（五月三十一日《大公报》）。民武又入阳江大圩良爱村，距离蒋军哨位不到五里，蒋军明明知道了也都不敢出来。是晚民武便在村中大演话剧（同上）。这些消息都反映出了当时这支东征队伍的声势浩大。同样的事实还可以从那班所谓西江代表们向行辕请愿时的控诉中反映出来。据估计目前西江民武有五、六千人（一说六、七千）。据另一估计：西江北岸于广宁一带的有兵力三千人，于南岸云浮新兴鹤山一带的有四

千人，于罗定郁南一带的则至少二千人以上，合计则达万人（五月五日《华侨报》）。而且被组织起来的民众有二十万人之多（省港各报）。计这个多月来打下的乡镇公所及分发的田粮仓库，据大小官报从惊慌失措中泄露出来的，就有阳江之北惯墟，新兴之东城墟，鹤山之禾谷墟，台山之寨门墟，阳春之合水墟，郁南之迴龙、狮子崖等，高明之更楼仓，鹤山之龙口、宅梧仓，德庆之高良、嘉积等仓，新兴之小南社中乡谷仓及大南西木乡谷仓……等等，至少有二十余处之多。至于缴获枪械，则据西江“请愿代表”的供辞说：“初步调查已有机枪十七挺，步枪二百余杆”云。（五月五日《国民日报》）正如官方报纸所招供：“此等‘匪邦’……挟其优势‘匪’力，历向我地方团队包围攻击，我方‘剿匪’队伍常吃寡不敌众之亏。”（五月八日《大光报》）“队伍声势浩大，当地团队无法与抗。”（五月八日《国民日报》），而且初时有些官报却以为那是中区民武向西江发展的，（如五月八日《国民报》所报道）。可见这支突然而来的武装队伍，简直有点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兵，使反动当局一时摸不着头脑。

三、琼崖四面出击

正当西江告急声中，海南又告急了。报纸上传来最动人的消息是从五月十天左右至五月二十一左右民武围攻乐东县城的战斗中，把那率队增援的乐东县长韩云超击毙（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六日在西区的出击中又把保三团长曾杰击毙。其余还有许多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这使得宋子文在惊急仓惶，而又无兵应付中，便不能不连自己身边的御林军，驻防广州的特务团，也急于调到琼崖去了。海南民武展开了全面的出击，本来已在今年春间开始，二月二十日解放保亭县城，三月四日一中同时攻陷崖县及临高县城，三月十六日攻占那大市区，同时四面破击铁路，到处摧毁土蒋乡公所及解除自卫队的武装，前蒋记乐东县长王衍祚便是在四月十五日破毁从榆林到崖县一段铁路的当中被俘的。人民武装出击的战锋由南到北，由西到东，使东西南北四大城市——加积、那大、三亚、海口都处

于被攻打与威胁中。甚至三亚港的飞机场也要连忙搬走(港省报)。而宋子文的军力方面(共四个保警团,一个残旅),其驻守琼南的保四团已在二月间由于民武挺进石碌矿场附近,将其击溃。接着民武向昌感崖沿海出击,使这一团人忙于招架,再也不敢调离防区一步了。驻守西区的保六团,当民武三月间一连串的包围那大、南丰及攻打澄迈、临高、儋县的时候,保六团长陈瑞璋奉命往解那大之团,当抵达清平乡平口村的时候,即被民武包围袭击,当堂将团长陈瑞璋击毙(三月九日)。于是西区蒋军兵力大感削弱,韩汉英便将原日驻防东区琼文一带的保三团调到西区救急。而相距不过两个多月,在六月六日保三团长曾杰又继陈瑞璋之后被击毙了。约略估计,宋子文兵力被歼的在一千二百人以上,这确实不能不令韩汉英宋子文之流大感震惊了。关于曾杰被击毙的情形,一说是在那大附近被围,“寡不敌众”,所部官兵二百余人同时被歼的(六月十四《大公报》),一是在白沙的新村与芭蕉村之间地区被截击打死的(中央社讯),而据官方报道,同时被击毙的第四连长郭择,二连排长徐锡基,三连排长莫光明,四连排长周鉴生等,说明这个战斗至少有一连人给干净彻底消灭。

同样的关于围困乐昌县城击毙乐昌县长这一个战斗(一说开始于四月底至五月中——《华商报》五月二十四日琼崖通讯),琼崖民武确实也做到了掌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条战略原则。事情的经过是:当县长韩云超率领地方团队三、四百人及榆林要塞司令部援军三百余人,亲自前去解救乐昌之围,在二十日就放出了乐昌解围的消息(五月三十日《大光报》),却不料民武有意要诱敌深入,自动停攻县城,使韩超放胆前进,在敌人前进途中的承仲附近突然予以伏击,使其“团队三四百人全部丧失(内大队长符守卫一名),连战斗力最强的海军要塞司令部的三百余人牺牲过半。只剩下百余人退到北黎,才从北黎乘船回榆林”(六月二十日《大公报》)。于是民武再攻县城,把守城团队全部解决。

根据报纸资料,关于琼崖民武的胜利消息,择其较大的则还有

五月八日民武一小队进入韩汉英总部所在地的海口市攻袭修械所，缴轻械三挺，卡宾枪二枝，步枪十余枝（五月十五日《星岛报》）；五月二十二日攻占崖县城，破监仓释放冤狱二百余名；五月十二日围攻陵水，击毙空军管理员胡渐享，俘排长陈友善及职员数人，缴枪六支；又攻入新村港空军仓库，轰毁该港碉楼等。其余关于破毁铁路，威胁矿山，打乡公所及自卫队等零星的出击，这里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说到了。

四、粉碎了“重点进攻”

从上面的叙述中，从东韩江告急，到西江告急，再到琼崖告急，我们看到了宋子文到处焦头烂额，处处招架、挨打，整个陷于被动的事实。这里至少可以说明了宋子文再想全面发动进攻已不可能了，就是对于一个较大地区的所谓重点进攻的计划也要惨遭失败。目前宋子文及黄镇球之流强调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又所谓“第一期清剿即将结束，目前要开始第二期清剿”（省港报）云云，那就是宋子文被迫要承认自己计划的失败而急欲修正的一个说明。比如对于东韩江，宋子文已集中了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几占其正规军力四分之一；保警团则有保五、保八、保十二、保十三四个团，约占其保总十四个团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强；而保独立大队共有十一个则已使用了一、三、七、九、十一五个大队，即约占兵力之一半。加上福建方面保安团第三第五两个团及各地的地方团队以至收编的匪伪兵力，不可谓兵力不多了。然而只就这一月来表现出来的事实，则有闽粤边区副总指挥五月三十日的被俘，揭阳县、普宁县先后成立民主政府。其余各县民武胜利的消息更日日见诸报章。这里只以敌人兵力最集中的韩江几个县来说吧：

惠来县：五月八日攻袭县城警察局，当场毙队长以下数名，缴获长短枪数杆，并捣毁该局。

普宁县：五月八日民武二百余进入桥柱乡，包围谷库。十三日打振和乡仕林村缴获大批弹粮枪械。

揭阳县：五月五日攻袭鸿江乡，缴获大批枪弹粮。

又同日另一部抵埔头乡，包围守菁队，缴长短枪十余杆。

五月十日攻和贞乡公所，全部枪械缴去。

潮安县：五月三日民武分袭县城东南之东津及意溪两乡，毙俘保警队数名。

十八日打大和乡公所缴长短枪二十余杆，米粮千余斤。并再度进入鹤陇桥村分发赋谷。

丰顺乡：五月十三日民武二百余围攻灵水坑自卫队部炮楼，缴获大批粮弹枪械并将该楼拆毁。

这里只列举在同一地区的五个县，而且时间都在五月初旬左右，而那正是闽粤边及韩江一带的涂思宗、曾举直、喻英奇之流侈谈什么“十字形扫荡”的时候，韩江民武便是这样用遍地不断的进攻去对付敌人的进攻，而且到处取得胜利。而随着民武更大的向前发展，宋子文手下无兵的弱点则将越更暴露了。不管宋子文目前高叫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不管如何压迫绅士回乡，办什么“联防联保”“家族联保”（闽粤边采取的办法）；搞出什么“神秘区”（叶肇在粤北搞的办法）；把过去民族敌人日本强盗做过的办法都搬了出来，企图挽救他们面临的危机，然而这种建立在反人民的基础上的一切办法，即使暂时可能增加其稀微的反动力量，但其前途依然摆着“失败”两个大字。

（原载《正报》第95期，1948年6月26日）

粵港等地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动态等情报汇集

(1948年6月)

一月

1. 穗市警局实有人数八百五十七人(驻警、特务、教导三大队未列入,如并列则共为二千一百四十五人)。(一月二十九日)

2. 粤三十七年全年岁入预算:岁出为四千八百一十三亿一千八百五十六万元,岁入为一千零一十亿元,仅占岁出四分之一强。(一月二十九日)

3. △目前广东C·C与政学斗争甚烈,政学支持之李大超、欧阳驹、雷鸿堃及间接关系之沈康杰,均在积极制造工会选举纠纷,市盲会空长风潮,全为沈康杰在后作弄,企图打击高信,高信对此极头痛,已积极进行对付方法(沙面事件,CC联合三青打击欧阳驹即为一例),查沈康杰之活动一面因在为替政学打击CC,同时其本人则图倒高,获得穗市党部主委之职。

4. 黄绍雄为李宗仁竞选的总指挥。

5. 李蒙在南京谓桂系可退至香港活动,但甘介侯坚持他们应在南京活动。

6. 李宗仁在北平时不但和美帝有勾结,而且和傅作义等也有勾结,因傅等得知非蒋的嫡系,终不免有被收拾的一天。

7. 胡适在北平和李宗仁谈得很好,但一到南京就被蒋拉去了。

8. 据实业公司中人谈:现该公司与美商合办一“制械厂”于广州。宋已批准,该公司已派员会同美商代表查勘河南地段,并拟

就现有之机器厂改设，约十月可成立。

9. 粤三十六年田赋征额为四百五十八万四千石，但截至年底止，只征起七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仅达百分之十八。（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

1. 抗战时，尝在重庆财政部财政问题研究会做事的洪某，在港读毛主席的报告之后，大为赞同。近来往港、沪之间做单帮生意，至沪时，与金城银行专员汤象龙复述毛主席文告大意。汤为留美学生，尝在清华燕京当教授，在金城做了十几年，现每月只得法币二千元。儿子在大学读书，总没法支持，他平素对中共是不同情的，听洪复述后，大为感动，以未得读毛原文为憾。对于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尤表同意，并表示愿做调查官僚资本工作。

2. 旧历年三十晚，深圳海关缉私站被当地游击队俘获，该站有六人（一人请假），武装五人，一人为海关关员。在深夜十一时，为游击队突入，全体被俘获至笔架山后面。至翌晨元旦放回，临行嘱彼等不可帮助坏政府做事，并将他们錶、自来水笔、银钱归还。现海关关员都感到游击队作法很好，以后他们遇到游击队最好是树白旗，还击是没有好处。此种风气已传遍海关各处，一位西人海关关员，曾说“共产党做事，是很文明的”。

3. 上海来客谈，工商界都相信土改很快胜利的推行，一部份人看见k党无前途，又害怕中共，因此亦随《大公报》之后倡自由主义，如北平费孝通之乡土复员论便是代表之一。

4. 二月二十四日《南华早报》中国的药方，

司徒的致中国人民书得到广泛的赞成，而由于它似与华盛顿政策矛盾，又使人惊讶。它和马歇尔、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实是相似的观点，好象一支最后的挽歌，证实了司徒将离职一样。尽管司徒说，他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但相信那代表了美国一部分的焦急。在大选当儿，援华计划遭到不少的反对，对美国

全民保证援助必须有条件，这一点是必要的。同时国民党又被劝告，肃清内部施行实际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据说苏联有调解的建议，条件是可笑的——莫斯科否认了。这表示中国问题又到了个转折点，而昨天的币值大跌，指出这转折不会是好的象征。

司徒和马的援华声明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司徒希望向知识分子及自由分子呼吁，但马歇尔见到第三方面不可能接管中国，尽管自由主义此运动是重要的，而其地位是很复杂的，它没有有力的军队——在中国政治界这是个决定的障碍物。司徒这两个演说有一个观念就是和谈，目的是或为真正民主制或至少为联合政府，已有好多观察家（包括我们自己）这样劝告过了。显然的这是中国今天唯一的办法。

马歇尔说国军缺乏组织和敌忾心，是早已为其他有资格人士所指出，这是任何援助所不能奏效的，而国民党常常否认，这就使人怀疑，国民党希望战争如鹅会生金蛋一样。国民党发言人迄今尚认为与中共言和是不必想的，当然，中共现在讨价会很高，但死硬派应当认识他们即使有实质的援助也不能打胜中共。这就是说，如中共的威胁的以武力来消灭，美军一定会来，这样做，而中国也许会成为第三次大战的战场。

5. 海关动态：

（一）二月二十四日，湖北轮自闽运来武装税警四十名，遣往深圳缉私总部。

（二）二月二十八晚，莲塘支所发生宪兵与民众武装搏斗事，详情未明，正调查中。

（三）九龙关支出费用无着，已欠农民银行四百万元，税司密令九龙车站可能征收每天五万元，采取二百元以下客带者可以免税。自二月二十日起，由九龙车站罗主任暗中通知各有关报关商携货来报，所有报单（即发票）非经该主任签字盖章不得征税。因此中下级职员因全部利益被该主任独占，不服，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天采取怠工，以对抗每天税收比过去仅多几千元。到二十七

日，该主任才放弃签字，直接由商人携发票给估验人员报验完税，税收每天增至二万元以上。二十八日税司亲自来车站巡视工作，令每客要凭车票始得报关纳税，概因该税司怕输管会攻讦，认为九龙关不照政府需要凭输入特许证方可进口的规定，故欺骗自己，而明明是货编作为客人自带自用的东西，二十九日的税收又减少。因为手续甚烦，每人带一件二百元以下的货，须经过磅、估价。

三月

1. 湛江警察局长何学超现已为警保处黄镇球所控制，现市长柯景廉仅留得两个分局长。前局长上任时，曾约定分局长将全部收入四六分，即总局及市长占四成，分局及以下人员占六成，故到任年余，大事搜括。

2. 黄镇球长保护处后，现成立了五个保护总队，都是客家人任总队长。最近有三个总队才去各县接收新兵，现五个总队干部，都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

3. 广东国民党政府最近拟成立青年处，专责搞青年运动，决定由法商学院院长张良修为处长。张是留法的法学博士，在中大、民大任教授九年，曾任中大师院系的主任，余汉谋的亲信，由余提拔于三十三、四年至今的国民参政员，前在七战区兼少将参议。为人略有自由主义思想，是一个好好先生，与各方都容易接近。该青年处主任秘书，内定是肖事根，中大毕业，思想倾向较好。

4. 宋子文官邸男女多能英语，男侍均西装革履，内警卫森严，不易接近，宋主行轺后，不明下情，自奉甚丰，张发奎在时，每餐五万，他来即改为二十五万一餐，现大概二百五十万了。据行轺职员说，现在经常拖欠薪饷，下面怨声载道。

因经费不足，缪培南（行轺副主任）有辞职不干之意。

5. 李朗如最近谈：

张发奎来港，见之，谈了一下，内容为老蒋任大总统，副总统可能最大是孙科。选举后，老蒋可能去台湾，以便让人在京和中共

谈判，如不和，可以再返京。

6. 工商界对中共的意见（三月一日）：

（一）章乃器提议应把解放区民营工业的状况报道出来，在东北，从新华社及《群众》，已可看成铁路、煤矿、农业及手工业的数字，但民生工业的情况，尚缺乏材料，最好把东北解放区的各种工业（民生工业在内）作个全面叙述，并与解放前国民党在东北的状况比较，将引起工商界的注意。

章并表示，要团结工商界来与中共进行交涉关于保护工商界事宜。

（二）南洋烟草公司简玉阶向某君表示：中共最好要将工商法令、办法、解放区工商状况及“二七社论”之类，印成小册子，分送香港商家，当有大影响，他甚至表示对此事可捐出钱来。

（三）章乃器谈：工商界对中共的观感完全改变，去年这个时候，他们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今年也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但不同的地方是去年希望国民党快点打败共产党，今年则希望共产党赶快打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的确是不行了。

（四）香港大成布厂老板李某与章乃器谈，认〔为〕国民党已宣告绝望，但中共的工业政策不知如何，甚表疑虑，李举出石家庄的纱厂被毁坏，作为中共破坏工业的证明。章谓此事或许毁于砲火，中共决不会有意破坏生产机关。李认为如中共能保存生产机关，让民间生产，则李本人决不反抗，只求得经营下去而已。

（五）董仲伟（现任华南总会主席）表示：在港办理“救济特捐”甚感困难。目前党部尚未有公文到会，即有公文到，彼亦交下届办理。

7. 工商界动态（三月一日）：

（一）吴蕴初来港之后，已在荃湾构得十万尺的地皮作为建筑天厨工厂之用，因吴认〔为〕国内靠不住，故他在美国所定的制造酸、碱的最新式的机器，不敢送至上海，而在香港开港云。

（二）据最近从上海回来的商人（新华汽车行经理温明超）

说，K党近在上海鼓励厂家及大商家南迁，因为他们已感到上海并不安全，故最近自沪南调资金不少。

(三)广州商人估计，上海、汉口不稳，资金南移，广州将有一个畸形繁荣的局面出现，但他们很担心粤汉路不通。

8. 官僚资本及其走私活动(三月一日)：

(一)粤汉路走私退役军人总数达万人以上，其中有少将参谋长四人，团长二十名以上，全部都有证件及穿军衣者。K当局被搞得没法，早已为他们挂专卡，让他走私，免查收税项及运费。在沿线常常与宪警及特务人员冲突。

(二)国民党中委委员邹鲁，目前来港，除作政治活动外，并送了一个开发揭阳锡矿的计划书给潘李公司港分公司，要求该公司投资合作。该计划由该公司翻译成英文，寄美国潘宜审阅，按该锡矿权是邹鲁在战前的投资，他想用矿权去换取美国的资金。

(三)港、沪间飞机的最大走私老板，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替宣经理这一业务的姓何，在表面上虽不是包租全架飞机，但每班机都有他们的黄货，大都藏在飞机的双翼和发动机里面。

9. 工商人物(三月二十二日)：

(一)蔡贞人又名蔡文玄，抗战前在汕头主办《侨声报》，以敲竹杠维持报馆开销。嗣〔后〕赴西贡，应该地富商朱继兴之聘，主持《远东日报》(该报现仍继续出版)，此时与陈立夫发生关系，其所获得之国大代表资格“系陈氏介绍者。当时蔡某即运用手段(收买猪仔票)拥朱继兴为华商总会主席。日人势力侵入西贡后，蔡某初赴澳门，后从广州湾经商，均失败。战争结束后始来港，由朱继兴出资，组织公司，估计彼现有财产约四十万(一说达百万)，广州设联号，由其弟主持。蔡某夫妇均染肺病。

(二)据间接调查所得“陈君冷(下简称陈)在沪读书时，结识广西兴业县五大土霸之一李伯筹之子李祖训，两人成为知交。李祖训之叔李锡余(已故)于民十七年曾任李宗仁之参谋长。抗战时间，陈应李祖训之邀，赴兴业中学(县立)当教务主任，当时李系

校长。嗣后李创立兴德中学，陈且兼该校教务主任。当时陈与兴业各绅士关系极密切，甚得彼等之信任。抗战结束后，陈来港，通过兴业绅士之介绍任三江布厂经理。原来三江布厂是一班兴业人创办的，其中大股东姓名略历如下：

梁权——前任广西公路处处长。

梁纬略——李宗仁部下，李任四集团军总司令时，他任经理处长。

黄维——前任广西合作金库总经理，广西银行董事，曾任该行副行长。

陈系受三江雇用，他并无股份。他任经理，完全是兴业人支持的。

10. 官僚资本动态：

(一) 荣氏家族主持之申新纱厂与宋子文有关，近荣尔仁由沪抵港，除视察南洋纱厂业外，并在浅水湾买洋房一座，值港币五十万元。彼于十六日赴穗，晤宋子文商请申新二五厂南迁事宜。闻该两厂已在穗觅得厂址。

(二) 本港华东企业公司系孔祥熙经营之大规模出入口庄，拥有欧美厂商七大代理特权，总公司在沪，港分公司系鲍志新。最近总经理董某来港，视察业务。

(三) 香港南洋纱厂是与申新纱厂有血统关系的，它的老板荣氏家族的荣鸿三最近曾来港。

11. 海关消息（三月十二日）：

(一) 新近由上海海关总署传来消息，谓中港协定的具体办法，将自四月一日起开始实施。故由各地海关调来香港的人员限于四月一日前须到齐，以便分配各新设关卡工作。

(二) Hopen(瑚珮)英籍海关税务司，本来在总署缉私科为税务司，前来港与港督协商中港协定实施状况者，就是他在主持。后他又到澳门，与澳政府成立中澳缉私协定。今则实任澳门关税务司。此君算是英籍税务司中在中国海关里最活动的人物。

12. 云南人所开之茂恒公司（在香港雷厂街十八号二楼），系与缪云台等官僚资本有关者，规模宏大。公司的董事长王少岩（近在香港）接到上海该公司之经理吴瑞之来函说，据一个叫张峻达的口头通知吴，叫他函告王少岩下列的事：

美国人叫麦克迈（大约系MC Bam）的，对腾冲人念念不忘（麦在战时曾在腾冲过），麦本人愿尽力帮助腾冲人把腾保（腾冲至保山）及腾八（腾冲至八英）两条公路造好，他并且已与美政府中华救济会（China Relief Mission of U.S Government）谈过，请该会赞助已久。同时有一个现在腾冲的美国医生也向旅港、沪之腾冲人建议，叫他们向政府要求，则美国可拨出资金办理此事。吴现已函缪云台积极推动此事。

王并已函南京之周柱城及尹泽新二人注意（周住南京正洪街正洪里，曾做过什么司令）。此事在吴等认为系腾冲最好的机会（他们大都是腾冲人），故异常秘密。说此事者再三声明此讯不要发表，否则他的职位要失掉的。

13. 资源委员会为了开发华南煤矿，已拟具一增产计划，于本年内加强各矿之煤产。该计划内容是开发与加强江西萍乡的煤矿，对湖南之永邵、中湘、湖湘、湘江等矿以及粤之南岭煤矿均添置设备，补充器材，增建电厂，增筑运输路线。此外并计划兴建鄂南的嘉鱼、蒲圻二县的煤区，预计该矿于本年七月起即可产煤。湘、粤、赣各矿目前每月产量仅三万三千余吨，至本年底再加鄂南及湖湘二矿，拟增产每月为八万八千吨。（三月二十二日）

四月

1. 工商动态：

（一）此次高卓雄签名拥护李宗仁总选签名，据高说由黄令驹向他要求签字，当时黄持书面，仅有董仲伟、郭赞（？）二人名字。高以为签字也无关重要，但该书面发表出来之后，始知有徐季良、蔡贞人名字，高谓上了一次当。

（二）此次香港政府立法院开会，非官议员周骏年、周锡年、罗文锦等攻击香港供应处甚利害。据内幕消息，这表示香港政府官僚资本与英国的华人买办一种经济斗争，因为罗文锦曾申请建屋，结果不准，此其一。其次过去供应处长加路荣曾与荣记合作办理配纱业务，曾获利三千万，加获利占三分之一。周锡年与罗文锦曾有要求供应事宜，结果被荣记抢去，所以在这次集中攻击供应处（供应处长加路荣因发财太多，已自动辞职归国，又荣记司理是中国人，此人在战前与加氏认识，当时彼手上只有十五元，因请求加氏帮忙，加氏乃和他合作创办荣记，因得加氏之支持，遂发大财）。

（三）香港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增高地价就是其中之一法。比如中国银行投买大会堂之地址，港政府喉使何东出面将地价提高，与中国银行竞投，故结果将底价二百万增至三百七十万元。

2. 九龙关高级职员人事调动：

（一）查近九龙税务司级职员除正税务司戈略尔外，其他缉私课税务司卢月波告长假离沪，由江海关调来张中炜代卢，又常务司柏尔默告老回英，由闽海关英籍税务司拔士调来。此外又从江海关调来一位估验视员侯尔。以上两位华籍副税务司，缉私课张及常务王颇开明，经济记者如经常向这两位税司访问，必有所获。（四月六日）

（二）九龙车站得悉二百元货价可以恢复整批纳税，三月初曾一度（约有数天）实行化整为零，充为行李纳税办法。后因柏尔默亲自到九龙车站阻止，但如小量零星客带仍可征收，每天税收只有数千元，距每天六万元之目的远甚。近又从总关传出，即将恢复三月份开始时那种办法，即准许商人将货化整为零，充作行李在货仓报关纳税。唯迄今此消息已传出数天，仍无实行征象。（四月六日）

3. 关于潘宜公司：

（一）上次美国议会开会时，由周以德、塔虎脱三人联署，请示国会通过三亿二千万美元作为中国复兴费，交由“拨款委员会”办理。此外并请求通过一亿二千万美元，作为军事援助费，其理由

中国建议如治安没有办法，一切都谈不到，故必先由治安着手。潘宜公司的投资计划是包括湘、鄂、粤、桂四省。（四月十九日）

（二）最近国内报纸攻击潘宜公司，其内幕是因具祖诒当在美国向美国会提出一个“中国行政计划”结果不通过，但国会上通过潘宜公司的计划。因此国民党买办们大呷醋，故发动攻击潘宜公司。

（三）据潘宜公司内部职员说：最近香港潘宜公司办事处与在美之潘氏电讯往返甚密，因最近议会将举行讨论潘宜公司之计划而向华投资。又美进出口银行拟直接向华投资，不想经过潘李公司之手，因潘李公司纯为一经纪人。

4. 潘李公司内幕：

潘李公司香港地址在德辅道中国民生银行九楼。

总经理潘宜，美国人，战前在美国做经纪，战时入伍，被马歇尔派来中国服务，驻第四战区为中美联络员。胜利后，返美国组织潘李公司，潘就是他，李是李仲生。潘宜第一次结婚已离异，第二次结婚，其妻颇有财产，现有子女四人，均在美，潘本人资力甚薄。在潘李公司，他与李各占六分之一的股份，实均系空头。现下每月在该公司拿一千元美金的薪水，目前留美，正作拉拢资本家投资中国之活动，计划甚庞大，但其拉拢无甚成就，倒因潘李公司去年买到大批陈旧物资，而被股东控告，在美国吃官司。

副总经理李仲生，粤台山屋禾田旧村人。父为美华侨，洗衣工人，名李圣策，十余年前在乡身故。仲生高中时代在中山大学附中毕业，后得其宗兄弟之助赴美工读，入华盛顿大学攻经济。战前回国，在张发奎之第四战区政治部工作，后调为该战区合作社经理。李整个是买办思想，曾对人言：中国如早日向日本投降，则美国在华可以干净地取得支配，也即无今日之内战，中国必须由美国统治，才能上轨道。蒋美联络后，李亦重派为中美联络员，与潘宜识。战后返粤，即赴美集资组潘李公司。赴美时向罗卓英询问可否代表他向美华侨宣慰。罗因利乘便，给李委托书，李遂以宣慰专使

之姿态在侨胞中活动。他向华侨宣传，不管在美买什么东西回去，均可获十个八个的利润。于是鼓动华侨组织了三个公司：一个是联信公司，一个是侨美公司，另一个名称待查。这三个公司，有一个是美国华侨安良堂一群首领组织的（如余祚斋、陈琼、梅友卓、余敬福等），总资本达美金二十万美元（三公司合计）。第一批货把资本尽买肥料、洋杂、旧衣车、被单……等，李从中中饱，提高进货价，因而弄到米价四百五十元一部衣车，回来只沽七十元。这批货亏本达千万美元，全体股东无不鼓噪，因为除安良堂分子资产较大外，其余都是辛苦来的汗血钱。经李此次贪污中饱，华侨社会已激起万丈怒火，安良堂一班人声言，如李再入美国门，必要他的命。

但李已发了财，在广州德宣路建了新房子，他立潘李公司，每月薪美金三千元。现经常住广州，从事出卖中国主权的活动，与在美的潘宜两相呼应。现美华侨已都知潘李公司是一个骗局，但国人知之者甚少。

潘李公司资本总额是三十万美元，全系美国人资本，其中两个是银行家。潘李公司目前业务：该公司一向业务甚少，因潘常在美国，李不懂生意，只是专心在中国从事出卖主权的活动。曾与罗记广东当局订了一个卖国条约，并与桂、湘、鄂省也订了条约。二月间，邹鲁来港，也尝与该公司接洽，要出卖揭阳某矿矿权。但李是有名无实的，一切要靠潘在美招摇，看能否拉到野心家来合作侵略中国而定。

潘宜曾函世界银行，请投资开发中国，得复谓：如有适当机会及计划，当可投资。因而潘、李遂利用了这函在中国官场招摇，于是取得了若干高级官员的信任。罗卓英以前之有五年计划，正想利用美资及潘之关系，以固己地位，而王东原、黄旭初等，亦未尝不欲走美国路线，故亦欢迎。

三个月前，该公司与港青洲英坭订了一个间接合同（直接与英坭厂订合同者为褶孟和之联×（？）公司），代运石头，从英德到

港，每吨收货值二十三元，每月至少运三千吨。但月来英德水道不清，保护费太重，运石起运成本不过二港元，但抵港超过二十五元，加以最近潘李公司运石船有四、五名职员被土匪掳去，运石已停止，该公司也已全无业务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认定潘、李是出卖中国主权的骗子，他们是买空卖空的，但如中国主权买到了，说不定也骗到美国资本家的本钱，故也不能太轻视它的做法。

5. 章伯钧十四、五日找黄琪翔的熟人谈，谓此地不能随便乱讲话，因中共批评。我猜中共下半年政策将转变。美元不可怕，但全国防共心理有力。若能解除防共心理，则战争可在年内结束。防共心理——各地军阀怕共。若中共对各地军阀用软攻而不用硬干，则蒋年内可倒。我虽不如毛先生，但我干过数十年政治，有些见解。惜乎对比间中共人士不能谈了。

国际局势虽紧，五年以内打不起来。意共（选举前说似不能胜。今后国际局势可望缓和。中共下半年困难将增多。其政策若不改，恐将打十几年。

6. 工商界对中共态度（四月十九日）：

（一）章乃器对任弼时的文章《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十分赞赏，“对于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及“打人杀人问题”二节，尤感兴趣，他认为任氏所说的地主如果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则政府不但要损失不小的一批劳动力，而且“他们就会去抢、去讨饭、去偷，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是十分中肯之谈，这种说法胜于空口说什么宽大为怀的话很多，因为政治是现实的，说仁义道德都不能使人安心，只有从实际利害出发才能使人觉得有把握。今后我（章）将根据这点向工商界说明中共之保证地主生路，保护工商业，并不是空话，而是有实际的根据的。

（二）黄炎培的《国讯》（沪版）经常登载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材料，第四五七期又把《中国土地法大纲》与CC的土地改革方案对比，并转载《华商报》的（其实是新华社的）“关于土地改革与整党

办法新指示，”致被国民党勒令停刊。该刊第四五八期为“临别号”（即停刊号），出版不及一天，沪市全数销完，且已三版矣。当停刊消息发表后，该刊一天即接到五百封慰问信，黄氏表示决不向国民党谈条件取得复刊，情愿就停刊下去，又有人劝他同施存统合作，将施氏的《展望》杂志加以充实，黄氏正在考虑中。

（三）洋纸行商会理事长潘柏年对土改表示意见：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值得拥护。查潘氏系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一位忠实的中山信徒。

他赞成实行三民主义。他说国民党的当权分子，都是中山先生的叛徒，他表示痛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四）油蔴地小轮船总经理刘德谱说：华南总会如果落在江浙帮手上，不要说进出口贸易全由他们垄断，就是将来江浙假如有水灾或荒灾的话，华商会一定捐出大宗款项去救灾，他说他的父亲（已故）〔生〕前曾和孙中山先生结识，帮助革命事业。但今天国民党不但不照顾老百姓利益，连从前效力革命的老同志也丢开了。

（五）英利行老板陈鑑坡（华商会干事值理之一）对记者表示：他在山东开设的商店，全被共军分子或充公，该店司理人已从解放区回来，极力攻击解放军。

（六）前正和银行高级职员，现在自己开大地行（在华人行）的彭成慧说：他在乡下有一间小店铺，人民解放军去后，物宅完全抢光，看铺的人被抓去关了一个月。有一个村不过千余人口，被派军粮千余担，现在他们周围乡村横直六十里，已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自卫，对外来武装，一律抵抗，对我们在乡村的政策很反感。

7. 民主圈内：

（一）谭平山甚重视老华之报告，已写成五、六千字之提要，将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作传达，×与他谈到任弼时的文章，他恍然认为片面强调缺点与错误，是不应该的，特别对于香港的民主人士更不应如此。对于党外缺点与错误只作原则性的提示便够，因太具体反足资反动派之攻击也。

谭对局势看法，认为美国之支持特殊堪重视，人民解放军恐不可能一口气打下来。目前的任务，应为在东北打下长春、沈阳，在华北打下太原，在西北应将势力伸入四川。四川在抗战时没受摧残，人力、物资皆甚充实，而且在对美战争的意义上更重要，四川如得，滇黔即可动摇，因此，他认为三北解决之后，军事可能停顿一个时期，南北对峙之局面，大可形成，中共应着手准备成立联合政府的工作。

谭对陈其尤甚为鄙视，说陈完全是在买空卖空，黑社会怎能成为“政党”，对李任潮亦不重视，认李无群众基础。

(二) 章伯钧对某君表示，中共对军事政策，失之狭隘，如能与各地地方势力取得合作，倒蒋更容易。现在是硬碰硬，自己打天下的办法，阻力当然更大。入春以来，军事无大发展，实以此故，大约再碰一下钉子，中共自然会转变其对地方杂牌军的态度。

(三) 据一部〔份〕民盟的知识分子反映如下几件事情：

一、在龙门，他们得来的消息是中农剩余粮食都要献出来，而不是从自觉出发，因此增城的中农对我也表示害怕。

二、在梅县三乡（张文的故乡）举行普遍借粮，除了欠个月粮外一律都借光。

上面两个问题，他们觉得对争取中农政策有出入，同时强调梅县一带是中农占多数，贫农少。如此问题搞不好，将孤立。现在许多较中立的人来港都对此不满，而最反感的则是肉票政策，如对一些回乡华侨，写信借钱，甚至有人被掳去。

三、对乱清算也不满，如梅县学艺中学校长李度广，并非地主，家产被清算，引起一般的反感，有一位姓廖的水客也非地主，也被清算。

四、梅县铜鼓障有一著名梅山矿场，出产煤炭颇多，有工人百余，最近我方派一政工人员去工作，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管理人提出要请示经理，并将其暂行停工，我方即要其复工，并要捐献。结果为K所闻，派了一营人到矿场驻扎，不能开工。我方以为是矿场

的报复，即将其大股东古洪昌之子掳去，结果用了港币二十余万元，都是行走的人得油水才放出来。目前煤矿不能继续开工，工人失业，客观上破坏了生产。他们希望要多反映群众意见。

(四) 三党中委李伯球的母亲在乡下被老K抓去，家里被劫一空，关了三天才由同乡担保出来。

(五) 伍宪子谓新政协仍为中共所包办，闻李任潮对伍谈：中共作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及不惜重大的牺牲而作战，不过在欲实行其主张和政策。因此关于新政协方面应尊重中共意见。

8. 报界消息：

(一) 曹聚仁每月从《青岛日报》领得津贴二百港元，约定每月供给文稿五、六篇，但其中大部份是从上海的《东南日报》剪来的。曹近日来趋悲观，《青岛》尚有曹的几篇未发表的文章，亦属于悲观失望的。

(二) 《大公报》每月支出为四万五千元，而每日之广告，只有七百元上下，全月亦不过二万元左右而已，故该报每月要亏本二万五千元。

(三) 《大公报》记者陈凡最近对某一个同志倾谈，其意见如下：

(1) 胡政之这次来香港办《大公报》，好象商店老板开支店一样。《大公报》在上海是赔本，而且时局不好，一定要将资产转移来港，如果《大公报》垮台，胡政之就不为胡政之。这次港版，并有准备将天津《大公报》人马调来港。

(2) 《大公报》港版方面，主要是向华南、南洋各地及在英、美、澳各地华侨。

(3) 《大公报》在这里经费与上海的帐目彼此独立，外面传说《大公报》拿政府二十万美元，恐怕国民党不会如此慷慨。

(4) 《大公报》发行数目一万份，广东销五千，香港及南洋约五千，广州办事处一个月经费用港币五千元，电报费约二千余，薪水二千余。

(5) 前次TV宋到香港,《华商报》传出他与保大密谈,恐怕不是,主要的是谈中港协定,与向香港银行集团借款。

(6) TV宋在广州东山那里有一个国际情报机关,人数约三四十人。

(7) 暹罗近来排华甚烈,有人给瑞纳书,谓将有大批学生来华转学。

(8) 近来香港因七学童失踪事,检查香港的学校很严,有一小学校教员因此被革职,又有一香岛中学学生被捕,后被学生的家长保出。

9. 华商会竞选(四月十九日):

(一) 据《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健章对渠下属说:“前次对华商会竞选拥郭的社论,是由港府华民政务司杜德所授意,先是杜曾召以董仲伟等元老派诸人商谈,董表示拥郭。在港府方面对这次选举雷荫荪得势固不愿意,但高卓雄当选,亦不放心,其理由:①《华商报》拥高,港府怕中共打入商会,②港府曾拟授太平绅士名义与高,但高表示要考虑,因此港府对高还不放心。③过去华商会做事俱按照港府意旨进行,港府亦甚喜,彼等作法,而郭赞为副主席,自然港府对郭信心会比高好。④港府怕纠纷,引起社会不安。”

(二) 雷派最近在石塘咀广州酒家宴请新闻记者,举动甚阔绰。据朱世璋对记者表示,高卓雄是一个人请客,我们是合起来请,已经有好多处是这样做,高不及我们对记者招待这样好。

10. 海关消息(四月十九日):

(一) 九龙关会计主任透露,海关经费十分短绌,将进行裁员、减薪。消息称,近以九龙关税收无着,职工薪水皆由杂项收入如缉私货物拍卖款项等拨充,设立支关经费亦屡请总署拨给,亦迟迟未下发,仅于本年一、二两月拨来一百二十万,不敷甚钜。本来希望九龙车站支关,每月能收入六十万,今则每天只收千元,故本关税务司又将实际开支情形呈报总署,请求拨助。而总署方面,却来了一张公文,叫九龙关税务司调查香港府职工待遇情形,并与九

龙关职工作一比较。据查本关业将复文送署，称本关高级职员之待遇尚不及香港政府之上级职员，而中、下级则比港府为优。如此则可能将中、下职员调或减薪，以节开支港币，并拟将薪津之一部发国币者。

(二) TV宋曾令九龙及广州两海关派员警在广九路上押送运火车以防走私，该关当局前曾派员警押运一时，因无良效，无形取消。近被TV宋知道此事，有点灌火，他下了一个警告说，如果粤、九两关不派员警，则渠将派军警来。因此，粤海关复派一班员警从广州与大沙头间押运，而九龙关方面则于蔡福围建设一卡，新派职员十五人及警士若干人从深圳到大沙头作押运工作。此事从本月十六日开始。

(三) 新近从上海送来旧驻船一艘，拟安在油蔴地作为水上缉私站，以查水上往来船只，此为中国海关在英国水界执行缉私工作之开端，唯开办时间尚未确定。由于西环方面亦有暂借招商局货仓栈房海关驻西环办公处之说，唯尚未有明令。

11. 关于黄埔建港——去年九月开工，分疏河与开港两部工程。疏河由水利局负责。开港工程分三期，每期定六个月，现第一期仅完成四分之一。据云原因之一为费绌，初定预算八百亿，至四月初尚仅得二百八十二亿。又因币值下跌，已追加至二千亿，而南京迄无款来。据工程处人称：以目前币值实需二万亿以上，因此仅第一期工程已无完成之信心，但南京最近屡催迅速完成，有准备发行美金公债之说。

12. 关于西南铁桥——沟通粤汉路与广三路的铁桥，预算须美金一百二十万元，交部已批准，但无款可拨，亦将以发行美金公债去兴建。

13. 关于南零公司——为资委会与粤省府合组，以开采粤北九牙洞煤矿者，兴筑由粤汉路罗家渡至九牙洞一段铁路，预算一千五百二十七亿，行政院核准一千亿，三个月完成。现因无款拨来尚未开工。但闻势在必行，因为成则九牙洞煤矿每日可运出四千吨以上

以解决湘粤煤荒，且于工厂南移亦有需要。

14. 关于穗新纺织厂——此为广东实业公司与上海申新纱厂合营之广东第二纺织厂，设河南草芳园广州纺织厂附近，申新已于四月初旬运到机器，共有二万锭，定九一开工。

15. 关于湔江水电厂——因缺钱，未进行。

16. 关于资委会与宋子文拟合办之其他各厂——市桥糖厂、海南钢铁厂、硫酸厂、亚肥厂，均因外汇以及机器、原料各问题未能进行，现宋与资委会拟邀请潘李公司三方投资合办。

17. 关于琼崖工矿——宋准备与美（可能是实业公司）、日三方签约共同开发，由美投资，技术人美为主而日为辅，机器由宋筹备，而不足则由美负责补充之，监督由美、宋两方共派。惟具体进行须先澄清海南治安，一切在协商中。

18. 海关消息：（一）这半月来，调来一位代副税司，办事十分死板，凡属货物性质之货皆不许打税，这是矛盾的。所有外勤人员抓住这矛盾，即顺他意拒绝所有货物税性质之水客打税。因此，半月来差不多没有税司，这位副税司被上峰召问两次，第一次回来告诉大家，可以放宽一些。大家可不管他的话，仍旧采取消极的办法。最近一次，他自动写张呈文（是上面的授意），请自二十四日开始可以容许客人在货仓报关，而车站方面则供应货车，每天八点二十分及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每次一辆货车，限每客报一件，以二百元为额，货重不超过40公斤。消息传出以后，很多客商来查消息，看来报货还不踊跃，今这两天只寥寥千数件。大前天晚上假太平酒家，宴会我也出席，有十一位报关者也来，他们要求放宽重量及免验车票。但这两种是上面规定，无法接受，而客人则认为开销大，利润小，穗价不高，不大划算，结果是试试看。客人报验时，先要拿票到副司务办公室签可后，交货来验。这种签可权为最重要，却握在内勤手里，故将恐怕又有一段内部的斗争。

（二）郑介民租借本港干德道（罗便臣道之上）四十三号A楼

下，顶费二万元、月租五百元，据说一年以来并无任何人在内居住。该屋属于娱乐戏院老板郑某，楼上简东浦三子借居，目前房东拟向郑收回自居。郑要求退回顶费及年来所交房租，双方相持未决。

(三) 据香港出口处徐嘉祥对经济记者私人谈话：

一、中港协定不能实现的原因：(1) 没有钱。(2) 没有办事处。(3) 缉私艇少且不中用，常被东江纵队打击，多则养不起，中港四六分赃并非事实，且不易实行，因为缉私人员通水(合贿)，不易缉获。(4) 人选问题K部争执甚大，陈策、李大超都想做缉私处负责人。

二、出口货因为要有结汇证，影响港对外输出，减少美元收入。港府拟准备发动立法局会议，取消该案。

三、华民政务司杜德答辩立法局非官方议员之发言，过于辩护本人，认为一个人担保，而没有用具体数字事实说明，工供局等的作弊。徐嘉祥对他很不满意，因为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缺乏英国民主气派。

19. 杂讯(四月二十九日)：

(一) 永华影片公司及大华印刷公司老板李祖永(宁波人)，与杜月笙等同为渝金潮案主角，当时李之获释，王耀堂(法律界，其时似在担任行政院顾问)也出了一点力，故李委王为大华总经理兼永华副经理，以为报答。永华资本据算达港币五百万元，图算霸影业，大华专印中国钞票，获利颇丰，这与官僚资本有密切关系。

(二) 关于冯苍我：①西源行资本港币二十万元，主要经营桐油出口，传与民社党有关。上月某日冯与陈其尤到他主持的培知中学合摄一照，某教员看见了，随便提及西源行资本大部属陈。②冯平时甚少到培知中学，一个月只到一、两次。最近某日冯到校后不久，托派分子余光乘(曾任岭东中学教员，现任元朗小学校长，聘用进步教员，冒充民主派)随即到访，与冯长谈两小时。③冯与九龙

流派头区震过从甚密，与区之工厂似有生意关系。

1. 反对日货倾销运动（五月十二日）：

（一）据商人说：港府曾授意此间厂商多多呼吁日货倾销的威胁，扩大影响，以便采纳民意，转呈英伦设法制止倾销。

（二）惠明洋行老板之一蔡惠鸿说：日货倾销，英国也身受其害，他代理的英国棉毛织品最近没有销路，是受廉价日货的打击。他又说：英国为了获得美元借款，不惜迁就美国对日政策，所以反对日货是不中用的。他已把日货倾销对英国货的打击实情，去函英国厂，请他们注意事实的发展。

（三）此次反对日货倾销，陈君冷最为卖力，因利害冲突故也。陈每日带日本正头货办在口袋中，逢人便出示说：日货一尺一元港元，而本港货的成本，一尺要一元八角，如何抵得住？大家如要活，就得签名，故他签得最多。

（四）徐季良经章乃器的关系亦签得不少，日来蔡贞人亦发动了CC，把此运动转去专门向港政府找麻烦，并做为对港府讲价的政治资本，应注意。

2. 工商界动态（五月十二日）：

（一）华商总会元老刘德谱（现任油蔴地小轮总经理）表示：华商总会中必须维持过去的“在商言商”的传统，这次粤帮商人既不欲“外江帮”把持商会，也不愿政治渗入商会，我们防国民党，也防共产党，也防民社党……。

查刘于港沦陷前曾和三井（或三菱）日人通气息，日本友人暗示太平洋战争可能爆发，劝他囤煤，他果然听了话，结果战争爆发后，他大发洋财。

（二）香港政府对于高卓雄颇为忌惧，因为目前在竞选运动中曾掌握了六十多个行头，团结了不少商场的人士，有组织便有力量。他过去曾反对成药税，所利得税，以及沦陷区债权债务法例案。虽然他是买办，但却刚愎自用。所以港府宁愿郭赞任理事长，因为郭最听话，而且没有群众。

3. 据蒋政府粮食部估计，去年全国各省粮食作物：①稻谷产九亿六千六百八十八万六千市担；②甘薯五亿一千五百四十四万四千市担；③小麦四亿三千零五十六万市担；④大豆一亿五千九百二十一万八千市担；⑤小麦一亿二千六百九十二万七千市担；⑥碗豆六千五百一十四万七千市担；⑦蚕豆六千一百八十六万七千市担；⑧糜子三千零五十万市担；⑨燕麦一千九百零六万一千市担。与该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前年和大前年的估计比较，稻谷比前年减产六百九十六万九千市担，比大前年减产二百八十八万二千市担；小麦比前年减产四十六万九千市担，比大前年减产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市担，而稻谷和小麦以外的十种杂粮底总产量，却比前年增加七亿零十万九千市担，比大前年增加六亿七千九百三十七万市担。这种估计自然未必可靠，尤其在现阶段蒋政府因粮食缺乏，粮价飞涨，非加紧欺骗人民之时，稻谷和小麦是否只减产这许多，而十种杂粮底总产量是否真有这许多增加，都无从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从这里知道的，即蒋政府所集中力量强征强借强购的稻谷和小麦确在减产，而一般农民所食用的杂粮却在增产，这不（以下原件缺漏——编者）

4. 惹息：中国海关派人搜去万安庄货物（该货是港走私去惠州的）达港币二十余万，此事予一般运输公司及货客很大波动。事后传谓是广东省府授权总关行动的，另说则事前曾有人向该庄敲竹杠不遂后乃发生此事。

5. 伍宪子谓新政协仍为中共所包办，闻李任潮对伍谈，中共作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及不惜重大的牺牲而作战，不过在欲实行其主张和政策。因此关于新政协方面应尊重中共意见。

6. 近来香港民主党派对新政协的态度似稍冷淡，转而企图摸索中共的态度。

7. 陈劭光谓新政协当由中共召集，但其语气并非作百分之百的赞成。

8. 朱蕴山和梅龚彬谓新政协召集的地点最好在四川。

9. 萨空了晤与港方与民主人士接头之玛格丽。华生女士。华生谓：①为什么你们民盟的主张总是和中共缠不清，可发一声明，说明你们和中共不同乎？这样，我们帮助你们也容易些。②你们知道捷克的教训乎？

10. 闻李济琛正在叫乐古印务公司买机器，准备搞日报。

11. 港美领馆职员狄克·谢维思在毛“四·一文告”发表后即来看我们，说民盟和中共是一样的东西。

刘、杨棋，拟成立发行一刊物，现已成立五人委会，刘五之仍是业主兼财务，杨棋是发行兼编辑，空了任秘书，曾招伦是编委会主席，胡愈之为不管部。

12. 据《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健章说：港府最近对民主派的活动比较注意，据说要收紧一点，但约束是有限度的，因为今天港府还要利用国共的矛盾来维持他的统治，他说《华侨日报》是百分之百执行港府政策的。（五月十二日）

13. 《时代批评》职员是袁大顿（又名河卓），在文协发动捐款赈灾（陕北）时，他没有捐款，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捐，他说怕周鲸文知道，影响他的职业。

14. 星州林芳声（前任《××日报》总编辑，现任《南侨日报》编辑）等组织《南洋经济导报社》，出版《南洋经济半月刊》，定六月一日创刊，内容和作风与《经济导报》差不多。

15. 传《南华早报》（英文）拟出中文版。（五月十二日）

16. 洋纸商会潘柏年对四童赴华界旅行惨遭杀害事件深表愤慨。他引用《德臣西报》的报道证明官方的声明完全撒谎。

17. 对于《华商报》，他认为批评蒋府措施不该带漫骂和火气，应该平心静气地说理。他并不反对分地。但他认为苏联是独裁的政治。

曾昭伦现编《现代批评》，向周新民找稿，周新民谓当时该杂志写稿，使他的内容可看。

胡：华侨对国家政府的认识与要求。——K与蒋虽坏，但仍是

国家代表。

新政协有人民国体很重要。

全国知、学应如何在人民国体上努力与参加，是否在劳工国体中值得考虑。

全国文化国体建立是否也必要了。

国际上的需要。

翦：是各国体联一致还是充实各国体，如何吸引国内教授、知识分子参加。

学生一线，教授二线，工商界三线，在沪已运用。

国体比政党作用小？

社会贤达的名词可否要？

如何准备开会的宪法各问题？

那些党派是真正民主党派？

那些国体才是民主国体？

人数？

政府早点搞还好。

矛：宪法或迟点，但纲领应快，集中搞，如何搞政协与代会。

侯：响应如何联系到全部纲领。

沈：如何成为一运动。

主要先搞纲领。

“五·一”号召是强大政治攻势；

矛补：也是一种对人民政治教育。

宋：研究后才来响应。

千：如何展开工商业中的宣传。

刘：美进步人士对蒋的希望已感到〔破灭〕，对中共政策也开始研究，对诬蔑者批驳。

如何成为运动的宣教工作。

孟：如何解释与答复不正确思想。

黄：加深研究，加强运动。

如何座谈讨论报告。

必要而要快些，学习国家纲领（运动）研究与批驳宪法。响应。

胡：根据群众意见来开展运动，希望于民主建国。

沈：如何从具体问题来发动，使运动更宽点。

黄：过去不是根据群众经验去搞，对艰巨的革命性如何用革命策略。

聂：大众化结果是政权问题，政治问题也解决大众化问题。

郭：如何把宣教工作搞出去。

有许多文件可避免倾向。

宣工要不怕麻烦。

巩固与扩大统线是质量互助。

宣传工作有时也不可太温和。

宋：从地主分裂出来的是否也是统线，故应多的研究。

18. 商界对“五·一”号召（五月十二日）

（一）潮商姚幕秋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发出之后，惟有武装斗争到底，蒋介石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他说K党方面，现在不是为了别的而战，而是为了保存四大家族的财产而战，不战到底，纵使现在投降，官僚资本也要没收。不过，他认为四大家族的财产是不能保守的，在军事上他们一定失败，国内财产要没收，国外的财产：美国到时因为中国新政府不承认蒋的借款，就要冻结四大家族存款，收回一笔烂帐。

（二）黄长水说：提出各党派召开政协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当更明朗，没有中间可谈。政协召开以后，当然成立各党派的民主政府与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政权对立。表明中共并非一党专政，工商界到那时，不是站在蒋一方，就站在民主一面，没有中间界线更明确。

《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建章近表示如果解放军渡了江，该报言论马上转风，但另方面最近仍想拉拢宋子文，不断求人说项，争取

该报入口。

《大公报》香港版十五日出版，仅印七千份，在港的销三千份，其余运穗，一般人认为内容不充实，尤以“《港闻》”及“《经济新闻》”为劣，均表失望。

《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健章表示：该报无条件拥高派，主因是香港政府反对CC渗入商会，他说：“CC在穗放火烧英领事馆，将来在港得势，岂非连总督府也烧起来吗？最后他说，目前尚未到正式表示态度的时候，等竞选白热化，快决胜负时才拿出主张来。

最近《华侨日报》已准进广州，说广州已取消惩办汉奸事，但国民党当局已拟定新汉奸三百余名，据说将通缉。樊仲云已进《华侨日报》做编辑，各周刊调穗。

19. 狄超白云：章乃器最近和狄长谈：

(一) “路只有一条”不如改为“目标只有一个”。

(二) 忽视做事，强调内部算帐，应“放手”一点。

(三) 认为美“和平攻势”为对蒋之打击。

(四) 认为现在应和谈，谓不必怕蒋暗中准备，因民主方面亦可暗中准备。

(五) 谓美国务院主张和谈。

20. 朱蕴山和狄谈：

(一) 革委会最近因机密泄露太多，加紧守秘密。

(二) 陇海以南有一支部队他有关系。

(三) 潘文华现在宜昌，很动摇。

(四) 朱学范在莫斯科时打电给李济琛，勉励他，至哈后又电李。

(五) 最近滇发生兵变，和革委会有关。

(六) 革委会在美建支部，王崑崙参加。

21. 陈劭光谈：

(一) 郭德洁去平时，谓李宗仁竞选费用，不用自己出，是外国人的。

(二) 胡政之与陈谈，对中共发牢骚。

(三) 粤方电桂方谓李任仁参加革委会，桂方拟在一星期内将李押至粤。

22. 陈琪璵谈：

港现有很多人希望联合政府快成立。

(一) 钟敬文对“五·一”文告以为又是一个转折点，战争长期化，否则是打败蒋后再成立联合政府，现在是要成为南北朝了。

(二) 陈汝棠谈革命委员会内部较民主团结，对“五·一”文告满意，发动委员会的写文章拥护，李任公同意“五·一”文告。

(三) 章乃器以为战争要长期化了。

秋江事日中，沈老等看毛“四·一报告”未说到各党各派，已强调中共领导，恐章伯钧等又要说：中共不要各党派了。

(四) 周新民对“五·一”文告反映，认为很好、及时，大家要求时正好来到。

(五) 陈琪璵认为“五·一”文告很好，要革命委员会表示，还要中共讲的话——即使中共要说的，不妨让我们说，表示民意。

(六) 万武说：联合政府、土改等问题又谈一次，土改问题有不满之处，最好能缓一点，要中共做到叫仁爱的地步。副总统选出前，他以为是孙科。

(七) 英国进步电讯社(Deane)东京电：现马歇尔手下有一部分人主张要政治阴谋，在港美领事馆已和港民主党派取得实际联系，如他们同意参加联合政府，蒋可下台，同时希望与中共做试探性的接触。

23. 民主圈内：

刚从美国回来的“广东实业公司驻美专员”的余少云(田屏)，广东台山人，北大毕业，现年五十岁，是广州较有地位的律师，他利用了罗卓英的关系去美利用实业公司名义，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实业的，他原是国民党的党员，暗中帮助李任潮和冯玉祥。

他最近回来对他的好朋友说：他曾经在美提出一个问题问冯玉

祥，该问题是：“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大党，非国即共，其他党派，力量却很少，民盟不见得有很广大的群众，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现在仅有李、蔡及冯先生等人，假如将来打倒老蒋的话，那国民党力量全部垮台、李、蔡、冯的国民党的力量很小，那不是在中共之下，变为现在 K 党下的民、青两党一样吗？到时如果 K 党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中共不同，会不会象捷克政变一样，被共党一脚踢走吗？”

冯答：“K 党现在只有蒋家几个人把持，蒋系以外的人，都不一定拥护蒋，比方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白都是反蒋的，他们在香港、美国都有代表，且和革命委员会有联络，将来时机一到，他们即一致起来，迫老蒋下野，那么，K 党不是保存很大的力量，和中共谈判吗？”

余认为冯的答复不满意，他说：如果象冯这样说，将来仍是保存有龙云、李宗仁这批家伙，那么打倒了老蒋有什么用呢？中国还不是老一套东西吗？因为他认为革命委员会没有什么前途。

他劝他的好朋友，要么就走老蒋的 K 党。要么就走共产党，如果不走蒋党，就不要加入民盟、革命委员会之类，要加入中共才是办法。

关于广东的敌情研究

——对敌人各种武装数量、使用情况、 军事计划及军事动态的估计

(1948年6月底)

一、广东敌人各种武装数量及其使用

甲、敌方兵力总数。

依据各方资料整理所得，确实结果如下：

(一) 国防军，共有三个旅另一个团及二个交通警察总队——三一旅三个团约共四千人；一五三旅三个团约共三千五百人；一五四旅三个团约共三千五百人；国防部直属独二团约共一千人；交总十四、十七两团约共二千人。以上合计约一万四千人。

国防军的调粤，系属整编接兵性质，初来时官多兵少，逐渐补训，一到相当足额，如六九师及其两旅九二、九九达一万三千人，便即由六月初起集中候命北调参战。今后很可能仍有残师败旅调来，旧有的亦将续增新兵多少。

(二) 省防军，共有十五个保警团，十一个独立营，一个盐警总队，技术部队有通讯、工兵、砲兵、汽车各一营，其他部队如特务、教导、省警等共四大队。此外还有虎门及海南要塞守备队等。人数如下：

旧有十个保警团现在总数约八千人；新编五个保警团现在总数约五千人；十一个保警独立营现在总数约三千人；盐警总队现在总数约一千五百人，技术部队现在总数约六百人；其他部队现在总数约一千五百人。虎门守备大队现在总数约三百人；海南要塞部队现

在总数约六百人。

以上合计约二万零五百人。

其中旧有十个保警团乃系由李汉魂留下给罗卓英，再转交给宋子文，素质很差和人枪不足；新编五团，仅保十五在广州经过两个月正规训练，人数较足，装备较佳，大概可与旧有保八成为最强的主力；独立营均在半年来拉杂编成。宋子文最近阅兵夸称新编五团及盐警队合计一万八千人，旧有十团亦补足每团一千六百人。根据现有材料，尚非事实。

(三) 地方团队

各地情况极不平衡，以东莞、中山、南海等县人数最多，把县保警、警察、联防队、自卫队等合计起来，其中每县约有千余人，但其他各县最大多数仅得三数百人。假如拿平均一县五百人计算，则全省目前最大限度不超出五万五千人。由上述三项统计可得结论：目前全省敌方正规军不出三万四千五百人，地方团队不出五万五千人。

(四) 其他兵力

敌方还有广州兵力、海军兵力及邻省临时加入兵力，三种计：

广州兵力：绥署警卫团二千人（六月下旬调琼增援榆林）；市警察二千二百人；义勇警察总队八百人；刑警队七十五人；再加上宪兵第二六团（一说三百人）；合计约六千人。

海军兵力：第四海军基地由海南迁广州，又移黄埔，全省设立四个巡防处：榆林、北海、汕头、秀英，配有小型装甲艇、浅水舰等多艘。

邻省加入兵力：闽边福建保警二团，桂南广西保警一团及一七四旅一部；桂东广西保警一团；赣南江西保警一团。

乙、敌方兵力使用。

(一) 驻粤国防军中心任务在于接兵补训，主要借来使用于警卫广州、韶关、海口三大据点及其附近铁道和地区。一三一旅旅部驻琼崖定安，警卫海口及琼文一带，六月下旬榆林告急，旅长张其

中亲率一部千人航运榆林增援。一五三旅接防粤北，警卫韶关及配合十四、十七两个交总保护粤汉铁路。一五四旅警卫广州及广九铁路，旅长张一中兼任广州警备司令。快速部队之独二团则经常驻防广州近郊及其外围。

这一类兵力，临时由绥靖公署指挥。

(二) 省级保警团，旧有十团一向使用于琼崖、南路、东江、韩江四处地区；新编五团增配东江、韩江、西江、中区各一团，留一个团在广州训练。独立营主要配属于各区专署，或边区指挥部，琼崖没有，东、韩江较多。这两种兵力，大概临时归边区或专署指挥。此外技术部队留警保处，其他部队派出各地区护卫机关，盐警总队刚编成，未见出发。

保一、二、九、十共四团久驻南路，保一刚调广州转粤北增防。

保三、四、六、七共四团久驻琼崖，保三、六均丧失过团长。

保五、十二共二团分布于韩江之连和兴梅及潮汕方面。

保八、十三共二团分布于东江之东、增、惠、博等地。

保十一驻中区之台山接兵，分布四邑；保十四驻西江之德庆等接兵补训。

保十五与盐警总队共两团在广州训练完毕，等待使用。

第一至第十一独立营的分驻地，依次为：1. 松口；2. 海丰；3. 茂名（一说潮汕）；4. 广州；5. 南雄；6. 高要；7. 惠阳；8. 揭阳（一说清远）；9. 兴宁；10. 钦县；11. 潮汕。其第四至第十独立营四月时尚在补训中。

以上旧保警团半年来未闻大规模补充，旧的及新的保警团驻地亦未曾经过大调动。

(三) 敌方军事机构部署，最初成立粤桂南边区，总指挥张瑞贵，依次为粤湘赣边区叶肇，粤闽赣边区涂思宗，到三月初三个总部都设立完成。全省又划分九清剿区，司令官兼专员，起用宿将，依分区数目次序为：1. 何彤；2. 莫雄；3. 莫福明（前任陈

文)；4. 张光琼；5. 喻英奇；6. 曾举直；7. 刘其宽；8. 董煜；9. 韩汉英。其中第六区九县，划四县为粤闽边，划一县为粤赣边，只管四县，防地划分颇为详细，叫做“分区清剿”。第二区清剿司令辞专员兼职，已由南雄县长韩建勋调升。同时又有区际联防，如一、三、七区联防主任为大绅梁明翰，县际以至乡际联防，形成错综复杂大大小小的系统。联防指挥所或办事处，有联防队；县城大镇有警所与自卫队部，乡保有自卫队。统由县长或专员指挥。

第九区琼崖近又改制，等于边区指挥部，另划清剿区。

四、五月间在桂东、粤西又新成立一边区，由广西派罗福康当总指挥，现在总部移驻广西怀集。这就是第四个省际联防的边区。

又传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将划出定为第十区，委张君嵩主管。

又传广东即将设一警卫旅，由原第二区专员莫雄当旅长。

又传一五三旅将改编成师，由原旅长李莱梧当师长，原副旅长陈丹青当副师长。

这三件传说，要看下文如何。

二、对半年来广东反动军军事计划总结算

(一) 敌大规模全面进攻阴谋终于破灭。

去年底三个月，宋子文初来广东，忙于了解情况，配备省府机构，一面继续按照张、罗时代重点进攻南路、琼崖的军事部署，同时抱着很大阴谋企图组织向广东人民实行全面的大规模进攻。他发出豪壮的代表说：治安没有办法，一切都无办法。他又保证粤省政治三个月有成效，六个月见成绩。他的助手黄镇球则保证“剿匪”三个月内见效，六个月有办法。他们原来的想法是：三个月肃清“大股”六个月内肃清“小股”，然后把广东布置成为蒋朝退路的最后基地。

但是，宋子文的时代，比罗卓英时代已不同了，因为人民武装

在半年来的发展中已较前更为壮大了。罗、张那时能够向着新起的对手发动全面进攻，后来也能够发动大规模的重点进攻，而宋子文一来就碰到了生长壮大不可欺侮的对手，只有另想办法了。

宋子文的计划是：第一，期望琼崖、南路方面的重点进攻迅速收效，调出兵力；第二，锐意编练新兵，建立强大主力；第三，起用宿将，设立清剿区及边区，完全〔成〕军事机构部署。他抱着这种打算，看到人民武装的增长，就愈加着急。他不停走动，活象热锅上的蚂蚁，向邻省乞粮借兵，向主子要钱要械。结果，到三月间才摆得好三个边区指挥部和九个清剿区，直到今天（六月底）才编足训练装；备了两个团新兵；南路方面也到了今天才能借重广西的协助抽出一团保警调粤北填防；琼崖方面的重点进攻早已变成重点防守。敌初时阴谋布置全省规模的全面进攻的主观愿望，就这样终成画饼。

由于敌人始终兵力不足，增补了一些力量，但始终赶不上各地人民武装的发展速度，无法加强全面兵力，造成全面绝对优势，虽然加上驻粤残师败旅整编相当完成后协助出动，仍是疲于奔命，不足应付；粤闽边区涂思宗从上任时候起喊兵力不足，就一直喊到现在，最近涂思宗在广州公开声称当地人民武装部队数量比他们的部队还多。琼崖韩汉英差不多每月飞广州一次求援；粤北六九师胡长青六月初临走前夸称毙伤俘降共解决了人民武装一万二千人，虏获枪械上万，但叶肇同时却叫喊着尚有人民武装四千二百余人。毫无疑问的敌人的大规模全面进攻，已不容易组织起来了。

（二）敌大规模重点进攻也组织不起来，宋子文初时继承罗卓英的余音，喊“南路严重，琼崖次之，东江又次之”，后来又喊“东江严重，琼崖次之，南路又次之”。其实北江、韩江、西江也相继引起敌人的注意。半年来的形势，敌人惨遭四面八方的围攻。严重与严重次之的地区很多，满天麻雀，惹得反动军头晕目眩。

以琼崖而论，敌虽使用了保三、四、六、七共四个团及一三一旅，但说不上大规模重点进攻，因为这些兵力放到琼崖不过只有挨

打。琼崖解放军半年来巩固了五指山根据地，并且四面出击，屡攻崖县县城、乐东县城以及儋县之重镇那大，打得敌人损兵折将，只有招架。最近榆林港军情紧急，广州绥处警卫团也开琼助战，驻定安的一三一旅旅长张其中率部千人慌忙航运榆港登陆。半年来，敌人抽调不动琼崖的兵力，但也无兵可增调琼崖，因此，就组织不起对琼崖的重点进攻。

以南路而论，敌使用了保一、二、九、十共四个团及配合桂南一七四旅一部和广西一个保警团，这个重点进攻是由张瑞贵继承着陈沛来执行的，我们南路主力既然能够向东向西打出，也就是粉碎了敌之进攻，何况平原老地区还能够在坚持斗争。就敌方来说，并没有更优势的大军可集中到南路，而最近又急调走保一团接防粤北去了。就半年来南路敌我兵力着眼，又就三月以后敌人在各区兵力分布来看，都不能说敌人在南路还进行什么大规模的重点进攻。

再以敌之兵力分布来说，三个月以后，大致情形就是全省各区相当平均使用兵力。三月二日焦岭县城被攻陷，韩江告急，宋之新编保十二、保十三，就分调东、韩江一带，并抬来福建保警二团协助闽粤边，配置新编独立营及分派出九九旅、九二旅、一三一旅之各一个团到达东韩江，分头合作。四、五月西江怒吼，中区活跃，保十一与十四就驻在这一带地区应付，又成立桂东粤西边区，借重广西兵力两团。此外，粤汉路、广九路及其附近地区都归属所谓国防军防地。

由于敌军兵力四面八方受着牵制，抽调不动，所以半年来纵观全局，并不见大的兵力调动，只见敌新编还未完整之兵力增配到兵力较弱的区去。因此，可以说大规模的重点进攻，也并没有出现。

这就是说，敌人的战略主动已被剥夺，接着全面进攻的流产，旧的重点进攻的失败，连新的大规模重点进攻，也都不容易进行了。

如果没有东、韩江告急，如果没有南路向西江、中区的跃进，如果没有相机进攻的战斗，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进攻发展的方

针，没有全面的战略协同的动作，陷于保守，敌人才有可能抽调自如，才组织得起大规模重点进攻。但是，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是以进攻粉碎进攻，以发展粉碎进攻，迫使敌之全面进攻胎死腹中，同时也打破了敌之重点进攻。

（三）所谓“分区清剿”就是“分区择点进攻”。敌之主动权已被剥夺，在全局使用兵力上已处于被动地位，但并未陷于毫无主动权情况，在主观上更绝不会放弃主动，那样的形势是要到来的，现在却还没有到来。因此，全面进攻尽管胎死腹中，大规模布置新的重点进攻尽管流产，敌人在多数地区范围内找寻主动方向还是可能的，所以，敌之所谓“分区清剿”，其实内容就是“分区择点进攻”。

在琼崖解放军今年转入进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局面下，那里敌人是在择点防御，主要警卫海口、琼文一带，防守临高、儋县，至于兵力调动则多数为了增援解围，而不是集中进攻，二、三月以后这种情形更加显著，最近则增兵守卫榆林港。

在南路方面，一、二月里，敌择点攻击化州我区，先搞化南，后搞化北。三月中，敌又转移兵力使用于廉、遂，经相当时期以后，才又转向四属，布置围攻十万大山。五月中旬，保一团便须集中韩江的十字围攻，八乡山围攻、南山围攻也是相继出现的一个地区内的择点进攻。其他东江、西江等地区，以至九连山区，大致都是择时择地的择点进攻。只有粤北方面，补足较优数量的六九师，才能采取近乎全面的推进的作战形式，我方受的压力最大。

以平原与山地划分来说，敌或攻平原，或攻山地，多不能同时并攻。这也足以说明，敌半年来高唱的“集中兵力，机动搜剿，争取主动”，至今唱未完的调子，在实质上只不过是区内择点进攻。根据已有材料，对敌军事全局部署与作战行动加以考察的结果，所谓“第一期清剿”，其特点就是这样的“分区择点进攻”。敌在“分区择点进攻”中所采取的军事策略，约分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是深入腹地擒捉主力，在运用上有围攻方法，或穿梭扫

荡（如在南路），或分进合围，或大军密集（如在粤北）推进围困。又有奔袭方法，由夜间偷进，拂晓袭击，到白昼赶至黄昏进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求得使用主力对付主力，找寻决战，企图收获歼灭或击溃的目的。

其次是动员地方反动武力协助出击或堵截，在进行上有大小联防系统的建立及联防队、自卫队的组织。又有筑堡驻防、特务封村等办法。这些办法，被视为主力穷追猛打的补助工具。

再次是悬赏、策反诱降、抚招等一套，此外，屠杀恐怖政策与怀柔欺骗政策交换使用，胁迫民众烧山、携信、向导等等。又特别着力搜捕嫌疑分子，宁错勿漏。

大概由叶肇年初建议的四个办法：1. 机动搜剿，“以匪情为主不分界域，穷追猛打，不任匪稍有喘息余地”；2. 县警联防，“截击逃窜之敌，搜捕清查”；3. 加强交通通讯；4. 彻底统制民枪，实际上都在逐渐补充执行。

特殊的，叶肇在粤北有“神秘区”的建立；韩汉英在琼崖进行过“并村”的做法；喻英奇在潮汕有强制中立分子“抗匪”的奇计。至于沿海河道实施海陆联防，争夺水陆交通要道及税站，则是普遍的。

就半年来的敌情观察，敌之军事策略原则，不外是“招抚兼施”，“军政合一”，“穷追久困”这三原则在下半年势将充实运用，而不会放弃或根本改变。

三、对下半年广东反动军事动态估计

（一）过去半年广东敌我军事斗争的结算：

上半年中，人民武装力量的胜利发展，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这证明了我们军事斗争方针的正确。首先二月和三月间，闽边武装挺进韩江，一度解放焦岭县城，接着使数个县城同时遭受围攻威胁。其后东、韩江人民力量密锣紧鼓的勇猛发展，不因敌之增兵择点进攻而陷于退缩。到四、五月间，南路武装向西江、中区的跃进，打

出崭新局面，并已奠下武装的民众的基础。这些就是人民的显著胜利，敌人之明显失败。近日来，广东反动统治阶级上层已失掉信心，威风扫地；其下层也起了更大动摇，徬徨无主。从全局形势上说，是如此，再从情势发展上说，全省人民武装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活动地区的广大普及，就材料看找不出那个县份是空白的了，这些也就是我们在这时期的最好成绩，敌人的最大不利。此外，各个地区内，我们既然能够坚持平原地带并不断扩大新的发展，恢复和巩固山地区域，便是实在使得敌人的择点进攻归于无用。至于琼崖，则是已经把敌人打得仅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力了。

敌人现在拿来自夸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以“战果统计”自夸；第二，以“新编兵力”自夸。关于前者荒唐无稽，连伪省参议员也不肯相信，伪省参陈洪範说：“警保处列举战果，说毙伤俘共军共三万四千零十一人，可是省参议员来自全省各地，如此的战果数字，我们十分怀疑”。另一位伪省参高深说：“省府总报告和警保处报告中，关于剿共战果就不同。省府说毙共一万一千余人，伤共三千余人，但警保处却说毙六千三百二十余人，伤四千五百余人。究竟省府说的正确，还是警保处说的正确？”结果，黄镇球对剿共战果的数目字“承认不正确，承认共军愈剿愈多。对政府方面损失没有作正面答复”（均见六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关于后者，宋子文在伪省参会上报告新编六个团达一万八千人。说加上各区去比原有兵力增加三倍。依这个计算原有兵力就是六千人了，但他又说原有十个保警团每团已补足一千六百人，便自相矛盾，显出自己捏造数目字壮胆。

宋子文去年底，“保证粤省政治三个月见效，六个月见成绩”，其助手黄镇球同时发出豪语：“绥靖三个月见效，六个月有办法”，现在都改口了。这次宋说“从来没有抱三个月、六个月的希望”，而黄说：“过去说三个月、六个月是有苦衷的”。这就是说，广东人民武装已经把敌人打得低下头来了。

宋子文的失败自供有说：“分区清剿，未能获奏全效”，“广东各区剿匪的进步，程序不齐，有一部份是发展较迟，有若干县甚至还有退步”。更滑稽的是《广东日报》发表黄镇球的阅兵讲词，有说“广东共匪半年内必定肃清”。次天（六月二十六日），黄镇球立刻在各省报上登出“郑重更正”，不承认说过“半年内”这三个字。由此可见，敌人尝了人民给他的苦头，过去的气焰是一落千丈了。

加上宋子文的“经建”全部无保留的落空，“军建”单只黄埔一港，粤汉一路、狗牙一洞，还是在等待美援而定，毫无一定把握，目前实际一筹莫展。他的“县政”，高唱改革，议论纷纷，目前实际举棋不定，束手无策，绝无前途可言。所有这些敌情，都促成宋子文走向下坡路的形势，使得敌人阵营中充满垂头丧气的氛围。

（二）敌可能布置疯狂的重点进攻吗？

敌之主要困难，在军事上仍旧是兵力不足，基层薄弱，人民反抗。关于国防军兵力，驻粤三旅一团，还有增足兵额，加强实力的可能。但全国前线吃紧，必须加速整编赶早完成训练，准备随时北调，所以在广东作战视作次要任务，临时借用性质，不可能远离韶关、广州、粤汉、广九两路及琼崖海口、定安、榆林港等必须守卫的地区，而使用于各地区深入作战。即使还有残师败旅调粤，也是忙于接收新兵，可不作真面目的作战力量看待。

关于省防军兵力，现有人枪虽然还可增补多少，依上半年情形看来，下半年也无法迅速的大量的加强，因此十四个保安团，十一个独立营，能够调动自如的很少。集中广州候命的保十五及盐警总队，就是敌人手上仅有的两张王牌，对照着现有的及日益增长的广东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发展的汹涌情况，可以估计敌人将不能超脱出自己上半年使用兵力的规律，而“国防军使用于韶、穗、琼及铁道区，省防军依当地情势严重程度，使用于各地区”。

反动统治基层薄弱，地方反动武力还不够普遍强大，这是敌人

军事斗争上的致命弱点。现在敌人阵营中，从宋子文、黄镇球到边区总指挥，到清剿区司令官，到各县长，都深刻的痛感到和认识了，比之上半年，他们不打不紧的单独希望省防军做救命靠山，已逐渐变成把希望寄托于“充实与整顿地方团队”，而实际宋子文也已经说出把这个作为下半年的中心工作了。他声称：“此后工作，将集中于充实整理各县、各乡的保警自卫队”。同样，县政改革，整饬吏治，健全基层机构。他们早已提上议事日程，特别目前深感迫切，决心下手去做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传统败坏，缺乏能手，目前又大势已去，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希望如愿做好的。

至于人民反抗，对于垂死的反动统治，是永远不能阻止的事。现在广东下半年起征的卅七年度征实规定二百五十万石，征借也是二百五十万石，比去年征借差不多是增加一倍。抽剥得更深，引起的反抗将更大是毫无疑问的，何况人民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及已经掌握的武装力量等都已大大提高，所以人民“造反”声势必越浩大。广东征兵额八万零五百名，到了期征足了一说二成，一说五成，下半年还要继续催征，人民对宋子文的反抗的自发斗争将是不会少，只会多的。

总括的说，敌人的情况是：兵力不足，调动不灵，基层薄弱，整顿不易；人民反抗，无法制止。依据这三个条件估计，敌要布置疯狂的重点进攻，还是不容易的。

（三）敌下半年的军事动态究竟怎样？

从上半年敌军行动中，可抽取出几点规律性的东西来作参考：

1. 国防军常使用于韶、穗、琼及铁道区，省防军则依当地情势严重程度使用于各地区。由于这样，我们就要知所轻重。

2. 国防军初来接兵增补，常静伏不动，一到经过相当整编时间，便即开始负担警卫协助战斗，在原地区向周围出击推进。由于这样我们就要严加警惕。

3. 国防军相当整编完成，常不能久留，前线吃紧，即须调走，又由其余较弱后继者接防。由于这样，我们有机可乘。

4. 敌人划区分防，陷于各不相顾；划区联防，又陷于兵力分薄，顾此失彼，无所适从，互相猜忌，互相埋怨。由于这样，我们有隙可钻。

5. 敌人鼓吹“经建”，整理县政，由始至终，毫无办法，只有走下坡路，因此唯有寄希望于军事，困兽之计，毒辣异常。由于这样，我们应该密切注意。

6. 敌人过去以为军事问题，可由单纯军事解决，后来已深刻领略，军事必须有政治及民众工作的配合，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所谓“总体战”，亦即所谓“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由于这样，我们应该确立对策。归纳敌方最近透露的材料，可预测到敌人的几个动向如下：

宋子文在六月底召开的绥靖会议上表示：“围剿大股，然后清乡”。他预定本年内首先击破主力，并进行招抚零散。据称他强调说：“最低限度毋使奸匪力量有增加”。宋说装备和经费不成问题，力劝各人赶快返防。喻英奇临返防前夸称：“五、六区合作，限三个月内肃清大股共军”。

七月一日的《国民日报》载，粤军事当局表示“涂思宗倦勤说不确”。后两天报载，绥靖会议决定“对粤东加强兵力，重新分配组训民众，有新办法”，又称：“今后兵力将机动集中使用”。

宋子文常常挂在口头：“省防军与国防军负责清剿大股；地方团队负责清剿小股”。这都是敌方阵营盛极一时的论调，也正是与充实地方团队政策相符合的。

最近传说绥署通令各县政府三件事：第一，附城择地开辟小型机场；第二，重修县境之内公路；第三，限于七月二十日以前编组民众自卫队：每乡一队，每保一丁，经费弹粮，地方自筹。独二团近在从化采取“穷追长困”战术。

综合起来，即可以预见：

A. 由于“第一期清剿”归于无用，正如宋子文自己说的，“以兵力不足以及种种环境关系，未能悉达预期效果”。那么，下

半年的军事计划，他说已改为主动及突击战略，并注意培植民众武力，这是必然的。这就是集中兵力，机动使用的说法。

B. 由于“穷追猛打”未能收效，所以改变到“围剿大股，然后清乡”，实际上是采取长围久困政策，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肃清平原，围困山地”的说法。

C. 由于有两团新兵在手，又有少数技术部队训练完成，只要交通便利条件存在，敌之“主动及突击战略”是可能出现的，但不一定能够做成大规模的重点进攻。

D. 由于有些地区建筑了碉堡，发动了反动武装，只要再加上我们的民众政策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地区内敌之“长围久困”政策是可能实施的，但不一定能够贯彻收效。

敌下半年的军事动态究竟怎样？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分区清剿，择点进攻”，但带上新的特点，就是可能主动突击某一地区变成重点进攻的性质；同时可能对我们实施长围久困，断粮绝援的政策。详细的变化，是必须随时密切注意，加以细心研究。

如果说敌人不是疯狂进攻，就要转入防御，这是不对的。因为敌不容易做成疯狂进攻乃是由于兵力不足等条件限制，但敌平均使用于各地的兵力，虽则被牵制于各地区、却还能打硬仗。我们就不能打硬仗，它还能找寻主动方向出击，我们则要避其锋芒，夺取我之主动发展方向。

如果说敌人在这下半年将是整顿、准备，以便能够在将来向我大举进攻，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主观上说，敌人不能自信将来的时机对敌人有利，从客观上说，敌还不是已经到了毫无气力的时候，目前只不过是我和宋子文打了第一个回合，敌军有生力量并没有损失很大，相反的，就敌军自己来说质量、数量是有增长的。仅仅在相对发展观点上看，我们已走在他的前头吧了。

我们只可以说，假如没有解放军压迫华中，强渡长江的形势，没有全国革命高潮与广东人民斗争高潮的存在与发展，我们广东人民武装斗争没有正确的领导方针与正确的民众工作政策，而同时敌

人有了更多的残师败旅调粤整编及作战，敌保安团完成辆流抽出补训，地方团队真正整理充实起来，那么只有在这些条件出现的时候，敌人才能转入大举的全面进攻或大规模的重点进攻，不然的话，敌人就没有这个可能。而我们不是在睡觉，我们是要提出和推行足以打垮敌人的对策。

四、针对敌情提出军事对策

这里为了讨论研究的方便，仅只根据上述对敌估计，开列几点极不成熟的意见以供参考。

我们认为上半年敌之军事策略原则归结为“军政合一，穷追久困，剿抚兼施”三点，并预计敌在下半年将要加以更充实的运用。

我们认为目前整个形势是旧广东在灭亡，反动阵营中的头子过去的气焰已一落千丈，新广东在生长。又由于敌兵力不足，捉襟见肘，基层机构，不可救治，人民反抗抽剥迫害的斗争不可遏止。因此敌人在此时期纵使主观上不放弃向人民实施疯狂的进攻的企图，但实际上极不容易搞得起来。虽然这样，但盲目的轻视敌人，不警惕敌人挣扎的凶锋，是会常把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的。必须承认敌还能够集结相当兵力，机动使用突击，这对某一地区的压力是可能很大的；又必须承认敌还是能够逐步加强地通过千方百计来实施对我长围久困策略的。

此外，上半年敌军事行动使用兵力的几点规律，也可放在参考利用之列。

按照上述这些实际情况，首先我们要求有坚强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产生密切的战略协同动作。这就需要各地区不断的积极打有准备有把握有缴获之仗，从打仗中壮大队伍，锻炼战斗力；并在扩大战果中配合兄弟区的战事发展，使得全局对于我们有利。只有如此，才能分散敌人集中的视线，随处粉碎敌之机动突击战略，使之无法出现或出现了反变成泥足深陷，再也抽调不出，又解决不了问题。结果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反给我们其他地区大好跃进的机会。

其次，我们要求加强整顿队伍与巩固群众关系。这就需要不断努力的进行整训（整党与整军），为纯洁党的组织与纯洁人民的军队而奋斗，加强气节教育，加强阶级教育，特别加强形势的教育（包括指出敌之政治败坏不可收拾，经济崩溃束手无策，经建落空毫无成就等等现时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提高对大势的明确瞭解，充实对胜利的坚定信心）；注意防奸，注意防腐，并且注意争取及瓦解敌军工作，同时严格执行正确政策，提高干部通晓政策与掌握政策的程度与能力，搞好各项群众运动。

只有如此，才能打破敌实施长围久困的险毒计谋，而终于赢得巩固的决定的在广大地区的广大民众中的胜利。

第三，我们要求尽量扩大游击区域，进一步建立巩固根据地。这就需要继续坚决的发展游击区工作，从进行重点工作中，经过适当选择与充分准备把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严厉对付最孤立的反动特务及地方恶霸，可以采取擒贼先擒王手段，但以较容易较脆弱的做对象，而不是硬吃钉子。

只有如此，才能打落农村中的反动堡垒，打散反动的大小地方联防系统，制服反动团队的武力，使敌军失去在农村立足之地，摇撼整个反动统治的基层，使之急促崩溃。

此外，我们必须预见民众抗征、自卫斗争必将继续广泛发动，并随时准备相当干部及时派出，采用适当步骤加以提高成为坚强队伍。准备大规模展开破击战术，多制地雷，打垮敌之军运交通，使敌之快速部队用途减少及集中使用兵力效果减低。估计到天空发现敌机的时候，并应适时略加防空训练，主要是懂得如何避免敌机侦察或扫射的目标。至于一切战术训练，即应根据各个地区情况研究规定加以有效的实施。

总括起来就是说：采取积极主动的再走上前一步的扩大进攻、扩大发展的方针，反对保守停滞、徘徊却步、坐失时机、陷于挨打的等待的错误方针，认为敌人已转入防御或在静待时机，对我疯狂进攻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是要不得的幼稚乐观；但认为敌之疯狂进攻

无法制止，不能战胜，也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布置和实现于我有利的
新条件，并大胆机巧上前迎击，就必能克敌取胜。

敌军兵种人数及分布驻地表

番 号	首要姓名	人 数	装 备	驻 地	任 务	备 考
154旅	张一中 副曾传垣	3500		广州·广 九沿線	警卫	旅长兼广 州警备司 令
153旅	李荣梧 副陈丹青	3500		粤汉路 沿線	接防粤北	
131旅	张其中	4000	美 式	琼 崖 海 口、定安		六月旅长 亲率千人 增援榆林港
独二团		1000	半日式	广州郊外	驻防	快速步队
警察交通 总队一四 ·一七		2000	半日式	粤汉路 沿線	护路	接六九师 防务

附注：六九师（全部兵力13000人）本月初师部及九二旅一团已抵
达汉口，其余之九二旅集中穗北、九九旅集中原地候命北调。

番 号	首要姓名	人 数	装 备	驻 地	任 务	备 考
保一团	练仲宏			新调粤北	接防	原驻南路 湛江
二 团	王仲声			石康、钦县、 安铺(南路)	作战	三营十二 连
九 团	陈 鹏			防 城 (南路)	作战	三营十二 连
十 团	陈一林			化 县 (南路)	作战	三营十二 连
保三团				琼崖儋县 那大	作战	1.原团长曾 杰于六月初 阵亡 2.三营十一 连

番号	首要姓名	人数	装备	驻地	任务	备考
四团	罗志英			琼崖北黎		三营十二连(第八连缩编)
六团	符仲英			琼崖西路	作战	1.原驻琼山旧团长陈瑞斗章那大战斗阵亡 2.三营十二连
七团	易俗			琼崖琼东、嘉积	作战	三营十二连
五团	列应佳			韩江和平彭寨一带	作战	三营十二连
十二团	魏大杰		每营附重机连	韩江兴宁潮汕一带	补训	三营九连人数未足
八团	徐东来			东江惠州	作战	三营十二连 每连131人
十三团	曾天节		每营附重机连	东江	接收新兵	三营九连
十一团	刘耀华		每营附重机连	中区台山新昌	整训	三营九连
十四团	罗梓彬		每营附重机连	西江肇庆	接兵	三营九连
十五团	陆文琛		每营附重机连 配备新式	广州	候命	三营九连训练完成

附注：1. 保一至保十团均无直属队，保十一至十五与三十七年度之国防军步兵团编制同。

2. 人数依四月份之保警处统计，每团均有千人以上，但查实并未依数补足，现每团约七、八百人左右。

3. 各团驻地虽调动频繁，但均不出一定防区范围内。

敌军兵种人数及分布驻地表（续上）

番 号	姓 名	人 数	装 备	驻 地	任 务	备 考
保警处直 属特务营	蓝琼林	430		广州及派 出各地	警 卫	四 连
省警教导 大队	吴祥雁	298		广州及海 口	警 卫	三 连
省警第一 大队	张国熙	408		广宁春水	作 战	四 连
省警第二 大队	李 飞	393		广州黄埔 各机关	警 卫	四 连

附注：直属保警处之工兵营、炮兵营、通讯营、汽车大队传已成立，详情未悉，待查。

番 号	首要姓名	人 数	装 备	驻 地	任 务	备 考
保警独立 第一营	蓝举初	296		潮汕杜口	作 战	四 连
第二营	钟铁坚			海 丰	作 战	
三				一说潮汕	成立中	
四	陈汉英	216		广 州	补训中	
五	潘国杏	136		南 雄	"	
六	李振林			西江高要	"	
七	邱德明	143		惠 阳	"	
八	曾 吉	554		韩江揭阳 一说清远	"	
九	叶剑光			兴 宁	"	

番 号	首要姓名	人 数	装 备	驻 地	任 务	备 考
十	胡鑑光			南路钦县	补训中	
保警独立 第十一营 宪兵第二 十六团	王国权			潮 汕	作 战	
	刘襄汉	300		广州市		
绥署警卫 团(两个)		2000		广州市	作 战	现调琼崖 作战
市警察		2000		广州市	治 安	
刑警队	王一平	七 五	短 枪	广州市	侦 查	
义勇警察 总队	欧阳新	800		广州市		
盐警总队		据称足额	新式配备	广州市	候 命	
海军第四 基地司令 部	杨元忠	砲舰查存 者有：美 益、美、 海翔、公 海平第一 四等多艘 配轻重 机小钢 砲		司令部设 黄埔四个 巡防处： 1. 榆林， 2. 秀英， 3. 汕头， 4. 北海	配合海陆 联防	

香港工人的反美帝扶日运动

(1948年7月)

鲁 保

日本在美帝扶植之下，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宣言》，保持了财阀的工业，和变相的武装，大战犯逍遥法外，法西斯日益猖狂。美帝协助日本发展贸易，廉价的日货，冲进了东亚的许多国家。蒋管区的民族工业因此惨遭摧残，工商界纷纷破产，国内工人兄弟大量失业饥饿，不忍想象。

在本港，战后美货大量输港，本港受到的威胁，是很严重的。日货大量输港以来，更是不得了。由今年一月至三月，大工厂倒闭有报载者计有印刷厂三家，制药厂一家，灯泡厂一家，炭精厂一家，其余未经宣布实已停业或无报载者尚未计在内，目前受打击最严重者为纺织业及橡胶业。纺织业方面，手机织造厂已被日货摧毁到百分之八十停工，规模较大的电机布厂，也陷于半停顿状态，现在勉强继续开工的织造厂，全行不断进行减薪除人，或减产，最大的布厂，目前也不过保留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量而已，现在各厂有个一致的现象，就是每一个工人，每织成一匹布后，必停工一周或十日，她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试问怎能过活。不仅如此，每月找到三几疋布织也不容易，据统计，由于仇货倾销而完全失业的男女纺织工人，为数起码在二万以上。

橡胶厂倒闭的也很多，港九大小五十家胶厂中，规模较大的如“大行”、“香港”两家已完全停工，规模较小的如“南英”等十一家也已停止出产，“中美”、“华强”等几家已实行“轮工制”，著名的

大胶厂如冯强等也宣告减产，全行陷于风雨飘摇中，估计橡胶业目前失业工人为数在五千以上。

此外，如玻璃、瓷器、搪瓷、化学品、成药、玩具、五金等等亦皆受严重的打击，纷纷停工减产，全港普遍除人减薪，工人失业人数之多，生活所受威胁之大，较之战后任何时为严重。

不仅如此，甚至因为生意不佳，车主也会解雇司机，工厂倒闭得多，缺乏修建工程，三行工友也无工可做，供电减少，电力公司也可以进行除人，机器工人也将无机可修，所谓“一淡白淡”，因此，美日侵略，确使工友人人自危。查香港工人，为数最多者是纺织业，次则为造船业，在美帝积极扶植之下，日本造船业不难复兴，日本造船业在战前是世界有名的，现再加上美国的扶植，将来对本港船坞的打击必大，到时人数占全港第二位的船坞工人难免失业，其影响本港工人生活当更加严重。

二

香港工人面对着当前的生活状况，面对着自己的死敌又重新加诸自己的威胁，不能不回忆在三年以前，在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当中日寇加诸我们的凌虐，它，曾要我们捱了三年木薯粉，要我们付出三十六元代价购一斤番薯渣，要我们捱到患黄肿病，要我们家散人亡，捱尽了多少“萝卜头”的鞭鞑与掌掴？特别是香港电话工友和太古船坞工友，更不能不回忆自己的旧伙伴多少被牺牲在敌人毒焰之下？

部份工友是于战后才新到香港做工的，这部份工友在日寇铁蹄下生活得很长，捱得更惨，自然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兄弟如何被日寇迫死杀戮的惨状，或者是自己的妻女姐妹如何被日寇奸淫的冤屈，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恨，太平洋的水也洗涤不净。

同样不能忘记，不能被抹煞，更不能被糟蹋的就是香港工人当时怎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反法西斯而协助英军抵抗强寇，保卫香港，随后英军弃守香港，又如何艰苦回国参与与日寇英勇血战，

果敢牺牲，拯救了不少中国同胞和英国朋友，把日寇从中国从香港最后地赶出去这些光荣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香港工人对于这些旧恨新仇，是不能忘记，是一定要洗雪的。六月十八日的晚上，港九工会联合会，接受本港各业工人领袖的建议，召开了一个“港九工团夏季联谊茶会”，是晚赴会者有各业工人代表约共三百人，代表三十个产业工会和职业工会，茶会长达三个钟头的时空中，大家都争着发言，代表们代表了全港十几万工友提出了控诉，过去三年零八个月被日寇迫害到如何惨酷，八年抗战如何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胜利以来又如何忍受折磨苛待。现在，日寇投降还未满三年，仇货竟又卷土重来，广大工人又被迫陷于失业饥饿的惨痛境遇。代表们找寻出了这个惨痛的根源，提出了互助自救，主张要从“反美帝扶日，反蒋府卖国”来割除失业饥饿和一切惨痛的根源。

这样的主张完全正确，确实地代表了广大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这些主张是从工人群众中来，它一定能够再到工人群众中去激发起更伟大的巨浪的。

三

目前，香港反美扶日运动已在广大的工人、工商界、青年学生、妇女群众中普遍展开，香港侨胞也和国内同胞一样，眼见到民族工商业及本港工商业惨遭美蒋日的摧残，感到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为了国家民族及自身的生存，向美帝国主义提出强硬的抗议，结束中国封建、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抗击，这一纯属人民自卫行动，一切有血性的爱国的中国人民，以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朋友，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无不寄予同情和参与行动的。

但是，香港人士特别是香港工人必须警惕，还有一些人制造一种或很多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企图把我们这一运动扭转到相反的方向甚或对我们诬蔑、中伤、反对，企图把这一运动停止。

有些人装着同情这一运动，但说中国目前的外忧是日本，内患是中共，中国必须安内攘外，因此，他们说反对美国“过份”扶日，他的主要目的却是要求美国援华（蒋）剿共。他们企图把这个反帝反卖国的人民运动变成帮助帝国主义帮助独裁统治者杀害人民的活活动。这样的人，请美援蒋是真的，反美扶日是假的，这些人无疑是法西斯独裁者的走狗，是人民的敌人。

也有人说如果要反美帝扶日，那么也应该反对“苏联帮助共产党作乱”，这种故意造谣惑众，不值一驳的，但必须明瞭造谣者的居心，他们无疑是企图转移群众的视听，主要的作用是和缓群众对美蒋日的仇恨，抄袋希特勒的方法，扯起反苏反共的旗帜来进行杀害人民，向人民加紧掠夺。

提得比较动听的谬论是用“自我努力”去挽救民族工业危机这一种，他们说，美帝扶日我们无须管它，我们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减低成本，改良品质与日货竞争。我们认为自己努力，减低成本，改良品质是必需的，但我们同样必须自知，我们的中国民族工业和香港华侨工业不论在历史、资本、机器技术等条件都不如人，日本工业素称机器好，工资平，加上现在美帝的贷款投资，资本雄厚，不仅我们无法抵当，即很多工业国家亦恐不容易招架，今日中国民族工业和香港华侨工业还是一种新生的嫩芽，如果不加保护，而先任外力摧残，那有不覆折之理，如果我们不知己知彼，实行反美扶日，实行禁止日货入口，实行抵制日货，纵然高喊“自我努力”甚或不顾一切以强硬手段压低工资，其结果只有弄到工潮澎湃，而民族工业和华侨工业只有在“自我努力”的漂亮口号之下，被日货摧残殆尽，侨工生活益加痛苦而已。

最露骨的是说这一运动有政治作用。藉此对群众半恐吓，半威胁，以破坏这一运动。这个反对美帝扶日运动，是中国一切爱国人民，全世界（包括美国）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一个自卫行动，当然是一种政治运动，没有这种运动，美帝国主义者即将扶起日寇再来侵害我们，屠杀我们，我们应该反对，破坏我们这个自卫的“政

治运动”，以便美日向我们侵害，他又有何居心，他是不是有政治阴谋？为了广泛深入展开这一运动，必须清除这一运动的障碍。

四

香港工人在这一反美帝扶日的运动中，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正确的主张，应该掌握着正确的方向。笔者根据各报读者版登载的工人意见，和很多位工人代表人物谈过，特别系根据最近本港工团发表的文件综合整理，提出下面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首先，加强全港工人阶级团结，在本港各界反美帝扶日运动中，工人阶级应该起带头作用，保证反美帝扶日运动在本港范围内广泛深入而又正确地展开，并取得良好效果。全港工友应该不分轻重工业，不分失业或仍在业，不分男女一致团结起来，实行同舟共济，互助自救，目前几万工人兄弟姐妹已陷于失业饥饿，我们必须提高阶级友爱，向各工团，向各在业工友，向社会人士展开救济失业工友运动，在加强阶级友爱中去加强阶级团结，通过救济运动来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和对法西斯侵略者及卖国贼的憎恨。从而敢于起来自救救人，自觉觉人。目前本港工商界、青年学生、妇女各界的反美扶日运动已经开始，但还不深入，不广泛，工人阶级应该在他们面前起示范作用，以保证这一运动在全港广泛深入展开，正确发展，美满收获为己任的。

其次，在反美蒋日侵害的前提下，在资方开诚公布要求合作的原则下，应该与资方谅解提携。在平时，为了反对资方的过份剥削，为了反对资方的无理压迫，我们不能不与资方进行斗争，但是今日大敌当前，一个凶恶的共同敌人已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如果我们不合力去将它打退，我们劳资双方都会发生危险，因此，资方也应该和我们一道反美蒋日的侵害，不是一意孤行藉口减低成本单方面进行开除工友减发工资，应该公开成本，有困难时双方推诚相与，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如果确系这样，我们工友是可以与资方协议出合理的适当的解决办法，以实现劳资合作，共同去反对美蒋日

侵害的。

第三、香港工人应该在要求中英人民紧密合作反对美蒋日侵害，反对日货倾销危害中英人民利益的原则下，要求英国朋友和我们一起进行要求香港政府和英属各地政府禁止日货入口。美帝国主义者违反了战时盟国中美英苏人民的意向，违反《波茨坦宣言》立场，不尽盟国委托管制日本之责，反而尽力扶植日本经济扩张，帮助日寇占夺香港和英属各地市场。美帝国主义者以我们的仇货来打击战时盟国中英两国的工商业，是违反了一切协定一切国际精神，香港政府和英属各地政府自无须客气对日货（仇货）禁止入口，以保障香港和英属各地的工商业、工人生活和人民大众利益。在和会未开，和约未订之前，日本还是我们的敌国，日货自然是仇货，香港政府和各地政府不仅有义务禁止日货入口，而且有权禁止入口，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惟查目前香港与英属各地已仇货充斥，中英人民应该谨记三年前被日寇凌虐的可怖，实行不买、不卖、不用、严予抵制，工人阶级应于这一点上起模范作用。

我们深信，在香港工人和各界人士一致坚持之下，反美扶日运动是一定胜利的。

（原载《群众》25期，1948年7月1日）

纪念“七·一”与整党

（1948年7月）

星 星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二十七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已进入全国规模的彻底胜利阶段，中国共产党行将

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这固然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但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将要担负起更繁重、更伟大的任务的预告。纪念“七·一”加强整党，就是要加强党使能够胜任愉快的达到这一目的。

在南方，一年来农村的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城市的民主爱国运动，都已有一个急速的发展，而党的工作，则远落于这个发展的形势后面，故南方的整党工作，较之北方的解放区，实在更为迫切而需要。

根据南方的一般情况，南方的整党工作，必须从以下的五个问题着手。

南方农民斗争的发展，已经有成千成万的优秀的工农知识分子，拿起武器作自卫的游击战争，而联系千百万的群众在其周围。南方党为着有力而胜利的领导这些武装与群众斗争，就必须大胆的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中去物色其中的积极分子，有计划的去培养、教育、吸收他们进党，以强大党的力量，以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够真正成为群众性的大党。

南方党现在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有山地的设立政权的据点，有平原的游击战争；有合法而配合以非法的农民斗争，有在敌人疯狂统治下的城市工作；斗争形式不同，因此党的组织方式也应随之而异。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与善于灵活的运用，我们便不能有力而适当的领导斗争，我们便有遭受敌人在若干地区破坏之危险。因此，整党工作应该如何重视这些不同地区的如何调整，公开与秘密如何划分而又应如何有机的联系，目前的使用与将来的使用如何严格的区分，也是我们要动用脑筋依照实际情况下解决的问题，善于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目前的工作做得好而不受破坏，将来又可以做得更好。

南方党与群众的联系，一般的是建立起来了的；个别地区且已与群众有了血肉相关的巩固联系。但是，如何将个别地区与群众血肉相关的巩固联系更密切起来，如何将这种经验推动到各个地区

去，则仍有待于我们的加倍努力。

所谓群众，就是毛主席所指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主要成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贫民，而且也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民主分子（至于不反动的地主或以前反动而现在愿意纠正错误站在我们一边的分子，则也应予以争取团结）。我们固然应该首先去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分子，为着他们的利益而奋斗；但我们必须同时照顾到其他不反对我们的一切人们的利益，教育他们，提高他们，不断克服他们的动摇，使他们明白跟着我们这样做他们是有出路的。这样才能达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的更快胜利。

一句话：所谓巩固与群众血肉的联系，就是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并要服务得很好，与群众同进退，共死生，一切政策以广大群众利益为依据。

南方党虽然一般的掌握着中央的政策，但是在许多地区却掌握得不很好，这是由于未明白正确的政策在与敌人作战中是有决定的胜利的意义的缘故。

党的政策是根据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来决定的，再配合某一个时期的主客观力量及群众斗争趋势来决定策略。

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对象是侵略与欺凌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大买办、大地主与四大家族，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而党在当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则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这个总路线与总政策在南方具体运用起来则是：“消灭反动政权的下层机构、地方恶霸特务势力，由削弱封建势力到有步骤有计划的消灭封建势力”。

因此，我们对于政策的运用，便不能不分敌友，乱打乱攻，也不能过早的打击不应该打击的人物（如不反动的地主），更不能因

为经济困难而随便侵犯着工商业家、富户、华侨、中农的财产。

政策的运用如果违背以上所指的总路线与总方针，我们一定要失败，故不可不慎重的研究与措施。

南方党的作风，虽然开始走向群众路线，但主观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尚未受到彻底清算与剷除，明显表现在于大部份支部生活之枯燥乏味，不着边际，不能解决同志与群众的迫切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去讨论与解决问题，而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国内外政治形势，从上而下的赋给任务，支部工作与同志的生活脱节，这一点如不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是很难开展的。

总之，南方的党，虽然已经过了几次的整风学习，但是，由于南方党所处的农村的分散环境，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由于整风领导上的不健全，因此并没有进行得很好、很彻底，党员与干部中间党性不纯的现象仍严重的存在着，阻碍着党中央的正确政策与策略的贯彻执行，阻碍着我们更大的胜利，今天，要更好的来纪念“七·一”，应该更好的把整党工作推动起来，这样，才能领导南方群众斗争的胜利以配合解放军在全国的最后胜利。

（原载《正报》96期，1948年7月3日）

林鏘云致中央 转华野两广纵队雷曾电

（1948年7月8日）

中央转华野两广纵队雷曾：

我等与关内各代表团于已铤安抵哈，前经大连见李微、树琴等十九人，安东蔡冰如、高云（山东紧急撤来）等七人，各病稍好，

有四人已癒，我已分别转达曾雷意，各均愉快，并嘱与两纵联络，曾留给部分钱。详情函告。小雷曾患剧病，经治已轻。

林鏊云

午齐

宋灾下的水灾（综合报道）

（1948年7月）

玉 尧

今年粤省的水灾，从五月三日曲江老×水库的崩溃开始，到端午节的前后，即六月十日、十四、十五日之间连日的大风雨，一时各江都汹涌上涨；由于广东地势北高而南低，从北方山地倾泻而下的激流到下游骤然纾缓，同时正当海面潮汐高涨，各江激流一时宣泄不去，于是向两岸低地泛滥，使得东、西、北、韩江及各地支流沿岸许多县份大水汇成一片，此外还使三角洲的台、开、恩、新一带及南路的湛江、遂溪一带爆发了“百年来罕见”的大水灾。在地域上说，则今年的灾区比去年更要广泛。

八十处堤围崩溃了

各地灾情虽然报上纷纷报道，已见惨重之一斑，但直到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对于此次水灾损失作一较完全的统计。只就各地较大的围堤的崩溃而言，就有三角洲一带的台山县的大南乡白沙围、新白沙乡保穗围、永安围、石咀围、北陡乡陡门围、联和乡鼠山围、那扶乡禾雀坡，第九区的交筋围等八处；新会县的横冈、大塘、大圩、小回、里岗、蚬壳、樟林、东海等基围四十余处（六月

十八日《大光报》)；西江一带的高要县的青湾围，高明之陶筑围，三水之永乐围、瑞冈围、永安围，南海之小圩高木洞围等六处；东江方面的东莞石龙之园洲围，博罗之罗西围等二处；潮汕一带的潮安之龙美堤、高树堤、吴处堤、南堤、岐山堤，赐茶堤等六处；澄海县的大路村堤、滨村堤、东围村堤等三处；南路方面的，遂溪东区之长尾、华丰、福建、山葛等基围，西区乐长，北宁、江洪、纪家等基围十余处。若连老滨水库及其他还未修起复遭大水淹没之围如南海之鼎安围等合计则至少达八十余处之多。其被淹禾田只就台山，东莞、高明、遂溪、南海、潮安、澄海几处，报上已有数字发表的，约略统计已有三十六万亩之多。这是只围田禾田而言，至若因大水湧溢旁及其他低洼田地者，更无可计数。至于此处只有灾情而无数字报导者，如新会县田地大半被淹，恩平开平中山等县损失惨重，兴宁田禾收成仅一二成，梅县仅三四成，其余如东江及西江沿岸一带田禾被淹，一望汪洋，南路化县、阳江、吴川梅茂等县，田地地势低洼，且因去年决堤尚未修复，其“被淹禾苗多成白穗，预计收成无望”……等等（具见省港报）。若能查确其田禾被淹数字，相信总在二百万亩以上。关于坍屋数字，据极不完全统计，达一万一千余栋（光台山一县坍屋逾万间——六月二十七日《华侨报》）。至于其他如沉船（河源及广宁上处被捲没航船五艘），人畜被淹如湛江河边村及白水村全村被淹，遂溪镇平乡一百二十余户被大水冲为平地等），冲毁桥梁（最惊心动魄的是湛江西营的钢筋水泥大桥被水冲为三截）。电桿被毁等消息更纷至沓来，若能精密调查，其损失将达惊人数字。

是谁让堤围崩溃？

宋子文这半年多以来，动员了二百三十余万民工（四月十五日《华侨报》），动用了八千余万元公帑（计堤工会基金五千元，蒋中央指拨一十亿元，美中华救济团拨助四百八十八亿元，水灾会一千五百亿元，蒋水利部防汛会一百亿元，农行水利贷款三百八十

亿六元等，具见省港报）。照理为着自救，总也应该把全省粮食所繁的围堤修好，然而初时拟定最低限度要修筑的一百零六处堤围，也缩手只修了七十三处。计每处由三、四千万（如四会之熟头围仅得八百余万元）至十余亿元，平均亦不过六七亿元，七十余处合计总共当不超过五百亿元，而花在其官僚机构之所谓堤工会的各级官员手上的就已达三千五百余亿元之鉅。当时款项都是换取外币及谷物储存的，而目前堤工会的报销却说邮去了三千余亿元，目前尚存二千五百亿元云云，妄想凑足一笔数目掩人耳目，但过去的几千亿元和现在的几千亿元这数目是大有区别的（目前增加的至少数百倍）。他们只筑了七十余处的堤围，便草草了事，竟将偌大的一笔款项吞了下去，而且对于各围堤拨款也大都一再拖延。原本规定各地堤围四月中旬就要全部完工了，可是到了四月底还有许多堤围没有接到拨款；有的则说“工作迟滞疑难照拨”（如永丰围），有的则说做得太快（如新会之柠檬围及兴宁之宁江围等，因该处工人每日能担土方三至五公方，要派员查明呈报后乃可核付项云）停止拨款。甚至近在广州咫尺的黄金围堤，当美国中华救济团的森盛偕谢文龙等去视察时，竟见不到半个修堤工人（四月十九日《华侨报》）。同时宋子文还要派员到各地勒催坐迫，要各地自行筹款，其颁布的所谓围堤修防办法就规定了费用由受益者按受益比例多寡分配负担。如东莞一县就要当地筹集谷米六千五百石（四月二十七日《华侨报》），如容奇则派县警队声势汹汹，会同镇乡公所到各商户勒迫交款，否则捉人（《大光报》）。可知所谓已完成的七十三处云云，也大都用的是民间的财力。

宋子文帮以此扣着款项不放，原来因为有着货币时值的差额可吞（蒋币快要跌毙了，他们还照着原来的数目报销）：而且他们又可以假公济私，拿着公款大肆投机囤积，如当初购买谷物固然可捞一笔，到了四月间还有谷米一十七万三千六百余石，其后出售仅报销七百余亿元（见各报）。若照时值伸算这批米谷致少值二千六百余亿元的，他们便是这样在一买一卖之间从中渔利（也许他们倒是

自己卖下来囤积居奇了！）。本来堤工资是以米价折算的，规定每土方工资米三斤，但发到手上的工资往往远落在米价之后。如东莞圆州堤围每工仅发八千元，尚未及半斤米价，总而言之，此种重重的贪污剋扣殊属令人发指！但人民毕竟忍耐下来了，因为围堤建筑确实不能停工的，据报载四月间各地应征筑堤者达二百余万人，其后堤围崩缺，各地农民亦不辞劳瘁日夜鸣锣抢救。终于围堤连接地崩溃，而且比宋子文所筑的还多出了十余处，受过此次水灾祸害的人民将会记着宋子文这一笔冤债的！

惊心动魄的灾情

由于各处堤围大都建筑于水流急浚之处，故堤围的崩决实造成此次大水灾损失惨重的原因。其中如台山开平交界的新白沙乡一带的保穗围、永安围、石咀围等崩决之时，汹涌澎湃的潦水如万马奔腾湧进围内，立刻水深逾二丈余，附近一带田地村庄尽被卷入水内。当时被困于潦水内者达万余人（六月十八日《广东报》），其中如上闽乡，乡民七八十人逃上砲楼，但因怒潮冲击，砲楼全座倾覆，男女老少尽皆测毙（六月十九日《华侨报》）。据广东侨务处发出的呼救电文所说，仅二区一带已坍屋二千余栋，人畜被淹死者无数，可见当时损失之惨重。其后禾雀坡、陆门围、鼠山围、交筋围等相继崩陷，于是大水泛滥，全县七十余乡几无一倖免。据报全县塌屋总数在万间以上（六月二十七日《华侨报》），这是损失最惨重的例子（台山县府统计四十二乡坍屋五千六百八十二间，毁屋一千八百八十三间，合计已达七千五百六十五间。其余还有二十余乡未计），其次是东莞蒙兰之园洲堤围崩决，良田三万余亩尽被淹没，南海鼎安围因尚未修好，潦水湧进，淹禾田二十万余亩，收成全告绝望；三水先有永安围之崩，永顺围随告裂痕，其后永乐围又告崩决，全县禾田过半被淹……等等，这些都是因围堤崩决惨遭损失的例子。

至于水灾损失以至流离失所的，光潮汕一带据报已达二十余万

人。大部也因围堤崩决，潮水汹涌而来，致使兴、梅、潮、揭、澄等县纷纷报灾。其中严重的如潮安一带，“县城如置水中，四门下栅，下水门十二块，然而这样还防不住海湧而来的水势；水竟越栅而过，一时太昌路上洪水滔滔竟成江河”（六月二十五日《星岛报》）。其次如兴宁县城亦“四面皆水，城内居民如处于锅底之下”（同上）！其他乡村城镇因崩堤而被淹者不计其数。米价也就因而大涨，澄海县城已涨至每担二千五百万元，潮、汕、揭等都突破了二千元大关（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从水里逃出来的难民，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其中不少卖男卖女，藉图一饱；还有不少逃到台、闽、赣各地，“其中还有途中遭了贼劫的，真是惨绝人寰”（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其他如恩、新、吴、梅（菴）等各地都有类似的消息传来，可知在此次水灾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广大人民受害之惨。

当大水冲来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情形还可拿南路湛江与遂溪等处举例。湛江从西营到赤坎中间的唯一大桥西营桥，是法政府时代所筑，以钢筋三合土筑成，竟当大水卷来之时，一下就被大水冲为三截。大水挟着沙石泥土，甚至大树亦连根拔起，顺流冲下。有一间砖厂被水冲坍了，几个老人及小孩站在一堵砖墙上，高叫求援，不料后来水里冲下的一株大树一撞，竟至危墙倾倒，七个人全被大水冲走。泅水往救的几个人也给激流带下海里。湛江之河边村、白水村及遂溪之镇平乡等突遭大水卷至，在半夜里，人民惊呼哭叫声与水声混成一片，然而一霎间，一切归于寂然，全部数百户居民尽被卷入水内（俱见省报）。……这里只不过报上披露的一两个例子，然而设身处地，也尽够令人惊悸了。

这笔冤债要宋子文清偿

然而在这一片报灾声中，宋子文帮不但天良泯没，妄想想以“该围非该会（省堤工会）所修”，“系当地围董会未依照计划加强土方所致”等等藉口，推诿责任，并经过那所谓水利局长的杨华日之口说出了：“从各江的水位涨落曲线及各地雨量来判断，今年

不会发生水灾。”有意的粉饰太平，藉以掩盖其由上至下一系列的贪污腐化所造成的此次围堤崩溃的罪恶。还当宋子文口惠而实不至地打着官腔说要拨若干款项赈灾，但款未拨下，贪官们已先筹划将赈款挪作“公费”了（如台山县）。而同时宋子文则加征什么“自卫特捐”，堤并筑什么小型飞机场，各地纷纷进行，而且又要成立什么水利基金委员会（除请中央补助的款外，可就田赋、货物税，航船及其他可靠财源各附征百分之三十或相当数目为建设水利基金”（七月二日《大公报》）。则更是露骨借天灾以行搜刮。这次各江潦涨固然来自天雨，然而反动统治者事先既未尽力设法防患于未然，事后还要藉灾抢财，向面临巨灾的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本来就是缺粮省份的广东，今年发生水灾的地方又都在产米之区的沿海地带，才经去年的灾害之后，今年广东人民生活将更艰困，其造成这次灾祸的人为的因素，人民将来作总清算之日是要向宋子文这群追究其应负的深重罪过的。

（原载《正报》97期，1948年7月10日）

谁在制造广东的粮荒

（1948年7月17日《正报》社论）

正当广东人民，在水灾风灾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蒋朝又下井落石地大增其证实征借的数额了！

据本港《大公报》本月七日的消息，蒋朝“今年照样推行田赋证实政策，经核定粤省应征之数是五百万石，其中证实征借各占半数。这个数目比去年多三分之一。原因是华北、华中烽火漫天，湖南滨湖之区稻作受水灾影响，收成不如往年，‘中央’于是希望粤省多负担一点”，这一条简短的消息，又一次的把蒋朝的狰狞面目

暴露出来了。

为什么“华北华中烽火漫天”呢？这不是蒋朝的内战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么？为什么会有华南九省的大灾呢？这不是蒋朝的残酷榨取所制造出来的么？蒋朝用他的武力去维持那种黑暗的封建剥削，用它的武力去直接破坏广大农村的林木与水利，老天多下几天雨，水灾便奔腾澎湃的起来了。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这是人祸的必然的结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制造内战，制造天灾之后，又进一步的使人民来负担这种损失，这不是说，为了蒋朝的反动统治，人民要牺牲一切么？

广东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据一般的估计，每年粮食的消费量约在一万〔亿〕五千万市担左右，而产量吗？大约是九千六七百万市担。产消相抵，每年的不足量是在五千余万市担以上。正是因为广东的粮食缺乏，所以广东的粮价经常是属于全国最贵的等级。今年呢？情形就更糟了。四邑雷州遭受严重的水灾，而潮梅一带则在风灾之后，又加上水灾。台山、开平、新会、湛江、遂溪、海康六县市，都是一片汪洋的，在其中，台山的水灾为三十年所未见。据初步估计，台山的谷稻损失为七十一万一千市担，新会的收成只达到三成，遂溪的水灾是百年罕见的，全县被淹田亩是在九千五百亩以上。潮汕各县早收最佳的县份不逾三成，最少是少许，甚或颗粒无收。称为潮汕米库的揭阳，收成只有二成许，饶平二成，潮安不及三成，澄海内围只有三成，外围悉告失收，丰顺二成许，潮阳二成，普宁、惠来只有一成上下，汕头市本来的一年收成还不够一天的食用，今年只有二成，那就不够一餐之食用了。这就是今年广东粮食收成的素描。在这里，早造收获顶多只有五成，而晚造呢？看看目下这种状况，顶多亦只有六七成的样子吧了。

假定广东的每年平常收获量是九千七百万市担的话，则今年打了一个六折，就只有五千八百万市担而已。如果以全省一万〔亿〕五千万市担的消费量来说，则今年广东的粮食缺额当在九千万市担以上，缺额远超过生产量，广东人民正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蒋朝却在

这里提高广东的征实征借数额。读者们，如果这不是火上加油的话，那还有什么事情，可算是火上加油的呢？

宋子文在今年春天，曾经提出什么增产的计划。试问“增产”增加在哪里呢？事实胜于雄辩，南宋所干的勾当不是“增产”，而是增赋。在一方面，今年的征实征借数额比去年提高三分之一，在另一方面，去年度的征实折价从七月十日起又涨了三四倍。深度的搜刮，深度的榨取，“理财能手”的TV宋，就在这里大显其身手了！

蒋宋对于广东这样榨取，不但使雇农贫农和中农遭了殃，而且使中小地主和富农遭了殃。中小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分负担田赋的，中农贫农有一部分是要负担出赋的。在歉收的情况下而又增加田赋，这不是使他们更加破产吗？雇农呢？水灾使收成减少，田赋增加又硬抢去一部分。这么一来，米价不是更要飞涨了吗？根据历年的经验，农民实际所提供的粮食，多为征实数额的三倍至五倍。就假定以三倍计算吧，今年广东的人民，就要在自己的口里，挖出一千五百万市担的粮食去供蒋宋打内战。在这种情形之下，广东的粮荒就更严重了。广东粮食的不足额，将从九千万市担增加到一万万市担以上了！这就是说，因为蒋宋的榨取，今年广东人民的粮食消费量，将有三分之二是没有着落的了。

谁在制造广东的粮荒？谁在加深广东人民的灾难？事实不是证明得明明白白么？在人民解放军的雷霆万钧的打击之下，蒋朝的军事崩溃和经济崩溃，就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军事溃败使它的统治区更加缩小，使它的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更加减少，使它的法币的流通区域更加集中，东北快完了，华北华中亦快完了。它的最后的希望只跑到华南，跑到广东来苟延的残喘。但，这么一来，华南，特别是广东的人民可就更糟糕了。没有其它的地方可以榨取，它就必然拼命的向广东人民增强其榨取。要粮，要钱，要力，要命——将如雨点般向广东人民袭击。这将是客观事实的规律；蒋朝的愈益崩溃，则其对于广东人民的榨取抉削，亦就更加利害。

但是，英勇的广东人民是决不会怏怏愧愧，忍受蒋宋覬覦残酷的征实的。这一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各地的发展，一年来广东各地人民的反三征的火一般的斗争，就是这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实的逻辑是再明白也没有的。只有起来反三征，只有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广东的人民，才有生路，才不会被蒋宋把自己的身家财产完全吃个精光！

（原载《正报》98期，1948年7月17日）

宋子文下斜坡

——广东时局述评

（1948年7月）

千 山

宋子文初来时，曾引起一些人很大的错觉，以为他有“财神”、“蒋舅”、“美狗”三位一体的资格，亲身负担准备朝末后事的重任，来头很大，来势很凶，非同小可。

但在今天看来，特别在最近伪省参四届大会上看来，一切都一清二楚了……旧中国在灭亡，旧广东也正下着斜坡；蒋已焦头烂额，宋也虽以苦撑。对于他们，这就叫做“大势已去，挽天无术”。

在九个月来广东时局发展当中，宋子文三次飞京，大约每三个月一次，每次滞留京沪二至三星期；此外还飞桂飞琼、来港，忙个不了，真的“拼命去干”（宋自称），并邀见邻省湘、赣、闽、桂头目，约会邻邦港、澳、越、暹使者，无片刻的喘息，活象热锅上

的蚂蚁，所有这些奔波劳碌，不是为了别的，都为了求兵、借粮、乞钱；但结果还是救不了命。

在军事上，比之罗卓英时代是一蟹不如一蟹了。过去广东几个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除琼崖、南路外，还不过是幼嫩的新芽，因此罗卓英有了可能发动虽然终归失败的相当规模的全面进攻，及其后也还有可能发动虽然仍归失败的对琼崖、南路的重点进攻；可是到了宋子文，面对着全省发展壮大的坚强人民武装队伍，便不仅只阴谋组织全面进攻的企图要被迫胎死腹中，就连想要重新布置一个更大规模的新重点进攻，也都不得不拖延下来以至流产了。宋子文的军事失败自供有说：“兵力不足，以及种种环境关系，未能悉达预期效果”。近半年来广东军事斗争的结果，人民武装“愈剿愈多”（黄镇球语），足以指出反动军事的“第一期清剿”终归落空！而且县城被攻陷，县长被俘，副总指挥遭擒，县长、团长接连阵亡；直至由于六月从南路调离了一个保一团兵力填防粤北，南路解放军便于最近打进湛江市，以上种种事件，在说明宋子文的军事失利，比罗卓英更甚得多。

在政治上，也比之罗卓英时代是更加孤立无援。广东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公务员为反饥饿反压迫对反动统治不满，群起斗争，日趋深入尖锐化；就是曾经一度看见“财神”当政引起了特别幻想的工商业界，也早已从日常生活体验中由希望而失望，转入对宋淡漠不满了。宋子文在去年到粤第三个月，即年底伪省参会三届大会上曾誇下大口：“保证粤省政治三个月内见功效，六个月后见成绩”，现在踏上第九个月，在刚开过的伪省参四届大会上，却连忙改口了，自称从来没有抱三个月六个月的希望了。他们的“县政改革”一直“谈得热闹”（《大公报》语），议论纷纭，可是结果毫无定论，唯有摇头叹息：“找到一百个好人当县长殊不容易”。不要说一百个，其实他一个“好县长”也没有，只见贪污腐化无能，比罗卓英的县长更坏。伪省政、县政、乡政，都因财政困难，又兼派系纷争，越弄越糟。谁都看见，整个宋子文的政治机构，只知向人民

要粮要钱要命，比罗卓英更凶，因此引起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激烈而扩大，使它的崩溃速度越快。

在经建上，比之罗卓英时代虽更见善于吹播，但其成就完全同样空洞无物，半斤等于八两，且依据宋自己虚报的施政报告来说一说吧：他的第一项建设，原拟修筑堤围一百零六处，据报已完成堤围二十四处；他的第二项建设，与办水利工程计划已完成惠阳马鞍围、曲江之枫湾、老玃、东莞之怀德乡等四宗大型工程。恰巧今年水患又来，竟有八十余处堤围崩溃；老玃水库，洪水一至，逐告冲破。从此谁都可以判断他的建设成绩是如何渺少了。他的第三项建设，按系黄埔筑港，自称“现首期工程已经完竣，其中有四百公尺之码头，可靠泊交运材料及火车零件之轮船。至第二期工程计划，应即与建者，为仓库两所，海关检查仓库一所，发电厂一所及其附属设备等”。若考其实际，则所谓“可靠泊交运材料及火车零件之轮船”的四百公尺码头，原来还是抗战前的旧有建筑物，而所谓第二期工程计划，全部内容主要的就不外是建筑几个仓库。接着他报告了第四、五、六项建设：“修筑公路”、“加强电讯”、“发展工矿”更属有名无实，微不足道。至于在报章喧腾了多时的什么建筑西南大铁桥，筹设翁江水电工程，湛江建港筑路，以至开发海南等等，许多“繁华梦”里的东西，都变得无影无踪，只好在他们报告里只字不提了。所以，宋子文的所谓“经建”，恰可拿黄埔港近状来做象征——一片荒凉！又正如黄埔筑港一样，还有粤×一路，狗牙一洞，同是宋子文的“军建”，但也久闻雷响，还未下雨，要待迟迟其来的美援分拨下来多少，而定分晓。如果说罗卓英高唱“五年计划”时，有一个陈济棠出来开办糖厂，有一个美国人潘宜要开设一个公司向华南投资，到了宋子文唱“经建”的时候，却连一个退老官僚，华侨更不用说了，连一个民间的美国人，其他外国人更不用说了，统统都没有来响应响应，其寂莫孤单之情态，实在更属可怜。

这样，县政改革，由于大势已去，无所适从；经济建设，由于

美援有限，一筹莫展；军事布置，由于兵力薄弱捉襟见肘；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造成今后宋子文下斜坡的总形势，而广东各阶层人民的本身任务不是在旁观，正是要加足力气，一致推他滚下去！

（原载《正报》98期，1948年7月17日）

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 在东江前线发表谈话

（1948年7月25日）

（东江新华南社）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党委发言人于七月二十五日在东江前线某地接见本社随军记者东良，谈话一小时许，兹将谈话内容择要报道如下：

问：（本社记者）沙鱼涌、三洲田两次战役，均获得歼灭战之伟大胜利，各方面对于沙鱼涌战役却特别注意，除详细报道外，还纷纷评论，但三洲田之役却极少报道，你对于这两个战役的意见如何？

答：（广东区党委发言人）沙鱼涌之役，是我之主动出击，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彻底干净的歼灭。在军事上这一出击，是先发制人地打击了与延迟了敌人这次的“扫荡”计划。同时又对于这次反“扫荡”准备好条件。在经济上，突破这一点，便迫使整个马士湾沿岸的蒋记海关，从南澳到盐田，不能不暂时撤退，在政治上，更给广大的国内外人士知道，宋子文一年来所吹嘘的一切胜利，乃瞎吹牛皮罢了。

三洲田的歼灭战，军事上的收获，还超过沙鱼涌之役，这一仗，是我集结兵力的优势，歼灭其一路主攻的兵力，旋即展开追

击，打退其他的三路进攻，它这一战役的全部“扫荡”计划，便迅速被粉碎。这是防御战中运用机动的攻势战术而获得反“扫荡”胜利的光辉范例。前后不过×天，蒋军被歼灭计两个营部，四个正规连，另一个特务连，一个警察大队受歼灭性打击。伤毙一百三十人，俘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三挺，轻机十二挺，冲锋枪六挺，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枝，子弹十一万余发，炮弹二百发，无线电台一座，其他军用物资尚多，收获甚大。

至于被歼灭的两个营部，是经过相当时期整训的蒋军，即一五四旅第二十三团第一营和第二十二团第二营。这些美式装备的整训蒋军的被歼灭与被击溃，在广东人民爱国护乡的解放战争中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蒋宋对广东人民所谓第二期“绥靖清剿”计划的开始，更残酷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我们必须加紧的依靠人民与更好的团结人民，更快的发展与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才能彻底粉碎蒋宋的第二期“清剿”进攻。

问：沙鱼涌之役是否有蒋记海军参加作战？

答：确有两艘不明国籍之小型舰在英领海向我军发炮，不过，吾人不信英领海可被利用作内战基地之用。

问：香港蒋党机关报《国民日报》载：廖承志已南来主持军政大计，曾生，林锵云将军亦已回粤，这消息确不确？

答：全是谣言，廖承志同志仍在陕北新华社主管宣传工作。曾司令员正在领导两广纵队在豫、鲁、皖各地作战，这次开封与睢杞大歼灭战，两广健儿建功不少。前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同志，原是海员工人，是港粤工人运动的前辈，现已由前线转赴东北哈尔滨出席全国解放区的工人代表大会。反动派放出这些谣言，除表现其宣传技术的拙劣外，显然是企图在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打击下，藉以掩盖自己的失败罢了。

问：反动派又宣传说，我军攻占沙鱼涌时，曾散发反英传单并扬言进攻元朗，并大肆制造港粤边界紧张的气氛，你对此事有何感想？

答：这些谣言与廖承志、曾生、林锵云诸同志回粤的谣言同样拙劣且更无常识。我军是东江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任务是护乡卫国，反抗蒋宋的反动统治，战事纵然迩近边界地区，但吾人断言不致越过边界，对于港九，广大侨胞希望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我们亦具同感，时间与事实，必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问：反动派制造这些谣言的目的何在？

答：很明显的，它们企图挑拨港政府对于中国人民之间的恶感，特别是企图造成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之间的种种不利情况，他们还制造了一大串的谣言，如中共在香港设立华南局，与设立华南军事指挥部，说香港是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一大串谣言同一性质与同一目的。反动派还有一种卑鄙行为，便是自己放火嫁祸别人，去年海外青年行动派之恐吓行动，也曾制造物证（散传单）人证（罪犯在法庭上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图谋嫁祸中共。今年六月上旬，新界沙田车站被劫，六月十三日的《国民晚报》的头条大新闻，竟公然指系我军所为，最近又有“东江游击纵队”某大队某中队的打单勒索信出现。反动派每一次制造谣言的前后，都免不了要产生此种类似事件，这是反动派自鸣得意的“杰作”，其实，明眼人是一望可穿的。但这种恶毒的阴谋，我们认为亦有提起港九市民严重注意的必要。

（原载《正报》102期，1948年8月14日）

广东我军伤亡被俘统计表

——根据匪军所公布“出击及战果”统计

(1948年7月)

地区	类别	月份						合计	备注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上半月)			
一区	作战次数 毙俘		14次 93名 19名	11次 66名 17名	6次 83名 9名	11次	42次 242名 45名	本区匪军出动以三月份为最多	
二区	作战次数 毙俘	7次 47名 42名	23次 249名 249名	18次 86名 116名	13次 59名 1名	14次	75次 441名 408名	本区匪军出动亦以三月份最多	

地区	月份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上半月)	合计	备注
	类别	作战次数 毙伤俘							
三区				8次 56名 2名	3次 30名 21名	11次	22次 86名 23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六月份为最多，惟缺战果	
四区		5次 50名 20名	4次 42名 4名	22次 171名 18名	11次 89名 34名	17次	59次 352名 76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四月份为最多	
五区		7次		9次 4名 1名	7次 107名 8名	4次	27次 111名 9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四月份为最多	
六区		1次	13次 204名 54名	8次 109名 1名	10次 48名 5名	3次	35次 361名 60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三月份为最多	
七区			11次 76名 20名	7次 63名	18次 163名 12名	2次	38次 302名 32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五月份为最多	

地区	月份类别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上半月)	合计	备注
	作战次数	毙伤俘	作战次数	毙伤俘	作战次数	毙伤俘	作战次数	毙伤俘	
八区	3次	17次 194名 22名	14次 284名 92名	24次 226名 104名	16次	74次 704名 218名	本区匪军出动，以五月份为最多		
九区	31次 137名 6名	45次 347名 16名	25次 196名 3名	21次 96名 1名		122次 776名 26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三月份为最多		
闽粤边		3次	9次 120名 98名	8次 31名 98名	5次	25次 151名 196名	本区匪军出动次数以四月份为最多		
本省 全月统计	54次 234名 68名	130次 1205名 384名	131次 1155名 348名	121次 932名 293名	83次	519次 3526名 1093名	(1) 半年来匪军出动次数最多者为四月份，其次是三月份 (2) 半年来匪军在各区出击最多者以九区为首，其次是在第二区，再其次在第八区 (3) 半年来匪军在第八区所得战果最大，其次是在第二区，再其次是在第九区		

有关武装斗争的参考资料

(1948年7月)

建军问题

(一) 思想观点

(1)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斗争常常发展为武装斗争，这是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中的最高形式。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中，这种武装斗争的小规模者，不一定以推翻统治者的政权为目的，而多带着生活斗争的意义。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则总是由求生存所掀起以推翻旧皇朝为目的，成为过去封建社会转朝换代的关键。至于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结合，剥削与压迫更为残酷强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更为高亢，而且日益发展提高，这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斯大林）。这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成功，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毛主席）。

武装斗争并不一定开头就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根据历史经验与革命特点，武装斗争可以从某些地区（甚至是很小的地区）的小型暴动（不一定是推翻政权的暴动）转变为较大的斗争（迫上梁山），再发展到游击战争，从而建立梅花据点到建立根据地，一直从一个或几个边区组成的解放区，最后达到推翻反动政权的目的。

不弄清这个思想就会忽视领导武装斗争，就会认为不一定要武装斗争也可以取得革命胜利，就犯错误。如果弄清这一点，我们就有坚定的认识，了解并不是要不要武装斗争的，而是应该依靠武装

斗争，发动武装斗争（甚至是小规模，小地区的），把武装斗争不断发展提高，达到革命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今天，武装斗争必须是我党领导的独立自由的，不能去替别人“抬轿”。这是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掌握不稳，革命的果实将落在别人手上，如果掌握得稳，革命胜利才有保证。中国旧的军队完全是一种雇佣式的，是某一私人，某一派系，某一集团所私有的。它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侵略为独裁为剥削者而作战，即是为了军阀及其集团的私有利益而作战，是反人民的工具，我们的军队则完全不同，我们原来是从人民中出身的，是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我们的军队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保卫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人民自己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进行的是人民的战争，为民族、民主、人民而作战。这是我们建军的人民观点，群众路线。不弄清这个思想，不把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严格区别开来，结果就会产生纯军事观点，产生军阀主义私有军队的现象，就不是进行解放人民而作战，反而压迫人民了，到底也会不关心人民。

（3）我们的军队既从人民中来，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给人民以利益而不是叫人民给我们以利益，所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只负起打仗一个任务，而要负起打仗，群众工作，生产三大任务。我们的军队应该帮助人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应该成为人民政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应该了解武装斗争（打仗）的目的为了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政权，这是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革命军队的基本任务。但在一定条件之下，我们不能一开始便建立一面政权，有必要与可能建立两面政权，但这种两面政权的目的是为了了一面政权的建立。我们的军队不但要帮助建立人民的政权，而且也要为建党工作而奋斗。我们的军队应该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不能增重人民的负担，因此自己动手生产达到部分自给或完全自给，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重大特色。

（4）武装斗争是发展的。绝不应该一成不变。武装斗争发动

起来，就必须到外发展，普遍发展，决不能陷于保守，保守就是绝路一条。武装斗争不仅应该普遍发展，而且必须逐步提高，不提高就停顿在原来水平上，不能适合形势的发展的要求。

以上几点是建军中比较主要和迫切需要弄清的思想。过去个别地区有从未曾解决的，有未曾彻底解决的，今天就有重新加以弄清，检讨经验，取得教训的必要。

(二) 如何组织？

(1) 武装斗争是群众斗争的一种形式，基本上也是群众要求生存的斗争之一，可能有下列各种形态：

- a. 农民反租税反贪污反剥削的暴动；
- b. 工人为争生活改善从罢工发展起来的暴动；
- c. 兵变，士兵因生活或反压迫而激起的譁变；
- d. 或生活无着挺而走险，或不务正业求事劫掠，或迫上梁山落草为寇一类的土匪绿林，也是一种为生活而斗争；
- e.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号召下的武装起义与拨乱；

(以上各种可能完全自发的，也可能由我党领导的。但自发性的斗争无我党领导或不接受我党领导时，其结果往往被消灭被压下去)

f. 以前革命队伍留下的武装乘机而起，如内战时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散布于南方的队伍，又如东纵北撤后散布在广东的队伍。

g. 我解放军未到达之地，由我派出小部队去活动，发展武装斗争。

(2) 从一种小规模个别地区的暴动或变乱，经过坚持，往往就走上山，如属有正确的对策，不被敌人消灭或打垮，那就会进一步活动、流动，扩大范围，发展起游击战。这种游击战可能是幼稚的，无知的，没有讲求战法的一种朴素的游击战。因为没有一定地区，不能固守，也没有防御能力，因而影响不大，一年来我们的建军主要是：

一种是集中可能的人枪，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向而推进企图形成一个民变区或游击根据地，但因力量不够庞大，各方面又未能配合，过早引起乱之注意，受围困不能发展。

一种是组织好了训练好了才派出，但过迟失时。

一种是组织数人或数十人，到四方活动，和群众做好事，对地方武装及群众组织的建立够忽视。

今后在放手大搞的方针下我们应该着重下列问题：

一方面要组织多数武工队（武工小组配合地方党或自行领导各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继续更广泛普遍的发展群众武装斗争，创造多量梅花式据点及小游击队；一面就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各个大小战略地区内建立统一领导，适当建立各区的主力，把军队和武装斗争提高一步，并再准备进而建立野战兵团。

一方面在凡已活动到之地区，组织民兵，开展党的组织，建立灰色两面政权，但一方面又要准备走向建立一面政权，到边区，到解放区。

一方面仍然是按照各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情绪，提出适合的行动口号，与普遍发动群众斗争，但一方面又必须提高群众觉悟，迅速走向平分土地的斗争，军队的任务必须是促进帮助和保卫群众的土地斗争，保卫群众的斗争果实。

为应付将来斗争的复杂尖锐，必须预先准备各种工作，以便克服可能到来的困迫（如干部缺乏，经济困难等）。

（三）带兵、练兵、养兵

（1）带兵：我们的军队成员既是来自人民，又是自愿自动参加的，故应该一视同仁，无分彼此。但是在我们的军队中仍有许多不良现象，例如军阀主义的存在。所谓带兵问题实质上是个官兵关系问题，关系好就带得好，关系不好就带得不好，过去东纵时期就有许多不良现象，例如：打骂制度，不把士兵当人或只当做很低贱的人，可以随便打骂。完全是不平等的待遇，不关心疾苦，对伤病

员的照顾，对士兵（特别新兵）生活上的关怀，都没有认真做好；没有珍惜士兵的生命，对安全保障不够注意，往往轻率牺牲或发生意外；官兵之间感情不融合，不熟热，摆架子，官僚气，严分上下级，不象一家人；很容易变成流寇式。这种态度的游击队伍，如果让其自流，就有可能向反人民反革命的方向走；如果加以改造就有可能走到人民的革命的方向。对于这种队伍，我们必须注意把它接受过来。领导它走上正确的道路。

（2）在游击战争已经普遍发展、部队壮大了、地区扩大了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把军队组织成为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武工队，民兵这种“阶梯式”的形态。

主力兵团的任务是保卫人民，保卫地区，保卫政权，歼灭敌人，向外发展，成为全军模范队伍。可以根据情势的需要与任务不同而分别建立主力。在干部选择，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各项，主力队伍应该与其他队伍不同，应该是最优良的最充足的最坚强的，决不能一般化。在建立主力时，要注意适时适当，不可过早（大而无边）不可过迟（错失时机）以及损害地方群众武装斗争或陷于保守。

地方兵团就是地方性的武装部队，其任务为保卫本地区内人民利益和民主政权，完全脱离生产，干部地方化，装备一般。地方兵团也可以建立它的主力。

武工队主要是以精悍短小的部队去开展新地区，必须能打能写能讲，军事工作政治工作都做得，在新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政权，甚至发展党的组织与保护地方党，解决经济。因此干部条件必须认真选择，要政治坚定，文武全才，有勇有谋才能胜任。武器装备亦须适当，才能担负任务。

民兵是不能脱离生产的基层的民众武装，主要是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应该广泛普遍组织起来。民兵又是地方兵团主力兵团建立的兵员主要来源，但使民兵提高一步，必须根据自愿原则与政治动员，必须反对吞并的方针以免妨碍群众斗争情绪。

（3）武器装备的补给应该主要向敌人求解决，歼灭敌之正规

军，地方团队，地主武装而夺取缴获其一切武器配合来装备自己。其次才是自己制造，以地雷、手榴弹弹药为主。再次，充分运用地方武器（土枪土炮）加以改良，发挥其效用。总之，武器装备问题的解决来源主要是向敌人要，如果靠购买，靠收缴兵枪，靠自己制造，在相当的期间都不是基本的办法。

（4）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上，过去东纵时期的缺点在于：

一、没有广泛组织民兵，发展民兵战，全民战的思想，吞并民众武装，其结果是瓦解了已组织起来的民兵武装。这又可分两个时期说明，在前期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思想，在后期已经知道这种东西，知道有组织阶梯式军队式之必要，但没有了解其精神和实质，故只有形式上的改变，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变。

二、没有组织更多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及敌可能占领地区开展工作。

三、没有预早秘密建立边区根据地的准备，后期虽有但未坚决贯彻，发生动摇。

四、不善于改造与我合作的军队。

这只是略举一斑。这样带兵，不能使军队发挥其作战的积极性，完全违反朱总司令的带兵方法，他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

民主集中制——废除打骂，官兵平等，只有职务区别，没有政治上阶级上的区别，互相批评；

严格的纪律——军事纪律，民群纪律，官兵一律遵守，自觉的遵守；

军官模范作用——各方面均身为表率，反省自己，带头作用；

尊干爱兵——爱护士兵，尊重干部，官兵如师生关系、兄弟关系，加强团结；

照顾家属荣誉军人——使每一士兵无内顾之忧，无后顾之忧，得以安心作战，受伤也觉得光荣，不会因伤残废而失去生活保障。

在执行这些办法时，同时也应防止士兵中的平均主义，土匪流氓意识，极端民主化等不良现象之发展。

(2) 练兵：兵必须练，不练就不会打战。练兵的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讲求实际活用。例如以前练兵照旧式一套，立正稍息，制式教练，只是操场上的练习，不是战场上的练习，样样照步兵操典，实际打仗就全不适用，这种方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方法，不是革命的练兵方法；又如把解放军的练兵计划照样硬搬，那些方法虽然是革命的练兵方法，但那是适用于当时的解放军的条件的方法，就不一定全部适用于现时的我们的队伍，硬搬过来，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方法。

实事求是的练兵方法，就是学以致用，就是看什么样的军队，打什么样的仗，就练什么样的兵。我们的战略战术发展了、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练兵的方法计划，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使之适用实际需要。我们现在打游击战，那我们练的就应是这几样技术：瞄准、射击、掷弹、刺杀、地雷；我们要练的这几种战法：夜袭、伏击、歼灭、野战。第二是学习，最切实最有用的是学每次战役战斗的总结，从活生生的打仗中学会怎样打战。我们还要从敌军友军方面学习他们的优点。我们也要向民兵方面学习他们的长处。还有，要学习使用武器，从熟练原有武器到使用新式武器。

朱总司令的练兵原则就是练智力、练体力、练技术。练兵方法是官兵互教，知识互助。我们应根据这些原则方法运用在我们具体情况中的具体军队具体战场上。

(3) 养兵：兵养得好打仗才有劲。养兵就是解决财政经济问题，这是个很重要和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照目前情况说，募捐罚款借债虽可算是办法的一方面，但这不是可靠的和妥当的；而基本的办法还应是税收，打敌，征收，这都是有关政策的事情，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不同条件定出具体的条例。

除了这些收入之外，节约仍是一个重要原则，既然生产自给不易做到，就更不应该有浪费现象，要严格规定各种制度，确实执行“有的时候不要吃得过饱，没有的时候免得饿肚皮”，这是要认真注意的。

有这样的偏向：一种偏向是“有兵不怕没钱粮”，打到甚么地方吃到甚么地方，实质上就变成扰民。另一种偏向相反是“有钱粮才能养兵”，钱粮囤好才能养兵，没钱粮就不能维持了。还有一种是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不从长期打算，或者不看到发展壮大，只保守满足于目前光景。这些偏向都要纠正。

朱总司令的养兵三大原则：

- 一、不增加人民负担，军民兼顾；
- 二、官兵平等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兵士同甘苦；
- 三、军队自己生产及帮助人民生产。

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思想上应准备这样做。

（四）争取友军、土匪、俘虏

（1）争取友军——应区别各种对我程度不同的友军，分别采取对策，如“有的消极，有的守中立，有的同情，有的合作”。以争取改造为基本方针，但争取改造并非抬轿，而是争取与我合作，争为我用，决不助其发展扩大，时刻仍应防备警惕，一旦反共反人民，即适时消灭之。如人民反对他，要求消灭之，我们不能违背民意。

（2）土匪基本上是不能容许其存在，采取消灭此种行为与意识的方针而不是消灭其肉体。暂时不反对我们，愿与我保持关系者，则划定地区限制等活动。如果投诚我们者，应从政治上，积极争取改造为我用，但不可操之过急，要求马上变成我们一样，可以有职有权，放胆使用、如转有成绩，表现得好的，应予以奖励；如果人民痛恨要求消灭的，我们也不能违反民意。

（3）对俘虏采取宽大优待政策，一般不能损害生命不没收其私有财产，如有机会应予以短期教育然后释放，如无条件的则随俘随放，进行政治宣传，发给路费，愿意留下者可以留下。

（4）必须着重的估计到，在敌人没有办法从外面消灭我们的时候，敌人正在采用多种式样秘密的打进我们部队内来破坏我们，

瓦解我们，因此，提高阶级警惕性的防奸工作应立即进行。应在队员中找到好的党员或最穷的对革命最坚决得到革命的利益的苦力雇农组织防奸网，在各政治部建立保卫科或保卫特派员专门侦察研究审讯内奸工作，对刚争取过来的友军、土匪和俘虏必须予以教育，改造，然后才分编到我队中，对整队的友军土匪的配合作战，必须作适当警戒，必须提高“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思想。

广东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一)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辉煌的理论创造，指导了和继续指导着中国的革命战争，并使它走向胜利；离了他的指导的时候，革命战争就不能够胜利，就使革命遭受挫折或部分的挫折，这是历史的和当前的现实所完全证明的真理。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完整的研究毛主席的关于战略问题的全部理论；我们只能拿它的基本精神，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我们南方斗争的经验相结合，以此求得解决适用于指导南方军事斗争的理论问题。同时，由于我们过去的经验以及当前的经验都没有具备全部加以总结的条件，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完整的解决全部关于南方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只能解决一部分迫切的重要的问题。又由于我们的革命斗争处于一种急激发展的情况，我们的任务又是向前提高的任务，因此我们不但解决一部分属于当前迫切需要的问题，而且必须对今后在发展的提高的情况之下的战略战术问题，加以研究，成为预见。

以上就是我们研究南方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的三个基本态度。如果这种态度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分开两方面来做研究：

(1) 过去一年来敌我情况及其战略战术；

(2) 今后敌我情况的变化及我之战略战术。

(二)

敌我情况

敌正规军自东纵北撤后陆续北调，由于(1)东纵北撤后，张发奎曾到东江、北江、闽粤赣边、琼崖，广西等地布置绥靖，我之留守队伍完全隐伏，敌曾到处搜索了一个时期，一部复员人员和解属曾经受到摧残，但找不到我之队伍；(2)前线吃紧，正规军必须北调作战。

后来敌六十九师残兵和青年军二〇五师调粤整补，三四月间开始部分使用向我进攻。敌之省级部队共十个保安总队，行辕转各团二个团，虎门要塞警备部队一个团，全部正规部队总数不足三万人。各县地方团队少者百余人，多者千余人，合共三四万人。湖南有二〇五师一个旅，广西、江西南部，闽西南无正规军。广西有六个保安总队，赣南二个保总，闽西南三个保总。

在我开始恢复活动后，敌重点使用兵力，以六个保总的兵力集中进攻琼崖，其他地区一发现我之活动即疯狂猛扑。敌行动之目标在于打击我之主力，破坏税收，摧残人民，建立反动地方武装，维持交通要道，但我之分散发动，敌则兵力不足，敌形成处处薄弱，处处告急，疲于奔命。近半年情况稍有变化，敌从海南抽兵到大陆，兵力主要集中南路，次为东江。其重点使用兵力与兵力不足的形势没有变化。

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情绪，一年来转变颇大。东纵北撤后，群众害怕敌之强大，正统观念又一时相当的提高。但经过敌之进攻摧残，某日地区内地主向农民反攻，三征剥削，土匪横行，加上敌在前线上的失利，敌正规军北调后，显现的兵力薄弱，群众对敌之不满和愤恨逐渐增长，并回忆到我之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恢复了活

动。到了现在，由于一年多自卫战争伟大胜利，解放军大举反攻，土地法的颁布及我一年来的努力奋斗，群众斗争情绪空前高涨。不但在我之活动区内群众更进一步的拥护我们（如江南之退租退息，粤北之停租废债、西北江之清算斗争），而且非我活动区群众自发斗争也不断兴起。

东纵北撤后，我留置广东大陆之兵力共约×××人连闽西南在内为××人，这是奠定我发动武装斗争的优良基础。但由于大的变化，干部思想波动，对前途失望，埋怨组织，少数干部落伍退化。显然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上我还是弱而小。敌正规军北调后，兵力空虚，我干部战士及群众都跃跃欲动，故恢复活动后，干部战士和群众极振奋，情绪高涨。

我之方针系放手小搞打下大搞基础，从梅花式的流动据点到割据式的边区到解放区的建立，从武工队游小组到处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发动民兵战，消灭地方封建反动武装，建立掩护灰色两面政权，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消灭敌地方团队以达到强大发展自己，进一步适当建立主动。

在以上方针之下，我一年来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一般说有如下几种：

1. 集中兵力打大仗，大摇大摆，向前推进。
2. 集中兵力打攻坚仗，拔敌据点。
3. 搞好自己原有地区，然后逐步推进，蚕食向前。
4. 组织数十人一队之小队伍，到处消灭弱小敌人。

在这一年当中，我军力量平均发展十倍以上，活动范围超过东纵北撤前之地区，相当组织了一些民兵，群众获得相当的利益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些灰色的两面的掩蔽的与自己的政权，逐渐奠定将来南方开闢新战场的基础。

有几个问题没解决或没有正确解决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正确的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要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要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与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动击溃战，承认消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与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与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新阶段。”

以上这许多的问题均属于战略范围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根据斗争实际情况来加以解决。在这里我们只把过去一年来的斗争中存在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研究。

（1）是大搞呢？还是小搞？是正确的主力作战，还是广泛群众性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灵活性的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又怎样才不是流寇主义？

（2）有什么武器打什么武器的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敌人的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呢？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打法，和不会行先学走的攻坚仗呢？

（3）是不是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怎样打歼灭战至今仍未解决。

（4）把人枪都集中在自己队伍里，使自己变成独臂将军呢？还是走群众路线，发展广泛的民兵战。

以上这几个问题，开始时没有解决，现在均已有所改变，但不一定就是在思想上完全正确的解决。

在抗日时期，我之广东武装斗争也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的：

(1) 我们的武装斗争，应自始至终是独立自主的党领导的斗争，抗日时期的初期，由于投降主义的影响，没有解决，到东纵成立公开党的领导之后，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还有残余。

(2) 掌握“武装革命，消灭武装反革命”的特点，把武装斗争发动起来，逐步提高，一直到达胜利，这个思想过去也不能贯彻到底。

(3) 不是贯彻人民战争路线，而是基本的单纯军队打仗，不是全民战，民兵战。

(4) 停留在初级的游击战争阶段，不懂得把武装斗争发展到进一步的新阶段。

(5) 没有弄清打击对象，打击时机选择不得适当，形成过早过多树敌，敌人越打越涨。

(6) 没有以我解决华南的坚定思想，形成满足现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消极，防御或逃跑倾向。

(三)

敌我形势的变化

宋子文来粤后，广东敌情可能起着如下的变化：广东更加受美国控制，成为美接蒋之运输站。敌之兵力可能增加，据说广东增编五个保总，两广八个税警队，湘桂赣三省亦可能增加。敌六十九师调走，原日粤军残兵回旅（131 D、153 D、154 D、156 D、187 D、159 D）调来一面整补一面维持地安。五岭及湘桂边亦增兵二旅。宋子文可能组织新军，又极力组织反动武装。

敌之重点进攻可能不变，当兵力相当增加后可能全面分区同时向我进攻。可能采取碉堡政策。但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只能逐步实现，另方面又要看前线的变化。

统治者内部可能有变化，可能玩弄“反蒋和平与偏安”的政治

阴谋，但目的仍在于对进攻消灭，保留其局部“统治”候机反攻。

群众当有重大的变化。宋子文把一切负担加诸人民，对人民的压迫更加严重，群众的反抗一定更加高涨。前线胜利和土地法的颁布，是动员群众的伟大力量。今天已经是革命新高潮的时期，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情绪的提高是一日千里，不可压阻的。

我方针是放手大搞，破坏美蒋宋阴谋，迎接大反攻，争取华南彻底解放。

我们对这一方针，作如下的了解：

(1) 目前是革命高潮，其表现形式则是武装斗争的高潮，大反攻和土地法的颁布，群众觉悟更加提高，求生斗争更加高涨。放手大搞以迎接与配合大军反攻，就是适切时机，把战略方针停顿在过去的阶段，就是错失时机。

(2) 华南形势在新的变动，今后斗争加频繁复杂，敌在作垂死挣扎，斗争必更加尖锐艰苦，不放手大搞就不能走在前头，先发制人，破坏到粉碎宋子文的阴谋计划。走在前头就一定胜利，否则就有迂迴曲折之可能。

(3) 一年来斗争已有了初步基础与经验，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事实证明过去一年之放手小搞打下大搞基础的方针的胜利。今天不但有放手大搞的必要，而且也有放手大搞的可能。

(4) 根据过去一年来斗争的经验，如果我们可能正确解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上的问题，又能把战略战术再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否则，弄得不好也还有挫折的可能。

战略战术的新发展

(1) 由于上面情况分析，我们有自己解放华南的可能，我们应努力争取这一可能的实现，我们应极力避免斗争的迂迴曲折。

(2) 我们的战略因为是由无到有，所以一开始就是进攻的，但力量初形成，敌大我小战争将不可避免有迂迴曲折，所以有时又须是防御的。但我之力量大大发展、从小搞到大搞，从游击据点到边区解放区，从这角度看我又发展的、进攻的。

(3) 我们从普及到提高到胜利，其特点又是长期性的。美国援助，和在酝酿的反蒋和平偏安阴谋未能及早打破，一定会增加我之负担，可能增加斗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反攻大军的胜利及我之足够努力与不犯错误，又可能缩短长期性。思想上作长期准备不会不好（不能幻想明天就胜利、也不是什么长期黑暗）我们把实际工作做好缩短这个长期性那就更好。因此，战略的长期持久与战役战斗的速决这一原则仍然适用。

(4) 主要的是游击战，把朴素的游击战发展到基本的游击战，准备在将来发展到运动战。

(5) 我建立边区或解放区，敌必集中兵力进攻，因此围剿与反围剿的形式一定出现。但这一形式的长期反复就不一定出现。因为我之军队不只一个，解放区将来也不只一个，我对付的不是红军在内战时期的全国性敌人，而是地方性敌人。有此条件，我们可能以各个地区的战略协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并且可能进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有可能因此而结束战略的防御阶段，转变到彻底歼灭敌人解放华南的战略进攻阶段。

(6) 如果反攻大军南下，我将迅速的从战略防御的游击战转为战略进攻的运动战。

(7) 集中优势兵力的速决的歼灭战，主要的是集中兵力歼灭地方反动武力，争取可能歼灭敌保安团队及正规军。

(8) 主要的不是夺取或固守城镇据点，而是占领广大农村。

(9) 基本的原则仍然是有什么枪打什么战，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按照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参考书籍

- (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2) 毛泽东：致林彪的信
- (3)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 (4) 古田会议决议案

(5) 统一领导的决定

(6) 政治工作条例

关于军事上的几个问题

(附件)

我看了建军问题及广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之后，根据南路基本的情况，提出几个问题，以供大家研究，如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才补充到那个提纲里面去，我的问题简述如下：

一、招兵买马与发动群众，下令组织与志愿参加

在发动武装斗争与建军工作上，乘敌之虚，攻其不备，大胆、迅速、广泛摧毁敌之区、乡保甲政权及地方反动武装，把群众武装起来，以民变的形式出现，这样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展开武装斗争，是正确和重要的方法。同时招兵买马和广泛号召，造成豪杰蜂起，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是必要，和有效的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军队既然是人民的军队，建军就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要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来建设军队，这是我们建军的思想观点和根本原则，招兵买马，收编伪军土匪，利用流氓烂崽，虽然一时有效，但不能作为我们建军的路线。

我们又要弄清楚，人民的解放事业，既然是要靠人民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相信自己的力量，由人民自觉自信，决心起来斗争，才能胜利，而我们的军队，就是人民藉以获得解放的工具。人民的参军和组织武装，就必须是出于志愿的要求，任何情况也不能加以强迫和命令。

因此，如果片面强调招兵买马，使干部思想凝结在这一点上，忽视甚至蔑视发动群众，又为求发展迅速，急于事功，下令组织，

下层干部就不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不做深入耐心的群众工作，把乡队村队农军等等强迫成立起来，这个结果，伪军土匪流氓烂崽，窃盗之流，或乘机借势，或挺而走险，出头带兵秉政，阳图敷衍，阴谋恐吓，民则被迫起来革命，雇佣的成份也出现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几个具体问题，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依靠谁，我们只有依靠基本群众（工人、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伪军、土匪、流氓、烂崽、窃盗。

第二个问题是搞乱谁的天下。利用伪军、土匪、流氓、烂崽、窃盗是要搞乱四大家族统治的天下，不能破坏我们的政策，不能扰乱人民，不能在自己阵营内“养乱”，“矫极必须过正”，但不能使人民也说“糟得很”。

第三个问题是收编和防备，孤立和争取，利用和改造，我们可以收编伪军、土匪，争取利用，但应提防他们投机叛变，孤立其上层领袖、争其下层群众，并一般改造他们，我们可以利用流氓烂崽、窃盗等旧社会的“下流”人物，但应一般加以改造，因为他们实质上是贫苦农民，所以我们在农村的干部政策是贫雇农的干部政策，不是简单的流氓烂崽干部政策，我们争取改造伪军土匪，使成为人民军队，争取改造流氓、烂崽、窃盗，使成为人民干部（所谓求同），但必先分清上下层，分清阶级成分，承认和正视他们的伪军土匪性质流氓性质，和我们人民军队在爱人民干部的性质之间的差别（所谓之异），然后方能够重视和切实使他们上层孤立，提防他们叛变，争取他们下层并加以改造。

第四个问题是命令主义和群众路线，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反对命令主义，这是很明显的，不必多说。

二、地方性与机动性，分散发展与集中破坏

我们的武装，以×××××四县来说，脱离生产的，总数约××人，今年秋收分粮以前，基本上没有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这××

武装组成农军村队和乡队、区队、县主力团（八月以后边区主力团拨归各县），农军村队乡队由乡或村政府指挥，区队由区委或区政府指挥，县主力团由县委指挥，这样武装的指挥系统和指挥权力是分散的，部队的组织和活动也是分散的，如果以县为地方单位，则我们今天只有地方性的部队，没有机动性（以若干县为活动范围）的部队，今天对于我们的部队，只有分散指挥的一面，没有集中指挥的一面。

地方性和机动性，指挥权力的相对分散和相对集中，分散发展和集中破敌，在今天××的武装斗争局面中，都是不可偏废的，我认为缺乏一个有经验的军事中心人物，缺乏机动部队和适当的集中指挥，因此在反扫荡斗争中不能集中破敌，四月以来敌之扫荡继续不停且日益强劲逼进，这是我们军事上最大的弱点。

当我们的力量已过早公开暴露，敌已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并加强地方武装对我扫荡之际，如果我不能集中破敌，则分散发展，其本上是不可能的（武工队除外），这时候要求分散发展，而不作集中破敌的部署布置，并力求达此目的，那便是一种主观空想，我在××这么久，直到现在，始终认为在敌围剿扫荡之下，分散活动，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以保存我之实力，是必要和可能的，但要以此求其发展，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如长期或相当长时期如此，既然基本上不可能发展，则保持实力以求生存，也不可，除非外力援助，或全国全省攻势迅速发展，敌在总方面垮得很快。

集中破敌有没有可能呢？我认为是有条件的，所谓集中破敌，不是说一举破敌，这是不可能的，但集中我之力量，逐渐破敌有生力量之小部或一部逐渐壮大自己，以求敌我力量对比之变化，迫使敌停止这一次的围剿扫荡，取得发展的机会，则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之优势仅是相对优势，兵员数量敌我相差不多，敌之配备与技术比我强，我之士气比敌壮，群众助我，敌之指挥作战经验比我高，我则上下团结，情况熟悉胜于敌。

如果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在敌集中围剿扫荡的形

势下，为了生存与发展，集中破敌是必要和可能的，那么，建立机动部队（边区主力）相当集中的指挥权力和适当的统一制度，都是必要的，今天我们的部队，实际上不能脱离游击性，地方性，和分散不统一性，但我们也不应停留在这上面，应逐步提高，因为我们已经搞了一年了，何况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更为迫切，不能集中破敌，就不能分散发动，也不能长此生长。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还缺乏一个有经验的军事中心人物，战略战术思想与指挥经验战场经验都还很幼稚，则遭受若干挫折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创造一个的新世界，失败又是为成功之母，我们要在若干挫折中锻炼出一批军事英雄出来。

三、战斗经验

如果我们把××次战斗来研究一下，在战术上是可以得出一些经验的，××寨之战，我约三倍于敌，敌是××自卫队（即现在县警卫队），敌我各占阵地，我胜，获轻机一，掷弹筒二，×村之仗我约三倍于敌，敌是保×总队，敌我各占阵地，我击溃敌人，无所获，××南区之战，我约为敌之二倍半，敌为××自卫队，敌我各占阵地，我击败敌人，无所获，××山之战我约四倍于敌，敌为××旅壁山营，敌我各占阵地，我击败敌人，无所获。××之仗，我进入×北时，曾白日行军，暴露目标，敌来时我料敌仅百余人，但实际上敌三、四百人，我约为敌之二倍或二倍半，敌为保×总队，敌我各占阵地，初敌不利，被我包围，但我冲锋失败，持久消耗，我弹尽，敌反冲锋，我败。××坑之战，我约六倍于敌，敌为××自卫队，我设埋伏，我胜，获轻机一挺，步枪五枝，电台一座，×县共打伏击仗三次，第一次伏击在敌两据点相距不过三十里之中间进行，我约为敌之三倍，敌为保×总队，敌中伏后占阵地抵抗，战斗持久，各据点敌大援，我败，××书记牺牲。第二次伏击，当我到达伏击地点时，突发现该地有敌踪，出我意外，又因在夜中，不明情况，我仍攻击敌之阵地，敌为保×总队，人数不明，

我约六百人，结果敌乘夜撤退，我无所获，弹药耗尽。第三次伏击，敌为保×总队，敌一路中伏，我约为敌之四倍，但另一路来援，此路敌来援出我意外，情况变化于我不利，我败。××西北区之伏击仗，我约为敌之五倍，敌为地方联防队，我胜，获轻机一挺，步枪短枪三支。××路上之伏击仗，我约为敌之四倍，敌为自卫队，押新兵二百余名，我胜，获一些被服，轻机预备筒一支，解放新兵百余名。××袭击战，有内应，敌为地方联防队，反正及俘获四十余人，步枪四十余支，轻机一挺。××袭击战，无内应，敌为自卫队，我约四倍于敌，因冲锋突击的组织和配备不好，失败。此外××，××，××，以小部夜袭，有内应，敌为地方反动武装，均获胜，缴轻机四挺。

一 历数了许多战斗之后，我觉得应该指出几点经验：
（一）情况不明不打，或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应坚决退出战斗。

（二）我已暴露又无绝对把握不打。

（三）找自卫队、联防队、地方反动武装来打，正规军及省保警总队，一般不和他们打，我占绝对优势才可以打。

（四）打自卫队、联防队及地方反动武装，一般应有三倍至四倍以上之优势，打正规军省省警总队，一般应有六倍以上之优势。

（五）一般不打大仗，应打小仗。

（六）不打消耗战和击溃仗，要打歼灭仗，不打阵地战和运动仗，要打游击战，即夜袭和伏击，因此冲锋袭击的组织和配备必须集中使用，夜袭和伏击的布置指挥，成为我们指挥员的基本战术，冲锋袭击的技术，如掷弹术、刺刀术、射击术、爆破术、成为我们战斗员的基本战术，我们部队的教育和训练，要根据战斗要求进行。

（七）敌军内线工作应十分重视，目前形势及以后发展，敌军内线工作的有条件将更多。

这些经验，本来已经是很普遍的东西了，但在今天的××则是

很重要的，俗语说“听过不如见过，见过不如做过”。我觉得是很好的。

四、创造新的根据地

日寇投降后，珠纵之转移广宁，东纵之转移五岭九连，南路解放军之转移越南和现在转移左右江，都是广东武装脱离老的、平原的沿海的根据地、建立了或正在建立着新的、山地的、边境的根据地的史实。这种转移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可称为战略转移。

目前×××××这个地区，可以说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根据地了，这个地区，因为虽然本区反动统治不强，但四周如××，××等主属，则是反动统治很强的，虽然××是丘陵地带，但××则是沿海平原地带，所以虽然是一个根据地。故为准备万全起见，一面坚持原来的地区，另一面开辟新的地区，是很必要的，认为原来地区可以巩固，可以波浪式向四周扩张，不必开辟新地区，及认为原来地区不能巩固，必须作主力转移式战略转移的这二种意见，都是不对的。但坚持原来地区与开辟新地区，两者的平均部署也是不对的，今天应以坚持原来地区为主，以开辟新地区为次。

新地区的方向问题，是首先和头等重要的，决定一切的问题，向着反动统治的中心或很强的地区去碰，一定是失败的，一九四五年××解放军向××转移，及桂东南起义的失败就是实例。我们曾不明情况，把开辟新地区的方向放在××王属。这也是错误的，把方向重新决定在×××，今天看来是对的。因为那里是山岳地带，两粤边境，反动统治较弱，经济条件并非不容我生存的一个地区。

但是自我们从新决定这个方向以来，至今实际上并没有加强那里的工作，这是因为××党虽然承认必须开辟那个地区，但只宜就地组织短枪武工队，外来的长枪战斗部队，是不能在那里生存的，我们今天只好派出二百至四百的战斗部队去那个地区，但一般干部对这个行动都没有信心，虽然提供了××，××，××，×××各地的实例和经验，仍然不能使干部相信这个行动是可以有成就的。

一种行动虽然客观上有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存在，但主观上认识不够或经验缺乏，往往还是不能见诸实践的。

五、伤病员和军属

照顾伤病员和军属，是提高战士的革命热情，巩固部队的重要工作之一，但这个工作往往为我们的部队首长及党的领导机关所忽视。

有几种严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

(1) 医务机关缺乏，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有些地方管理不善，没有专人负责，专款供应，部队首长没有把这个工作作为军事行政上重要的经常的部门，有系统地来领导，伤病员随外寄放，把责任推给地方工作人员，地方党又不能专责照顾，因此伤病员对医疗、给养和政治工作，普遍表示不满。部队的医务人员官僚思想浓厚，一般被称为“医官”，是“医官不医兵”的讽刺。

(2) 医务机关或寄放伤兵的处所，忽视安全保证；或者集中暴露，或者笨重庞大，或者脱离群众，往往被敌袭击，有所牺牲损失，或仓卒撤退，伤病员无人照顾，转侧于荒山棘路，在敌搜索中听天由命。

(3) 革命战士和干部，牺牲了的、撤退了的、流亡了的、现在继续奋斗着的，他们的家属，或受反动派摧残，或为饥寒所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为数甚多，这些家属对革命失去信心和热情，发出怨言，或积怨在心，群众则以此为鉴，害怕革命，××一些老边区基础极好，产生干部及参军极多的乡村，现在成为对革命最冷淡的乡村，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说这些干部，这些家属，这些乡村，是老而“生锈”，“乌龟缩了头”。

各地目前应普遍检讨和讨论这个问题，克服各种错误现象，我认为：

首先我们的首长和领导机关，要深刻反省，对为革命流血流汗

的干部和战士，对备受苦难的军属，负起责任，不要把人当作器具，用坏了就丢掉（勤俭的人，器具坏了还要修理），要把伤病员和军属的照顾问题，作为重要部门的工作，亲身动手来处理，首长及负责干部，应该经常到医务机关去，下连队去，慰问伤病人员，亲手去检查和督促医务工作，发扬和鼓励伤病人员医务人员的光荣和功劳。

其次，医务机关要分散、隐蔽、轻装、依靠群众、反对集中，暴露、笨重和脱离群众的做法。要专人专款打理，保证医药、食料、被服的供应及政治工作的经常加强，伤病员的优待应有条例决定，保证执行。

最后，军属的照顾优待，也应规定条例，注意发动军队帮助军属的劳动生产和慰问联欢，地方党、政权、群众团体、应将照顾和优待军属作为一件日常工作，发动群众来安慰和帮助军属，凡劳动、耕牛、种籽、疾病、医药及一切困难，应尽可能照顾周到。

宋子文“军建”的透视

（1948年8月）

我们远在三个月以前，在“论宋子文经建骗局之败露”中，肯定地指出：宋子文的“经建”实际上是个“军建”，而且这个宋子文自己特为法宝的“军建”，却仅只黄埔一港、粤汉一路也还没有全部完成的可能。时间才又过去了三个月，事实又揭破宋记许多关于“军建”的捏造和渲染，证实了他们岂但没有全部完成，根本并未正式着手实做。十个月来宋子文装腔作势藉以吓人的美援军建的这一场“计划”，竟暴露得如此彻底的破绽，这的确是南宋残局中一幕精彩的奇观。

依照魏德迈的亡华计划中“使粤省成为一个工业及交通中枢”

的设计，通过宋子文而具体制定出全广东一个星罗棋布密如蛛网的包括海港、铁路、公路和工矿的大计划，虽然使得若干冷静的观察者发笑而不予置信；但按照美蒋宋救急如妄想有个华南基地以备最后挣扎这一点看来，那末，从美援中拨出一些现钱来建筑黄埔港与整理粤汉路，作为输送军事物资的码头和动脉，并开办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工矿事业，则还未便事先作否定的判断。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毕竟是出乎一切人们的意料之外，甚至出乎宋子文本人的主观意愿之外，真所谓“形势比人还强”。

这个被誇称为南方大港并要“夺取香港而代之”的黄埔港，宋子文曾亲口说过，港口建筑至迟在四月一号落成，四月一号过去了又说五月初，又说六月初，现在是七月，依然连个开港的剪彩仪式都没有听到，而听到却只有黄埔港工区主任李颂陶六月九日陪同胡文虎去黄埔参观时的说明：“现在四百公尺码头可以停泊四条中型商船”；“近海那面建筑五个仓库”在“计划中”；“现在黄埔兴业公司，正准备在近码头那边建筑大厦为办公之所”。胡文虎向他提出重要建议则是“第一应将全港地区填平”（六月十六日《星岛报》）。人们听到的还有省参议员们观察黄埔后的感想：“黄埔港目前仍属荒凉一片，除了码头、起重机及数堆日本赔偿物资以外，其余则无他物可供报道。”“黄埔港要在五十年以后，才可以具备规模”（七月七日《星岛报》）。试问一个南方大港只有可以停泊四条中型商船的四百公尺的码头，而且这码头还是抗战前的旧筑物，这个码头也只有两个旧仓库，及两个新设的移动仓库，新筑的则连一座仓库（船坞更不用说）都还没有盖起来，甚至地面还没有填平；而近日大吹已经集中资本负担实际建筑黄埔的所谓“兴业公司”则还是在开会选举公司筹备委员准备办公地址中；这样的一个港口怪不得连美援调查团史蒂尔曼六月二十四日视察黄埔时，向宋官们问一声“何时可建筑完成”之后，“对各方问题均避不作答”了（六月二十五日《星岛报》）。黄埔一港就是这个样子，什么几千万金元的拨款等于一个屁，其他的什么广州内港，汕头深水港，湛

江、海口、榆林之类的筑港问题，更属神话了。

宋子文说要在本年底整修完成的粤汉铁路，整修费美援金元由三千二百万减成二千二百万，但是还是一个钱也没有拨到，占全路近半的五百四十二公里的破烂铁轨和枕木还是依然未换，九十二座钢桥十一座桥便急待整修的桥梁还是依然未修。传出来的有关修路的消息，有的是粤汉局长杜镇远的悲鸣：“美援规定做建设用的才不过六千万元，这六千万元即使完全用在粤汉路还不够，然而美国方面调查那么久，将来究竟粤汉路能占多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物资什么时候来，更是遥遥无期。”（七月十六日《大公报》）。杜镇远还公然宣称：“现在物价高涨，员工六月份的待遇仍照五十五万倍计算，没有钱，只好把预备材料的款项先用来发薪了。”（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

再说由坪石通南岭煤矿的三十三公里的狗牙洞支线，是久矣夫说要建筑了的，那在供给粤路和广州煤介上原来也是绝对急需的工程，但五月十五日举行开工典礼之后，时至今日，“交通部拨助的二千五百亿已告用罄。收购土地问题迄未获解决。”（杜镇远七月十五日在香港宣称）。就是说，这支线是连路基的地皮也还没有安排妥当啊！

此外宋子文还有四通八达的公路计划。但不说新修，旧路也日见缩短了。广东一万五千余公里的旧有公路中，“能通车的不及三分之一”（交通部公路总司长方兆镛对《大公报》记者语）。而且目前都在柔肠寸断着，“南路、北江、东江和西江、广宁四会一带，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由广州开出的公路车，不论是走任何方面，都不会超出七十五公里”。好久以前就说要积极修筑的东南两大干线（按东干线自广州至汕头接福建，南干线由广州至钦县接桂越），但经费呢？今年南京已拨助粤省的公路建筑费仅只二百八十亿元，除归还年前省府垫借公路费二百亿外，剩下拨五十亿修黄埔公路，最后三十亿蒋元拨修东南干线。这几个钱供养办事机关人员尚嫌不敷，不说筑路了。

宋子文的工矿业计划又是如何呢？广州的工厂，给宋子文“建设”到百分之九十停了业（据六月二十七日《星岛报》），幸存的则纷纷向香港南移，但这大批广东民间工厂之死亡，并非宋子文所引进的所谓广东美资十一种大企业和二百家被批准的美商兴办起来的结果，其实一切的美资企业随着潘宜公司的销声匿迹而不见了踪影，宋记实际“建设”的就是一个广州南石头的制纸厂，这个纸厂的机器原来是日寇掠去而现在还在日本，等待拆迁回来，并且即使实行拆卸运回也须年底运到，装修时间还须一年（六月十六日《国民日报》），到底也等于神话。新设的姑且勿论，就是原有的矿业，首先如蒋宋借以输出铁砂亲日媚美的海南铁矿，实际上竟也付之停顿，海南矿务局长郭楠由榆林回广州时公开的说：“田独矿场的员工口粮缺乏”，“现在办实业的人为吃饭问题伤透了脑筋”（六月四日《大公报》）。该矿务局为着掩饰其除了把旧存铁砂进贡美帝供给日本之外便毫无生产的事实，还无耻的宣言“俟该矿砂载运完毕，则全力采矿”云云（同上报）。这还不明白吗，美宋宣传得举世瞩目的田独钢铁业原来便是连员工吃饭都成问题、只拍卖旧矿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至于海南电厂早年“接收”时已然破坏不堪，近则藉口治安不靖，员工都作鸟兽散了。故宋记所谓建设海南兴办炼钢厂，正如其他如翁江水电厂广州汽车厂等一样，实际上美元蒋元一文俱无，投资云云，也同样是一个屁。

总起来看，宋子文的“军建”成绩，就是：一港未筑，一路未修，一矿未开十二个字。前些时有人打趣地说：美国经济合作局执行人霍夫曼，用广东话来说就是“确乎慢”，恰好说明宋子文美援军建进行的速度。但是，事到如今，一切都要变成“确乎有”了。

十个月来宋子文装腔作势藉以吓人的美援军建的一场“计划”，竟落得如此彻底的空空如也，在人们的认识中从“确乎慢”变成了“确乎有”；但这并非美帝之故意不理，或者宋子文故意怠工，也并非美宋从开始就预见或愿意会有今天的结果。首先是美帝的拨款有限而蒋朝漏洞无底，宋子文二月、四月两次上京向蒋美叩头，终

于分不到残羹剩饭。求其次于美商，则他们看穿“内战时期若投资经营事业无获利把握”（合众电）。再求其次于侨资，可惜宋虽“念念不忘”，但“港侨并不热心”（《新生报》）。宋记五路俱穷，自己在美洲的荷包又不肯拿出来，“军建”就只好如此而已了。

十个月来宋记军建的规律，教育了广东人民：美援是无济于事的，依靠若干美援大放空气的宋子文军建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广东人民全华南人民的斗争日益发展与壮大中，宋子文的美援军建将永远地无办法，宋自己说得对，“治安无办法则一切无办法”。岂但无办法已哉，宋子文还要经常负起“送子弹”的任务来也。

（原载《正报》100期，1948年8月1日）

百期纪念，鸣谢读者

（1948年8月）

正报同人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香港复员之初，“正报”创立，即以小型两日报出现，作为华南人民大众的喉舌，得到祖国人民及海外侨胞争相传阅，爱护备至。

一九四六年东纵北撤完成之后，又值国内旧政协时期告终，“正报”当即改为旬刊，出版新一号，在华南满天云雾当中，乘风破浪，坚持不懈，由新十一号起，又改为周刊，经常的报道光明消息，传播斗争真理，为了击退黑暗，苦撑奋斗，随着南方人民斗争形势的重新开展，吹响进军的号角。

一直至今都为各阶层人士所重视，尤为学生青年干部所宝贵。

经过一九四七年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经过华南特别是广东

人民自卫斗争向游击战争的转变点，计自新一号到现在恰到达第一百号。在全国解放军五路大捷及在广东各江人民武装斗争获得划时期的盛大胜利的声威中，回读期刊百期历史及其前史，恰正约略反映了近三年来华南自卫斗争与解放斗争的大势，又恰正大体反映了南方青年干部的学习锻炼及其迈步前进的全程，并且不仅仅印下了急激发展中的历史的足迹，而且着重推进了它的步伐。这些点滴成绩，正就是能力不足的“正报”前后全体同人共同努力做了微不足道的事业。今当百期告满，我们追思往迹，放眼前程，正应深深领略自己能力短缺之处，并须因而加倍振作，克服弱点，不断进取，力求赶上全国革命形势特别华南人民解放斗争继续开展的迫切需要于万一。这便是我们势当自勉并告诉读者的一句话。

这里，我们以社内人力、财力不足，经验、学识贫乏，即使不过做了一些点滴成绩，都是由于第一；我们是在伟大的正确坚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第二，我们是在许多忠诚能干的人民作家的协助下努力工作的；第三，我们是在广大的热情蓬勃的读者支持下尽责工作的。

关于重要的最后一点，读者群众多年来给予我们的精神与物质的支持，到访或写信教导、鼓励以至责备、训勉的也有，乐捐金钱以至物品或用具的也有，甚至于对本报事业心到手到亲身出力协助工作的也有，帮助式样之多，赞助持续之久，虽未达成“群众办报”的最高形式，但实际上也已确证了“依靠群众”是战胜一切的法宝——这个真理了。

尤其是今次从三月中旬开始，读者响应本报万元基金乐捐运动，截至五月底即经已突破原定目标，现在适逢百期纪念，全部统计刚告结束，捐款全数内包括港币、叻币、荷币、美金，陆续伸算合计，竟达港币一万二千余元之巨，乐捐人数多至一千五百五十一人，另二十集体单位未计在内，包括了工商业界、工人、苦力、学生青年、妇女等各阶层人士，充分表现了各地广大读者爱护本报的热烈，使得我们深刻感到只有万分感激、敬佩和兴奋，同时，鉴于

目前若干国外读者因而也就是本刊的销路，受到更多的隔阂和限制，加给我们更多的困难，这就更加使得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努力，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继续克服前途险阻而继续保持与提高成绩，适应革命战斗的需求，也即是读者的期望。

在百期纪念中，仅此鸣谢本报全体读者，并发表万元办报基金乐捐总结如下：

乐捐人数1551人，集体单位20个，港币11,944.71元，美金80.68元（以下略——编者）

（原载《正报》100期，1948年8月1日）

敌人呼救无门

——粤局述评

（1948年8月）

现在要说，广东反动派已经被投入人民势力的天罗地网中，处处挨打，大祸难逃，有了种种事例可资证实：

首先，琼崖反动军被围受困，动弹不得，为时已久。敌之四个保警团及一三一旅几千新兵，只顾缩守据点早丢了线，丢了面，无论如何。六月榆港告急后，全岛敌军至今蛰伏待援，粤省方却无能再增派兵力去挽救危局。

其次，七月南路解放军胜利攻进湛江，一进一出之后，依然强有力地控制湛江市区外围及廉江遂溪广大县境。敌之三个保警团结合广西在边境之数千反动团队，应付不了十万大山人民武装的游

击，顾此失彼，慌乱已极。一个月来，硬要乞求粤省方多派两团保警，张君嵩才敢赴湛就任新设的第十区“专员司令”，结果勉强抽调给了他一个营人马，还是欲行又止，迟至今天，尚未登程。粤省方只能在报章上虚张声势，遥为张瑞贵壮胆。而南路解放军增长兵力，扩张战果，跟着接连攻破廉江县三大炮垒，县城敌人大感震骇，尽管哭哭啼啼，终于无人救援。

再次，敌最近发动一五四旅、保五保八以至保十三等几个团，及派出监警总队，调来虎门警备队并集结若干地方团队，狂妄策划向东江地区大举进行所谓“第二期清剿”。他们的兵力刚在展开行动，便给惠东宝护乡团眼明手快，一开头就在沙鱼涌创造了辉煌胜利的对敌歼灭战，接着于一旬之内，迎击敌之三路进攻中，又痛歼了横岗墟一路全数敌军，收得大量歼敌大量缴获的效果，使得当地民众说：宋子文应改姓名为“送子弹”。这个大而无力的挣扎性进攻，只能招来头破血流无人可怜的结果，将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西江、中区、粤北、粤东、各江战火熊熊。各个地区的反动头子手上掌握一两个单薄的警保团力量，算做有一点近卫兵力，暂时避免得了被活捉生擒的命运吧了。他们没有一个不焦头烂额，捶胸顿足，陷于兵力不敷作恶不得的愤闷悲鸣苦况中。如潮汕的喻英奇，粤闽边的涂思宗，都亲身赴穗屡请救兵，也都双手空空返回原防地，只好等待最后末日的来临。

广东反动军兵力，仅有在补训中的一五三旅、一五四旅、一三一旅等这一点点的所谓“国防军”，暂时保卫得住广州、韶关、榆林、海口几大巢穴；十五个残败的保警团和十数个残缺的保警营，亦即所谓“省防军”，暂时保守得住各区县城及市镇；另外一些什么交通警察总队、监警总队、要塞警备队，也暂时保护得了粤汉、广九两铁路及其他几个交通要道；以至各县收编土匪而成的七零八落的所谓“地方军队”，则不过仅可用来鱼肉民众，欺负迫害还没有武装起来的徒手人民而已。很显然的，这些反动军面对着火热的汹涌的、普遍全省的人民武装与解放大军的袭击浪潮，就正好

象陷身火海，除了粉身碎骨，便不可能有别的前途。

广东反动当局处在这种气息奄奄，垂危待毙的情况下，日思夜想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企求“中央”怜恤，关照应援。然而，他们的“中央”前线兵力更多些还不够支持，而正在兵败如山倒，那又有什么“劲旅”调粤助战的可能？

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危在旦夕的“中央”今年要征兵一百五十万，“年初以来已征了百万，今年还要征五十万名”（《大公报》；本来广东三十七年度定额为八万零五百名，六月底到期征得不及五成，现在却反而又再要广东加配兵额四万五千名，总共就是要广东一省交壮丁十二万五千五百名，给他们的“中央”当炮灰。这就是说，他们的“中央”不加重广东负担，不倚靠广东多一点，就已没有很多别的省份更可倚靠的了。对于他们，最悲哀的就是他们之间谁都救不了谁。

而且，他们财粮交困的“中央”，同样也指望广东多负责一点，救救“中央”。因此，今年度规定广东反动政权，要从粮赋上对人民抽剥征实征借合计五百万石，去年纳户的粮赋如果是一元的，就纳五市斗，今年要纳七斗半了。蒋朝广东手下自知，如要抽剥人民更甚一点，反抗力就会更大一点，结果反动统治的死期就只有来得更早一点的。因此，曾经呼冤叫屈，再三请求“中央核减”，可是终归无效。现在则决定十一月开征，而在八、九、十的三个月里，便打算拚命催收“历年的积欠征赋”了。

这里，敌人是还没有忘记一年来广东人民反三征的斗争，及其直接给与“征收者”的苦头的。粤省田粮处发表了一个统计：三十六年度征赋期间中，给枪杀虏去或受伤的田粮征收人员，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内被杀死的六十八人，被虏去的五十六人，受伤的十三人。被杀得最多的县份是陆丰，占十一人、化县九人、龙门七人、中山、钦县各六人（见七月二十四日《大公报》所载）。那么，用不着多说，他们一定是准备着吃更大的苦头，一定将要弄出个更巨大数目的统计呢。

敌人上下交困，为了救得一时得一时，上下都在吃苦头，事实上已经呼救无门！我们可以眼见着它渐渐摇摇欲坠，今后受到全国全省人民的紧接着的更大力度的围攻痛击，纵使还捱得一些时候，但捱不得很久的了。

（原载《正报》100期，1948年8月1日）

论广东经济的特点

（1948年8月）

许涤新

这一二年来，广东经济在整个蒋管区中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见提高了。可是，这种提高并不是广东人民的“福音”，而是广东人民的严重的灾难！

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在华北，在华东以至在中原的不断胜利，不但解放了广大的农村，而且解放了很多的城市。这么一来，蒋朝的经济力量不但退出了东北，退出了华北，就是南京和上海也就陷入被威胁的状态中了。在半年以前，东北的游资是向平津“逃避”，而平津的游资则是向上海一带集中的。到现在，南京和上海亦觉得靠不住了。于是，大量的游资便转而流向广州和香港。半年来大家嘴里所嚷着的“工厂南迁”、“豪门资本南下”以及“游资南流”等等，就是蒋朝在军事上溃败的结果。广州既成为蒋区资金的暂时的避风港，在整个蒋管区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就跟着提高起来了。

不但一般游资菌集于穗港，就是一些挂着“国家资本”招牌的工业，亦从华北东北撤退而集中到广东来了。资源委员会之撤退华北东北的厂矿而决定在华南进行开发煤源及建立动力设备，就是例证。在这种情形之下，游资跑到广州来，工厂亦有相当的一部份跑到广东来。广东经济在整个蒋区的比重，自然会跟着提高了。

广东经济在整个蒋管区中比重的提高，其所给与广东人民的影响，不是经济的繁荣，而是经济的破产；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生活的更加恶化！

二

看看这几年广东经济在内容上起了一些什么变化吧？

广东经济的第一个特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入。×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在蒋管区各地的势力，暴烈地增长起来，把战前站在它前面的英国和日本，都摔在后头了。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侵略，那是以整个中国作为对象的，但是，它对于广东却看得特别重要，在魏德迈的亡华计划中，把广东作为美帝在华的军事和经济的据点，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去年五月，潘宜公司早就从罗卓英手中取得广东十一种企业的独占权了。TV宋之出马统治广东，就是以执行美帝的计划作为主要任务的。今年四月间，那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来广州及海南岛“考察”。“考察”之后，他们都认为海南岛“经济条件异常优越”，据合众社电讯，他们此行是与“开发”华南的计划有关的。这个计划的要点有二：其一是建设广东的黄埔，台湾的高雄及海南岛的海口，成为一等海军基地与海陆空军训练中心；其二是开发矿产资源设立小型国防工厂，发展渔业及农业，增加糖业及建立制造工具的工厂。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借款之下进行的（当然建立海军基地之经费断不会在借款内支付）。由此可见：美帝的经济侵略是与军事行动打成一片的。同时，蒋朝在粤的“经济建设”，亦是没一项不是以美帝为背景的。固然，美帝在广东所取得的经济特权

(象潘宜公司的十一项企业独占权)，还未实行，但，卖身契已经签好了字，我们是不能因为它没有马上实现就看轻它的严重性的。除了美帝的“贷款”以外，美国的商人亦大量在华南进行经营。以今年四间的情形而言，美国在广州登记的进口商已有二百余家；一部份美商并且以中国商行名义注册。同时，美国的附庸加拿大，亦跟同美国一齐进入广东，如所谓珠江水利电工程建设方面，加拿大资本家亦协同投资。

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经济建设，实质上就是广东进一步的殖民地化。海南岛所出铁砂成为日本八幡的原料；在拟议中的开辟雷州为糖麻产区亦是完全以美帝的主张为依归并且完全受到美帝的支配的。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日本货又大量向蒋区，向广东倾销了。日货之倾销广州，有“走私”、“冒美国货的牌”及“由进口进口商正当输入”三种方式；倾销的货品，主要系呢绒、花布、搪瓷、日用品、药品等等。日本货之侵入是离不开美帝之扶助的；在今天，日货是不与美货相对立的，因为日本工业都投有美国的资本。故日货的倾销就是美货的倾销；日货的倾销亦正显示出广东（华南以至全蒋区）的殖民地化。

广东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官僚独占资本之侵入。这一件事，在表面上呈现为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对立。有一位记者这样写着：

“半年来，广州有一显著迹象，就是江浙财团在穗势力的逐渐膨大。金融机构多被把持在他们手里，新开设的大百货行（近来百货行特别开得多），进口商都是他们做了主人。每一个商人集会，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假如我们自己不团结，不争气，半年之后，我们也要学浙江话了’”。

这一段报道只能报道事实的表面，如果把江浙财团改成为官僚资本集团，那就好了。事实证明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官僚资本，如果与官僚资本没有什么勾结，则这一个江浙财团的气焰，是不可能这样嚣张的。事实证明得很清楚，今天统治广东，压倒广东土著工

商业的，不是别人，正是四大家族中的宋氏家族，看看宋家是如何掠夺广东经济吧！

TV宋到了广东不久，就双手劫取广东的省营企业，这个公司包括一百八十七座工厂，每年盈利数百万港元的顺德糖厂亦在内；宋氏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即将在广州设立分公司，经营食糖与纺织工业，原来属于广东实业公司经营的糖厂及纺织厂被宋氏划归该银公司经营；在广东占重要地位的洋灰工业亦归中国建设银公司所独占。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一个华南盐粮调整运输公司与珠江进出口贸易公司。顾名思义，这二个公司的业务都是很明白的。前者垄断华南的盐粮，后者是在垄断华南的出入口。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华侨日报》的广州通讯有云：“近闻有某工厂厂址尚未建筑，输管分会已预先代备输入材料。此举显示措施颠倒，缓急不分，何以设备完整，其产品又为社会需求殷切之民营工业不能得到其维持最低限度生产工作的材料输入，而输入额竟走向一片荒地上”？写这一段通讯的记者未免太天真了，四大家族为了自己的利益，那里有什么缓急之分呢？又那里顾到民营工业的死活呢？珠江进出口贸易公司建立之后，宋家在华南的贸易独占就更加加强了。在这里，输管会中的“输”是对官僚资本而言的；输管会中的“管”是对民营工商业而言的！

宋氏官僚资本不但在省营企业上进行其偷天换日的手段，而且又在“国家企业”的名义之下，把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国家资本引进到广东来。今年一月间，翁文灏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飞来广州与宋氏共同发表什么“宋翁声明”：由资委会与广东省府合作，增资于广州电厂并合办潞江水电厂，南岭公司（以粤北八字岭及湘南狗牙洞两大煤矿为对象），海南炼钢厂与制糖厂等等。这些企业在表面上是资委会与粤省府合作，实际上却是宋氏家族独占广东工业的官僚资本，更确切的说，那就是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与美帝国主义野合的私生子，因为这些单位，无一不是与美帝国主义的资本有关的。机器资金，无一不仰给于美帝，无一不是从美帝取得

支持的。

今天的广东是怎样一个广东？今天的广东经济是怎样的一种经济呢？看看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下面一句话，那就是：美国资本，日本货物和官僚资本的星罗棋布的工商金融机构。

三

广东既然成为美国资本，日本货物和官僚资本的世界，那末，民间资本自然没法生存下去了。

先谈工业吧，在TV宋的倾压之下，广东的民营工业弄不到必需的原料，贷不到必须的资金，保持不住原来的市场，这么一来，自然只有一天比一天衰落了。有一位记者这么的写着：

“现在已经在筹设中的农械公司，亦企图借重美国工程师来制造农械与一般小小的铁匠争生意；广东的火柴工厂在战前原有数十家，战后共有十家，但（今年）四月以来，宋子文更下令禁止火柴主要原料磷酸铅钙等进口，理由也是不说自明的。”

国民党政府之打击民间工业，还不仅因为它的帮助美国资本，占住市场和控制资金，而且还因为它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汇制度与输管制度。恶性通货膨胀使制造品的卖价没法购回原来的原料；而结汇制度则切断了货物的出口；输管制度则断绝了工厂所必须的进口原料，官僚资本就在这里大做其文章，就在这里利用这些法宝去大发横财，但是，民间工业就在这里完蛋了。据今年五月十六日《星岛日报》的报道：“目下广州各类工业，无论火柴、橡胶、卷烟、织布、电泡、五金等各工厂，相继被迫停业者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家庭工业则以延长时间的血汗制度，去维持其可怜的生存。

商业呢？情况是不见得比工业好一点的。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商行，因为拿到入口证，因为进行囤积与走私，自然可以大赚其钱，至于一般中小商人，那是惨痛得很的，据某报所载：“本年来穗市各行商业，多数不景，截至七月间，如以银水外币计算，则亏去百分之五十以上；以资物计算，至多得回六成至七成之间，缘以

金融物价不断暴涨，货物买卖盘沽盘高，往往不能追回原货。金融物价如此波动下去，直至年关时，本市同业将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倒闭”。

工厂关门的已经有百分之七、八十；商店关门的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就是TV宋所给予广东经济的成就！但，他们还是不以此为满足的，加重捐税，就是他们的又一德政，今年广东的所得税不但要照去年加六倍，而且又要限定在四月十五日以前清缴。逾期不缴，十天罚二成，二十天罚五成，三十天罚一倍，四十天罚二倍，四十天以上罚三倍。有些商店一次就要交几千万元，这样重税先打击了商家，接着就打到一般人民的身上来。因为蒋区的所得税毕竟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的。

工厂商店的大量关门，造成了更多的失业者；而恶性通货膨胀与北方游资的南流又将使物价跳得更快更厉害。这么一来，人民的生活就更痛苦了！在这里我们只注视城市经济。如果把三征和水灾风灾下的广东农村合并来看，那就更可以看出广东人民是在过着什么生活了。但是，英勇的广东人民是不会无声无息地忍受下去的，他们已经用行动来作回答了！

（原载《正报》101期，1948年8月7日）

关于宋粤派系斗争

（1948年8月）

颜 孙

反动统治集团各派系，在反人民的立场和政策上，是无条件的统一的；但在他们之间的各自利益的冲突上，和基于传统关系或地

域宗族的派系区分上，却经常存在着对立与斗争：这种对立斗争有时表现得激烈，有时表现得缓和，而在其斗争的发展总过程上，总是愈来愈尖锐，愈恶化，必至于削弱整个统治集团的力量，加深其统治危机，使得人民可以更有利地扑灭反动政权。

近几个月来，在广东以宋子文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趋于前所未有的激烈。这意味着未及一年的宋粤统治的危机，达到如何深重的地步。——“革命形势的到临，不仅被统治的阶级不能再活下去，连统治阶级也不能活下去了。”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说明今天的广东局面。

去年十月以前，以罗卓英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和以张发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斗争，达到了无比的恶化。十月以后，蒋介石“特派”宋子文到广东来调协这个斗争，特别是要他防止广东“地方势力”对蒋介石“中央”的离心运动和反侧倾向。

宋子文执行蒋介石的“圣旨”，于实施的方略上，原初采取“均势主义”。对于“中央势力”范围下的CC派，政学系，军统等等；和“地方势力”范围下“四军系”、“十二集团系”，“北江系”、“东江系”、“西江系”、“南路系”、“琼崖系”，无不兼容并包，集其大成；自己则藉口“党、政、军一元化”而独揽大权，高踞各派系之上，从而企图结集和强化整个广东反动势力，以加紧实施摧残人民的暴政和镇压人民的暴行。

“均势主义”的具体实施，一方面纵容CC派余俊贤、高信等，依旧盘据国民党粤省党部和穗市党部及许多御制御用的“民众团体”；一方面保留政学系的欧阳驹窃据广州市政府。在军事上，则利用黄镇球维系“四军系”残余分子缪培南、邓龙光、朱晖日、何彤之流；同时起用“十二集团系”（余汉谋旧部）的徐景唐、叶肇、张瑞贵、张光琼等分任军政要职。另一方面则支持曾为陈济棠“文胆”的林翼中把持所谓“省参议会”。唯有财政经济部门，宋子文任用嫡亲人物去“劫收”。此外，有一个所谓“智囊团”实际是“阉宦组织”，替宋子文“运筹帷幄”。那构成分子，便是李承

翼、钱树芬、朱光沐、陆文澜辈，他们在幕后活动，控制着宋粤“大政”！至于全省“民政”，表面上由徐景唐主理，实际各县“行政”全为各派系所分赃。

宋子文的“均势主义”开头就碰壁。最初，他的计划：是把张奎逼走后，而收容“四军系”的空头将军缪培南、邓龙光协同黄镇球，安置高位，分任“行轅”（后称“行营”，又改“绥署”）的副主任；他方面则分封“十二集团系”（亦即余汉谋系）的叶肇、张瑞贵、张光琮等据有北江、南路和东江的地盘。这一来，使“四军系”在上有权无力，又使“十二集团系”在下有力无权，形成上下掣肘的形势。这套“妙计”首先委屈了叶肇和张瑞贵，要他们以曾为“总司令”之尊，降格去当“行政专员”，以致张瑞贵迟迟不就“专员”。宋子文为了“迁就事实”，只得设置“粤桂边区总指挥”和“粤湘赣边区总指挥”，用以满足张瑞贵和叶肇。

“均势主义”即受“十二集团系”的反抗，宋子文除了提高叶、张地位之外，更让徐景唐在“县政”的分赃上予以相当满足。可是，才使“十二集团系”平伏了些，接着就有朱晖日的滚蛋，缪培南的消极，陈文（三区专员，曾为李汉魂、邓龙光部属）的去职；可见“四军系”因处劣势而消极。独有黄镇球那早已投靠“中央”的“四军逆子”，依然做宋子文的孤臣而已。

今年春夏之际，地方势力的两大派系的冲突，表现在“县长保举”的角斗上。分赃自然难得“公平”，徐景唐虽然做了民政厅长，但他常常表示“县长的委派，事前毫无所知”，可见悻悻之态。事实上，“县政”分赃的决策机关倒是“智囊团”，各派系对之，一面奉承，一面嫉忌，就是这个道理。

“县政”的分赃不匀的角斗，结果逼走了徐景唐。继之而来接任“民厅”的是华振中——这是个“骑墙人物”，他与“四军系”和“十二集团系”都有渊源，所以成为宋子文“协调”两派斗争的工具。可是，无论何种调解“工具”当遭遇到派系利益严重冲突的时候，一样要折断的！有一天“左右做人难”，就要“两边不讨好！”

历次所谓“省议会”的大会上，都露骨的反映了反动统治集团各派系间的斗争，不仅“地方势力”有其代言人在内，还包括了“中央势力”的CC派、政学系，和渗杂一些“亲宋分子”。他倒以伪装的“在野”的姿态，几番“炮轰”宋子文及其属僚，目的在打击各自的“政敌”，同时向宋子文示威，遍其“偏宠”自己（我们决不要被那闹得响亮的互扬臭史的“舌战”所蒙蔽，其实他们与宋子文的“在朝”的反动集团是血肉相连的）！当“十二集团系不满于宋子文“抬举四军系”的时候，其代言人就在“省参”藉“治安问题”大轰黄镇球，以后就有“四军系”的“省参”的回敬，藉“吏治”问题，反轰徐景唐。后来双方更藉“财政”“建设”问题，夹轰胡善恒、谢文龙，简直“轰”到了老宋的头上。但到底尚属“舌战”而已，未至大打出手。

今年五月以后就不同了，暗斗已经发展而为明争，终于短兵相接。而且，呈凶的双方，并不限于“地方势力”各派主要的竟是“中央势力”的CC派和政学系和“地方势力”各派的错综的混战。

自从今年一月“沙面焚燬英领馆”，事件发生后（这件事是CC派喉使特务挑发的），宋子文与CC派之间存在了嫌隙，宋子文便转而采取压抑CC派的态度，因而不能不愈加利用“地方势力”与之抗衡，从此暗争日趋激烈，终于在航业权利的争端上，爆发了朱克勤案。朱是投靠军统和CC派同时勾结李福林土势力的一名党棍，他与余汉谋的西江航业系（余佶闲、潘月樵等）的利益发生正面的尖锐冲突，余系桂系包围宋子文，而宋子文亦乐于藉此机会给CC派一个“下马威”，便突然下令扣留朱克勤，结果引起了CC派疯狂的反响，最后逼使宋子文软化下来。

此后，CC派又藉着喻英奇扣留吴履逊事件，由陈述经出面来打击徐景唐系属的喻英奇，同时威胁宋子文。这是宋子文“绥靖”

CC派的后果，使CC派经验到保守不足以图存，索性处处捣蛋。广州三轮车案，以至市“临时参议会”政组问题，市商会倒何（辑屏）案，更显现CC派不惜同时向政学系的欧阳驹开火。

宋子文的“均势主义”和“绥靖手段”，至此已告破产，对于蒋介石“中央”的援命来说，宋子文实在“有辱君命”！

宋子文调协各派系斗争的一切努力已成泡影，往下去，更严重的恶斗还在酝酿。最近起用张达为“绥署”副主任替代缪培南；起用华振中为“民厅长”，替代徐景唐；都是企图寻求“调协”的新步骤，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到今天为难调协的，宋子文的“调协”的新步骤终要失败的。更由于广东和全国人民斗争的胜利的展开，局势只有使宋粤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日益急剧，最后走完无可避免的命运，同归于尽。

一九四八年八月

（原载《正报》107期，1948年9月18日）

新高鹤人民部队发言人

指斥蒋宋阴谋出卖新宁铁路

断送华侨权益

（1948年9月）

新高鹤人民解放军发言人，指斥蒋介石、宋子文、马超俊、刘维炽等××××，阴谋出卖华侨血汗物业的新宁铁路发表谈话如下：

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宋子文，在大批出卖国家权益之后，又阴谋出卖我华侨的血汗物业新宁铁路了。他们妄想使用马超俊、刘维炽等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掩饰他们的盗卖行为，欺骗中区人民和海外华侨，那知大粪愈搅愈臭。蒋政府从来就是利用华侨与欺

骗华侨的，绝对没有保护过华侨的丝毫利益。如过去的所谓美金公债等，还不是骗取华侨财物的吗？又如菲律宾、越南、暹罗、荷印等地的侨胞，受尽了人家的歧视、排斥、摧残与剥削，蒋政府的外交人员，不但不设法保护，反而勾结外人，加紧对我侨胞的压迫和祸害。这些事实，多到举不胜举。谁都知道，马超俊、刘维炽等，便是这个出卖华侨权益的蒋政府重要官员之一，是与蒋宋一流的官僚资本家。至于美帝侵华亡华的野心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阴谋、蒋宋独裁×国降美的行为，中区和海外华侨，不也是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由新会江门到台山斗山的新宁铁路，是华侨陈宜禧等先生一手经营的，是全中国唯一的华侨血汗物业，被毁于抗日战争。这些损失的补偿，我们要坚决向蒋政府在日本赔偿中索取，以恢复新宁铁路，所有主权与管理仍属于华侨。但是我们相信，以欺骗和窃取为能事的蒋政府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我们主张宁愿由华侨重新集资来重设，并继续向蒋政府追取赔偿，绝对不容许宋、马、刘盗卖。

我们千万不可幻想美帝国主义借钱复路是什么好心，也不要以为有了一条铁路就能繁荣中区经济，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整个亡华阴谋的一部份，也是蒋宋×国××出卖国家权益的一部份，如果任其下去，我们将看到的，决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繁荣，而是美货的大量侵入，国民经济的破产，国家经济的命脉，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与控制，进而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华侨生活也将更加痛苦。

有一部份华侨，由于他们长期的远离祖国家乡，由于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他们对祖国的情形确实不明瞭，他们对于蒋政府还有正统观念。我们应当告诉这部份侨胞，国民党反动政府只是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只有一个由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开明绅士、海外华侨等民主阶层所建立的民

主联合政府，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我们又诚心的劝告这些侨胞，千祈不可和官僚资本合作经营任何工商业，不然，连最后一滴血汗都会被吸干！不少华侨的财产就是这样被官僚资本吞并了的。今天，华侨只能相信一个真理：就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下，经济才能繁荣，工商业才会发达，华侨资本才有正当出路，华侨利益才有切实保障。否则，不论蒋宋说得如何好听，全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盗卖新宁铁路的阴谋，是给我们华侨又一个最好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已看到一个新的日子就快到来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不断获得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已广泛起来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华扶日与蒋介石、宋子文的卖国独裁而斗争，广东中区人民武装力量日见成长壮大，我们充分相信，蒋宋等官僚资本家的一切阴谋诡计，一定会被人民的巨大力量打得粉碎，谁跟着他们做国内战罪犯，谁就会受到应得的裁判。

（原载《正报》106期，1948年9月11日）

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

（东江前线通讯）

（1948年9月20日）

罗 纯

为了了解广东人民武装活动地区的政策实施的真相，记者花了将近两个半月的工夫，从东江到粤东、粤北、西江以及中区、南路一带，亲历各个人民游击区进行访问和观察。承蒙各地人民部队的

负责机关给予充分的帮助，记者除了由他们获得各种书面的政令、布告、条例和口头说明之外，还直接从各地绅商和老百姓口中得到更丰富的意见和证据，使得记者对各项具体政策有了较完全的见识，并发现各地区中间，施政细则上虽然有若干差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记者试图将所得材料集纳整理起来，将各地区正在努力推行的一致政策，就其为现刻社会人士所最关心的诸项报道出来。同时，这报道的内容，当记者回抵东江前线时，乘便提出和中共广东区党委负责人某先生谈过，他认为我的观察虽尚未有全面，但这实际上和他们发下去的政策纲领原则上是一致的。因此，记者更有信心的把它发表出来。

一切这些政策，从什么出发来决定的呢？差不多各地的负责人，都一致的告诉我，是以有步骤削弱封建势力来决定的，是根据下面三个原则来决定的。

第一，集中火力打击反对人民及我军的反动头子、地方恶霸、首要特务，并消灭其武装组织，联合与中立不反对我们现在政策的地主、富农与一切可能联合与中立的社会力量。

第二，社会政策限于实行反“三征”、减租减息、生产合作、救灾救荒。

第三，财政政策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措施，并保证财权。

减租减息——现阶段的中心政策

最叫人注意的当然是土地问题。据记者所知，华北各解放区实行彻底分田废债之后，广东有的游击区也曾经自动开始实行，而且局部地方曾经出了些毛病，损害了若干中农的利益，和对于地主、富农、工商业家以及华侨人士，有过“左”的不适当的措施，好在范围不宽，而且为时未久即被纠正过来。他们的领导上认为分田废债在今天广东是一种过早的不合现实情况的行动，并确定了一个全省遵行的正确方针，以反“三征”和减租减息为现阶段的具体中心政策。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之实施，更能够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集

中打击蒋、宋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广东人民的各地民主政权。他们指出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总政策。但在南方，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要实行这一政策，还要经过一段相当期间的斗争过程。因此暂时只能采取一般的削弱封建势力的方针，而不是马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同时认定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的基本目的，是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与提高其觉悟程度。故当执行减租减息的时候，农民将获得支持。企图阻碍农民的民主、民生要求的破坏者，将受到坚决的反对；而另一方面，对于地主的地权，也必须承认，对于地主的财权，还须予以保障。

他们根据上面的方针而定下来的减租减息原则和要点，撮要说来，有下列诸项：

一、采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二五”减租。

二、减租办法规定为对分租（地主、农民各半）二五减，即实行减租之后，其租额不得超过耕地的正产物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七五。原租额超过对分（例如主六佃四）者，应降为对分，再二五减。原租额低于对分者，不得藉此提高，但可少减或免减（例如主四佃六时可减一五，主三佃七以下者可以免减）。减租之后，农民必须保证交租。

因受灾致正产物全部被毁者，得免付该造地租，因灾害歉收者，地主与贫民应就实收获的正产物按三七五与六二五之比例分配之。亦可取用“先减时年，再减二五”办法行之。

地主除就正产物按减租后之租额收取一定的地租外，副产物概归农民所有，一切劳役、季节送礼及其他任何超经济剥削一律禁止。

劳苦的革命军人家属及孤儿寡妇，因家中无劳力出租少量土地以维持生活，其生活水平不超过当地一般中农标准者，应予以免减或少减。

三、减租之后，必须保障佃权，禁止无理掀耕或收回自耕，

主、佃双方改订新契约，契约期限至少定为三年。契约未满时，地主出卖其土地，承租人之佃权依然有效；另一方面亦须承认地主的地权，故个别地主确实贫困，经农会同意，可收回一部分耕地自耕。

四、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禁止，借贷利率规定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旧债之清理，其利率在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一律按年利百分之三十计算。债务人已付利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其超过原本二倍者，视为借贷关系消灭，本利停付。

因蒋币币值变动太大，借贷关系以实物（谷）为标准，旧债清理，原则上应按当时价值折成实物较合情理。但如双方有纠纷，政府或农会应从中照顾双方生活调解之。

五、各地过去进行减租减息，若规定超过上述成数者，原则上照原规定办理，不予变更，但对地主的生活应予以适当的照顾。若过去减租成数太高，近乎停租者，如地主有要求，农民无意见时，可酌予变更。至新实行减租减息地区，则一律按照上述规定。

六、退租退息原则上不予发动。过去有些地区，发动退租减租减息法令公布前之债息，这是不合理的。其必须进行减租减息者，亦必须在我之减租减息法令公布以后，对于那些应减而未减，或减后仍然超过最高额者，方得实行退还，而且必须有一定的年限，不能退得太远，致引起纠纷过大。

七、实行减租减息，必须由农民自己来做，使之成为农民的自觉运动。反对恩赐观点，并公布减租减息法令予以保障。地主与农民间如有租佃、债务纠纷不能解决，应由政权机关或部队政治机关（未建立政权者），根据为农民改善生活而又照顾地主不致生活无着的原则，加以处理。

八、减租减息得益较大者主要为中农，故与减租减息同时，要按照实际情况，酌量提高雇农工资，一般以除雇农衣食外，另付给可以供养一个人至个半人的实务工资为适当。

另外几件事

第一件，对于已经分过的田地，如何处理呢？

以上条例是纯粹适合于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或已实行过减租减息的地区的执行。凡实行了分田的地区，他们也明确地定出三个处理的原则：

一、群众决心保田，不要把田交还地主者，则支持农民的要求，拒绝地主抢回土地，地主的生活则另行设法照顾。

二、群众自动把田交还地主者，部队不予干涉，但仍须实行减租减息。

三、曾因执行上错误致侵害中农利益者，则务须设法赔偿清理。

第二件，如何处理逆产呢？

关于没收反动头子、恶霸和首要特务等分子其土地与财产，按清还原则，可以没收分配。分配时除留出一份供其家属维持生活外，其余按照贫苦程度，适当地交给贫雇农。

至于一些在外参加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与乡中家属已无密切关系，其家属的土地、财产与彼无关者，则不能没收，有部分关系者则只没收其有关部分，不能株连其他。

第三件，如何发展生产呢？

和其他解放区一样，生产问题在这里受到一样的重视。他们的做法是：在减租减息贯彻实施之后，应立即团结全体农民，转入发展生产。生产的组织和领导，由农会主持，采取合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劳动互助，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部队帮助农民劳动。农会要募集一定的生产基金，政府或部队亦尽可能指拨一定的款项或实物，低利贷放给农民，贷放时要特别照顾贫苦农民的需要。

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

成为多数人谈论中心的，人民武装对于各项征收，也是一件。

官报和许多半官报在竞相转载，说游击队的税站如何如何的不得了等等。就记者所知，在二、三个月以前，游击区的财政政策还是没有有一个比较确定而统一的方针，这是事实，若干地方在抽税和截击车辆方面，也曾经有过不恰当的措施。但近两、三月来，各区都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政策原则和办法要点都在切实执行的过程中。他们财政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合理负担”四个字，他们认为合理负担的办法贵在简浅平易，并尽量贯彻累进税的基本精神，有免征点、累进率和累进最高率，使负担面略为偏重于富户，一面又不致窒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减租减息后，负担面可以放宽，通常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左右。根据这个政策原则，关于征收公粮、一般税收和借粮三方面，都有了严格的规章。

一、征收公粮：第一种按等级征收，其原则是：赤贫免收，贫户每年六升，中农一斗二升，富裕中农二斗四升，富农、地主年收三十石至六十石者收百分之五，六十一至一百石者收百分之十，一百〇一至一百五十石者收百分之十二，年收一百五十一石以上者另规定之。如遇天灾人祸则酌量减低。

第二种按亩或按种征收。其原则是：根据收获量百分之三，然后依上、中、下田之平均数，而定出每亩或每斗种的征收量，如一亩之平均收获量为四担，则一斗二升，照此推算，自耕农（富农除外）和军工烈属，照征收额八折，赤贫和鳏寡孤独，则根据实情减收或免收；佃农方面，属于自耕地部份收八折，属于租佃部分则地主应占征收额的三分之二，佃农占三分之一。（按：因战争环境关系，第二种的征收办法较多取用）

以上征纳谷物概在收获时由农民直接缴交，并且视各地收一造或收两造的情形，决定一次或两次征收。

二、一般税收：各区基本上以单一税为原则。税收种类主要是收货物出入口税，其次是各种特别税。至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是否征收和税率如何则由各地区自己相度情形自己决定。总之，已进行征收的地区，其税率均较蒋管区远为低减。

货物税的征收税率，一般如下：日常必需品征百分之五，奢侈品征百分之十，屠宰捐和烟酒税按当地情形酌量征收，特别须要的物品可以免收，小贩和非商业性质的免收。

三、借粮：数额以不致影响地主、富农的一家生活为限。由双方商量解决，禁止强迫命令。有借有还，保障借主之财权。

人权的保障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游击区究竟如何保障人权呢？广州报纸说的游击队杀人放火，其实，滥杀人的正是那班没落疯狂的反动派军队，这类写不完的人民的冤惨血账，已经是每日记在每个乡下老百姓的心里嘴里的了。至于人民部队和人民政权，除了打仗外，他们不轻易杀人。当然，在流动的战争环境中，人民部队不能把每一个首要的反动分子完全用教育的办法来解决。而且由于长期的尖锐斗争的生活，以及长期的惨酷剥削关系和由于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造成农民的报复心理，个别的错打错杀的事是有的，但这些都已经被放在严格的纠正的过程中。记者在三个地区看见同样一件他们上级发下来的关于保障人权的指示，我记起了如下的几条：

一、肃反工作必须严格执行既定的宽大政策，现在再一次唤起我各级干部的特别注意，不能随便打人杀人，应重证据不重口供，应严格废止肉刑，应分别首要与附从，应一律予以教育感化，视其觉悟程度而确定措置办法。

二、对于罪大恶极、感化无效、不得不处死刑者，必须经团部或县级政府之批准，及经过群众公审手续，事后又必须贴出布告，以示郑重。

三、对于国民党区一级以上的官员及带全区性的反动分子，必须解送团级以上的机关处理，不得随便轻纵或滥杀。

四、除有反革命确实证据，必须受上述肃反条例处理者以外，对任何人都必须保障其人权。

这个指示的严肃性，是很有根据的，因为他们连作为封建制度

的物质支持者的地主，都仅仅是当它作为一个阶级来从政治上、从社会经济上加以削弱以至消灭，而不是当他作为各个的个人加以肉体消灭。他们还进一步要在劳动中改造地主，而使之变为社会有用的人。在这种高度的革命科学思想和高度的人民道德标准底下，对于几千年来骑在农民的头上的地主阶级和曾经剥削过劳苦农民的个别地主，还是如此照顾其生存，关心其前途，网开三面，以德报怨，与人为善，只有那些怙恶不悛、无法改造、积极与人民为敌的极少数人，才受到适当的惩罚。而且依照这种革命科学的观点看来，农民们深藏久积的报复心理固然是自然会有东西，但这种心理和行动是落后的，是无补于新社会制度之建设和农民解放的大事业的。这在广东革命历史上已经有了深切的教训了的，应该加以克服。因此，不杀人的宽大政策的执行是符合于革命的总利益的，而并非绝出于唯心的人道主义；不留情的严厉的膺惩，仅仅是落在那些为数甚少的反动巨头、特务首要和罪不容赦的恶霸分子的身上，而且也还须证据确凿，并经过一定的审判手续。

特别关照华侨

广东、福建是华侨最多的地方，因此人民武装对于华侨的爱护，更是各级干部所关心的事情，他们现在固然尚很虚心的要求记者告诉各地华侨，尽量向他们提意见，以备可以把这些意见采纳之于他们的纲领。但他们对华侨除照一般法令优待外，还有些具体的决定。

第一，保护各地民营的批馆、汇兑庄，以避免蒋政府的剥削华侨血汗，抢夺侨汇，饿死侨属。

第二，在南洋各地战争动乱中，如侨胞家属接济不到，均可向当地政府要求借款、借粮，或要求救济。政府当尽一切能力予以帮助解决。

第三，华侨出国及回国，如进入游击区，各地政府或部队应负全责保护，以避免蒋军及土匪的抢劫。

第四，华侨到游击区投资举办轻工业或经商贸易，各地政府及部队都应给予优先权及在交通运输上给予帮助，税项给予减少或豁免。

记者在游击区访问中，惊奇地发现了广东人民在专制暴政中生长起来的觉醒和勇敢，简直是空前未有。而由于人民各式各样的不断反抗和用武器来批评，统治者的旧秩序，每一分钟都在分解和崩塌。上述正确政策之普遍施行，相信必然的行将使更广大的社会人士、各阶层各界被压迫的人们，汇合到革命的阵营中来，为结束暴戾恣睢的蒋、宋统治，建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的新广东而奋斗。

（九月二十日寄自东江前线）

（原载《正报》110期，1948年10月9日）

广东人民武装的发展与现势

（1948年9月）

蓝 川

半年以来，广东人民彻底粉碎了宋子文的一期“绥靖”计划之后，正在准备与组织更为壮大的军容，以迎击所谓二期“绥靖”的图谋。最近湛江、沙鱼涌、横岗等战之获得了超过以前的辉煌战绩，就说明了广东人民武装已由当初局部地区的抗征抗剿，打击反动地主武装的零星战斗，而发展到有力量进行较大的战斗行动，攻击城市、港口，得到胜利，不但能够消灭敌方“省防军”的保警部队，并且能够消灭敌方“国防军”的正规部队。这就是广东民武反二期“绥靖”的一个重要发展。

广东人民武装这样的发展壮大，是基于过去一年多来的胜利斗争。一年多以来，人民武装经历着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六年七月东纵北撤后，由于反动派的“清乡”“围剿”而激起的各地人民抗征抗剿自发的求生自卫斗争，纷纷起来，但真正有组织的武装部队的斗争行动，是以一九四七年春初南路击毙遂溪反动县长戴朝恩（铁胆）为开始。其后各地人民武装部队陆续出现，斗争由东江的惠、博、增，至北江的南（雄）、始、英、新（丰）、龙（门）、佛、和、连；中区四邑的南（海）、番、中、台、开、恩；南路的钦、廉、化等各县遍地展开，这种性质的斗争，一直到目前某些地区还在继续着（如中区三角洲一带）。于是敌人的“围剿”与人民的反“围剿”的斗争便日趋激烈，而人民武装之所以能够在强大敌人无数次的疯狂“扫荡”与“围剿”下，胜利发展，那正是由于人民武装一开始便代表了群众的利益，符合了群众的要求，——“东江人民护乡团”、“东江人民自卫总队”、“连和新翁人民保卫团”、“潮汕人民抗征队”，这些人民武装部队本身，便完全说明了当部队成立之初，其被迫拿起武器与人民一道作求生自卫的抗争，从而与广大群众的利益相结合的正义的性质——因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具有“人民的基础”，所以能经历得起狂风骇浪，而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部队的发展也是由于在正确的军事与政治原则指导之下，人民武装部队与其配备较优的强大敌人一刻不停地战斗，以不断的发展进攻粉碎敌人的“扫荡”“围剿”，从而在这些反“围剿”反“扫荡”的斗争中获得更加向前发展与壮大。

可以举作说明的例子的，首先便是琼崖人民的斗争。一九四六年谈判北撤时，反动派对琼崖不予承认，且加派大军压迫，故琼纵不能不起而自卫。顽军兵力最多时有韩练成的四十六军三个旅及伪军詹松年的一个独立旅（其后这些部队都陆续调走），还加上了二、三、四、五、六、七、共六个保警总队，军力达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以上，展开了对琼崖一地的全面进攻。反动派在战术上来取轮

流“扫荡”与“清乡”，在山地采“填空题”战术。琼纵则在山区实行空室清野，对其“斩山”，即将蒋军先头部队消灭，使其不能驱迫人民去斩；在平原则坚持发展进攻，譬如当韩练成在疯狂进攻中仍能次第攻陷旧州、文教等市镇，并到处展开反“调查户口”“五家联保”和“征丁”。一九四六年九月韩练成调走前承认在“剿共”战争中被打死三千七百六十三人（伤的没有说），并谓“琼崖尚有匪六千余人”云，这说明了琼纵远在当时独力撑持的情境之下，也已取得了反围剿扫荡的胜利。随后又粉碎了蔡劲军的进攻。直至韩汉英、宋子文手上，琼崖解放军已从胜利的进攻与发展中积蓄了力量，从今年一月开始，便转入了全面出击，先后进攻保宁、乐东、崖县、临高、澄迈等县城，计自今年一月至目前，围攻县城六次，解放并保有白沙、保宁、乐东等县城三座；陷那大，攻南丰、袭海口，逼榆林，攻占要镇六处，毙敌县长一名，榆林要塞副司令一名，俘县长两名，而且最令宋子文震惊的是连在五六月间毙保警团长二名。

由于琼纵坚决执行了进攻发展的战略方针，以进攻粉碎进攻，以发展压倒进攻，每战都集中了优势兵力歼敌，创造了围城打援的光辉的战例（如五月九日围那大，保六团长陈瑞璋来援，在清平乡中途突击而歼之；又如五月初围困乐东，县长韩云超率队来援，解放军佯退引其深入，在承仲附近全歼之）。因而全面的调动了敌人，取得了自己全面的主动。琼岛反动派原有四个保警团驻守，保三保七在东区，保四在琼南，保六在琼西。由于解放军攻那大，保六陈瑞璋来援被歼，于是保三曾杰调援琼西，结果曾杰也被打死，琼西遂削弱。解放军又在琼文区及琼南进攻，使海口的一三一旅调救榆林，琼东琼西已无兵可调，宋子文乃被迫增调广州警卫团一团赴琼，这完全说明了敌人的被调动；也就说明琼纵已从游击战提高一步到配合以运动战的发展。这是民武在斗争中发展的最典型的例子。

二

如果说反动派前些时对琼崖一地的重点进攻，还是占着主动的

地位的话，那么从去年六月至十月对南路的重点进攻，及今年春间开始对粤北一带的重点进攻，以及跟着七八月间对东江下游惠东宝一带的重点进攻，便已都带着被动的性质，而且一次跟着一次，这种性质越加显著。虽然进攻的本身还是主动性的，而且在兵力对比上仍然占优势，然而显然地，反动派所处的地位也是与对琼崖一地进攻时的情况不同了：第一，那是在各地人民武装逐渐生长壮大的情况下发动的，特别是在上述几处地区民武一连串的胜利进攻之下，逼使反动当局仓惶应付；在兵力对比上他们虽然还是优势，但由于兵力不足，因此不能不产生“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情形，其进攻的主动性于是大受限制。第二，其进攻的范围越来越小，其失败越来越大，那也是由于民武更大更快的向前发展及反动派的兵力越来越感不足的相互的形势所造成的。尤其明显的，是今年七月间宋子文集中了六个整团及两个整营的兵力（占其总兵力五分之一），对惠东宝三县的进攻。以前对琼崖及南路都是十多个县，也只用五六个团兵力；对粤北五六个县也只用了不足两个旅兵力，这一次对惠东宝一个狭长地区却动用了六七个团，那不能不算是进攻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经过了沙鱼涌、横岗、龙岗两次歼灭战一次杀伤战，只在一个月多的时间，民武便歼灭了敌人三个整营，合为一个整团的兵力，随后又陆续攻陷稔山、多祝等据点，于是宋子文的这次规模最大的重点进攻就迅速被粉碎了。

更追溯上去，关于南路及粤北两处的重点进攻，虽然由于当时民武的发展还在初期，处于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地位陷于突出孤立，加上主观领导上的一些错误，如当敌人进攻的时候，采取分散隐蔽，或则打无把握无准备之消耗战，或则放弃对民兵之领导，在兵力转移中犯了逃跑主义等等错误，以致受到了一些挫折与损失。然而民武主力却一直保存下来，而且不断给敌人以打击。民武主力部队始终穿插于敌人之间，或分散出击，或合力歼敌，使敌人顾此失彼，眼花缭乱。

南路的武装斗争最先崛起，在遂安公路上离湛江咫尺的蕲章墟

附近打死了最反动的遂溪县长号称“铁胆”的戴朝恩，曾使反动派心惊胆战。民武到处攻打乡镇，使吴、化、湛江、遂溪、以至灵山、合淦等城市都一时风声鹤唳。但这样过早的大搞，在全省民武的发展中，形成了单独一个地区的突出孤立，而也是继琼崖之后首先遭受敌人重点进攻的目标。从罗卓英到宋子文，经过陈沛到目前的张瑞贵，一直执行下来，反动军所到之处，人民饱受摧残，武装部队亦或多或少遭受挫折与损失。然而，民武的主力仍然保存下来了，他们与敌人胶着作战，坚持原日地区。到今年四五月间才分东西两面打出。尤其是东征那一路，迅速进入敌人兵力最为薄弱的西江一带，立刻与活动于中区及西江南北两岸的武装部队配合，造成了四五月间烜赫一时的西江攻势，约计在一个多月间他们打下乡公所及田粮仓库二十余处，反动派也承认，在这一时期中民武缴获机枪十七挺，步枪二百余枝，并谓被组织起来的民众达二十余万人之多。到这一时期为止，反动当局所布置的进攻南路计划便已全盘被粉碎了。然而南路民武这样的东进西征，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放弃了原日阵地，不，刚在敌人抽走了保一团（驻南路的有保一、二、九、十共四个团）到粤北以后，南路民武的留守部队就一举攻陷湛江的赤坎，歼灭了敌保十团一个营部及两个连，同时占领赤坎达九小时，这就说明了南路民武的留守部队还是强大有力，今后的发展胜利正是无可限量的。

至于反动派所谓“分区扫荡”的地区，那敌人的进攻更不顶事了。因为在那些地区，敌人仅以少数“省防军”配合着地方团队作战，一般的都是兵力较弱，因而不管敌人如何“扫”来“荡”去，结果都成了“输送队”，便于民武的更大发展。

三

总而言之，民武一面在群众利益相结合的斗争中奠下了发展的基础，一面又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打击及削弱敌人，从而转入了顺利的反攻或进攻，而获得更大的向前发展壮大。这种反“围

剿”的斗争此起彼落，遍及各地，或则歼灭或击溃敌之一路，因而把“围剿”粉碎（如五月十九日东莞梅塘之役，歼灭县警刘发如部之刘定加一中队，因而把蒋军的两路围剿粉碎。又如潮汕这半年来敌人的数次“围剿”，尤其是四五月间，曾举直、喻英奇对八乡山的“联合会剿”，结果在长滩地方击溃喻英奇部王国权一大队，使曾举直陷于孤立，不得不仓惶退却），或则只留少数部队箝制来犯之敌，大部分则转到敌人侧背（或攻打其重要城镇），使其腹背受敌，压迫敌人退却。又或则在广大地区间以普遍的发展进攻，使敌人根本就不能集中兵力，就算集中了兵力，却也因找不到民武的主力，结果疲于奔命，废然而退（如四五月间闽粤边涂思宗在韩江流域蕉平梅埔地区发动了所谓“十字形围剿”，民武则一面在闽边的和平、云霄、永定一带发展，牵制敌人之背，同时主力则与其迂迴周旋，曾直逼梅县县城，攻陷丙村——涂思宗总部所在地松口与梅县之间的大镇，跟着直下丰顺饶平一带；而当敌人前瞻后顾，目不暇给之时，乘间在梅埔银江之间，击溃涂思宗号称机械化部队的方景韩营，获得辉煌战果，使敌不能不仓惶结束其行动）。

然而，这限于在一时一地之情形，在全局的发展上，则民武正在大步前进。目前不但没有任何一个县中没有民武活动的踪迹，而且由于发展壮大的结果，各地之间民武的斗争已形成了战略的协同。去年南路一度的告急，曾抽动了敌人集中于琼崖一地的兵力（保二、保十团）；今年三月东韩江的告急，又抽动了敌人的兵力（九十九旅一部、九十二旅一团、一三一旅一团，当时增编的保十三、保十二等二团等）；其后西江告急，又抽动了敌人的兵力（当时新编的保十四团）；跟着又是琼崖告急，再又抽动了敌人的兵力（广州警备团）；到目前东江与南路再度胜利进攻，宋子文已再无兵可抽，即使勉强调动一处，势必削弱他处。那就是说，宋子文要发动全面的进攻至今还是不可能，就算在个别地区发动的重点进攻或择点进攻，也要日感困难了。而在民武方面，地区已由分散的点，成为广大的面，几个兄弟军联同作战的攻势业已出现（如最近

东江沙鱼涌及横岗之役)，这使今后几个地区协同作战的重大战役的出现也将有了可能。那就是说各地区之间的战略协同也将更为密切了。

当然，广东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胜利仅是人民初步的胜利，这个战斗目前还仅是在开始，未来的战斗将要更艰苦更残酷，不过人民已经有了这样胜利的基础与经验，而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困难的不能解决，只要能更紧密的依靠群众，正确的掌握政策不犯错误，则未来的更大的胜利，是完全有信心有把握的。

（原载《群众》38期，1948年9月30日）

和宋子文打政治仗

（1948年10月9日《正报》社论）

南方生长壮大的人民武装，一年以来，不只在军事上由于保持了坚决依靠人民的思想，因而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并提高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能够形成主力与有适应有配合的在若干地区开始打歼灭战；而且在政治上也由于紧紧的站在人民的利益立场，由朴素的自卫求生存的反“三征”、破仓分粮那种分散的、不统一的零星的斗争，走上有组织、有步骤、有条理的，以民主政府的初步施政纲领的雏形出现，踏上打政治胜仗的阶段来了。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正当蒋介石在全国不断大打败仗的时候，正当蒋介石用了几张烂纸要来抢夺中国人民的金钞财产的时候，正当宋子文在华南的一期“绥靖”计划受到粉碎，二期“绥靖”计划碰了大钉的时候，华南的人民武装，能够本着华南军事、政治形势以及群众斗争情绪和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明确地定出初步的各项主要行动纲领，表

明人民武装当前奋斗的目标，这显然是在打了军事胜仗以后，又接着要打一个伟大的政治胜仗，以展开未来华南的更大胜利的新局面。

华南的人民大众固然已经觉醒而动员起来进行斗争，但华南许多地方实力派、中产阶级、地主、士绅、失意军官，对于华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则还表现着徬徨等待，或则采取怀疑态度，或则虽略具同情之心而未敢毅然参加。这种原因，固然主要的一方面由于蒋、宋对人民武装的造谣诬蔑，对守中立人士的压迫捕杀；但另一面也是由于这些中间阶层人物，对于人民武装的作战的目的及其具体的政策，认识不清的缘故，因而徘徊不前。感到若助蒋、宋，则只有“同归于尽”，若站在人民武装方面，则又恐怕未必有我的“份”。

今天，人民武装这些具体政策的宣布，虽然尚嫌是局部的，细节的，离开华南的地方性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形成还远，还须再作更多与不断的努力补充修改、综合理订，才谈得上。但这些初步行动纲领，是具体而切实的，既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并且明确确定集中火力向着卖国殃民、罪大恶极的四大家族及其顽固的屠杀人民的走狗。因此，很显然的，只要是任何一个不愿与蒋、宋“同归于尽”的人物，以及一切只要是不反对现在人民武装的主张的社会力量，都是属于联合与争取的对象。从联合奋斗过程中来共同结束蒋、宋的卖国殃民统治的命运，来共同建设自由独立的新华南与新中国，则全部完整的纲领，在全国新政协召开后及在其指导之下，在华北地方联合政府的“老大哥”的借鉴之下，在华南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研究之下，将来是一定可以圆满完成的。

假如我们再把人民目前的行动纲领与宋子文的“绥靖”计划对照来看，那我们更可以看出：人民的行动纲领是为着爱家乡、保国家；而宋子文的“绥靖”计划则是勾结日本鬼子，把广东及西南献给美国帝国主义者作殖民地。人民的行动纲领是要推毁蒋、宋四大家族的统治及其顽固走狗的武装抵抗；而宋子文的“绥靖”计划是

在屠乡洗劫之外，举凡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正当绅士、工商业家，甚至守中立的地方实力派，以及非其嫡系的政敌，都在其剿勒之列。人民的行动纲领是做到人人有饭吃，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而宋子文的“绥靖”计划则是到处劫粮，到处没收人民物资，到处搜括人民金钞，做到除四大家族及其走狗以外，人人破产，人人饿饭。人民的行动纲领是尽可能的用一切办法护侨爱侨；而宋子文的“绥靖”计划则是在国外以其特务与当地反动派勾结，陷害侨民，封闭侨校，逮捕侨商，在国内则抢夺侨汇，摧残侨属，颁布许多名称的“条例”以限制侨胞的进出国内外……。这一切，明显的表现了谁是爱国谁是卖国，谁是爱民谁是害民，谁是为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谁是制造社会的混乱，贫穷与破产。

怎样把人民的爱国爱民的行动纲领与宋子文的卖国害民的“绥靖”计划，鲜明对照的告诉每一个南方人民，每一个不愿意与蒋、宋“同归于尽”的人民说呢？目前便应该广泛的进行以下的工作：

第一，人民武装必须深入的使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个战士，都能够确实明白人民武装目前这些行动纲领，并保证能忠实而彻底执行之，做错了必须认错，加以纠正，应赔偿的进行赔偿，充分表现人民武装的负责精神和高度威信，表现人民武装的言行一致。

第二，人民武装与人民政府必须根据自己的行动纲领，针对各地蒋、宋小政府的害民暴政的各种措施，针锋相对的用布告、传单、宣言予以揭发反对，而宣布自己的主张。例如蒋政权要征兵，人民政府就要布告免兵，蒋政权要没收私人侨汇，人民政府就布告保护侨汇自由流通等。

第三，人民武装与人民政府以及一切武工队、农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必须普遍的将行动纲领致送于其工作地区的周围，争取可能联合与争取的一切社会力量，争取他们不要受蒋、宋的欺骗，自取灭亡，联合他们来为自己的乡族尽忠服务，为人民办好事，共同生存，共同发展。

第四，各地人民武装与人民政府必须虚心的接受愿意反蒋、宋

的各阶层社会力量的意见，在逐步削弱封建势力的基础上把这个行动纲领更加充实发展起来，以便逐步形成将来地方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在军事上，人民武装已经打了胜仗而且还要打更大的胜利的仗；在政治上，人民武装也应该打胜仗而且继续的打更大的胜利的仗。军事的胜仗与政治的胜仗，互相配合，不断发展，不断胜利，南方人民解放的日子便更加接近了。让我们高呼：

从政治上打败宋子文！

（原载《正报》110期，1948年10月9日）

广东战况综合报道

（1948年10月）

七八月间，广东人民武装攻进湛江之役及沙鱼涌、横岗等几个战役，达到了干净、彻底、迅速、全部歼灭敌人的“国防军”及“省防军”，使南宋整个反动统治阵营为之震惊，人民的信心从而也大大的提高了。这是广东民武从游击战走向运动战的初步表现。关于这些战役甚至官报或半官报都在惊慌错愕中禁不住争相报道，本报也历经披露，这里不必详述了。就以最近一个月来出现于各地区的许多较小的战斗（这是还未引起普遍的应有的注意的）而说，也普遍地做到了“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不使漏网”，或“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可作为民武更能掌握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其战斗力已在普遍提高的说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下面的事实：

一、东江方面：九月十八晚攻袭东莞梅塘，全歼伪联防大队叶衍龄部之第三中队，无一漏网。

二、潮汕方面：九月五日，攻入大埔花窗乡全歼谢克强的自卫第三中队。

三、西江方面：八月十六日高要广华乡突袭乡公所，自卫班全被缴械，正副乡长苏启南、刘镜昌、自卫队长翁桐，分队长伍国华等均一网成擒。

四、南路方面，九月中旬廉江东南角西朗地方，保警队及自卫队被围三日，以众寡悬殊，率被攻入缴械。（《大光报》）

五、粤北方面，八月中旬始兴澄江团队被围攻；缴枪二百余。（《大公报》）

六、琼崖方面，保七团叶连驻防保亭白石，七月十四日连长叶志廷，以一排固守白石，亲率两排“搜剿”附近山地，于甘塘被包围，激战三小时，叶连长王排长以下全部被歼。

七、中区方面，从七月中旬起，台山民武从古兜山出击冲葵圩后，接着连下斗山，都斛莘村、安乡等处乡镇，除团队被全部缴械外，参议员李普殷等四人当堂被击毙。（《大光报》）

这里为了节省篇幅，所举不过是散见于各报关于各地区战斗中的一二例子，实在上各区发展及其对战斗锋芒之迅速猛烈，还不是拿这一二例子所可概括。譬如，一向民武力量较弱的中区一带，只就八月中至八月底的半个多月间，就有高要水口之役（八月十六日），开平锦湖之役（八月中旬）、台山莘村之役（同上）、新兴船岗之役（八月二十七日）、开平单水口之役（同上）、高明三洲之役（八月二十五日）、台山海宴之役（八月十六日）等六次胜仗，每次都全歼敌人，计有保十四第五连一排，联防自卫中队五个中队，一个乡队，缴轻机十挺，高射机枪一挺，汤姆生冲锋机四挺，手提机五挺，掷弹筒二枝，长短枪二百三十三枝，其他军用品无数。死伤对比为一比三，若连俘虏计算为一比五。至于其他各地都有或大或小的胜利。可见就在目前战局比较沉寂，只有零星的战斗出现中，各地民武也已形成了战略的协同，各地普遍出击并牵制了敌人，这就迫使宋子文之所以不能不作挖肉补疮的打算，“只是确保广九、粤汉两路”；

“对于其他各区要俟三个月后‘新的武装’训练完成，使有足够力量，足以调动及进行第二步计划，乃采取扫荡攻势”云。（八月六日《新生晚报》）

其次在民武力量的发展与扩大中，目前游击战争的火把不但已烧遍了整个乡村，可以说差不多已再没有那一个县是空白的了，而且战火已日渐逼近了城市，各地县城被攻、被围、或受严重威胁的消息频频出现。如果说攻占或围攻县城的事已从今年春间开始，那是只见于琼崖及东韩江两处，而在目前这种情形则越更普遍了，攻陷湛江之役更是攻打大城市的开始。只在八九月一个多月间出现的就有：

东江方面：河源县城一度被攻（省港各报）；龙门城附近激战，蒋军被围三日夜，死伤百人（路透社十月六日电）。

中区方面：新兴城被三路进攻（八月二十五日《华侨报》）。

粤北方面：新丰、清远被千人围攻，情势危急，始兴城被围攻缴械二百余（九月初港报）。

潮汕方面：普宁城告急，激战两夜共军始退去（九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琼崖方面：陵水告急，海口国民党部要求火急派军驰援（九月二十七南中社讯）。

以上消息，虽然除了攻入河源、始兴之外，其他都是属于困扰威胁性质，然而从其发生地区之普遍上说，可见民武的控制面越发扩大，使更多的城市成了孤岛，而处处告急也使得宋子文兵力不足的弱点越更暴露，对于整个反动统治阵营的影响极为严重。同一意义的也表现于官员出巡或下乡普遍被袭击的事实：

一、九月十四日，第二区“专员司令”韩建勋由连县回韶，途次距连县仅四十里地方，被民武截击包围（九月二十七日省港各报）。

二、九月七日，新丰县长李泛舟带领团队驻军经过县属水西鲤鱼坝地方，被龙景山部包围，经两日夜搏斗。（九月二十三日《大光报》）

三、九月二日，惠东县长方文爆赴汕，其护送队俟其下船后回

城，途中遭民武截击，当堂阵亡者二十六人，失轻机一挺，长短枪三十余杆，“逃回者亦多身负重伤。”（《华商报》）

四、大埔清乡军事科长赵剑鸣，九月七日率警察一中队，至箭竹岭地方被包围，死伤狼藉。（九月十九日《文汇报》）

五、广宁县府主秘吴江枫、军事科长冯司奇，省参李子培等押运向省府购回之武器一批，包括重机一、轻机四、步枪百余杆，子弹二百余箱，沿途由省保警及团队分别水陆护航，所乘电轮途次护罗遭民武截击，护送军之许锡基部“损失惨重，”轻机虽然凫水逃去，轮中所载武器因自动放火焚毁，全遭损失。（七月二十八日《大公报》）

当然这里所举的例子还不能算是完全的，而且也都属于零星的战斗，但若果和其他方面联系起来，民武这一行动对于整个反动统治的影响不能不算是严重的了。譬如据省田粮处的统计，这一年来征粮人员下乡被人民打伤及捕捉的，达一百三十七人，内死六十八人，伤十三人，被捉的五十六人，已经使反动当局大感棘手，现在则更连专员司令县长也都寸步难行了（这该是一个如何严重的警告啊！），说明了广大农村已被民武控制，以后征丁征粮将更困难了，“政令不出城市”的现象将更普遍了。随着民武的向前发展，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运动将更日益普遍展开，这将日益增大了反动统治的困难。

上面所说这两个特点（这是根据省港报纸材料看得出来的），表明了民武在过去胜利的基础之上已在日益提高并加强了，虽然自从经过七八月间的攻势以后，表面上局面似乎显得稍为沉寂，大的战役没有出现，然而那是战争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争取更大胜利的准备。在这一点上，则近月来出现的虽然仅仅是一些较小的战役或战斗，但那都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那便是敌人阵营中的武装起义。这是作为说明在形势发展之下，反动阵营越更分崩离析，同时民武力量继续发展与扩大经常起作用的特点之一。最近发生的有：

八月中旬，始兴澄江保警一中队携械起义（八月二十九日“星岛报”）。

八月二十五日，惠阳白花第一中队携长短枪八十枝，轻机一挺，手提机二挺，宣布起义，次日即袭击白泥塘之伪四区联防主任的盐运队（《华商报》）。

八月十六日台山海宴由陈宝珊领导农民起义，袭击当地的反动武装团队，计缴轻机三挺，驳壳十二枝，步枪三十余枝（《华商报》）。

这里所举不过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较为显著的一二例子，如果联系到反动阵营中的反战厌战，士兵逃亡等等，则报上披露不辍。如八月中广宁蒋军士兵厌战，一夜中一次逃亡竟达六十余名（九月六日《华商报》），所有这些消息，这里也不便一一列举了，总之，在民武日益发展胜利及在正义的召感之下，上述这一现象过去已经出现，今天继续存在，将来势必出现更多，那对于整个反动统治的影响也是相当严重与深刻的。

至于反动的统治当局方面，正好和民武更大的向前发展与胜利相对照，其兵力不足，财源枯竭，基层腐化的困难都在日渐增加而无法克服。他们由上而下正象一艘破船中的一群海盗，日渐感于面临灭亡的命运；而纷争不已，然而又毫无办法，毫无希望。特别是兵力不足，更成为其致命的弱点。正如宋子文自己说过的话一样，“治安没办法，一切都没办法”——一切决定于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巩固，然而在这一年中宋子文赖以大吹大擂的只是增编了五个保警总队，一个盐警总队，十一个独立营等，却在人民武装半年中的发展进攻以来，损失了三个团以上，约相当于其扩充军力的半数。目前留在境内的残师败旅随着全国形势的加紧必将陆续北调，征兵又成了铁定的困难，虽然宋子文妄想到湖南和广西征兵，在湖南已碰了钉子，广西方面也远没有下文。结果如何呢？只有收编土匪和扩编民团这两条路，然而这两条路目前也已到了极限，所有汉奸地头蛇都收编或起用了，结果只增加了与民为敌这一面，其失败是显然

的。而且民团的扩编到目下为止也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在财政方面，所谓美援，所谓“中央”拨款，都是画饼不能充饥；而穷征暴敛的增加税收，势必造成官逼民反，结果日更动摇其反动统治的基础。至于所谓整顿机构，澄清吏治云云，结果也越更尖锐了狗咬狗骨的派系斗争。随着客观形势的向前发展，反动当局这些内外的矛盾与困难将必加甚，宋子文的毫无办法，那是铁定的了。

至于人民武装方面，已在克服困难中打开局面，今后在胜利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将更毫无疑问。同时民武已纠正了过去在某些地方过早实行土改政策的错误，改为减租减息，更便于争取与团结更广大群众，使今后斗争胜利更有保证。人民武装活动于广大群众之中，犹如鱼之得水，群众的利益也就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勇于接受经验，纠正错误，坚决与群众合作，从而群众也保护了他们，两者互相结合，相得益彰，这样的军队也就成为无敌的军队。在这里让我举出潮汕的例子：

在今年早造成熟时，喻英奇调集手下的王国权部，又由闽粤边调出驻高陂的一营人以及丰顺所有的地方团队进行在韩江沿岸抢割，人民武装则实行保卫民众，围攻丰顺属之沙田、黄花村等处团队，掩护民众收割。喻英奇亲自到丰顺指挥，然而结果喻英奇手下的王牌王国权部被击毙连长吴华、排长温德、及毙伤以下数十名，而民武也达到了保卫民众夏收的目的。据报纸所说是：“全部谷物除小部挑不及散弃或焚毁之外，其余都早已挑走了”（八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关于八乡山一带的收割情形也是如此，蒋军到达时，乡民已在民武保护之下，全部已收割完竣了。（《华侨报》）

上举例子说明了民武是如何为保卫民众的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例子是举之不尽的，因而正如毛主席所说“具有人民的基础”，这就说明了广东民武之所以不但不能被“剿”灭，而且越战越强，而民武对于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及其一切政治措施，都是敌人一条也无法仿效的。相信今后民武更大的发展及胜利的消息将会继续传来。

（原载《正报》111期，1948年10月16日）

欢迎工商业家同人民合作

(1948年10月30日《正报》社论)

华南人民武装在公布了“目前行动纲领”之后，日前又公布“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实施办法”。对于华南的工商业家，这无疑是一个使人振奋的福音。

华南的工商业家，正如蒋管区内其他各地的工商业家一样，被蒋宋的“经济戡乱”，“戡”得焦头烂额了。但，更进一步来说，华南的人民和工商业家，比较江浙一带的同胞，是来得更狼狈的。

首先是蒋朝的所谓币制改革，硬性地把华南各地的汇率压低下来。以广州为例，八月十九日该市的市价，每元港币只合法币一百三十余万元，但照金圆券的比率换算，港币的价格，一下子就跳到二百二十五万元了。除了硬性提高港元之外，又不分皂白地轧平上海与广州的汇率。在以往，在广州拿五六千万法币汇到上海时，可以收到一万万元，这就是说，在以往，上海的法币购买力较诸广州是低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蒋宋的“币制改革”，却无视事实，一刀的斩下去，都是三百万元换一个金圆券。这不是硬把广州的法币购买力压低百分之四五十吗？这不是硬把广州人民手中的财产（以法币代表的）打去了一个四五折吗？蒋宋的“币制改革”，本来就是对人民的又一次大洗劫，但，从这一点来说，华南的人民是被洗劫得最凶的！

华南人民手中的法币，硬被压低了，华南各地的物价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飞涨起来。以粮食来说，八月十九日的米，每担是法币四六〇〇万元，但“币改”后的公价却规定为二十二元，合法币六六〇〇万元，一下子就高涨了三分之一。这么一来，其他各物亦就跟着在大步走。直到目前，第一级米已经涨到九十金圆一担了。这

不是要华南人民的命吗？

蒋宋不但通过恶性通货膨胀和强制收兑金钞，对人民进行无耻的劫夺，而且又利用这个机会拼命增加租税，以广州市为例，税捐处已于九月份起，实行改用金圆券，并决定税额为一百万金圆，合法币三万亿元，按市府八月份税收额不过法币五千亿元，现在一下子就涨了五倍以上。如此急速增税，使商家与人民同受其灾。因为捐税加重之后，商人的负担当然增加，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结果还是通过物价而转嫁到人民的身上的。

华南的人民和工商业家，是在所谓“币制改革”中更加破产了，但宋子文却正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洋财。除了他的中国银公司，广东银行，珠江贸易公司和广东企业公司等企业，在这里，混水摸鱼之外，他自己连一点也不肯少赚。当“币改”前夜他从南京回到广东时，“首先在香港卖出省单五十九万，然后向国家银行借二万亿法币，在穗兑出，不花一个本钱，净赚了三十万港币”（九月十五日《文汇报》）。蒋宋的做法，是除了四大家族及其亲密的走狗以外，都要人人饿死的。这就迫得华南各地的人民，不得不跟着其他各地同胞，起来抢购物品了。

抢购是人民为保存价值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对商家说来，这是不利的。商家在蒋宋的不合理的限价之下，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卖其商品，可是，售出以后却没法把货物补得进来。于是，只好疏散物资，只好关门停业。蒋宋当然不许商人这样的，广州从本月十七日起便采取强暴办法，禁止物资外运，禁止商店停业了。这就是说，商人的金钞必须双手奉送给它；商人的物资必须以低价卖出，换成不值一文的金圆券；商人的资金必须困死在蒋区指定范围之内不得移出海外。这就是说，要你生不得，也要你死不得！

针对着这个局面，华南人民武装的“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实施办法”公布了。这个办法，完全是以保护民族资本家、各地侨胞和游击区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对于事先通知当地政府军队的资金之移入游击区，沿路必予以保护；对于愿交游击区政府军队保存者，由政

府给予收据并按期给予合法利息，及其则按其原存入种类及数量，原璧交还；对于愿意在当地创办工商业者，当给予必要协助，并减轻其出入口税，免除一年以上的营业税，所得税及特别税；对于愿在当地经营侨汇者，当给予慎密保护和协助，务使信汇局与侨胞家属两受其利；对于愿意移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以发展工商业者，由政府负责设法转移，并给予种种便利。这一切，完全是与蒋宋的做法，尖锐地对立的。蒋宋要抢掠人民的金钞，我们则在保护人民的金钞；蒋宋要抢劫人民的物资，我们则在保护人民的物资；蒋宋千方百计所祈求的是，除了四大家族及其走狗之外，人人都成穷光蛋，而我们则致力于保护正当工商业，发展中国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黑暗与光明，反动与进步，在这里，是强烈地呈现出来了。

在全国范围内，解放区是人民和工商业家的乐土；在华南各地，人民武装所统治的地区也是人民和工商业家的乐土。这一年，人民武装正以超出意想之外的速度在发展着，人民武装与游击区域扩大，就越能保护人民和工商业。正在走头无路的工商业家，不要怀着绝望的心情吧！人民武装在欢迎你们，在声援你们，在协助你们，并且决心为使你们避免受蒋宋的残害而努力！来吧，工商界朋友们，抛弃蒋宋一切的造谣，抛弃一切不合事实的怀疑，快快来同我们合作吧。事实一定会证明：在人民武装保护之下，你们将会获得巨大的发展的！

（原载《正报》113期，1948年10月30日）

广东人民武装分布情形

——根据K报资料摘录

(1948年10月)

一、北江——北江武装以“人民解放军北江支队”名义四出活动，由李△△领率，人数四百余。

曲江县——县属西南（白土、龙归）一带人枪百余。县属北部（周田）乡公所被数十人攻占，烧毁文件。境内张秋华部百余人（地区不定）作政治宣传。城内发现共军三名潜入活动，被捕。

南雄县——县属北部刘鲁成部二百余人。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区辖下七个区队，队长黄业。

始兴县——县属东南部（罗坝）人数百余人。县属东部（澄江）人数六十余，与保警反动派激战，缴获枪枝二百余，系邓文礼部“南始人民自救团”。县属北部（马市）人数七十余人，与反动自卫队激战。

翁源县——县属北部（坝子）人数上百余人，与保警四队激战。县属北部何俊才部四百人，配备手提轻机十余挺，重机八挺，手枪、驳壳二百余，步枪少数。县属北部发现千余人，意图成立“解放区”。

阳山县——与连县南边界，人数七十余，轻机二挺，余步枪。县属北部（连平乡）数十人，截劫县参议。县属南部（七拱）百余人，与联防队激战，联防队不支，损失人枪甚重。县属南部（杜平乡）百余人。

英德县——县城车站附近二百余，配备犀利枪械，邬强部沿河设站收税。

乐昌县——县南部（桂头）朱禧标部三百余人活动。

二、南路——化县、吴川、廉江三县边界数十人（第四团）。化县、廉江边界百余人（第一团）。化县、吴川、廉江三县边界五十余人（新一团）。海康县符汉英部千余。化县县北李英部千余。防城曾作富部八十余人。粤桂边区（廉江）覃雄部四百余人。

三、东江：

增城——县属南部（仙村）发现二百余人，意图袭击火车。县属北部（正果）时有出现，人数未详。

从化——县北发现两中队，七十余人，携有犀利武器。县北（吕田）五十余人，作政治宣传。县北马达部队三百余人，轻重机十挺。县北发现“民主同盟义勇大队”，约四五百人作政治宣传。

博罗——县属西部（公庄）数十人。县属北部五、六百人，缴获反动派枪械。

河源——（古竹）数百人沿江设税站收税（紫金西部）。县属西南部（平陵）百余人，配轻机四挺、进驻作政治宣传。

宝安——县属东部（三区）二百余人，配轻重机十余挺，汤母生、自动步枪等。县属东部（王母圩）“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百余人进袭区署。县属南部（深圳）三百余人进占中英关卡，掳去五人，并散发传单。

四、西江：

清远、四会、广宁交界棋盘岭冯石生部二百余名。云浮、罗定边界发现百余人。

五、中区：

连日时有部队迁移于南、三、顺、恩、开、台、新、鹤、番等县之不管地区活动，人数未详。

顺德——县属北部（陈村）糖厂办事处被劫，人数未详。

三水——三水至广州水道设关卡十六处收税。

南海——县属东部（西潆）人数未详。县属北部（官窑）发现百余名，企图未明。县属北部（罗滸）集合百余，活动附近四乡。

台、新一—边界发现不明番号部队。

新会——莎堆反动自卫队被人民武装缴去轻机一挺，长短枪十余枝。

花县——至广州公路时遭匪徒截劫。

六、粤东：

普宁县属西部（鲤湖）一带人数未详，时作政治宣传。

潮安——揭阳、澄海边界五百余人四出活动。

七、海南岛：

冯白驹部万余人，有三十人渗入雷州半岛活动。

保亭、白沙、乐东三县为共军控制。

宋粤内哄新演变

（1948年11月）

颜 孙

近两个月来，宋粤派系斗争又有了惊人的急速的发展，那千奇百怪的现象，真使人目不暇给，而现在来作一个具体的分析，实有“恨晚”之感。

记者在本报一〇七期发表的“关于宋粤派系斗争”，曾经指出：蒋介石授命宋子文到广东来调协“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特别是要他防止广东“地方势力”对蒋介石“中央”的离心运动和反侧倾向，宋子文执行蒋介石的“圣旨”，于实施方略上，原初采取“均势主义”，对各派系兼容并包，实现反动势力的“集大成”。但到今年正月以后，各派系的冲突由暗斗发展到明争，宋子文的“均势主义”至此已告破产。对于蒋介石“中央”的授命来说，宋子文实已“有辱君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宋子文的“均势主义”遭遇了惨败之后，在方略上有了重大的改变。其演变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宋子文到任初期，在官职的分赃上，极力使“地方势力”中“四军系”与“十二集团系”平分秋色，在“封地”的分赃上则极力使“地头龙”作土皇帝；在“党团”的分赃上则让CC与军统去分享其利。他们之间有了磨擦冲突，宋子文便以和事老的姿态出面调解，力求协和。然而，宋氏江山坐稳之后，一方面目击各派系间的冲突无可协调，一方面是事实上只有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才能使宋家自己的势力伸张起来。所以宋子文在一面佯作“调解派系斗争”，一面却使他们两败俱伤，而自己逐步伸张势力。

宋氏自己伸张势力的步骤，首先是一手握紧财政经济权利，同时以“琼崖系”为骨干，在海南以至北江（二区专员韩建勋，琼崖人）为基地，进一步就向军事和党团方面布置势力，企图逐渐削弱地方派系的力量。军事方面，他把老干部莫雄（早在宋任财政部长时，跟宋任税警团长），从二区专员调任“警卫旅旅长”来建立宋家“近卫军”；乘着人民武装袭击广州湾，张瑞贵“睡觉”失职，便把黄埔系的张君嵩派到南路去分夺张瑞贵的权力；更踢走了涂思宗，升任喻英奇为闽粤边区总指挥；最近又把余汉谋系的一五四师温淑海部解除武装，派军统的黎铁汉兼任广州警备司令。在党团方面，早收容军统的谢镇南任“绥署新闻处长”，又把一脚踏两船（与CC军统同时勾结）的陶林英收买过来，利用他作为CC的内奸，而委允省府社会处长（近已病死了）。所有这些措置，都显示着宋子文为了伸张势力，排除异己，不惜扶植黄埔系和军统的势力作为自己的工具。而逐步向地方势力和广东的CC派进迫。

在宋家豢养下的黄埔系和军统势力的抬头，CC派首当其冲，受到莫大威胁，所以数月以来CC派为了“图存”而奋起抗争。朱克勤、吴履逊、陈伟烈由宋子文授意扣押，激起CC派的强烈的反响，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表面上，容易使人发生一种错觉：以为CC派对宋恣意为难。实则自从所谓“党团合并”以后，党部的C

C分子与三青团的军统团统（李国俊为首）分子反而开始正面火并，宋子文既用军统团统打击CC派，实使余俊贤、高信等深感位孤势危；为了对抗宋子文的进迫，便运用“京方”CC力量力加评击，竟有CC“监委”大声疾呼“枪毙宋子文”起来。“京中”CC虽然如此声色俱厉，毕竟未能撼动宋子文。于是，CC派直接打击宋氏的唯一途径，只有与那些同遭宋子文排斥的地方势力结成“联盟”。数月来CC派能够策动相当广泛的反宋运动，就是利用这部分地方势力的结果。

一般说来，广东地方势力的军政首要们都是目光如豆的家伙，大有被宋子文玩诸掌上之概！宋子文对他们简直是“始乱终弃”：缪培南、徐景唐、陈文，无不如此，至于陈济棠和李汉魂两系，则始终受着宋氏的冷遇，更加晦气极了。由于他们自成体系，力量分散，缺乏结合的基础，更加便利了宋子文的分化离间，但在宋子文日益进迫的窘境中，他们愤恨的情绪却在不断的增长着，迭次“参议会”对宋子文、黄镇球的无情的诘难和攻击，便是其表现，在这情况下，CC派便乘机煽动地方势力起来联合反宋。近几月来，CC派成为地方的暗中的组织者，只是由于CC派和地方势力缺乏深切的渊源，同时地方势力本身难于一致，而且一向对CC派的党棍流氓作风“不敢承教”，致使CC派的企图无法实现（即如勾结了林翼中，却不能操纵陈济棠），他们只能通过各地CC党棍抓住了一部分的中下层的势力而已。虽然这样，到底有了收获：他们使宋子文的“唯我独尊”的气概予以大大的打击，同时掀起了地方势力对宋子文的普遍的不满情绪。

宋子文为了伸张势力，引起了CC派和部分地方势力的反抗了。在初宋子文以太上老君的姿态来“协调”广东“凡间”的派系斗争。到后来，他自己赤身露体跳入这派系斗争的漩涡了！宋子文的“均势主义”变成了“扩张政策”，他现在正开始自食其果。

一九四八.十.二十六

（原载《正报》114期，1948年11月6日）

宋粤限价政策解冻前后（综合报道）

（1948年11月9日）

黄 瑛

一、限价下的牺牲者

限价政策于十一月一日寿终正寝了。久已失踪的物品又在市场上出现了。但物价在漫天飞涨，一切又恢复了币改前的老样子，不过人民的生活更恶化，物价的飞跃更加速。老百姓经过了这七十多天的经管新政策，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力差不多被消耗光了。宛如做了一场恶梦，梦醒后大家对于蒋政府抢掠的骗局，更认识得清楚了！

谁都不会忘记限价时期中广州市所演过的悲剧，霍宝树督导下的物价政策是完全不合理的，限价使商人亏本，物资向四乡逃亡，而老百姓则眼看自己积蓄下的一些金钞变为废纸，更不愿保存它。大家争先购买物资，于是演成了抢购风潮，越抢购物资越逃亡，在上月中旬，广州物资大量疏散，广三线上火车均告满载。当广州市的商店货橱稀少时，佛山镇各商店存货却是满框满架，花纱，布匹，糖油，面粉等各色俱全。所有的僻静街巷的古老房屋，都变成临时货栈。

最惨的莫如肉荒中购肉的悲剧。实施限价后，本市猪只来源日减，猪肉零售要凭户口证购买，每人限购四两，人们要从天未亮未开市之前就去肉档前排队。肉少人多，男女老幼有如冲锋面敌，为了买一点肉，打架，挤伤，失鞋，失屐已经层出不穷，而弄出人命的也时有所闻，象在海珠市场，一个背着小孩购肉的妇人，困于重

围中达两三点钟之久，孩子被挤得窒息殒命了；河南蜃口市场有一个十四岁小童被挤死，两小童被挤晕厥；西关市场有一老妇在人丛中领取猪肉，因卖肉的人一时过于忙乱，把她的手指也斩下来；东华路市场某肉店，为略事限制顾客抢购，关闭铁闸，但因抢购太多，妇孺都挤上门口空着的肉枱上面，守候采购，其中有一孕妇，在人堆中候购，由于拥挤竟把肉枱挤倒，将孕妇压伤，当场晕倒；在禺山市场，有一个十二岁孩子挤购猪肉，失足坠井毙命，这是“经营”所给予老百姓的“德政”。统治者一手造成的悲剧，已经在广州市民的脑海中深深印下来。

至于工商界呢？在限价中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不可计算了。他们过的日子是最黑暗的日子，由于限价使成品售价不够本钱，而原料奇缺，工人生活费用突涨数倍，使成本增加无法支持，全市除了几家尚有原料的省营工厂能少量生产之外，民营工厂相继倒闭。在河南的手工业厂场，有一天曾倒闭二十二家之多。上月底面倒呈闭者亦有二三十家之多。广州的织布厂近因配纱停顿，使全部停业。

在广州“经管政策”实行下曾经有一段纱业风波的小插曲，从币制改革后由于京沪限制纱布南运。使广州花纱不足，弄得纱业生意日趋绝境，而再加以强迫配纱，使纱商不堪亏累，纱商公会理事长伍锡璋的逃出香港，便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更忙个不了，纱业商在一个月以来，歇业他往及最近逃避他去者估计达五六十人之多，“纱布大王”伍锡璋逃港以后，棉纱市场顿呈混乱，纱庄倒闭风潮，有立刻即到之势，伍氏逃港之原因，据说因虚报花纱数量，纱业以为申报得少将来向黑市吸收数量及存货售出即将发生问题，故大部份多报存量，有关人士估计申报时本市各纱庄存纱仅一万条左右，而纱业申报总额竟达一万五千七百条，比实际数量多报了五千条，经管处信以为真，认为全市花纱足以全市消耗几个月，乃决定由纱商提出存货配给手织业生产。上月底更停止经纪人活动，将全市花纱仓库封存，监视纱商。依按规定，每逢星期二、五依公价将存纱分批配与手织业纱商虽曾配出一次，但因申报后一部份花纱之

逃避离市，市内花纱数量再见减少，实际上纱商已离维持经常之配纱，如以黑市价格购买花纱，照公价配出，则该业仅能弥补三分之一成本，亏折太大，当上月二十六日之第二次配纱，各号均认为无法支持，纱业中人对伍明白表示限价配售亏本太大，转口自由买卖也遭遇禁止，贴光了本钱活不下去，不把存货交出最多不过是特刑庭，所以不能对伍负责，可是伍又不得不向霍宝树负责，但他却为了负不起这责任而徬徨。因此只好藉赴南洋遍历为名，逃港了事，那知他走后会引起纱市风波。现在他是回到广州来了，这件事似告一段落，但是纱业所受到的损失是无法弥补了。

二、限价解冻以后

自限价政策放弃以后，宋子文为了应付华南物价暴涨，他在二日省委会议中，提出了一套所谓带有“社会改革”性的计划，要组织燃料、纱布、粮食、糖、油等生产供销委员会，统筹民生日用必需品，从生产到运销的工作。他只从治标方面去想法子来挽救经济崩溃，殊不知蒋政府那一套经济戡乱的法宝已把金融工商界的血液抽光了，在无止境的通货膨胀底下，民生凋蔽，生产萎缩，经济上已病入膏肓，再也无法挽救它死亡的命运了。假如这个政权还未垮台，它所订制的任何平价办法是行不通的，宋子文的抑价办法能生效吗？物价能平下去吗？看近一周来广州的物价就可使人瞭然了。自从经济管济补充办法公布后，物价空前大涨，普遍涨三倍至五倍，有的且达十倍，计一日上来每市石三十三元一角五分，四日价九十二元二角五分。食油一日每市担七十六元，四日价一百二十元，食盐一日价二十七元。四日价三十三元。二十支“新金城”一日价一百二十五元，四日价三百四十元。四十二支“蓝凤”一日价三百四十元，四日价四百二十元。大鹏细布一日价一百元，四日价一百六十元。到了七日，上等米议价已提高至一百六十元，二十支“新金城”提高至六千一百元，四十二支“蓝凤”更惊人的价格，上升达一万二千三百元，秦良玉布二百三十元，此外如工业原料也一

致上升。四日第一次议价的猪肉也加了六倍弱，牛肉加了七倍弱。国营交通事业由六日起增加四倍，消息传来百货市场为之沸腾，货物之上升，一天之间，涨价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同时又因为运费提价，物价不但受影响，来源也将成问题。本市三大公用事业也提出要加价。电话局预算增价计划是电话费由三元提至二十元，约增六倍半有余，电厂以煤价之增加而作加价比例，可能提高至每度电费一角九分六增至八角或一元，自来水也将随电厂加价而决定。

食品因无限价之规定而大量出场，市场内摊子上，陈列得琳琅满目，种种色色应有尽有，但价格太高，市民购买力低下而冷落，如五、六日各肉贩大有供过于求，卖余肉类甚多。整个的市场是麻痹了。商人因物价涨得太急剧抛售存货以后便补不进货物，故多采维持存货手段，以免亏折，其次因外汇涨，一般进口货输入成本俱增，货主虽多取港币本位，但不能以外币交易，故售出货物的金圆券，因受严格管制外汇买卖，商人不会套回外币，故进口货售出即遭亏折。迫令他们无法经营。

另一方面是由蒋政府最近的军事溃败之迅速，使北方南下的游资极为汹涌，据说每日逃出资金达二百万港元。本市十三行的金融黑市场又公开活跃起来了。抢购之风又再展开了。

三、公务员熬不下去了

公务员的生活是处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已快要熬不下去了。物价从未解冻前就波动，领一点薪水，不够养口，整天为柴米油盐而烦恼，于是无法安心工作，需要去东拉西借渡日子，因此迟到早退之风盛行，虽然欧阳驹颁布了八小时工作，但普通职员都不欢迎，谁都不会彻底执行命令，许多小职员说“工作实在拖着，因为吃不饱，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甚至裁员也不引起人们害怕，因为薪水少又拖欠，裁与不裁只是百步跟五十步之差罢了。

随着限价解冻公务人员加薪倍半法令也公布了，省府和市府的职员所表示的并不相同，没有计算到物价的人，是感到万分开心，

谈起来眉飞色舞，想得周密一点的依然是愁眉苦脸，以市政府来说，职员的薪金以八十元到一百元的占多数，加了一倍半也不过是百元到二百元，那是没有办法应付这狂涨的物价的。现在和公务员生活最密切的是米、油、肉、柴等，这些日用必需品不能稳定，从上涨一倍跳至三倍，五倍……七八倍，还要涨下去。公共汽车从五日开始增价，全票三角，优待票二角。新增票价较前票价增加百分之一百。这一切都是使公务员头痛的。因之大家在借贷无门，典当无物中感受到无限苦痛！

专门靠着喝人民血液过日子的统治者，并不会那么仁慈的照顾公教人员生活的。他们给你一点东西，一定要在你身上取回一点，广州市府已决定重新调整租税，用加税收入来补助发薪饷，除了旅馆戏院，税项较为固定调整之外。其他各种税收则按月征收。租税增加，也刺激了物价上涨，因为工商业负担不起只好转嫁于消费者，这样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九日寄于广州）

（原载《正报》115期，1948年11月13日）

敌人在苦撑待死（粤局述评）

（1948年11月）

千山

一年来南宋残局的变化发展，并不很复杂，而是清楚地沿着一条死亡线走。我们早已看见“困难紧跟敌人”（年初本刊七十二期），指出他们挣扎向死亡。其后伪省参四届大会期中，宋子文检阅新兵，到达了挣扎的最高峰，我们又看见“宋子文下斜坡”（本

刊九十八期)，指出他们的县政改革，由于大势已去，无所适从；经济建设，由于美援有限，一筹莫展；军事布署，由于兵力薄弱，捉襟见肘。而敌人在走下坡路中，窘态愈益显露，我们更看见“敌人呼救无门”（本刊百期纪念特大号），指出敌人上下交困，为了救得一时得一时，上下都在吃苦头。现在，我们最后看见了“敌人在苦撑待死”了。

去年解放大军过了黄河，反攻华中，濯足长江，一片“渡江”的呼声，惊吓得美蒋——特别老宋魂不附体。他一直急跳着脚，鼓其挣扎的余力“拼命硬干”（宋原语），在死亡圈里不停走动，活象热锅上的蚂蚁。挣扎经年，呼救无门。现在，人民解放大军发动的“无疑将要达到加速全中国的解放”的秋季攻势来临了，而且胜利接着胜利，“已经缩短中国的革命过程”。目前是距离南京仅四十余公里的蚌埠及徐州在围攻中，砲火响澈华西、华南了；走头无路的四大家族的“败运主子”之一的宋帮，这回又有什么“表情”呢？

敌人形势日蹙，来日无多。虽然伪“省新闻处”及官报半官报时断时续的，炒些旧新闻，但究其实际，则早已放下一切“不急之务”了。说开发建设吗？海南岛将让给广州的所谓“琼崖同乡会”，再喊出“海南改省”去揽花样，而一点环岛铁路连管理人员实早已经撤光；为了获取外汇，输出田独矿砂赴日，“订有合同，本年内输日二十五万吨，至九月上旬，已输出十九万吨，下月便运完”，“一俟田独开采完毕，矿局人马，便将移师石碌”（十一月八日《国民日报》载称），如此便算。一切开发建设或“经建”“军建”云云，久已乎司徒雷登，巴大维以至赖朴翰南游摇了头以后烟消云散了。此外，黄埔港还是旧日的黄埔港，没有拿钱，没有动工，一就是一，不能变做二，每隔几时，报上登出一条新闻，实属旧闻。粤汉铁路是顶要紧的，据传已与浙赣铁路驳了轨，这就是勾通京沪、武汉两地至广州的退路，可怜美援来得“确乎慢”，露天堆积于九龙尖沙咀车站的若干器材，听雨淋日晒，连搬动它一程的气力都缺乏。全东北解放了，华北，华中仗打得紧，蒋败得惨，因而“煤”

在广东便有问题：“粤省存煤只有三个月，而台煤因运输关系已不能来粤，故需南岭煤矿甚急”。在这一急之下，且看八日《华侨报》载一段宋、杜对白吧：

“粤汉铁路管理局杜局长镇远兄：南岭支线（狗牙洞支线）限于三十八年一月完工。宋子文（签字）”。这是宋的“条谕”，该讯续载：顷据杜氏语记者称：“该线长四十八公里，现仍有百公尺以上之大桥两座，仍未兴工；此外尚有石方工程甚多，今离限期只有三个月期，欲赶筑完成，不无困难。同时（！）该线工程费改币后，原预算四百万元，现以物价波动，预算须六百万元。除已由银行投资三百万元已领用外，余尚无着落。”

蒋在前方打仗下“手令”，宋在后方建设落“条谕”，都是“盲指挥”。然不管怎样，这就算是宋在苦撑。

又像今春那时候一样，粤湘之间，粤桂之间来往频繁，可是所谈的八个字说完：“两省联防，物资交换”，问题在于谁救不了谁，这又是无效的苦撑之另一面。此外，最要紧的，兵力不足没得了，办法呢？“旅”改称为“师”。又说还要在广东成立什么四个警备“旅”或“师”，委出“师”“旅”长了，其实十几个破铜炼铁由“保安总队”改称为“保安团”的，再戴上一顶大帽而已。难道从天掉下兵源、弹粮给宋子文增点残威吗？当然，也算一种苦撑。

属于“苦撑”的现象，还有种种：地方团队点验过了，点出三、四人竟吃三、四十人空额等等，就是最大成绩；“县政改革”始终无所适从，但华振中说要本月出巡了，我们除了“祝”他一路平安，这些官样的东西，可不用预测他的下文的。至于其他改善公教员待遇，及所谓地方建设或禁烟、禁赌、禁娼、禁舞以至禁搭棚做戏，“不急之务”的振兴教育，提倡卫生，则一律不在“苦撑”之列，“应毋庸议”。最最是属于苦撑要项：征税，征实、征借、征兵，就正是天天急催、层层贪污，层层加重抽剥人民。他们“苦撑”也为了反人民，又在反人民中“苦撑”。

一切老实的广东人民体验了对宋子文的“五望”阶段希望、观望、失望、怨望、绝望之后，反动派在政治上便愈益孤立，已失去一切哄骗基础。反动派之间自相冲突，经过沙面事件、朱克勤案、市商会竞选、吴履逊陈伟烈案，私套外汇和经检与经调队等等尖锐对立，及最后明争暗夺伪省市党主委、说明由于反人民分子都为了自私自利立场，这些敌人内部争吵到了整个阵营快将垮台的时候，因各人心里有数，不到垮台绝无了期。

根据上述征象，其苦撑是无前途的，敌之形势只有越变越坏，人民形势必定越变越好，故敌人是苦撑待“死”已不是苦撑待“变”，虽则其主观企图是要待“变”，但形势比人还强，前面就是他的绝路了。并由此可见，今天广东敌情的特点，就是上下交困，谁救不了谁；贪污腐化，分崩离折，达于极点，无可收拾；民心尽失，兵力不足，政治孤立，余威微薄；而时间因素日益有利于人民，不利于敌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敌人苦撑待死！

而全省各个地区已立于不拔之地的武装人民则已达到经常歼灭一连一连的敌人，正在走向建立更强大主力发展，将要经常围歼一营一团以至最后一旅的敌人。华南人民武装既已宣布“当前行动纲领”，力行正确政策，因此与人民大众结合得更加紧密和广大，将要在政治上也完全打败宋子文。让我们看看“新华社郑州七日电”几句话吧！

“白（略一字）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

立起来。”

这些话大体可移用于广东，我们广东的敌人也同样或必将要完全孤立起来了。

然而，我们这里说“敌人苦撑待死”，还不是等于说“敌人束手待毙”，只要从玲珑的字面上已可明白的。在人民解放军由北向南迅风一样的胜利进攻中，小袁世凯“迁都”一幕若果很快出现，这将是给广东人民以配合南进大军迎击南逃“落难狗”一个大好机会，应注意这一态势；而如果很快的小朝廷布置“树倒猢猻散”局面，南宋以割据残山剩水勾引美援，并作“取之广东人民而用之反广东人民”，利用抽剥广东的三征所得的兵源、物资，打算苟延残喘，从事“苦撑”他的死灭会有其迴光返照的一瞬是又应具体掌握时机，并在具体斗争中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宜抱轻敌态度的。

（原载《正报》115期，1948年11月13日）

休 刊 词

——告别读者

（1948年11月）

正报同人

广大读者每周阅读惯了《正报》，如今要突然地中断了；我们——《正报》同人，在休刊号出版以后，也要突然地脱离开久经日夕相对的工作和这个工作中的对象了。大家怎能没有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呢！

然而，我们不应也不会有什么“离愁别恨”的。当我们和我们

的读者大众，都能瞭然于这次《正报》休刊有其重大意义的时候，就一定会一致认识到这完全不是值得可悲的现象，反之，而是非常可喜的；这一举，原来并非出于不得已，反之，乃是全国和华南人民革命形势之发展，使我们必须主动的作新的调整与新的部署。由于这样，我们“惜别”的波动情绪，毫无疑问的，便应当要化为激烈的猛进力量了。

如广大读者所周知，目前形势是上半个中国已经完全解放了和正在完全解放中，而下半个中国也已面对完全解放之前夕了。没有别的，正是这个祖国解放斗争形势的急激新局面，在向留居海外的儿女们招手。因而两三年前来自祖国大地的儿女们，许多急不暇待的要回归祖国去了，祖国需要他们。不难瞭然，留港宣教阵线的调整，是由于全国和华南人民胜利的形势开展的必然要求，《正报》的休刊就是明白表现出来的，当前人民伟大胜利的形势在此地一个较显著的反映。因此，这毋宁说是大家所最热切欢迎的，再也用不着怀抱任何犹疑了。

中国最近三年，是光明压倒黑暗的三年。《正报》经历了这不平凡的三年，自从香港复员之初创刊，以两日小型报出现，约经大半载；其后东纵北撤，改为期刊，由旬刊而周刊，至今也已出版至第三年第十五期。本社前后工作同人，自愧经验浅薄、才识不丰，我们的编写工作很不高明；发行工作和组织稿源有客观困难，主观努力也很不够；我们办理的出版书册、书业门市、图书借阅、放映电影等工作，都经常不免有错误有缺点；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深切自责，并决心在另一工作岗位上将要更大的提高自己的负责精神的。但由于我们是在伟大的正确方针领导下，在许多忠诚能干的人民作家协助下，在广大的各地热心读者坚强支持下，齐心合力，勤奋工作，正如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大凡老老实实工作决不会落空的，我们的工作也曾经获得了应有的效果。

两年前，在美帝国主义主使下的蒋介石撕毁当时《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破坏和平，大打出手，使大半个中国继着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之后又被沉没在暗无天日的长夜中。而张发奎、罗卓英在广东全省横行霸道，弃信忘义，逮捕东纵复员人员，残杀抗日有功群众，日益加深抽剥压迫地方人民，造成广东的灾难重重。我们曾经再三严重警告这些反动头子无效，我们经过向人民揭露他们的丑态，直斥他们的残暴兽行；又向人民分析现实，透露光明，减却了万恶敌人的余威，增长了广东人民的斗志，正确指出困难紧紧跟着敌人，响亮地传播重新起来战斗的号召，南中国人民自卫求生的斗争随即开展和提高。宋子文到粤，来头很大，来势更凶，他担负出卖华南为美帝殖民地，及布署广东为全国反动内战支撑点的任务而来。他图谋增编反动兵力以便全面进行屠杀武装人民；他不断放出什么开发建设的空气，藉以骗取市民和侨胞对其幻想。我们除明确的指出宋之南来，是为着蒋朝“准备后事”外，还播送着华南人民斗争的指导方针：开头提出“和宋子文做力量发展的竞赛”，号召“走在宋子文前头”；又当人民武装力量在发展上取得上升的优势，而宋子文在竞赛中判定要输了的时候，接着吹响“放手发展，大胆进攻”的进军号角，并一再申论“坚决执行正确方针”；结果，宋子文走了龟步，人民走了虎步。从宋子文到差至今一周年计算，其反动兵力仅增添百分之六十（其损失兵力达三个团未作减除），而广东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在同时期内，是增长了两倍半。人民武装活动地区在罗卓英时期约占全省半数县份，如今在宋子文时期的一年中已是名符其实的遍及全省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线小块到联成大块，目前从琼崖以至全省东西南北中各个人民武装控制地区，已经立于坚强不拔之地。最近配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秋季攻势，为了提高和扩大动员华南各阶层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正报》一一〇期社论又发表了新的口号：“和宋子文打政治仗”；同时报道了《华南人民武装的当前行动纲领》，及进行介绍和交流人民武装新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成绩和经验。这一切都为了推动华南人民结合军事胜利的发展，同样要“从政治上打败宋子文”，以便加速华南解放斗争到达最后胜利。上述种种，就是《正报》创刊以

来、休刊以前，执行其本身主要任务的基本情况。可以由此说明《正报》作为华南人民斗争的一翼，是面向现实，面向斗争，面向群众，随时势推移，代表了人民要说的话，起了提高和促进人民斗志和斗争胜利的作用的。由于我们接受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们做到能够在政治上向人民严肃负责，今天华南胜利局面的开展，我们和全体战斗的人民群众享有共同的光荣。我们应当感激领导的正确和读者的爱护督责的。

《正报》作为华南人民斗争的一翼，我们也曾经正视着宋子文为其四大家族布置后事，割卖广东，进行其大吹大擂的所谓“经建”的实际。最初向人民暴露了他卖国求援的勾当，接着又揭穿了他在“经建”烟幕掩护下阴谋“军建”的实质，最后更如实报导和指穿了广东反动派的“经建”与“军建”及其全部“布置后事”工作的落空，因而使得广东人民及侨胞洞悉敌情真相，既不致于轻敌，也没有被敌人的挖破面孔，狂夸美援及一切装腔作势所吓倒。

《正报》作为华南人民斗争的一翼，也不仅限于报道和指导了南方斗争的开展实况和进展步骤，并调整着各个地区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及交流着各个地区的工作技术和经验，喊出了人民的呼声，又研究了敌情，在宣传任务上起了相当的作用；而且，从其创刊开始即已逐渐和不断加强着对人民干部和青年群众的思想改造和作风改造的教育工作，例如发动回农村的行动在广大侨众中做了思想准备，继而实际推动了这一行动的广大实践；又前后发表“献给人民团体”、“三年游击战争”两个长篇连载，以及及时的组织了許多研究学习、整风反省的各种文章，总结和提高了人民斗争的经验与理论，因而在教育任务上也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的。关于配合当地青年工作以至文艺运动的开展与进展，在《正报》的篇幅上也发表了很大数量的文章；关于全国各地解放区报道及其军事、政治、文化工作经验的学习，关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战局、政局的发展变化的简明概括的论述，这些都在许多人民作家帮忙下，尽了一定程度的力量，对读者有其足称的贡献。总之，过去两三年来，《正报》是负担着人民

当前斗争所付予的宣教任务，坚持不懈，而直至目前，其任务是还未完了的。

可是斗争形势决定着斗争的一切。由于人民解放胜利斗争局的开展，召唤着更多的斗士集中其心智体力于祖国大地上，以迎接人民的全国最后胜利；由于人力的推移关系，因而《正报》宣布休刊，结束工作，其人手又转向工作的新途，这是出于必要也就应当的了。同时，其未了任务也就得移交于其友军，我们可以相信，这虽则只有加重在港友军的负荷，而对于读者的给予，则无疑将是一样而且更为集中，决不致使我们的读者失望的。相反的，在祖国南方大地许多角落上，《正报》的精神将如流星般的闪露光芒。所以，这次《正报》的休刊，并不是出于任何别的什么原因，也完全不是整个服务人民斗争的宣教事业的削弱，而仅仅表现了斗争工作的调整及其方式的变换而已。这是由于适应整个情况的需要，深知必为明瞭的读者诸君所鉴谅的。

未了，对于一切协助本报工作的许多人民工作者，及一切乐捐和出力热烈支持我们办报的广大的各地读者，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你们曾经使我们深切体验到“依靠群众”是战胜一切的法宝——这个真理。我们永不会忘记，我们几年来做的办报及出版革命读物、办理书业门市、图书借阅、演出苏联片等各种事业，无一不在读者教导和群众力量扶助下获得成就；并且依据已往事实还可证明：假如需要，《正报》的一切工作是确实可能得到更大援助而长期发展下去，绝不会有无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既然形势的有利要求，不在于《正报》的继续办下去，而在于移交任务与转移人力，那么，我们便得为适应斗争而毅然告别读者了。

读者们，暂别了！在斗争的另一翼上再见！

敬祝

康乐与前进！

正报同人

（原载《正报》115期，1948年11月13日）